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

第六卷(上册)

中国金融出版社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

Selected Works on Economics of Joseph E. Stiglitz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



第六卷

（上）



发展与发展政策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Policy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著

纪沫　全冰　海荣

陈雨露　校

中国金融出版社

总 策 划：林铁钢
责任编辑：何　为
责任校对：刘　明
责任印制：裴　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与发展政策（Fazhan yu Fazhan Zhengce）/（美）斯蒂格利茨（Stiglitz，J. E.）著；纪沫，仝冰，海荣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7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6）
书名原文：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Policy
ISBN 978－7－5049－4250－0

Ⅰ．发…　Ⅱ．①斯…②纪…③仝…④海…　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研究　Ⅳ．F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187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72190，66070804（传真）
网 上 书 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63365686（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55 毫米×235 毫米
印张　33
字数　592 千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0 元（1—6 卷）
ISBN 978－7－5049－4250－0/F. 3810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63263947

目　录

第六卷导言

本卷转向研究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发展和转型问题。其中收录了我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发表的重要论文和演讲稿，在此前后撰写的一些学术性与应用性论文，以及几篇与中国直接相关的文章。

本卷第一组论文提出了从市场失灵的角度研究发展问题的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去解决这些市场失灵问题。无论如何发展政策应该认识到市场的这些局限性。这有助于对华盛顿共识政策（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市场运行良好的假设为依据的）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但是，对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批评性分析需要更加深入。由于这些政策只是将发展简单地视为资源的积累，所以只要市场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提高。但是，我认为，发展的含义甚为宽泛，其中包括社会的基本转型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的知识差距的消除。

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都居住在农村地区，因此理解农业部门中的经济组织就非常重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像分成制和放款人（money lenders）等制度安排发挥着重要作用。忽略这些制度（比如只是简单地考察劳动力和土地的供求关系），就不可能理解农业部门。通过几篇文章，我构建了一个农业组织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信息的不完美性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用这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分成制持续存在的原因，以及其他像信贷、劳动力、土地和产品市场相互关联这样一些特征之所以会存在的根源。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经济试验。将俄罗斯和中国进行对比，就会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俄罗斯失败了，而中国成功了。我认为，有些关键性的差异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强调创建新企业，俄罗斯则强调私有化老企业；中国强调实质性的稳定，俄罗斯则强调价格稳定；俄罗斯的公司治理很薄弱，但中国却通过乡镇企业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近年的讨论则十分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比如在讨论公

司治理问题时）。但是，在“‘激进式改革’之后？部分国家法治建立的障碍”这篇文章中，我和卡拉·霍夫（Karla Hoff）指出，经济学和政治学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像资本市场自由化和高利率等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建设法治社会的激励。

许多转型国家面临的问题反映了改革的一个共同问题。与实施改革或组织改革的拥护者相比，只是说说政府应该做什么那真是容易多了。这些经验是我撰写“对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一文的基础。

除了转型之外，20世纪后半期最引人注目的经济事件可能就是始于东亚的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此后来有许多争论——包括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怎样做才能防止下一场危机的爆发。虽然我就此主题写过大量文章，但是发表在《金融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e*）上的短文却是一个颇为中肯的综述。

本卷最后三篇文章是我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的不同时点，对中国的转型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其中，第一篇文章是我在Wingspread会议中心所作报告的底稿，关于这次会议，我已经在第一卷的导言中介绍过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写的东西，我认为对竞争（相比私有化）重要性的强调是正确的。

1990年，我受世界银行之邀，帮助他们分析东亚经济为什么会成功。这个研究项目最终为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引用率很高的书《东亚的奇迹》（*The East Asia Miracle*）。作为研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与钱颖一教授在广东考察了一段时间。在我们两个合作撰写的文章中已经说明，地方政府在广东省的成功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最后一篇文章是我与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他接替我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阿萨·胡塞因（Athar Hussain）合作撰写的。我们力图从比较的角度，更加全面地解释中国的成功。

新发展经济学*

基于理性农民不完美信息与信息成本的农业组织理论，为欠发达国家的很多现象提供了简明的解释。它对为什么分成制（sharecropping）如此普遍，以及分成制为何采取特定模式，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它也对信贷市场和土地市场的联系，以及成本共担的模式做出了解释。本文认为，这一理论比竞争理论更好地解释了这些现象。这一理论可以被视为更一般的范式，即"不完美信息范式"的重要应用，而不完美信息范式对解释各种经济现象非常有用，包括竞争、寡头和垄断；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和产品市场；以及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各种经济现象。

一、引言

在过去的 15 年中，我一直努力建立一个对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过程的一贯性的主张，以辨别它们与发达国家在哪些方面相似，在哪些方面不同和为什么不同?[1] 这里我无法对这些主张做出总结陈述。我现在的任务是，展示其中与农村部门经济组织有关的方面，并且解释为什么我（或者其他人）应该"相信"这些理论，或者至少，为什么它们比其他一些广为讨论的理论更合理。

我的研究遵循了以下五个主要原则：

1. 个体（包括欠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农民）理性，即他们以（合理）一致的方式行事，并能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应性改变。

2. 信息具有成本。这有很多重要的含义：个体无法获取完美信息，因此他们的行为与信息完美环境下的行为有显著的差别。当个体从事交易（购买劳动力服务，信贷，租用土地或牲畜）时，对所交易的物品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完美的。因此，完美信息假定下的理想交易可能不会发生。同样地，某些合同（比如，根据一定的标准提供特定的服务）可能是不可行的；

---

* "Th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ld Development*, 14 (2), 1986, pp. 257 - 265. 我很感激与 A. Braverman 以及 R. Sah 进行的有益的讨论。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财力支持。

1 有关这项工作某些方面的两个综述，参见 Stiglitz（1982b、1985）。

特别是事后很难辨明这些服务是否已经提供，或者很难鉴定服务质量好坏的情形下，合约更是难以执行。

3. 制度能够反映这些信息成本（以及其他交易成本）。因此，制度被看作是内生的，而非外生的，并且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制度结构发生滞后性的变化。

4. 个体理性以及制度内生于信息结构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经济具备（帕累托）效率。市场经济的效率，只在阿罗（Arrow）和德布鲁（Debreu）所探求的特殊环境集合下是可得的。这个集合包括一组完全市场和完美信息，这些条件在发达国家是否存在是可疑的，而在欠发达国家显然是毫不相关。由于信息不完美和市场不完全，欠发达经济几乎总是受约束的帕累托无效率，也就是一系列税收和补贴的存在可以改善每个人的福利。

5. 这意味着政府可以起到潜在的作用。就是说，政府可以带来帕累托改进，如果（ⅰ）政府对经济结构有充分的信息；（ⅱ）政府政策的执行者至少拥有与私有部门同样多的信息；（ⅲ）那些负责制定和执行政府政策的部门，存在激励引导政策实现帕累托改进，而不是实行收入再分配（将收入从穷人转移给富人或者反之，或者将收入从每一个人转移给另外的人）——这种再分配通常会带来国民产出的重大损失。信息问题，包括激励问题，在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一样重要；我们对后者研究的较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前者中不存在信息和激励问题。因此我们在建议政府采取某些行动弥补市场缺陷时一定要保持谨慎。

二、农业组织理论概述

在本部分，我将说明上述的一般性方法对于农业部门经济组织的见解。在各个欠发达国家可以观察到很多种制度安排。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分成制颇感兴趣。对分成制的早期观点是，它是一种无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工人的所得低于其边际产出价值，因此他们缺乏激励努力工作。问题是，这种看起来无效的经济组织形式为什么能够存活如此之久（以及为什么它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期，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组织形式），对那些甚至相信经济理性的人们来说，需要找到一些解释。

可以想到的一个解释是，农民对风险的厌恶更甚于地主；如果工人向地主租用土地，他们将要承担全部风险。工人的风险厌恶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但它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还可以有其他的（也许更加有效）风险分担安排。尤其是，通过实行工资制度，可以由地主承担全部风险，工人不承担

风险。工人可以作为工资劳动者进行工作，也可以在自己或者租来的土地上工作，通过将时间在这二者之间适当分配，可以实现工人和地主之间任何程度的风险分担。[2]

对分成制的另外一个重要解释是，当存在监督成本时，它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体系。因为在工资制度中，工人的收入不是直接与产出相关，地主必须花费资源来确保工人真正在工作。在分成制中，由于工人的报酬直接取决于其产出，他受到工作的激励。这种激励可能不会像他们自己拥有土地那么强烈（因为他们只能得到一部分（比如，一半）产出）；但这种自己拥有土地的风险安排忽视农民的风险厌恶。因此分成制代表这样一种折中：在租赁制度（rental system）中，激励是“正确的”，但工人承担所有的风险；在工资制度中，地主承担所有风险，但只能通过监督使工人努力工作。这一新观点（Stiglitz，1974）彻底转变对分成制的传统批判：正是由于相对于工资制度的激励性质，分成制才得以广泛采用。

但是租赁制度提供正确激励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租赁制度为佃农努力程度的决定提供了正确激励。但是佃农还要做出许多其他决定：包括对技术的选择、化肥的使用、收割时间的决定等。这些决策会影响产出的风险程度。例如，许多高产的种子平均产量较高，但对降雨却很敏感。每当存在违约的可能（即佃农不按照承诺支付租金）时，在租赁制度下，佃农就会缺乏做这些决定的正确激励。当然，在租赁制度下，由于是无限责任，使佃农承担了所有的成本。但是即便佃农做出所有的“正确”决定也可能仍然无法缴纳租金，并且常常很难辨别个体是否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大多数社会都不愿给予佃农无限责任，或采取如债务人监狱这样的极端措施，来确保个体不承担不必要的风险。[3] 因此，实际上，佃农承担的一部分风险成本是由地主承担的。[4] 在分成制度下，地主和佃农面临同样的风险。[5]

因此，可以把分成制视为基于以下原因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a）工人方面的风险厌恶；（b）当佃农无法支付租金时，迫使其支付租金的能力（或愿望）有限；以及（c）监督佃农行为的能力有限（或者这样做的成本很高）。

---

2 Stiglitz（1974）.

3 事实上，这种极端的措施会产生有害的激励效应，从而阻碍风险承担。

4 Johnson（1950）；Allen（1985）.

5 Johnson（1950）、Braverman and Stiglitz（1982a）强调了分成制的这一方面。参见 Stiglitz and Weiss（1981）。

一般性的理论已在许多方向得以拓展，我这里只对其中的三点加以讨论：成本分担、相互联系和技术变化。

在许多情况下，除了劳动力和土地，还有其他重要投入，比如耕牛或者肥料。如何支付这些投入？显然，如果工人支付全部成本，而只得到收益的一部分，他将没有足够的激励来提供这些投入。成本分担是一种补救方法。如果工人得到50%的产出，并支付50%的成本，他会有正确的激励：成本和收益都被减半。[6]

成本份额等于产出份额的规则看起来合理，但并不普遍。如何解释经济现实对这一规则的偏离呢？为寻找答案，我们需要再次回到一般理论框架，强调不完美信息的作用。首先，如果增加施肥可以增加边际劳动产品，则相对于50—50的规则，显然地主希望佃农更多地提供肥料，从而诱导工人更加努力工作。请记住，地主的核心问题是他不能直接控制工人的行为，他必须诱导他们努力工作。使用分成制的原因是它能够提供这些额外的激励。

但如果成本分担安排可以实施，这意味着可以对支出予以监督。如果对投入的支出能够得到监督，就没有采取成本分担的必要。相反，可以在合同条款中规定不同投入的水平。但一般来说，工人相对于地主对当前环境有更多的信息（用时髦的技术术语来说，存在一种信息不对称）。对投入水平作具体规定的合同，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成本分担合同提供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和激励，从而比简单规定投入水平的合同更加有效率。[7]

在许多欠发达国家中，经济组织的另一特性是市场的相互联系：地主在出租土地的同时，也会提供信贷（他还可能提供食物和其他投入）。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相互联系？一些人认为这只是地主剥削工人的另一种方式。我们稍后将对这些解释加以评论。现在，我们仅仅指出，我们的一般性理论能够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流行（在竞争和非竞争情形下）。我们已经一再指出地主的任务是诱导工人努力工作，并且做出从他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决定（关于技术选择、收割时机等的决定）。对于贷款人来说，存在完全类似的问题。他们担心借款人会拖欠贷款。拖欠的概率部分地取决于借款人所采取的行动。佃农—借款人的行动因此既影响贷款人，也影响地主。需要注意的是与地主签订的合约的条款也会影响贷款人，反之亦然：如果地主能够通过提供更多的肥料来降低违约概率，贷款人的福利会增加。借款人的行为

6 Heady（1947）。

7 Braverman and Stiglitz（1982b）。

（包括努力程度和技术选择）会受个体负债的影响，因此地主的（预期）收入可能受负债金额（条款）的影响。在地主和贷款人的行为之间，显然存在有可能是很重要的外部性。对于这种外部性，一个自然的市场办法是将外部性内部化，而这正是市场间的相互联系所能够实现的。[8]

因此，相互联系是由提高经济效率的愿望导致的，不一定是由于地主想进一步剥削工人。

相互联系的特征反过来与地主拒绝有利可图的创新的激励相关联。例如，Bhaduri[9] 认为，地主—债权人会拒绝创新，因为创新会减少对信贷的需求，从而减少他们作为债权人的收入。布雷弗曼（Braverman）和斯蒂格利茨[10]证明，创新并不必然导致信贷需求降低。信贷是用来平滑各期收入的，而在相当合理的条件下，创新既可提高也可降低信贷总需求。但他们进一步认为，信贷需求的变化并不是重点。

核心问题是，创新是否使经济的效用可能性曲线向外或向内移动。效用可能性曲线是，在一方（工人）的（预期）效用水平给定的情形下，另一方（地主）的（预期）效用的最高水平。与经济现实相关的效用可能性曲线考虑到信息问题，而后者正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例如，在存在分成制时，个体激励与没有监督成本时不同。没有监督成本时的效用可能性曲线可能以一种方式移动，而现实经济的效用可能性曲线会以另一种方式移动。因此存在某种创新，可以在每一种投入水平上提高产出，同时，会恶化激励—监督问题。这样的创新从社会角度来看是不合意的。地主将抵制这种创新，尽管从"工程"的角度来看，那样的创新是合意的。

从这一角度看，相互联系对于是否采纳创新的影响是模糊的。有些创新在具有相互联系时会被采纳，而没有相互联系时则不会被采纳，反之亦然；但是创新对信贷需求的影响，似乎并不重要。

尽管地主会为创新的激励—监督后果感到担忧，但是不能仓促得出结论，地主总是做出使他们效用最大化的决定，或者地主总是做出具有社会效率的决定。在竞争的环境中，如果在现有的价格（或合同条款）下，采纳

---

8 Braverman and Stiglitz（1982a）。在更一般信息理论文献中，在多重委托—代理问题中对此进行了讨论。我们这里讨论的外部性几乎出现在所有的道德风险问题中。参见 Arnott 和 Stiglitz（1984）。

9 Bhaduri（1984）。

10 Braverman and Stiglitz（即将发表）。

一项创新有利可图，地主就会这样做。当然，当所有的地主都采纳创新，价格（合同条款）会发生改变，这可能对地主产生不利。[11]在竞争环境下，尽管一项创新可能对地主不利，他们不太可能抵制创新（相反，如果他们处在“垄断”地位，他们将不希望抵制这样的创新，因为他们将获取所有与创新相关的剩余）。

但是，正如存在道德风险问题时，市场配置不是受约束的帕累托有效（即便是完全竞争经济也是如此），与创新有关的市场决策也不是受约束的帕累托有效（我们使用受约束的帕累托有效来表明我们考虑到了对信息的限制；我们假设政府不拥有任何私人个体不具有的信息）。尽管从原则上来讲，存在可以使每个人福利增加的政府干预（考虑到信息费用），这种帕累托改进的干预是否可能从政治过程中产生，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三、其他理论

在这一部分，我希望总结一些我认为重要的理论，它们对于农业部门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有一定的解释力。

在很多方面，我认为我的观点处于其他更极端的观点之间。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是理性的，他们在完全信息和完全竞争市场的环境中工作。根据这一观点，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的差异，并不在于精明的、效用最大化的农民和未受教育、依习惯行事的农民之间的差异，而主要在于经济环境的不同、由这些经济生产的产品不同、它们的禀赋不同，以及它们的禀赋被用于生产产品的方式不同。根据这一观点，分成制是对风险分担问题的理性反应。但是对于我上面阐述过的激励问题，给予的关注较少。当存在完美信息并且合约可以完全执行时，分成合约可以实现理想的劳动力供给水平，并实现有效率的技术选择。这些理论对其他一些我已经讨论的现象几乎未作解释：相互联系、技术变化和成本分担。相互联系可以通过交易成本的优势来解释，但是如果交易成本是核心因素，我们只能观察到简单的成本分担规则（成本份额等于产出份额）。

与之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是非理性的，他们的行为受习俗和制度支配，这些习俗和制度在较早些时候具有某种职能，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这

11　如果在现有价格下，创新增加了对工人的需求，那么合同条款可能会变得更有利于工人，而使地主的福利降低。这和更简单情形下的庇古（Pigou）土地—储蓄创新相类似。

种职能。这一方法（我将其称为制度历史方法（institutional - historical approach））试图描述那些存在分成制、相互联系的市场和成本分担的欠发达国家。它试图把当前的实践与早期的实践联系起来。特别是，这种制度历史方法可能认为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导致了分成制的建立，或者信贷体系的发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回答以下问题：即，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欠发达国家建立了相似的制度结构，为什么在某些国家成本份额等于产品份额，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二者并不相等。根本问题是，理论必须解释早期的实践是如何形成的，而为了解释这些，又不得不诉诸其他理论。因此，从其自身来讲，制度历史方法是不完全的。

还有第三种观点强调农业部门不具备竞争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地主剥削工人的能力。在一些情形中，工人被束缚在土地上，法律约束会使地主处在剥削工人的位置。但是，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就需要解释地主是如何运用他们的强制力的。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存在运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很多地主在丰收和播种时节需要工人，工人可以选择为谁工作。重要的是，剥削假设不能解释存在很多地主的情形下，他们通过什么机制进行剥削。[12]更一般地，它不能解释随着时间和国家的不同剥削程度为何会有所变化。工资低的事实并不一定能证明剥削的存在：如果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很低，竞争市场中的工资同样会很低。

剥削假设同样也不能解释农业组织的内在结构：为什么成本份额会如此分配，或者那些剥削工人的地主为什么（或者如何）运用信贷市场来获取进一步剥削的能力。

所有的解释可能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一些正在消逝的制度和习俗。制度结构显然并不随着环境的变迁而迅速调整。然而，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目的是辨别社会行为的系统组成和规则，从而探求众多现象背后的一般原理。描述在欠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制度是有益的，但是远远不够。

因此，我将理性假设作为一个方便的起点，借助这个简单的一般原则，来理解经济行为。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一些不符合理性假设的事实。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目的是去寻找系统性的偏离。Tversky 在文章中指出，在个体的概率判断，特别是小概率事件中，存在系统性的偏离。但是

---

12 关注重复博弈的最新研究表明，合谋的产出即使在非合作情形下也可以实现。因此，如果农业经济中地主的流动性受限制，并且单个社区中地主的数目很少，则他们很可能采取合谋行动。然而，这些非合作性合谋安排产生的情形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

Binswanger1978年的研究指出，相对于不重要的决策，在“重要”决策中，与理论的背离显得较不重要。很多行为看起来是非“理性”的，事实上可以被解释为在不完美信息下的“理性”决策。

我同样也把竞争假设看作一个方便的出发点。[13]许多重要而有趣的现象可以不依赖于剥削假设而得到解释。一定程度的不完全竞争，与不完美信息框架并不是不一致的：不完美信息框架部分解释了完全竞争的存在；它有助于辨别地主在何种情形下可以更为方便地剥削工人。而且，只要不完美信息制约了垄断地主从工人那里抽取剩余的能力，不完美信息框架就可以为地主如何增加垄断利润提供思路。我们发展的相互联系理论，因此可以被应用到垄断地主的行为分析中。

还有另外一种理论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事实上，它与我支持的理论紧密相关：即交易费用方法，它试图通过交易费用来说明经济关系。信息成本是交易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其他情形中也会产生信息问题）。我对交易费用方法的保留之处在于，它缺乏针对性（specificity）：信息范式的理论结构清晰，使我们可以推导出明确的定理（例如，可以推出合约的结构），而交易费用范式却无法做到。因此，交易费用范式可能就为什么采用成本分担有所见解，但是对成本分担协议的条款却无法提供思路。交易费用范式可能会认为，范围经济对为什么地主也提供信贷做出了解释，但是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地主—债权人会补贴信贷，或者何种情况下他会对信贷“课税”（tax it）。而且，信息范式可以识别出影响地主和债权人之间外部性程度的参数，从而在原则上可以辨别出哪些环境下更可能出现相互联系；而交易费用范式只能说明在范围不经济超过了范围经济的一些情形下，不存在相互联系。

四、评估不同理论的标准

在前一部分，我简单地讨论了一些主要的理论假说。在本部分，我想列出用于评价理论的一组标准，并且利用这组标准评估这些不同的理论。这些标准不存在创新性；这里不打算提供一个一般性的认识论方面的理论。[14]而

13 事实上，在劳动力流动性有限的条件下，小村庄中的劳动力市场不太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同时，地主远远不是劳动力垄断者。相对于寡头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完全竞争模型，现实世界用“垄断竞争模型”来描述可能更为合适。

14 类似地，这里无法对不同的认识论理论（比如，Karl Popper的理论）做出评价。

是从一个“实践工作者”的角度来提出这些标准。

我们可以把这些标准分为两组：内部的和外部的。内部的标准包括：[15]

(a) 内部一致性：公理（暗含的假设）相互间一致吗？结论是由这些假设推出的吗？

(b) 简单性：一般地，解释给定现象所需要的假设越少越好。

(c) 完全性：模型的假设应该是尽可能的“原始”。因此，根据这种观点，在宏观经济学中通过价格刚性解释失业的理论是不完全的；它对价格为什么是刚性的问题没有做出解释。

外部的标准包括：

(a) 可检验性（或者证伪性）：原则上理论至少要有一些可以检验或者证伪的含义；即至少可以设计思路试验，在其中理论的某些含义可以被拒绝。

(b) 外部一致性：模型的所有含义是否与观察的事实一致？注意模型含义包括那些可以从假设直接推出来的（明显直接的含义）。因此，如果一个假设本身被否定，模型将不具备外部一致的性质。根据这种观点，弗里德曼（Friedman）认为理论只应该依据其结论是否有效来评判的论断是错误的。如果一个理论的假设不合理，即假设本身可以被证伪，或者假设有其他不可接受（即可以被证伪）的含义，则这种理论应该被拒绝。许多“坏”理论的一些含义有可能是正确的；事实上，大概所有理论的某些含义都会与数据（至少是对数据的某些解释）不一致。但是一个好的理论应该没有含义与观察到的事实不一致的情形。

(c) 外部完全性：理论应该可以解释研究领域所观察到的尽可能多的规则行为。因此，如果一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分成制，又可以解释份额的决定，则这个理论好于只能解释分成制为什么存在的理论。这与以下标准紧密相关：

(d) 特定性：一个好的理论应该做出尽可能多的与特定现象有关的具体预测。

(e) 预测力：一个好的理论不仅与已经观察到的规则行为相一致，而且应该能够预测没有被观察到的新的规则行为。

(f) 一般性：同一个普遍性假说应该能够解释在不同情形下观察到的

---

15 这里不打算穷尽所有的标准。在其他情形下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强健性；理论的结论应当对假设的微小变动不敏感。

现象。

我现在想要依据这些基本的标准来考察不同理论的性能。我认为，不完美信息范式在所有的标准上面表现良好。这一领域研究的特点是，清晰地陈述假设，并从假设中推导结论：它在内部一致性标准上表现得很好。同样地，它在另外两个内部标准上也表现得很好：假设简单而且合理的"原始"。尽管在大多数的工作中，信息技术被视作外生给定，但在目前的一些研究中，信息技术被看作内生决定的。理论提供了特定的可以被检验的预测，事实上，对于农业经济组织的每一个方面都有解释。它对于欠发达国家的许多规律现象做出了预测，不幸的是，这些还没有得到严格检验。同时，不存在明显的规律现象与理论预测不一致。

最吸引人的一个性质是，信息范式提供了一个一般性框架，可以同时被应用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和资本市场中，分成制中讨论过的努力和技术选择问题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出现了。这个特征与"理性农民、完美市场和完美信息"范式相类似。但是后面这个理论没能对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的差异提供很好的解释。

但是，我对"理性农民、完美市场和完美信息"范式（以及相应的发达经济的理论）的主要异议是，它与观察到的许多现象不一致，并且它不能对其他现象提供解释。

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分成制被采纳（在完美信息下，存在很多种等价的合约形式；如果采用分成制，合约会具体说明劳动力供给的数量）。

它无法解释成本分担，特别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成本份额与产出份额不同。

它假设存在一组完全的风险市场；很明显，个体不能为许多重要的风险购买保险，而这对他们的行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大多数的小村庄，如果地主给劳动者的工资减少一个卢比，他不会雇到任何工人——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在很多情形下，存在工人愿意在现行的工资下工作，却不能被雇佣。似乎存在非自愿失业，而这个现象看起来与古典竞争模型并不一致。

这个理论可以加以修改，以解释这些现象，并且使它看起来与事实不是那么矛盾[16]，事实上，我们的不完美信息范式可以被视作是这样一种修改。

---

16 当理论由于这些特定的修改而变得复杂时，它就失去了简单性。而这原本是此理论的主要优点之一。

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根本性的转变，它影响我们在很多种情形下对经济关系的看法。当一个理论的预测与很多种情形下的事实不符，并且无法对重要的现象提供解释，这时需要的不是基于每一个案例对模型进行特定的调整，而是一个彻底的重新构造：不完美信息范式提供了这样一种重新构造。

交易费用范式代表另外一种试图以一致性的方式修改基本理论的尝试。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评论的，信息成本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易费用，并且我发现交易费用方法的许多方面很吸引人。[17]但是这个理论不符合一些关键的外部标准：由于理论依赖于无法观测的交易费用，它经济不能通过可证伪性的检验；现有的经济关系集合由当前（无法观测到的）交易费用来解释，经济关系性质的变化也是借助于类似的无法观测的交易费用来“解释”。理论同样不能通过预测的针对性以及外部完全性的检验：就像我们指出过的，尽管它可以解释为什么采用分成制，却不能解释成本分担安排的性质，对于分成合约的其他条款也很难提供思路。

与之对照，剥削理论在判断理论的内部和外部标准上都无法通过。不存在清晰阐述的原始假设，无法由此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例如，如果经济关系结构是由地主剥削工人的企图决定的，那什么决定了他们这样做的能力？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分成制相对于其他合约安排是更好的剥削方式；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成本分担提高了地主剥削工人的能力。它不能解释成本份额超过产出份额的情形。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提供信贷增强了地主剥削农民的能力。它不能解释当一个公社中存在很多地主时，他们如何一起共谋行动。在其他领域中存在的卡特尔的经验表明，当参与者的数目较多时，很难保持自愿的共谋安排。如果这个经验在这里也成立，那么这个理论仅仅对社区中存在少数地主的经济关系的结构做出了解释；如果这个经验在欠发达国家不成立，那么原因是什么？

17　有人认为，一旦考虑进交易费用，理性农民的均衡性质将和无交易费用经济所具备的标准效率性质相同。这是又一例证：结论不是从假设中逻辑推导出来的；结论是通过类比推理得到。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就“像”是其他的生产成本。一旦考虑进交易费用，为什么经济不应该是依然有效率的？

遗憾的是，结果显示，一般来讲，不完美信息（或者不完全市场）的经济，不是“受约束的”帕累托有效率的（这里的“受约束的”帕累托有效率只是提醒我们，我们已经适当地考虑了交易成本（信息不完美、市场不完全））。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推测的严格表述，是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成就之一；经济学的根本定理，像其他的定理一样，依赖于假设。有关完美信息、无交易成本，以及完全市场的假设并非无关痛痒的假设，对于结论的有效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某些方面，信息成本可能像其他生产成本一样，但是他们的差异非常重要，足以使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失效。

这个理论中的权力概念无法独立地量化，因此这个理论不能被验证：我们总是可以借助权力的不同来解释合约在不同时期和国家的差异。[18]由于这个理论不能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因此它是严重不完全的。

五、结论

基于信息不完美和有成本的环境下理性农民的农业组织理论，为欠发达国家中的很多种现象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它代表了更一般范式的重要应用，这里我称之为“不完美信息范式”，它有助于解释很多种情形下的现象，这些情形包括：竞争条件、寡头条件和垄断条件；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社会现象如此丰富，以至于期望某一理论能够解释可观测的所有制度和行为的变化都是不合理的。但是一个理论至少应该解释重要的现象。在这里，我们主要关心分成制，如何解释分成制的广泛应用，以及它所采取的特定形式；一个理论至少应当解释成本分担，成本份额经常不等于产出份额，以及信贷和土地市场间的相互联系。我们的理论做到了这些，而竞争理论却不能。我们的理论还引出了一组丰富的预测，这些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当进行这些检验的时候，理论是否依然成立，或者需要修改，或者被摒弃，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Allen, F. ,“The fixed nature of sharecropping contrac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March 1985). pp. 30—48.

Arnott, R. , and J. E. Stiglitz, “Equilibrium in competitive insurance markets,” Mimeo.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Bhaduri, A. , “Agricultural backwardness under semifeudalism,” *Economic Journal* (1973).

Binswanger, H. P. , “Attitudes towards risk: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evidence in rural Indi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62, No. 3 (August 1980), pp. 395—407.

Binswanger, H. P. ,“Attitudes towards risk: Implic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an experiment in rural India,” Yale Un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P 286 (1978b).

Braverman, A. , and J. E, Stiglitz, “Sharecropping and the interlinking of agrarian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2, No. 4 (September1982a), pp. 695—715.

Braverman, A. , and J. E. stiglitz, “Moral hazard, incentive flexibility and risk: Cost sharing arrangements under sharecropp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Center Memorandum No. 298 (1982b).

Braverman, A. , and J. E. Stiglitz, “Cost sharing arrangements under sharecropping: Moral

18 因此，“权力”对于剥削理论，正如交易费用对于交易费用模型。

hazard, incentive flexibility and risk," Mimeo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5).

Braverman, A., and J. E. Stiglitz, "Landlords tenant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thcoming).

Greenwald, B., and J. E. Stiglitz,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e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

Heady, E., "Economics of farm leasing system."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August 1947).

Johnson, D. Gale "Resource allocation under share contrac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April 1950), pp. 111—123.

Newbery, D., and J. E. Stiglitz, "Sharecropping, risk shari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imperfect information." paper presented to a conference in Mexico City March 1976 and published in J, A. Roumasset *et al*, (Eds.), *Risk*, *Uncertainty and Development* (SEARCA, A/D/C, 1979) pp, 311—341.

Newbery, D., and J. E. Stiglitz, *The Theory of Commodity Price Stab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Newbery, D., and J. E. Stiglitz, "The choice of techniques and the optimality of market equilibrium with rational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0, No. 2 (April 1982), pp. 223—246.

Stiglitz, J. E., "Rural-urban migration, surplus labo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wages," *East Af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 - 2 (December 1969), pp. 1—27.

Stiglitz, J. E., "Alternate theories of wage determin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LDCs; The labor turnover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7 (May 1974), pp. 194—227.

Stiglitz, J. E., "Incentives and risk sharing in sharecropp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1 (April 1974), pp. 219—255.

Stiglitz, J. E., "The efficiency wage hypothesis, surplus labo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LDC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28, No. 2 (July 1976), pp. 185—207.

Stiglitz, J. E., "Some further remarks on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H, Schwartz and R. Berney (Eds), *Soci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of Project Evaluation* (IDB, 1977);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Cost-Benefit Analysis, IDB, Washington, D. C, March 1973, pp. 253—282.

Stiglitz, J. E.,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wage determination and unemployment: The efficiency wage model." in Gersovitz *et al.*, (Eds) *The Theory and Experi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Sir W. Arthur Lewi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a), pp. 78—106.

Stiglitz, J. 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s and shadow prices in LDCs," presented at World Bank Conference, February 1976, in R. Sabot, (Ed.) *Migr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b). pp. 13—64.

Stiglitz, J. E., "The wage-productivity hypothesis: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82).

Stiglitz, J. 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and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sta de Econometria* (forthcoming).

Stiglitz, J. E., and A. We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1, No. 3 (June 1981), pp. 393—410.

Tversky, A., "Intransitivity of preference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76 (1969), pp. 31—48.

市场、市场失灵与发展*

发展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解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差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除了更穷之外，即穷国的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更少之外，穷国在其他方面与富国都是一样的。针对这样一个诊断，直接就可以开出下列药方：通过向欠发达国家转移资本（既可以是直接援助也可以是教育）或者鼓励它们提高储蓄率来增加欠发达国家的资源。

今天，这些答案并不比二十多年前更有说服力。如果欠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物质资本，那么欠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就应该高于发达国家，资本家逐利的本性就会使得资本从发达的国家流向欠发达国家（Howard Pack，1984；Stiglitz，1988）。如果欠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人力资本，那么与发达的国家相比，在欠发达国家接受了更多教育的人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水平即会很高。然而，我们如何才能解释，在欠发达国家，接受了更多教育的人的失业率很高，以及这些接受了更多教育的人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现象？

此外，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人均收入增长率收敛型论，以及基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差异解释人均消费的持久差异的观点，似乎都不能成立。

这些发现表明，至少在其他许多重要方面，欠发达国家还是不同于发达国家。对相似的工厂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运营效率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结论，确认了这个观点（Pack，1984，1987）。

尽管可能有点同义反复的意思，但是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也许是源于经济组织上的差异、各经济行为主体（生产要素）之间的

---

* "Markets, Market Failures,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 (2), May 1989, pp. 197 – 203. 评论人：Anne O. Krueger，杜克大学；Stanley Fischer，世界银行。作者写作本文时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作者衷心感谢俄林基金会（the Olin Foundation）和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所给予的资助。同时，我对Karla Hoff，Susan Skeath，Partha Dasgupta，Raaj Sah，Edwin Lai 等人的有益讨论表示诚挚的感谢。

互动关系的差异，以及协调这些互动行为的制度之间的差异。在所有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市场。

现在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在发达国家也存在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Bruce Greenwald and Stiglitz, 1986）。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非市场制度来改善市场失灵问题。比如说，如果资本市场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即资本市场“不完美”），而且这仅是因为信息是不完全的以及获得信息需要花费成本，那么一些非市场制度（大型企业集团中的内部资本市场）就会发展起来。[1] 在欠发达国家，市场失灵更为普遍，而且至少是在许多情况下，非市场制度并不能很好地改善市场失灵问题。本文的目标就是，探究欠发达国家市场失灵的原因及后果，以及私人部门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失效的前因后果，并指出政府干预可能会发挥的作用。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主要分析欠发达国家三方面的重要问题：学习与信息、资本市场，以及产品市场。在讨论每一个问题时，我都会指出，为什么市场不能像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发挥作用。

一、学习与信息

与知识和信息有关的“商品”市场是最不完美的（Stiglitz, 1987b）。从许多方面看，知识都很像公共物品。企业可能很难独占其所创造出来的知识的收益，结果就使得知识的供给不足。即使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独占这些收益，也会带来知识利用率不足的结果（原因就在于创造知识的企业要对只用知识的企业收费）。这会对发展过程产生一些影响。

二、干中学

最近一些研究（Robert Lucas, 1988; Stiglitz, 1987a; Paul Romer, 1986）指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源自于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Kenneth Arrow, 1962）以及缺乏在各国间实现知识转移的能力。如果欠发达国家很难从发达国家获得学习效应，那么它们就会发现（在给定初始劣势的情况下），最优的选择就是专门从事学习潜力较低的技术开发和生产制造活动。尽管学习现象肯定与发展过程相关，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微妙。

---

1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非市场制度有时非但不能改善市场失灵所导致的低效率问题，而且还会恶化市场失灵问题（R. Arnott and Stiglitz, 1988）。

价格效应。如果商品是由竞争性厂商生产的，而且是自由贸易，那么价格调整就可能会部分（完全，或过度）抵消生产率方面的差距：由于价格弹性为1，所以那些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国家，就要通过提高相对价格来弥补损失（Susan Skeath，1988）。

不完全竞争。当知识不能在一国内部完全溢出时（通常我们都会认为知识能在一国内部完全溢出），市场就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最先进入市场的企业就会获得垄断租金（Partha Dasgupta and Stiglitz，1988）。这些垄断租金可以解释持久的收入差距，而且创新速度的变化又能说明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扩大。

本地化学习（Localized Learning）。此外，从一定程度上讲，技术变革（学习）是本地化（Anthony Atkinson and Stiglitz，1969），所以发达国家生产过程中生产率的提高，对欠发达国家的溢出效应非常有限。因此，"本地化"程度的提高（即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拉大）会导致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

学会学习。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Stiglitz，1987a）中指出，学习能力是需要学习获得的，[2] 而且学习能力本身可能被本地化。

低水平均衡。"学会学习"以及本地化的学习能力意味着，可能存在低水平均衡陷阱：一个国家可能不但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资本水平很低、技术进步速度很慢、学习能力很差的稳定状态的均衡之中，而且它还会发现（在贴现率很高的情况下），保持现状是最优的选择。

考虑一个简单的生命周期模型。在此模型中，所有人只生活两个时期，而且只在第一期工作，退休后的消费来自工作期间的储蓄。储蓄率是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增函数和利率的减函数。我们假设技术进步是劳动增加型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在稳定状态，与技术 k 有关的劳动增加型技术进步的速度为 $n(k)$，其中 k 为资本—有效劳动比。而且，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其学习函数在稳定状态下的值就越大（$n'>0$）。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人口保持不变。于是，在稳定的均衡状态下，资本（K）的增长速度必须要等于有效劳动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即

$$d\ln K/dt = sQ/K = s(k)q(k) = n(k)$$

2 换言之，如果我们假设学习函数为 $\ln c_t - \ln c_{t+1} = a + b\ln Q_t$，那么学会学习（learning to learn）就意味着，参数 b 可能会发生变化。本地化的学会学习意味着，在一种技术的参数 b 发生变化时，另一种技术的参数不会受到影响。

其中 Q 为总产出，$q(k)$ 为技术 k 的产出—资本比，q 为 k 的减函数。在这些假设条件下，储蓄率 s 就是 k 的函数。如果 s 能够随着 k 的增加而迅速提高（这既可能是由人均收入的增长引起的，又可能是由利率的降低引起的），那么上述方程显然就会有多个解，如图 1 所示。而且在 k 值较高时所达到的均衡，其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较快。假如人可以无限期地存活下去，那么用另一种方法进行分析，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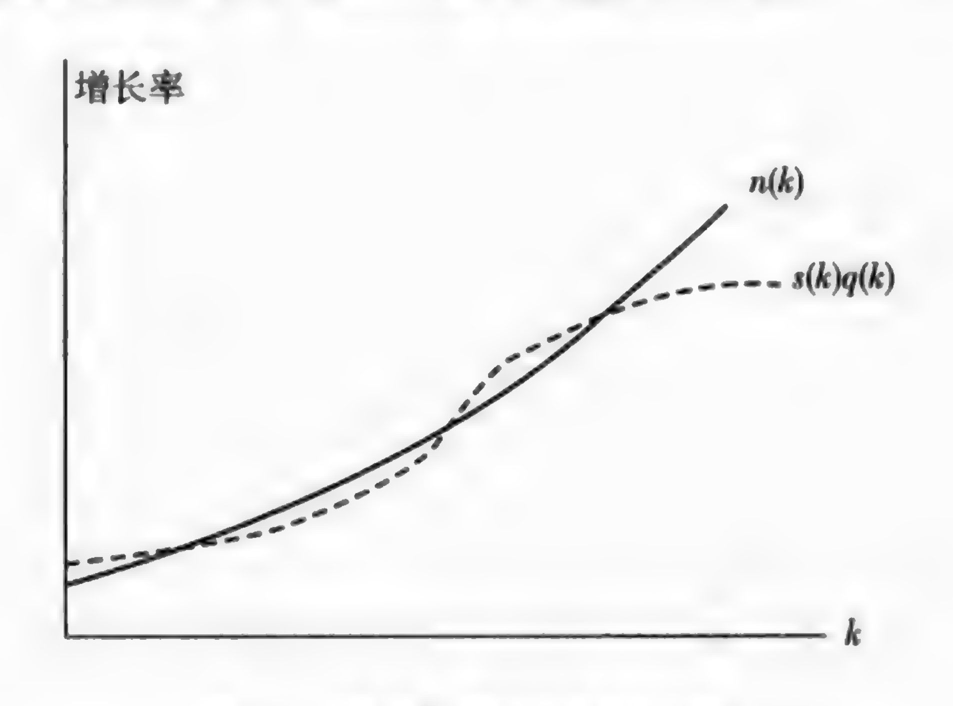


图 1　本地化学习的多重均衡

历史很重要（滞后现象）。对于某个特定的国家而言，在多个均衡中，究竟会处于哪个均衡状态，这取决于历史。的确，在学习模型中，尤其是在本地化的学习模型中，特殊事件（战争、瘟疫、萧条等）会产生持久的影响（相反，在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会收敛到稳定的均衡状态，而且此稳定的均衡状态与初始条件和历史事件无关）。

动态比较优势。学习本身，以及学习（和学会学习）可能被本地化的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不考虑长远利益的政策不是最优的政策。不能以当前的比较优势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此外，开始时承担一定的损失也许是最优的选择。因此，在欠发达国家发挥其学习潜力的过程中，（在下一部分我将要讨论的）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会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

学习的外部性。硅谷和波士顿 128 号公路的发展经历表明，在学习以及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存在重要的外部性。毋庸置疑，头脑风暴有益于创新活动。总会存在无法独占的知识溢出。这些非市场的外部性非常分散，于是单个企业就很难（通过兼并等手段）将它们内部化。

风险与进入。卡拉·霍夫（Karla Hoff，1988）研究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外部性。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企业家来承担风险：一个国家的资源是否

非常适合生产某种特定的商品？一个企业家的成功或失败，会将有关信息传递给其他企业家。这种收益是不可能为其所独占的。霍夫指出，这种外部性会产生一个结果，即很少会有企业进入新产业。

外部性与多重均衡。这些非市场的外部性也会带来多重均衡问题。此时会出现正反馈效应：企业 i 支付更多的研究与开发成本，会产生很大的溢出效应，从而就可能会提高企业 j 开展研究活动的边际收益（Raaj Sah and Stiglitz，1989）。

还有其他一些正反馈效应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假设在总人口中有两类不同的人：创新者和发明者。发明者产生新的想法，创新者就将这些想法转变为可以盈利的商业活动。创新者在发明者之间寻找好的想法。发明者越多，创新者的收益就越高；创新者越多，发明者的收益就越高。[3] 在一个社会中，接受较多教育的人越多，接受教育的收益就越高。[4]

*收入效应*也会带来多重均衡问题。如果经济中其他部门都在快速地增长，那么对我的产品的需求就会迅速增加。于是，我进行生产就能获得更高的收益，而且会使我的生产急剧扩张，从而能够快速地学习（对于进行国际贸易的商品而言，这种效应就不那么显著了）。

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已经讨论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在欠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原因就在于：首先，发达国家的市场规模较大，而且企业数目也比较多，于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就能从创新活动中获得足够的收益。这样就能减少由于无法独占所有创新收益而带来的损失。因此，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发现，支持那些推动激光和晶体管技术发展的基础研究是有利可图的。由于开展这种基础研究可以获得足够多的私人收益，所以即使私人收益明显低于社会收益，也能保证对基础研究的支出。

其次，从很大程度上讲，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的主要问题就是获取与技术有关的信息的问题，确定哪些产品能够生产而且应该生产，如何生产这些产品，以及如何才能获取适当的技术。

3　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彼德·戴梦德（Peter Diamond，1982）指出，搜寻模型能产生多重均衡。不过，戴尔·莫腾森（Dale Mortenson，1982）以及格林瓦尔德和斯蒂格利茨（Greenwald and Stiglitz，1986）指出，搜寻模型中的均衡通常都是帕累托无效的。

4　还有一些经济社会联系也会产生多重均衡：在时点 t 拥有更多创新者的社会，很可能会在以后培养出更多的创新者，创新会自我繁衍。同样，在官僚环境中，官僚行为就能获得更高的收益。

三、资本市场

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合同的实施等问题的存在就意味着，即使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也并不像（传统的）教科书上所讲的那样。现实中的资本市场是不完美的。即便是竞争性的市场，也会出现信贷配给（Stiglitz and Andrew Weiss，1981）和股权配给（Greenwald and Stiglitz，1988b）的现象。股权配给是指，发行新股会导致企业股票的市场价值显著下降，因此很少会有企业通过发行新股来筹集资金。

股权配给的存在意味着，企业不能分散其所面临的风险。因此，它们就会以规避风险的方式行事。此时，像源自于国际市场的不稳定性之类的外生冲击，就会产生很强的负面影响。不但会削弱企业扩张其产能的投资意愿，而且还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意愿（当然，即使有完善的国内股票市场，企业也不能分散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这也会对其投资活动产生重大的阻碍）。

只要生产率是由研究与开发投资或干中学决定的，那么企业所面临的环境风险越大，以及能够让企业分散风险的市场运行得越差，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就越慢（Greenwald and Stiglitz，1988b）。再强调一遍，此时可能会出现多重均衡问题。

更进一步地讲，信贷配给的现象越普遍，企业在扩张产能时对内部融资的依赖性就越强，资本的配置效率就越低。

在发达国家，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内部资本市场，这样就可以在企业内部各单位之间重新配置资源。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内部各单位的规模，相当于欠发达国家的多家企业的规模。因此，欠发达国家就面临着双重劣势：不但存在导致股权和信贷配给的信息的不完美性，而且在欠发达国家，这些信息的不完美性很可能变得更加突出（原因就在于变化过程本身会带来更大的信息问题），更重要的是，处理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的制度框架很可能是低效率的（这是因为欠发达国家的企业规模较小，以及收集、评价和传递信息的制度很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完善）。

此外，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中所阐述的那样，学习就意味着深谋远虑的政策（表现为企业的借贷行为）才是最优的政策。因此，在欠发达国家的学习曲线的前面部分，借款约束会对这些国家产生更大的影响。

四、产品市场

信息不完美既会直接影响到生产者，又会通过其对消费者的影响来间接地影响生产者。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中绝大多数企业，都面临着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这不同于新古典理论中的完全弹性需求的假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就有不完美信息的影响。

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这有两个重要的含义。首先，本币贬值可能并不会立即对出口产生显著的影响。其次，在不同的生产者之间，可能存在一种与产品质量有关的重要的外部性。消费者可能会将同一个国家中不同企业生产的产品混为一谈。如果某个国家的一个企业生产了冒牌货，那么就会使得消费者认为，该国其他企业很可能也会生产冒牌货。从贝叶斯推断的角度看，如果产品质量与生产该产品的经济环境（例如，投入品的质量、劳动者的素质，以及气候条件等）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消费者的推断是有道理的（参见霍夫在不太相同的背景下展开的类似的阐述）。假如事实的确如此的话，高质量的商品就会供给不足。

不完美信息还会阻止企业进入市场。这是因为，首先，由于消费者可能只认可现有产品的质量，所以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就很难在市场上立足。而且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在生产和销售新产品方面，也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还有许多重要的外部性。例如，为了开拓潜在市场，一家企业收集了许多信息，但是它却无法完全独享这些信息。其他企业看到这家企业获得成功之后，它们就会跟随它进入市场。

以前的一些文献强调了缺乏互补性产品的重要影响：如果消费者只喜欢加糖的茶叶，那么在没有糖的情况下只生产茶叶将无利可图，反之亦然。于是，政府计划的重要任务就是进行协调。在前面所给出的例子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可以将外部性内部化。只有在前面所讨论的外部性非常分散的情况下，才很难进行类似的内部化活动。

五、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在本文，我阐述了这么一个观点，即市场失灵，尤其是与不完全的信息和需要花费成本才能获得的信息有关的市场失灵，可以解释下列问题：为什么欠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很低？为什么许多欠发达国家不要说赶超发达国家，即使维持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现有差距也很困难？至关重要的绝不只是要素禀赋上的差异，而是经济活动组织方式上的差异，其中就包括在市场职

能上存在的差异。同时，我还指出，发达国家为改善市场失灵问题所采取的许多非市场制度，并不能在欠发达国家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所关注的市场失灵，与 20 年前备受关注的那些市场失灵有显著的不同。那时候，关注的焦点是，市场提供良好的投资信号的能力。于是，解决此问题的对策就是制订经济计划，或者最起码是制订指导性经济计划。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它低估了企业进行计划的能力。当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它们会预测投入品和产出的价格。其次，它高估了一般均衡问题的重要性，对于小型开放经济而言尤其如此。原因就在于，就小型开放经济而言，它们的物质产品供求方程（对于特定的产品）并不成立。它同时也高估了一般均衡模型的预测能力。实际上，一般均衡模型的预测能力，并不比其他较为简单的模型的预测能力更强。最后，它低估了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同发现一些与特定部门有关的合意的条件相比，了解哪些部门需要扩张这件事的重要性更低。项目的成功很可能高度依赖于是否找到了优秀的管理者，以及是否提供了很好的激励结构。这些问题都与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不完美性有关。在本文中，我已经讨论了这些市场的不完美性。国家计划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的确，正如我在本文的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由经济组织的不同引起的，那么首要任务应该就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去更好地理解欠发达国家的贫困的成因。因此，就需要针对欠发达国家的特征而构建的农业经济理论和工业经济理论。

尽管我在此处所关注的市场失灵为不同类型的政府干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政府所面临的信息和激励问题并不比市场所面临的信息和激励问题轻。政府随意进入市场都不敢涉足的领域，那无疑是冒失之举：私人资本市场上存在信贷配给，并不必然表明政府就要提供贷款。事实上，即使忽视政府贷款计划会产生明显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当通货膨胀率很高时，最可能出现这类问题），不管是在甄别贷款申请人方面，还是在监督贷款的使用方面，政府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在诸如不完美的资本市场之类的情形中，我认为政府干预的空间很小（尽管格林瓦尔德和我 1986 年的论文，以及我和魏斯的文章的分析结论都表明，存在帕累托改进型政府干预，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政府干预的空间确实非常有限）。在这些情形中，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可以消除市场的不完全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政策？比如，如果能设计出恰当的商品价格稳定制度，那么就能减少生产者所面临的风险，从而提高生产和投资水

平。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取消那些加剧企业风险的税收政策（即指那些只能抵扣部分损失的税收条款）。在其他一些情形中，政府可以在税收与补贴，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比如，政府可以采取税收与补贴政策，来抵消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些与信息有关的外部性；政府还可以通过组建有强制性会员资格的出口销售合作社，来避免“搭便车”问题。这些例子也提醒政府：有时候，利益集团会扭曲商品价格稳定制度，而且出口销售合作社也会只服务于其自身利益。不过，政府政策有时候需要提防这些负面影响，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政府干预不好。在许多成功的发展中，政府干预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在现代经济活动的各种组织形式中，各种市场是一系列重要的制度组合。然而，我们要明白，在发达国家，许多生产活动不是由市场来协调的，而是由大型公司来协调的。发达国家中的大公司的规模至少相当于小型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

在欠发达国家，市场失灵尤为普遍。有效的政策就需要对这些市场失灵现象进行区分，办法是判断哪些市场失灵问题只需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尤其是，降低政府设置的壁垒，让市场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就可以解决，哪些市场失灵问题只依赖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要确定哪些市场失灵问题是可以通过非市场制度就可以解决的。在建立这些非市场制度的过程中，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我们既要认识到市场的力量和局限性，又要认识到以矫正市场失灵为目标的政府干预的力量和局限性。

参考文献

Arnott, R. and Stiglitz, J. E., "Dysfunctional Non-Market Institutions and the Market,"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66, 1988.

Arrow, K.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une 1962, *29*, 155–73.

Atkinson, A. and Stiglitz, J. E., "A New View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Economic Journal*, September 1969, *79*, 46–49.

Dasgupta, P. and Stiglitz, J. E., "Learning-by-Doing, Market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and Trade Policie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June 1988, *40*, 246–68.

Diamond, P., "Aggregate Demand Management in Search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2, *90*, 881–94.

Greenwald, B. and Stiglitz, J. E.,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e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86, *101*, 229–64.

______ **and** ______, (1988a) "Pareto Inefficiency of Market Economies: Search and Efficiency Wage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May 1988, *78*, 351–55.

______ **and** ______, (1988b) "Financial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paper given at Stockholm conference, June 1988.

Hoff, Karla,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Trade and Taxation Under Incomplete Risk Marke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8.

Lucas, R. E.,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July 1988, *22*, 3–42.

Mortenson, D., "Property Rights and Efficiency in Mating, Racing and Related Gam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982, *72*, 968–79.

Pack, Howard, *Productivity,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______,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om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in G. Ranis and R. West, eds.,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Essays in honor of Lloyd Reynold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Romer,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6, *94*, 1002–38.

Sah, R. K. and Stiglitz, J. E., "Debt Stab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G. Calvo et al., eds., *Essays in Memory of Carlos DiazAlejandro*, London: Basil Blackwell, forthcoming 1989.

Skeath, S., "Learning, Price Effects, and Income Growth," mimeo., Princeton University, October 1988.

Stiglitz, J. E., (1987a) "Learning to Learn, Localized Learning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P. Dasgupta and P. Stoneman, eds., *Economic Policy and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______, (1987b) "On the Microeconomics of Technical Progress," in Jorge M. Katz, ed., *Technology Generation in Lat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London: Macmillan, 1987.

______,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H. Chenery and T. N. Srinivasa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I, Amsterdam: Elsevier, 1988.

______ **and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81, *71*, 393–410.

理性农民、有效制度与农业组织理论：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评述*

一、引言

评判一种理论是否具有说服力关键看这种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其所研究领域的重要“事实”。一个不能很好地诠释行星、地球以及月球运动的物理理论不值一提。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是，生活在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人生活水平悬殊：这并不是指生活贫困的人与生活富裕的人相比工作不努力，没有活力或不够聪明，或者欠缺企业家的才干。恰恰相反：欠发达国家中许多人的实际付出似乎常常是发达国家从事手工劳动的人所不能企及的，后者已经习惯于相对舒适的生活。

现代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没有诠释这一“事实”，反而要么背离了事实，要么将这种生活水平的差异归因于一些生产要素——资本或熟练劳动力——的缺乏。这些解释有其诱人之处，因为他们为这个问题开出了一个简单的药方。但是，正如我曾经说过的（Stiglitz，1987），尽管资本的缺乏可能会造成生活水平的差异，但是它几乎不能被视为一个主要的解释变量。因为假如生产函数在实际上是相同，那么边际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将会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资本使用模式将完全不同于我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模式。基于同样的原因，熟练工人的缺乏也不能成为一个主要解释变量，因为欠发达国家的工人常常面临着高失业率，并且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实际上低于发达国家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1]

在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表面看来）的情形下，熟练工人和非熟练

---

* “Rational Peasants，Efficient Institutions，and the Theory of Rural Organization：Methodological Remards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i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rarian Institutions*，P. Bardhan（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p. 18－29。非常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与布雷弗曼（A. Braverman）和萨（R. Sah）的交谈让我受益匪浅。

1　同样，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单一生产函数描述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在此情形下，相对短缺的因素应会获得较高的回报。

工人的工资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上不仅在欠发达国家是一个显著现象，莱特（Wright，1987）观察到，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存在着这种差异。

似乎没有人有兴趣解释这一重要事实，这让我感到不安，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我们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一重要事实，或者与这一事实相矛盾，由此可见这些理论最起码是非常不完善的。其次，我不知道有什么知识领域，当然包括社会科学知识领域，能够给人类带来普遍益处。了解为什么一些社会的经济得到发展而另外一些社会则没有，以及为什么一些社会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而另外一些社会生活水平较低，尽管我们不一定会使那些生来贫困并过着艰难生活（非因自身过错）的人们的境况立即得到改善，至少将能让我们向着纠正这些问题的方向开始努力，并使我们少犯一些过错，少走一些冤枉路。第三，由于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没能解决这个当前地球上大多数人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这就为其他某些理论的产生敞开大门，这些理论迎合了贫困人口向往美好生活这一必然诉求。尽管这些理论的逻辑基础令人生疑、自相矛盾，基本的经验假设疑点重重，但所有这些对于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人们来说无关紧要。

说句题外话，我还认为，那些从根本上对欠发达国家不感兴趣或漠不关心的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对这些国家的研究学到许多东西。从某种角度来看，对欠发达国家的研究与经济学的关系就如同病理研究与医药的关系。如果了解事物在运转不顺利时会发生何种情形，我们就能深入地了解事物在正常情况下的运行方式。其不同之处在于，在经济学中，病理决定一切，人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经济体当中。[2]

但是本文的目的不是励志，即鼓励其他研究学者投身解决这些问题，而是阐述我与几位合作者在过去二十年中所从事的一个研究项目。我认为，要理解发展的根源或者发展停滞的原因，这个研究项目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或许是基础部分。我曾经（Stiglitz，1987）总结过这个研究项目的许多发现。在这里，我想强调该研究项目所用的方法论，以此表明它为我们加深对欠发达国家所处困境的理解至少提供了可能性。我会进一步阐述，一些较为流行的观点没有触及发展的基本问题。

---

2 来自欠发达国家，或者至少受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启发建立的模型有很多，并且很出色。这其中包括当前受到许多宏观经济理论学家欢迎的效率工资模型，以及重点研究资本市场不完全所产生影响的模型。

二、中心原则

这个研究项目所采取的视角主要体现在它对制度、农民理性、市场的本质和作用，以及历史的作用进行的评述。

发展经济学既涉及欠发达国家的低收入，也涉及变革的进程。它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理解欠发达国家当前的收入为何如此之低，确定当前欠发达国家的总体特性，描述这些国家制度和经济的关系，以及解释为何这些关系既影响人均收入水平也影响人均收入增长过程。

关于发展（或发展停滞）的传统讨论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制度对发展进程的阻碍。无效制度持续存在这一现象要么未得到解释，要么被归因于农民的非理性。

与传统的讨论相反，现代经济理论强调农民的理性。许多事实为此提供了佐证，在这些事实中，农民和他们的制度面与解决了非常困难的经济问题，除此之外，计量经济学也提供了证据，证明农民能对市场力量做出回应。

一旦人们接受了农民理性这一假设，这就朝着有效市场假设和科斯（Coase）定理[3]方向迈进了一小步，科斯定理认为，个体将会迅速集中在一起，消除任何无效率的资源配置（或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假如人们看到了表面上无效率的制度安排，那么，人们之所以会看到这种表面的无效率，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充分理解所面临经济问题的本质。这一定理具有强有力的政策含义；如果任由国家自行发展，那么国家将会发展到其产能和资源的极限；发展停滞只能被归因于资源的匮乏或者（有害的）政府干预。由于经济力量天生会导致经济的无效率，因此对发展的研究就成为对发展的政治障碍的研究。“发展停滞总是并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强调政府常常是发展的阻碍这一事实，这种思想对下面这一观点提出质疑：政府干预是发展问题“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政府本身可能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但此类理论暗示市场自身将会解决问题，这具有负面影响；因为这些理论没有注意到政府在许多发达国家[4]发挥的重要并且似乎

3 通常所称的“科斯定理”当然不是一个定理，而是一个猜想，正如我在后面所阐述的。

4 尽管必然会想到日本的例子，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联邦政府在美国铁路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是积极的作用，也没有看到一些表面温和的政府（比如美国南部[5]）在发展方面的失败。

在我的研究中，我采取了一个更折中的立场：不应该只将制度视为理所当然，而是应该对其进行解释。通过理解为什么制度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经济理论能够让我们深入了解它们在当前或者曾经发挥的作用。但是，传统经济理论无法对制度的许多重要方面做出解释；要理解制度的这些重要方面，我们需要更宽广的视角，这就需要我们从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审视问题。在下文中，我将对这些主题展开论述。

1. 有益但不完善的制度

我对制度的观点，特别是就发展而言，也许能从我对分成制的研究中得到最好的说明。早期的研究，比如马歇尔（Marshall）的研究，指出分成制打消了佃农的积极性。分成制因此似乎是一种无效率的制度，经济学家可以对这种制度的影响进行分析，但是这种制度的持久性和普遍性从根本上仍然未得到解释。

Cheung（1969a）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74a），以及其他几个人（Braverman and Stiglitz，1982，1986a，1986b；Newbery and Stiglitz，1979[6]）曾经问道，我们能解释这种表面看来无效率的制度吗？我们能确认这种制度的经济功能，以及它与其他替代性制度安排相比更好的经济功能吗？我们是否不仅能解释这种制度的持久性和普遍性，也能解释制度采用的形式？（这里的形式既指系统模式，比如成本分担和相互关联，也指系统模式在不同团体和不同时期的差异）这一提问获得了部分的解答，但仅仅是部分。

分成制明显起到了在地主和佃农之间分担风险的作用；在没有保险市场（其他规避风险的市场）的情况下，这显然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功能。但是我已经证明，这种风险分担功能也能通过租用合同和工资合同的结合使用来完成（Stiglitz，1974）。

Cheung 认为，分成制的优势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我并不否认这些成本可能很重要，[7] 但我试着给出另外一种解释。与那种批评分成制打消积极

5 每一个被引用的历史事件很明显都是激烈论战的主题。但实际上，以下观点远未得到证实：政府总是阻碍发展，以及如果政府阻碍不存在便会有发展。

6 更多参考资料，参见 Stiglitz（1987）。

7 信息成本可以被视为交易成本的一种具体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两种方法彼此完全吻合。但是信息理论方法就制度安排的特性做出了更准确的预测；例如在本文中，它就分成制合约的特性做出了更清晰的预测。同时请参见巴德汉（Bardhan）的第一章。

性因而是无效率的标准观点相反，我认为分成制是合乎需要的，因为它加强了激励作用。较早的文献暗中包含了一个假设，劳动力投入无须花费任何成本便能够观测到。我的假设则相反，监测劳动力的投入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因此，分成制体现的是风险和激励效应之间的妥协：尽管租用合同提供了完美的激励机制，[8] 但佃农不得不消化全部的风险；地主消化了工资合同的风险，但工资合同没有提供工作的激励机制，除非工人受到严密监视。

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提出合同这种形式不仅仅可以被作为一种激励手段，而且还可以被作为一种自行甄别的手段，以鉴别出不同个人的品质特征。对于那些认为自己生产效率更高或者更愿意努力工作的个人而言，他们将会更希望签订依据工作表现确定工资的合同（Newbery and Stiglitz，1979）。

这一理论不仅仅能解释为何分成制长期存在，而且也许还能解释分成制为何在较发达国家衰落。机械化农业或许降低了监督成本，由此消除了工资合同的一个主要劣势。基于同样原因，这些技术变革可能还降低了分成制作为一种甄别手段的重要性。一些农场主财富的增加以及能够分担风险的替代性制度（比如期货市场）的发展可能降低了通过租佃合同分担风险的需要，由此令租用合同更具吸引力。这一理论还对诸如信贷和租佃合同的相互联系等现象提供了解释。此外，当认识到佃户和地主之间其他的信息不对称后，比如增加肥料的边际收益，这种理论得到扩充，由此对成本分担给出了解释。[9]

以上所述是这个理论的成功之处。但是如果我不同时指出该理论的一些局限，那将是我的失职。

这个理论是非常丰富的，[10] 它就合同条款如何根据不确定性的程度以及劳动力供给弹性等因素而改变进行了详细的比较静态阐述（我在 1974 年的论文中推断出其中几个比较静态阐述）。根据观察合同的形式是可变的，这种情形似乎至少在某些时候与我们的理论是相符的。但是，合同形式的范围与理论情形相比似乎受到更多的约束：比如，大多数合同的分配比例是一

---

8 在后来的研究中我证明了这一观点。由于农民的资本有限，租金常常在季末支付，因此存在违约风险；相应地，农民可能承担不了他们行为的所有后果。参见 Stiglitz and Weiss（1981）和 Johnson（1950）。

9 如果不存在这些信息不对称，与地主提供投入或者对佃户的投入予以规定相比，成本分担便没有明显优势。参见 Braverman and Stiglitz（1986a）。

10 成功不仅限于此，因为描述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合同安排成为分析这种所谓的委托—代理人关系的样板。我在 1974 年的论文中指出，企业所有者（资本家）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种形式上与分成制模型相同的模型来描述。

半，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尽管有人多次试图就这种一致性进行解释，但是没有一种解释获得普遍认可。[11]我怀疑在这一问题上可能需要更宽泛的社会/历史理论。个体们关心的是，他们在交易中是否得到公平的对待。有关公平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历史）决定的。不公平的对待工人是不值得的，因为这将降低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因此，如果某个社会接受50%的分配规则，地主违背这一社会常规是不值得的，即使这一分配比例导致佃户供应过剩。“提出”更低分配比例的佃户实际上将减少劳动量（因为他们实际上自愿接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由此使得地主预期的收益也随之降低。这种观点认为，地主对合同标准条款略加调整，以利用当前（对他）有利的市场环境是不值得的。[12]但是市场不轻易地做出适应性调整并不意味着市场对市场环境完全不进行适应性调整。如果市场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比如在“传统”合同下租户持续供应过剩，最终情形将会改变。如何改变、改变的速度，以及在何种情形下会改变是，或者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佃农理论有许多其他不尽如人意的方面。总体来看，非线性合同（比如，获得帕累托最优（Pareto-superior）结果）将优于线性合同，临时合同优于非临时合同（Arnott and Stiglitz，1988）。但是大多数合同的形式似乎极其简单。尽管人们可以将此归因于“复杂性的成本”，但这似乎并不是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解释，因为简单非线性合同似乎好于一般所看到的线性合同。[13]在此，我们所能说的也只能是，非线性合同的收益可能不是非常高；[14]并且，如果使用线性合同成为常规，那些偏离这种合同形式的人将会受到怀疑。[15]

---

11 阿伦（Allen，1985a）在一篇很有启发性的论文中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在Stiglitz（1987）中，我认为，如果每块土地的产出不能被监测，那么在均衡状态下肯定存在一个单一的佃户“率”。但是这本身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佃户率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时间不应该变化。

12 实际上有多个纳什（Nash）均衡。

13 这一特别异常引发了方法论的巨大争议。一些经济学家的立场是，只要我们不能解释为何应选择线性或非随机合约，我们就应该只分析那些使用非线性、随机合约的模型，同时忽略这些理论的反现实意义。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尽管我们或许不能解释为何合约采取线性、非随机的形式，我们的模型应该反映出我们所看到的合约安排，并且这种显然受到限制的合约的影响仍然值得研究。我非常赞同后者的观点。

14 特别是由于合约的最佳形式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线性合约可能因此具有非线性合约所缺乏的强劲生命力。

15 这导致了僵化；参见Allen（1985a）。

2. 理性农民和不完美信息：对有效市场假设的批判

更一般的来看，尽管农民可能在许多方面是理性的，能对市场力量做出回应，但他们不完全了解他们的行为或者他们所处制度的影响。实际上，我们穷尽毕生精力研究这些问题尚且把握不定，又如何能期望他们了解呢？这种情况自身就能部分解释为何能提高生产率的制度调整得不到采用。

但是即使农民充分了解到：他们和与之打交道的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没有明显的“无效率”，资源配置可能也不是帕累托有效（Pareto-efficient）的。宣称市场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定理在严格条件下才能成立。它不仅仅要求完全的竞争，而且它只有在市场完全和信息完美的情况下才会有效，而这样的条件显然是不能满足的。

实际上，欠发达国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某些市场是缺失的。这种缺失本身就是这种理论应该解释的，实际上，以研究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导致后果为主的信息—理论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帮助，它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某些市场可能要么不存在，要么“若隐若无”。

格林瓦尔德（Greenwald）和斯蒂格利茨（1986）已经证明，在不完全市场和不完美信息情形下进行的市场配置总体来看抑制了帕累托无效（Pareto-inefficient）；也就是说，存在着政府干预，这明确考虑了信息和建立市场（能使每个人的境况都变好）的成本。他们证明，在这些市场实际上普遍存在着外部因素；单个个体的行为影响其他人员的福利。这些外部因素可以部分的内部化——比如，通过联结欠发达国家的市场可以做到这一点（Braverman and Stiglitz，1982）——但是将这些外部因素完全内部化显然与分权背道而驰。[16]让我们换一种方式看这个问题，合同安排的双效不足以确保经济的整体均衡效率，除非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即使我们相信个人获得足够的信息确保双效，认为经济也能获得总体均衡效率是不切实际的。[17]

当然，社会对市场的不完全性会做出适应性调整：建立相应的制度，执行原本由缺失的市场所执行的功能。因此，分成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制度对某些风险（保险）市场的缺失所做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正如我们

16 同时请参见 Arnott and Stiglitz（1984，1986）在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的情境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17 除了文章最后几个段落所强调的市场经济对效率的限制外，我应该补充一个重要告诫——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以下观点：在非完美信息的情况下，即使是双方关系也可能是无效的，至少在这一术语的传统含义下时如此。参见 Farrell（1987）。

曾强调的，制度做出反应并执行某些经济功能，不意味着它们会“最好的”执行这些功能，也不意味着由此产生的均衡在任何实质意义上都是有效的。[18]

不过，执行似乎能产生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ing）效果的改革所面临的另一个障碍是进行必要的补偿，这在实际中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个障碍。技术变革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到某些个体的利益。与其他领域相比较，政府以及工人的集体行动在这方面可能是进步的最大障碍。由于那些利益因变革受损的人常常是一个相对较小并且很容易辨认的群体，因此他们常常似乎拥有不可抗拒的动机去充当特殊利益群体，去施加他们可能拥有的政治影响力，以阻碍变革。与此相反，变革或改革的受益者是分散的，因此“搭便车”的问题对于这些受益者在政治环境中团结行动是一个有效障碍。[19]

为推动改革/变革而进行补偿的困难在于，补偿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信息问题——准确的确定哪些个体受到负面影响以及其受影响程度是很困难的（相应地，以符合帕累托改善的方式筹集资金存在困难，这不仅需要确定受益人，也有必要确定他们的受益程度）。

但是除了上述这些担忧，对“有效”市场观点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批评：在其他替代性财富分配情形下，国民收入是否不会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点在确认市场为帕累托有效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提及。近来对存在信息不完美的经济体所进行的研究认为，效率和分配问题的传统对立充其量是误入歧途。也就是说，传统分析首先强调建立（体现）帕累托有效分配体系，然后问其中哪些是“社会所需要的”。福利经济学的第二项基本原理认为，任何帕累托有效的分配是可以通过对捐赠进行的适当的首次分配而获得的。

一旦激励的重要性得到确认，分配和生产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更加紧密。[20]分成制是人力资源（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分配不均的一个产物。如果两者能够平等分配，分成制将没有存在的必要（尽管如果不同土地产出没有完全关联，风险分担仍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分成制或

---

18 实际上，Arnott and Stiglitz（1984）已经证明了，制度对市场提供不完全保险所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应对道德风险的问题——实际上可能会降低经济福利。

19 当然，这些问题在所有国家都出现。公众寻求公共物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物品（Stiglitz，1988）。但是我们没有解释为何一些国家消除了这些普遍存在的发展和增长障碍，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没有。

20 因此，Shapiro and Stiglitz（1984）证明，尽管如果资本家与工人截然不同，市场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但是如果资本在工人之间平等分配，市场配置则不是（受约束的）帕累托有效的。

许是帕累托有效的。比如，一场将土地从地主手中夺走并将之分给农民的土地改革不会是帕累托改善的，因为地主的境况将会变糟；但是这种改革不只是减少不平等，它会大幅提高国民的产出（如果劳动力供应的弹性是正值而且很高）。

3. 竞争

上述评论的重点是我对理性农民和理性制度的假设的看法。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也存在很大分歧：市场的竞争程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看到工人和地主数量庞大，由此推断出市场肯定是高度竞争的；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看到地主和农民之间贫富悬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这场不平等的争斗中，农民肯定处于劣势。

我的观点介于上述两种偏激观点之间。竞争是存在的，财富不平等本身并不意味着地主能够无限制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另外，有大量参与者（两方皆如此）的市场无须高度竞争；[21]交易成本，特别是信息成本意味着，一些市场能够用不完全竞争模型而不是完全竞争模型得到更好的阐述。[22]不仅不完美信息可能会导致不完全竞争，而且许多欠发达国家农村生活中的长期关系（相对较高的退出障碍）特别容易导致共谋的结果。

4. 历史，制度和经济理论

前面章节的观点认为，常规至少在确定短期市场均衡的特性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并且那些常规至少有一部分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依据这种观点，我们仅仅通过研究当前的科技和偏好也许不能充分理解当前均衡的特性：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历史，即当前状况的由来过程。尽管这一主张似乎是一个明显的常识，但是它与当前盛行的新古典主义模型相矛盾，因为新古典主义模型，至少从其常规表述方式来看，认为理解历史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单单知道偏好和科技（两者假定皆为外来因素），人们就能够解释经济的发展；诸如战争和瘟疫等特殊事件可能会影响一个经济体传承自过去的资本储量水平或劳动力供应水平，但即便是此类重大事件的影响最终也将消失。

与此相反，我认为历史是重要的，原因有如下几个：

首先，历史自身产生了信息的重大不对称：个人对他们最近身居其中的制度和惯例的了解多于对其他可能的制度和惯例的了解。变革的后果因此而

21 Stiglitz（1987）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下对这一点进行了充分论述。

22 Salop（1976）也在更全面的情境中对这一点进行了着重论述。

变得不确定，风险厌恶本身成为了保持当前制度的动力。[23]

第二，我曾经说过，若了解当前科技我们还必须研究历史；由于科技变革的局部化特性（一种科技的进步对其他科技只具有有限的外溢效应），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历史价格自身就受到瘟疫和战争等特殊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影响了资本—劳动力比率）决定了哪些科技得到发展，由此决定了今天可资利用的机会的框架。[24,25]实际上，即使是当前的学习能力本身也可以被学习，因此学习能力可能主要取决于历史经历。

三、结论

一个多世纪以来，提倡用替代性方法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人士一直争执不下。制度型学者强调制度的作用，以及这些制度可能对发展进程构成的阻碍。历史型学者则提供了许多理论家所称的“历史轶事”，即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成功和失败的故事。理论型学者则提供了通常要么不能解释，要么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基本事实相矛盾的模型。

我在本文所提出的观点认为，上述三者——制度、历史和理论——都很重要。制度对这些经济体如何运行施加影响；尽管我们应该尝试揭开制度的面纱，透过现象看到经济交易的真实本质，但是即便在此之后，制度仍然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同时，制度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理所当然；它们需要得到解释；在理解诸如分成制之类的制度所发挥的经济功能以及这些制度的影响方面，有许多经济学的观点可供使用。但是某些制度发挥一定的经济功能并不意味着，它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最佳的”，在我们理解为什么某些制度存在而另外一些制度不存在，或者为什么那些制度以其特有的形式存在时，历史的力量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已经进一步提出，那些重点研究“理性”和有效制度环境中获得充分信息的理性农民的模型不仅可能不妥，而且可能具有严重的误导性，这和那些简单假设农民受规则（传统）束缚并且是非理性和非经济性的模型如

---

23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中，可以证明这些因素能够导致价格、工资和就业的僵化。

24 参见 Atkinson and Stiglitz（1969）以及 Stiglitz（1987）。这些是一类普通现象的特别例子，被称为路径依赖的过程；可参见 Arthur（1985）或 David（1987）。

25 这只是历史经验将永久而非暂时影响经济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毫无疑问，就偏好的发展也可以得出类似的观点。重要的是，认识到不论是何种塑造科技和偏好的变革力量——例如，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决定公司生存与否的变革力量——都没有理由相信它们有稳固的最优属性；可参见 Sah and Stiglitz（1985）。

出一辙。农民是理性的，但是他们没有获得充分的信息。不完美信息（以及各种其他交易成本）除了会限制竞争的有效程度，还会导致制度的僵化，由此使得表面看来无效率的制度长期存在下去。也许不能通过分权的方法实现改变——中央的协调，即政府干预，可能是必需的。市场力量自身可能不足以确保发展进程的成功。与此同时，政治进程不仅不利于发展，反而频繁地阻碍发展——这不足为奇，我们和其他一些人已经指出了原因。

如果没有本文所主张的那种更宽广的视角，我们的理论就无法解释在欠发达国家中所见的各种农业组织模式。但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理解发展经济学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生活水平的悬殊持续存在以及可能消除这种悬殊的方法——的本质，这种更宽广的视角也是必不可少的。

现代经济理论与发展*

过去50年来我们对于发展的理解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今天我们知道发展是可能的，但却不是必然发生的。我们已经有过很多的试验。显然，不存在获得成功的万能公式；如果有这种万能公式的话，就应该有更多的成功。一些战略似乎在一段时期内有作用，然后就僵化了；一些战略似乎在一些国家有作用，在其他国家则没有作用。[1] 为了对这些成功和失败进行解释，经济理论也在发展。本文试图描述经济理论——所使用的各种模型，以及识别出的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的这些变化。我们集中讨论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哪些力量可以解释国家之间收入的差距？对于最有可能促进发展的干预的性质，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示？

本文的一个基本主题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在于资本水平——甚至不仅在于它们的人力资本水平不同。更多的资本也许是有益的，但引人注目的是，即便是直接的资金转移（transfer of funds）对经济增长也没有很大影响（World Bank，1999a）。消除政府强加的扭曲显然也是合意的，但对于可持续增长来说，似乎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2] 我们考察的发展理论都共同承认的一个观点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生产函数上，并且组织方式不同。发展不再被看作主要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而是被看作一个组织变化的过程。

我们讨论的属于三个广泛的、相互联系的研究领域——信息经济学、协

---

* “Modern Economic Theory and Development”, with Karla Hoff in G. Meier and J. Stiglitz, *The Futur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89 – 459。作者感谢 Abhijit Banerjee，Arnold Harberger，Gustav Ranis 和 Debraj Ray 的有益评论。非常感谢 John D. 和 Catherine T. MacArthur 基金会对霍夫的资助。

1 例如，巴西的进口替代政策创造了连续9年（1968—1976年）10%的年均增长率，但显然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持续下去。20世纪80年代巴西的“自由化”政策最终在90年代开始产生效果，然而与早期相比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繁荣持续的时间也更短；这种增长似乎在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也陷入了困境。要判断增长是否能够恢复以及多久之后才能恢复，目前还为时过早。

2 低收入国家中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是中国，但中国并没有实行私有化，对贸易体制还有某些限制，而且只是逐渐地消除了价格扭曲。

调问题的理论和制度经济学。这些研究超出了新古典理论的较为苛刻的假设。在新古典理论中，每一个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一般来说均衡是唯一的。[3] 相反，在这里讨论的研究中，个人不一定会做出正确的权衡。过去我们认为这一点的含义是经济会有轻微的扭曲，而现在我们明白这些轻微扭曲的行为的相互作用会产生非常大的扭曲。结果可能会有多重均衡，并且每一个均衡都是无效率的。在某个初始均衡下，即使每个人都知道存在另外一个均衡，在这个均衡下所有人都比现在处境更好，人们也没有能力协调实现那个均衡所必需的互补变化（complementary changes）。这一章提供了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里，寻租、无效率的制度、对研发（R&D）和培训的投资不足都可以被解释为协调失灵（coordination failure）。[4]

这里讨论的研究产生了不同于新古典模型的重点和结论。新古典模型假设可以通过资源、技术和偏好这样的“基本因素”来解释产出、增长以及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如果不同国家的偏好是相同的，国家间资本积累的差异只有通过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早开始资本积累的事实来解释。也就是说，不发达是后起（a late start）的结果；在长期来说，所有国家的人均收入都会收敛。附录Ⅰ分析了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1956），认为低资本水平不能解释经济落后。

新古典理论认为经济中特定的制度并不重要。这一立场依赖于三个要点：(a) 结果是由基本力量（表现为资源、偏好和技术）决定的；(b) 这些力量导致帕累托有效的结果；(c) 制度甚至不会影响均衡的选择。例如，不管一个社会的制度是新娘家支付嫁妆，还是新郎家支付彩礼，或两家都不支付，新古典理论认为给定基本因素不变，收入分配将与没有这些制度时的收入分配相同（Becker，1973）。新古典经济学中标准的建模技术是为了解决在非个人化背景下——存在一个包含所有商品、所有时期和所有风险的市场，人们“与市场”

---

3 我们用术语*新古典理论*作为对一类模型的简称，这些模型假设最大化的主体通过一组完整的完全竞争市场相互作用。新古典理论的这个狭义定义仅仅是为了方便。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早期工作在精神上是新古典的，因为它们认为一旦考虑进签订和执行合约的成本，制度会填补市场缺失从而带来效率。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早期工作（可以叫做“诺斯Ⅰ”）例证了这一观点。他的工作认为先进制度最终会消灭落后制度，从而效率会得到实现（参见 North and Thomas，1970，1973）。诺斯的晚期工作——由于结论与他早期的工作显著不同，可以叫做诺斯Ⅱ——批评了把经济史多少理解为不可避免地趋向更有效率的制度的观点：“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个体的经验和政治行动者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结合在一起以产生有效率的结果”（North，1990：96；North，1994）。Hoff（1992）对此有一个评论。

4 表格 A2.1 列举了我们的主要例子。

进行交易——会出现的结果。新古典理论认为，历史并不重要，如果一个人只对效率感兴趣的话，甚至财富分配也不重要。这些都是很苛刻的假设。由于忽略了制度、历史和分配因素，新古典经济学也忽略了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而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上述基本因素不是决定经济结果的唯一的深层因素。

当然，新古典理论家不能无视理论预测的收敛没有出现的事实，因此他们不得不寻找某种“外部”干预。*政府失灵提供了解决理论困境的方便出路*。当新古典经济学家排除了资源、技术和偏好这些基本因素，他们几乎只强调政府因素——政府对市场的妨碍使经济不能够平滑运转。但是这种理论的很多版本都内在地不能令人满意。在一些版本中，假设政府失灵是外生的，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社会中比另一些社会有更多的政府干预。在另一些版本中，用政治经济模型来解释政府失灵——但它们通常没有解释某些推荐的干预怎样或什么时候会战胜最初导致扭曲的政治力量。毫无疑问，外部建议者的善意言辞似乎不太可能取代根本的政治力量！更广泛地，正如我们在下面要看到的，经济落后的“政府导致扭曲”（government-induced distortion）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方面。

今天，我们承认政府失灵可能非常重要。但我们也认识到它们需要被解释，通常也可以被解释；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我们甚至可以限制政府失灵。我们同样认识到，即使没有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也很普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5] 但本文的目的是超越对市场失灵和发展的标准讨论，以确定影响经济结果的一组广泛的基本因素。我们集中在四个方面：制度、财富分配、历史和“生态学”（ecology）——我们用这个词指代经济中其他主体的行为有溢出效应。

制度。新古典理论穿透制度的面纱，看到（因此它主张）对经济结果的更深层决定因素——经济基础。今天，我们认识到信息和执行问题会对经济施加限制，这种限制与技术限制同样真实。非市场制度作为对这些限制的反应而产生，并会影响结果。但这些制度的改善——“好的变异”（good mutations）——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制度的互补性变化，可能无法单独存在下去。“如果制度环境奖励盗版侵权行为，那么盗版的组织就会产生……”（North，1994：361）。和目的论的看法不同——没有演化动力保证结果会是有效率的。如果制度的纳什均衡存在的话，它可能是没有效率的。我会提供很多这样的例子。

5　例如可参见 Stiglitz（1989）。Floro and Yotopoulos（1991）以及 Hoff，Braverman and Stiglitz（1993）提供了很多案例研究，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农业信贷市场上市场失灵的重要性。

进入制度黑箱内部。现代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移动我们放在黑箱内部（例如，看作是制度刚性）和能用模型解释的现象之间的界线。早期的理论工作集中在制度问题和发展政策的作用方面，力图识别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制度特征，并把它们作为外生特征结合进模型里面。这被称为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钱纳里（Chenery，1975）对此有一个概述。后来的工作力图在描述经济问题的严格经济模型（articulated economic models）中包含进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并对这些政策进行评估。

这种界线的移动对于我们认识政策有很强的含义。本文提供了五个例子。

- **工业化的互补性**。早期的“大推进”模型（Rosenstein-Rodan，1943）简单地假设需求是互补的，从而得出对低投资的预期会自我实现的结论。模型的含义是政府应该干预工业化过程。后来的模型发展了理论框架，互补性作为均衡的结果被推导出来。在一些情形下，互补性被证明不会导致无效率（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sect. 3），或者一旦经济对国际贸易开放就会消失。但在其他情形下，互补性的确产生了无效率，而且没有简单的政策措施可以解决它们。例如，对于搜寻成本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
- **农村信贷**。早期的模型只是假设农村信贷市场运行不好。后来的模型从信息和执行成本推导出信贷市场的不完美。这些模型的一个含义是通过信贷补贴进行的标准干预可能是无效的，而制度干预可能会改善信贷市场。
- **劳动市场**。城市失业的早期模型把城市工资视为固定的，因此认为它不反映劳动的机会成本。后来的模型解释为什么均衡时城市工资会超过农村工资，并且城市工资仍然反映了扩大城市就业的机会成本。
- **储蓄率**。早期的模型假设与工资和农业收入相比，利润的储蓄比例更高，因此认为对农业收入应该课征更高比率的税收。后来的经验证明农业储蓄率也可能非常高，理论也阐明了制度对储蓄的影响。
- **政治约束**。政治过程是内生的。早期的模型倾向于忽略政治过程并假设外部干预可以有效地改变政策。我们区分“深”干预和“浅”干预，深干预影响潜在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因此会改变政策，浅干预不影响潜在的经济政治力量，实际上可能会使事情更糟糕。

分配、制度和效率的不可分性。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制度和财富分配对于效率都不重要；生产性资源总是通过市场交换流入对它们评价最高的人手中。对这一思想的更强表述是科斯定理。科斯（Coase，1960）认为当一个

经济偏离新古典模型的完全市场假设，私人之间的讨价还价会提供一个矫正机制，从而保证经济仍然有效率。当然，科斯承认他的定理在有交易费用时是不成立的（McCloskey，1998）。如果存在交易费用和信息问题，那么财富和产权怎样分配就很重要。交易费用是重要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经济理论强调：交易费用取决于制度，制度是内生的，财富分配不仅直接影响经济效率，也通过它对制度的影响而间接影响经济效率。[6]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很容易看到财富分配怎样影响效率。在这些关系中，委托人（比如说贷款人）控制一种资源，他把这种资源委托给另外一个人，即他的代理人（比如说借款人），委托人对于代理人已经采取或者将要采取的行动存在不完美信息。在很多情形下，个人的行动不容易被观察到。例如，银行把资源委托给借款人，但不能完全监督借款人的投资和动机；农业中地主把土地委托给佃农，但他很难监督佃农的努力和对土地的维护。委托人的任务是设计一个激励机制，尽力使代理人的激励和他自己的激励相一致。委托—代理文献强调设计合约，激励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动。可以实现这一目的的合约规定包括抵押、债券以及把低产出的风险转移给代理人的条款。代理人提供担保和抵押、提前交付租金和承担风险的能力越强，代理人就越倾向于采取适当的行动。[7] 在这些方面，一个代理人的财富将影响他的激励和生产率。抵押形式的财富起到的作用类似于催化剂，而不是生产过程中被消耗的投入品（Hoff，1996）。

第一个要点是，财富发挥这种作用的程度取决于财富的分配。显然，如果财富分配太不平等，以至于一些人因为拥有过多财富而不能最好地利用他们的技能，而另一些人因为财富太少而不能获得信贷去从事生产性的项目，财富的催化剂作用将是有限的。第二个要点是，因为财富分配影响人们的市场决策，影响价格和工资这样的宏观变量，所以任何单一主体的福利一般取

---

6 分配和效率之间的联系在 William Samuelson（1985）的讨价还价模型中得到论证。Dasgupta and Ray（1986）是最早把不平等和总体经济运行联系起来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一。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论证分配和效率之间联系的经济模型包括 Bowles（1985），Braverman and Stiglitz（1989），Banerjee and Newman（1993），Hoff（1994），Hoff and Lyon（1995），Legros and Newman（1996），Aghion and Bolton（1997），Mookherjee（1997a，1997b）以及 Hoff and Sen（2000）。Bardhan and Ghatak（1999）的集体行动模型、Robinson（1999）的政治经济模型也都考察了这一联系。在第二部分我们简要地讨论来自 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以及 Engerman，Haber and Sokoloff（1999）的证据，其中初始的财富不平等通过政治渠道影响制度和增长。

7 同样地，一个企业的激励将取决于它的净价值（Greenwald，Stiglitz and Weiss，1984；Bernanke and Gertler，1990；Greenwald and Stiglitz，1993）。

决于整体的财富分配。[8]

也许财富分配影响合约的最清晰阐释是分成制，分成制在发展中国家无处不在。分成制的出现是由于财富分配（土地持有）不平等和缺少分担风险的更好方式，或者佃户承担损失的能力有限。它产生了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这给经济造成了潜在的巨大成本——50%分成带来的扭曲与50%的边际税率带来的扭曲相似（Banerjee，Gertler and Ghatak，1998 做过一个案例研究）。劳动和资本市场的总的代理成本可以通过将这些合约关联而降低，但这种关联可能会降低经济中竞争的有效程度（Braverman and Stiglitz，1982，1989；Ray and Sengupta，1989）。

第三个要点是因为财富分配影响当期的合约、激励和产出，从而也会影响下一期的财富分配。没有或只有很少资产的个人会相对缺乏生产力（即，相对于如果他有更多财富，能够做企业家或签订更强激励的合约时的产出而言）。并且如果很多人没有资产或只有很少资产，那么工资率会很低。在低工资下，初始财富低的个人将给下一代留下较少的遗产。因此，初始的高度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会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进行自我复制。Banerjee 和 Newman（1993）证明初始高度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并可以永久性地限制增长。Mookherjee 和 Ray（2000）给出一个更强的结果，因为他们允许人们在无限的生命期内进行储蓄，以最大化一生的效用。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穷人不更多地储蓄以提高他们未来的生产率？在答案中，他们证明如果市场是竞争性的，穷人就会这样做；但"如果这些人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并且贷款人只签订一期合约），那么穷人的储蓄收益会完全被贷款人占有，从而导致贫困陷阱"（Mookherjee and Ray，2000：1）。

历史。除了财富分配之外，历史还通过其他方式影响经济结果。历史影响一个社会的技术、技能基础（skill base）和制度。过去事件的影响不一定随着时间推移而削弱。这些事件可能会成为推动经济达到某一稳定状态的前提条件。[9]

8　很容易忽视这一点，也许是因为"第一代"委托—代理模型（Ross，1973；Stiglitz，1974a）是局部均衡模型。我们感谢雷（Ray）的评论对这一点的强调。后来的模型可称为"第二代"委托—代理模型，与第一代不同，它们在一般均衡情况下分析道德风险，其中代理问题可能会影响工资率（Banerjee and Newman，1993；Legros and Newman，1996）、利率（Aghion and Bolton，1997；Piketty 1997）和资产价格路径（Hoff and Sen，2000）。

9　关于这一问题存在大量文献。一批精选的有趣结论包括 Azariadis 和 Drazen（1990），Krugman（1991），Ljungqvist（1993），Acemoglu（1995）以及 Mookherjee 和 Ray（1998）。Banerjee（2000）用一个简单的图形处理了初始财富分配对稳态的影响。

短暂的事件具有持久影响的情形被称为*滞后效应*（hysteresis）。例如，黑死病造成的大量死亡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在欧洲带来了劳动节约型的创新，这对欧洲大陆的历史发展有深远的含义。[10]

历史也通过影响信念而影响结果。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预期（至少部分地）是适应性的情形：个人预期到人们未来的行为会与过去的行为一样。即使在完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历史也会投射一个很长的影子。例如，腐败的大量发生，或者一个行业的某些企业被发现将次品作为高质量商品销售，会损害整个行业的声誉。直觉告诉我们，这会降低群体内每一个成员在未来诚实行为的激励。梯若尔（Tirole，1996）正式地考察了这一思想。他假设群体内每一个成员（例如，一个组织的雇员或一个行业中的企业）的声誉取决于他过去的行为，并且也取决于他所在组织过去的行为（因为他的行为记录不能被完全观察到）。群体的任何一个成员在过去被发现有不诚实行为都会*增加*其他成员建立诚实声誉所需的时间。这会*降低*个人的诚实激励，并会造成一个*腐败的恶性循环*，在其中"组织的新成员会受到前人原罪的不利影响（即便是他们已经消失很久）。（p. 1）"。这是一个*路径依赖*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未来的变量水平取决于它过去的水平。

历史很重要还因为它影响塑造个人偏好的文化模式。一代人谋生方式的改变会通过抚养孩子、学校教育和非正式的学习方式（比如顺从、行为榜样和社会规范）来影响下一代。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塑造偏好的社会制度；它可能会孕育开放、竞争和自利的特征。（有意思的讨论参见 Acemoglu，1995：sect. 4；Bowles，1998。）偏好、技术和制度都是内生的，暂时的事件对它们有持久的影响。

多重均衡。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主要思想是某个市场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市场有影响。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中这种相互作用是以价格作为中介力量，并且通常只有一个均衡。相反，如果对应任何一组基本因素都存在一个均衡的连续统，那么一般均衡理论就不适用了：一个人不能通过基本因素来解释不同经济的差别。事实上，索洛（Solow）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不只是宣称某一个时刻只有一个均衡。在他的模型中，长期的均衡不取决于历史、制度或财富分配。[11]他的模型的著名预测是国家间的人均收入将会收敛。而一旦按

---

10 例如，一旦高工资带来劳动节约型的创新，随后的工资下降并不会中止这种创新。更广泛的讨论，见 Landes（1998）。

11 事实上，Stiglitz（1969）在索洛模型的一个变体中表明收入分配甚至不取决于初始条件。

照我们建议的方式扩展分析，就很容易建立有多重均衡的模型，我们在下面会表明这一点。

“生态经济学。”更一般地，现代发展经济学拒绝了作为传统新古典分析基础的“均衡”概念。在那种分析里，经济的动态是机械的：知道基本因素和初始条件，就可以精确地预测经济“演变”的过程。[12]即使存在随机事件，如果知道影响相关变量的随机过程，就可以预测每一日期结果的概率分布。相反，现代发展经济学更多地受生物学模型的影响，而不是受物理学模型的影响。后者强调趋向均衡的拉力——类似的力量在所有的经济中都起作用，所有的经济都会被拉向同一个均衡——前者更多地强调演化过程、复杂系统和导致系统发散的偶然事件。

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结尾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讨论了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上的情况，他写道：

（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动植物有极大的不同，尽管各岛有）同样的地质特征、同样的高度、同样的气候……很久以来这对我都是很大的难题，但它主要产生于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即认为一个国家的物质条件是其物种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但我认为，无可置疑的是，其他物种的性质（每一物种都要与他们竞争）至少同样重要，并且通常是更加重要的成功因素。(Darwin [1859] 1993：540)

经济好像一个生态系统，达尔文暗示了生态系统具有多重均衡。内生变量（生态环境）比基本因素（气候和地理）在决定系统演化方面更加重要得多。运气——历史的偶然事件——在决定这个环境时起到了作用，因此在选择均衡时起到了作用。

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发展就比以前认为的更加简单也更加困难。在旧的理论中，确保经济发展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转移足够的资本并去掉政府强加的扭曲。在新的理论中，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从旧的均衡中转移出来，沿正确的方向充分地远离旧均衡，使经济可以被“吸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均衡。尽管这样做需要的资源更少，但它需要更多的技术。某些扰动可能将经济引到一个更坏的均衡——正如一些人认为的，某些

12 我们把“均衡”和“演变”放在引号里面，因为新古典分析忽略了制度；然而正如我们指出过的，制度确实影响资源配置。制度对禀赋、技术和政策的变化做出反应而发生演化，这种相互作用是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转型经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这一更宽广的视角下，新古典理论的“深层”基本因素——偏好和技术——本身就是内生的，受到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影响。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没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发展问题的理论框架，但它在发展理论的演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宣称制度不重要，这迫使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制度重要。它宣称财富分配不重要，这迫使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财富分配重要。它宣称经济的主要相互作用是通过价格来传导，这迫使我们思考经济生态系统中无数其他的重要相互作用。

一、发展的障碍：资本禀赋和政府导致的价格扭曲之外的因素

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在过去的50年中没有缩小？关于发展的所有非新古典视角的共同观点是这两组国家处于不同的生产函数上，并且组织方式也不同。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这些差距的来源。这一部分更详细地考察三个互补的假说：制度、“生态学”和知识。

制度、组织和社会资本

最近的理论工作的一个主要见解是制度作为对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合约的反应而产生，尽管其本意是改善经济结果，但不能保证这种改善实际会发生。制度可能成为均衡的一部分，但却功能失常。例如，阿诺特（Arnott）和斯蒂格利茨（1991）考察了由道德风险导致的市场提供保险不足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影响。他们证明非正式的社会保险会挤出市场保险并减少社会福利。因为制度是内生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低水平的市场发展导致高水平的信息不完美，这些信息不完美本身又会产生阻碍市场发展的制度——例如，非正式的、个人化的关系网（其他例子见 Kranton，1996；Banerjee and Newman，1998）。

有效市场——尤其是与跨期交易相关的市场——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存在保证私有产权安全、执行合约和提供信息披露的制度。这些都需要政府。当然，在很多地方都存在黑社会性质（Mafia-style）的执行机制，但是这种执行机制有自己的缺点（Gambetta，1993）。举一个例子来说，这种法律外机制不仅被用来执行合约，通常也被用来阻碍市场进入。不仅仅过于专横的政府会阻碍市场的发展，通常，政府过于软弱也会成为问题（World Bank，1997）。

在某些情况下，私人团体可以通过各自的努力来执行产权，但是这种执行并不必然拥有任何最优性质。De Meza 和 Gould（1992）证明了这一结果。

他们的研究背景是政府规定一种自然资源（比如土地或矿产）的产权，但产权的执行则取决于个人所有者是否愿意支付一个固定的执行成本——例如，是把他的土地围起来还是进行巡逻。如果所有者不支付执行成本，那么根据假设，其他人会自由地使用他的财产。所有者执行产权的收益是雇佣劳动力来使用自然资源，并从中收取租金。在决定是否执行产权的时候，所有者比较他能获取的租金和执行产权的固定成本。工人的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越低，租金越高。在均衡时，工人的保留工资取决于有多少其他所有者执行产权：随着执行产权的所有者比例提高，工人的外部机会减少，从而他们的保留工资也下降。在工资较低的情况下，潜在的资源租金上升。从而可能产生两个稳定的均衡——在一个均衡里所有的所有者执行产权，并获得高租金，而在另一个均衡里没有人执行产权，单独一个所有者从执行产权中得到的租金也很低。[13]（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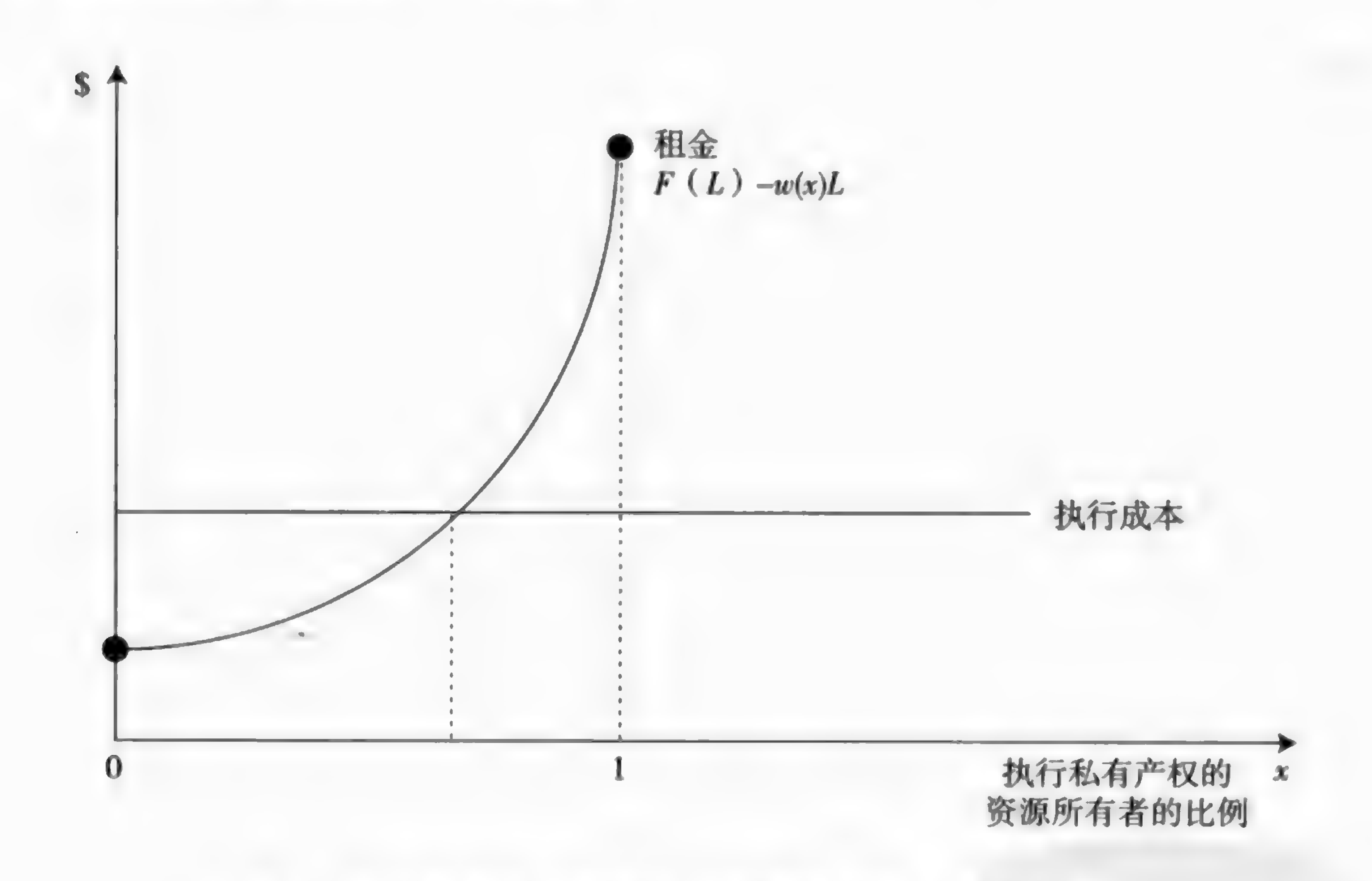


图 1　在执行私有产权条件下的多重均衡（有角点解）

如科斯（1937）所强调的，当执行私有产权的成本很高时，市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最优的分配机制。但是科斯并没有认识到，不管最优的分配制

13　正式地，假设每一个执行产权的资源所有者雇佣 L 个工人，工人产出的价值为 $F(L)$。因此他的租金为 $F(L) - w(xL)$，这里 w 是工资函数，它随着执行产权的资源所有者的比例 x 的上升而下降。

度是什么，具有私人执行成本的分散经济肯定不会是最优的分配制度。最近的历史发展超出了这一观察，表明合约执行制度存在路径依赖。[14]

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息网络、信誉机制和社会制裁）有时候能够替代正式的执行机制。通过重复关系来执行的隐性合约在确保“好的行为”方面，可能与显性合约同样重要。有这样一种担心，在发展的早期，规范和信息网络会被弱化，从而社会制裁变得不再有效。随着传统社区由于很多人从乡村迁移出来和高度的变动率（例如，劳动力流动）而瓦解，隐性合约的执行变得很困难。如果利率很高，问题会更加恶化。非正式执行机制的瓦解通常发生在新的联系重新建立和有效的正式机制发展起来之前：社会资本在它被再创造出来之前就被摧毁了。

我们把社会看作一个组织，在这个组织里，交换和生产不仅通过市场，也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安排来协调。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通常是社会和信息资本的衰退，而不是增加；这些损失由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增加来（部分地或完全地）补偿。损失的结果是生产率的提高比没有损失情况下要小。例如，市场的扩张降低了社区的作用，会增加对统一的标准和甄别制度的需要，但这些只能随着时间慢慢出现（非正式的阐述见 Klitgaard（1991））。在这些出现以前，技术变迁实际上会使信息问题更加恶化，以至于技术变迁的某些、所有或者甚至比所有还要多的收益会被消散掉（Hoff，1998）。[15]

政府强制改革的速度和顺序可能会削弱或增大这些非组织力量。改革的负效应可能抵消改革带来的大部分收益，甚至负效应可能大于改革收益。例如，对银行规范的快速改革和汇率调整的一种潜在的巨大影响是破坏银行的特许权价值，降低了其他资产的价值。这削弱了银行（从而它们更有可能进行掠夺或承担过量风险），因此增加了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如果银行破产，由此导致的信贷紧缩会使企业破产，这又导致组织和信息资本的进一步受损。

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双重挑战，一种挑战是在发展过程中失去社会资

---

14 例如，参见 Bardhan（2000）和 Greif（1997）。Greif 提到，“既然一个特定的‘合约执行’体系的相对效率取决于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就没有理由期望一个特定社会的特定制度是经济上有效率的”（257）。

15 为了看清这一点，注意在甄别制度建立之前，看起来相同的异质商品以同样的价格出售。价格取决于平均质量，平均质量就像是一种公共财产，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它为生产者带来一个收入流；（b）收入流取决于所有生产者的行为，他们可以降低或提高这个收入流，这取决于他们是低质量还是高质量的生产者；（c）没有生产者对它拥有私人产权。如果一个技术变化导致边际意义上低质量的新生产者进入，他们可能降低平均质量，以至于没有生产者能从这一技术变化中获得利益。

本，另一种挑战是缺乏约束政府在法律规则范围内行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民主是对政府的一种制约。政府作为发展主体的行动能力取决于民主力量的大小和选举者按照阶级和种族界限被划分的程度。很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阶级或种族的两极分化，这阻碍了政府在公共物品（Easterly，1999）或再分配（Tornell and Lane，1999）的决策中充当“发展型政府”的能力。另一些国家面临暴力水平不断增加的问题。在非洲，民众骚乱被证明是发展的一个重要阻碍（Easterly and Levine，1997）。

从生态或演化的角度看，发展为动态过程引进了新的要素。它不仅刻画出了资本积累的动态（这是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重点）或者知识的传播路径（这是熊彼特理论的重点），而且刻画出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演化路径。例如，我们需要知道特定的干预怎样影响某些制度的形成成本，这反过来影响实施改革的类型。我们将在下文回到这些主题。

协调问题的一些例子

对前文描述的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的模型化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但对协调失灵的模型化方面则取得了相当大进展。[16]这里，我们对这一研究进行一个总评。这个研究抓住了一个思想，即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重要活动，如创新、诚实贸易、投资、劳动培训和储蓄，都能产生外部性。外部性可以通过如下变化间接起作用：（a）观念和信息的改变；（b）对经济主体技术的影响；（c）存在的市场集合的改变；（d）市场规模的变化；以及（e）搜寻成本的变化。这些外部性会影响活动的回报，并能产生多重均衡，每个均衡都对应一个不同的回报结构。因此，这个工作描述了具有一组给定基本因素——类似于达尔文描述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地质、气候和自然资源——的环境可以支持行为集中的任何一种行为作为它的均衡。

我们将在附录Ⅱ中正式考察这些模型的数学结构，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简要讨论动态问题。为了给后面的讨论做好准备，我们在这里要指出可以将我们要描述的静态均衡嵌入到跨期模型中，正如 Adserà 和 Ray（1998）所做的；并可以证明即使当事人有完美的预期，也可能不存在一个均衡路径使经济沿着这一路径摆脱“坏的”均衡。陷阱继续存在。

我们在下面提出的市场经济模型中存在大量参与者，因此每个人都忽略了他的行动对其他人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是无穷小的（因此我们集中

16 这里我们集中于协调理论在发展方面的应用。Cooper（1999）讨论了它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于纳什均衡)。模型在结构上类似于有策略互补性的博弈，但有一些重要的概念差别。在博弈论模型中，策略互动的概念意味着每个参与者都知道他的行动会影响其他参与者的行动，而在我们关注的市场均衡模型中，这样的策略互动被假设为不存在。我们认为对于分析市场问题，市场模型比博弈论模型更加合适（尽管后者对于理解一个佃农和地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重要的)。

1. *研发的溢出效应*。对大多数生产者从事的那种研发进行概念化的一种方式是它是将一组已知事实和基本原理转变为一种潜在可盈利的新应用。根据这一观点，对研发投资的期望回报随着公共领域知识存量的增加而上升。如果私人研究的一部分成果渗入到“公共池”中，那么进行的私人研究越多，每个生产者可以利用的思想库就越大。有了丰富的思想存量，每个生产者从事研发的激励就上升了（Romer，1986)。

为了分析这一情形，考虑一个简单模型，其中任何生产者（假设所有生产者都是相同的）的利润（效用）取决于价格、他自己的研发水平（他的行动 a^i 可以是0到1之间的任何值）和所有其他生产者的研发水平（他们的行动 a)。因为这里我们只关心对称均衡，所以我们只考虑所有其他生产者都选择相同行动的情形。因此，我们把利润函数写作 $U^i[a^i;a,p(a)]$，这里 p 是价格向量（它本身依赖于主体的行动向量)。假设每个主体的行动水平提高的边际回报递减。给定其他人的行动，每个主体选择他的行动以最大化他的利润（每个主体都非常小，以至于不存在策略的相互作用，可以忽略个体行动对 p 的影响)。

反应函数

$$u_1^i[a^i;a,p(a)] = 0 \tag{1}$$

描绘了对于其他行动者选择的所有可能的 a 值，代表性个体 i 将采取的行动。函数 u_1^i 是 u^i 对于第一项 a^i 的偏导数。式（1）强调，给定 a，个体不能通过他行动水平的边际变动来获得一个更高的支付。图2描绘了一种情形，其中所有其他个体采取更高的行动 a 会使剩下的主体 i 仿效：正式的，其他主体的更高行动增加了每个人更高行动的边际回报。我们说不同主体的行动是*互补*的。

对称的内点解均衡是满足下面方程的 a^* 值

$$u_1^i[a^*;a^*,p(a^*)] = 0 \tag{2}$$

如果个体之间的互补性足够大，就会出现多重均衡。图2显示了在 $a^{*\prime}$ 处的稳定的低水平均衡，和在 $a^{*\prime\prime\prime}$ 处的稳定的高水平均衡。当其他人很少进行研发的时候，任何企业大量进行研发都是没有好处的。如果有一个冲击能够改变每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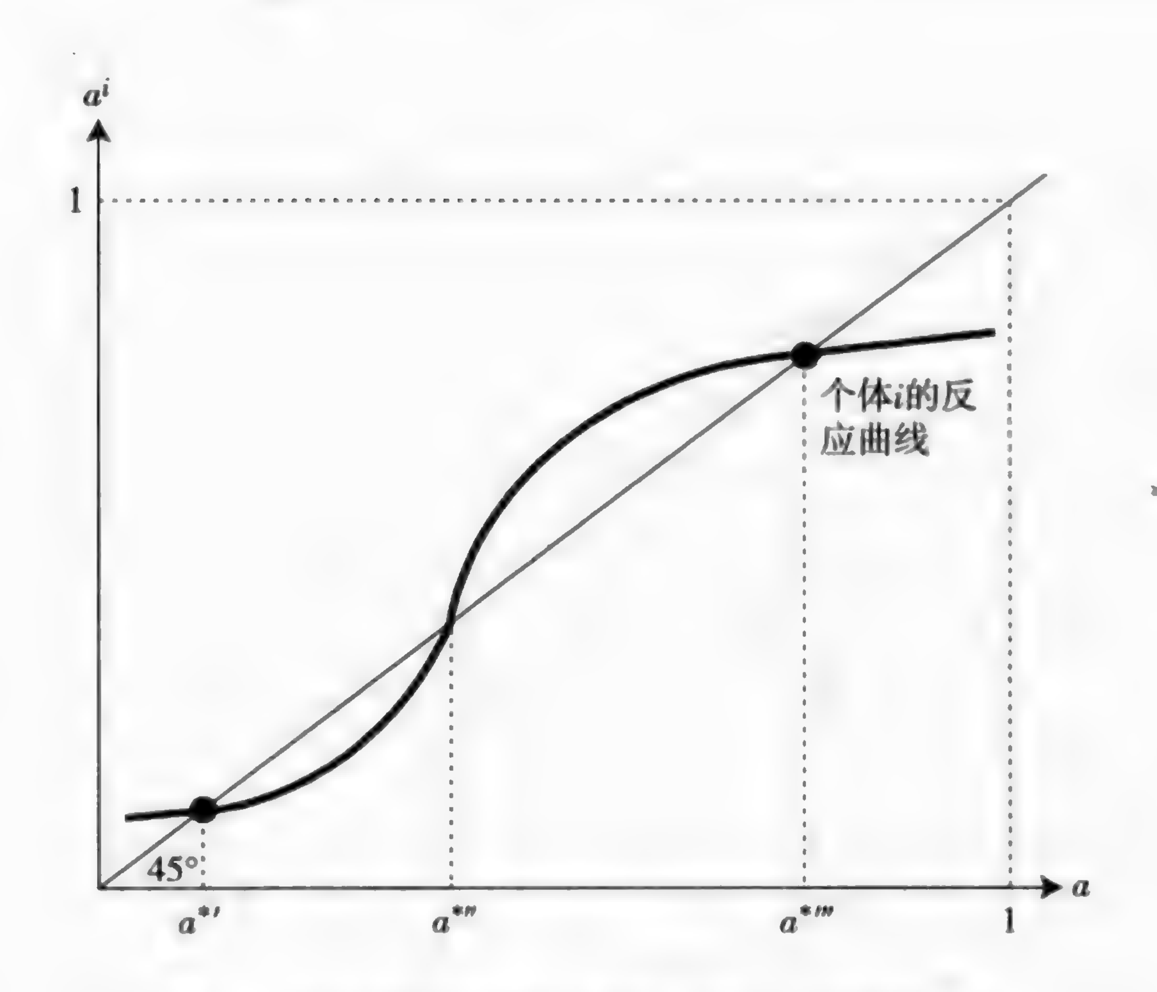


图 2 有对称行动者的模型中的二元稳定均衡

企业的研发水平，使它提高到略高于 $a^{*\prime\prime}$的水平，就会产生一种反应，将均衡移动到 $a^{*\prime\prime\prime}$处（参见 Romer，1986 and Krugman，1991 对动态的讨论）。

这个模型抓住了个体间有正的溢出效应这一简单思想。相反，在新古典理论中，影响主体的唯一内生变量是价格。价格通常会引导资源达到有效率的配置，因为市场是完全的（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机制，通过这一机制，一个企业的研发对其他企业的溢出效应可以得到补偿）。

2. 官僚、寻租者和集体主义执行者的溢出效应。协调问题文献不仅关心行为水平（比如研发或投资），而且关心一个经济中行为和制度的类型。人们像官僚一样行动，还是追求创新？他们是进行寻租还是生产？为了执行合约，他们是否依赖非正式团体、个人或者政府的约束力？个人的行为会产生外部性。外部性会决定不同行为方案的排列次序。如前面例子所示，这会导致多重均衡，每个均衡都有一个不同的回报结构。我们在下面考虑这三种情形。[17]

“官僚”行为还是“创新”行为。Sah 和 Stiglitz（1989a）提出了一个社

17 在第一部分我们讨论了第四个例子，产生于产权执行过程中的互补性（de Meza and Gould（1992）里面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产权所有者的执行行为的互补性导致多重均衡，一些均衡比另一些均衡有更高的总社会剩余。但均衡结果不是帕累托可排序的（在这个模型中，工人们通常偏好更少的执行），所以协调失灵不可能出现。

会均衡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个人可以选择“官僚”行为或者“创新”行为。官僚使创新者的生存更加艰难，反之亦然。

假设 x 是选择创新行为的人口比例，$U(I;x,p)$ 是采取创新策略带来的效用，而 $U(B;x,p)$ 是采取官僚策略带来的效用。给定 x 和价格向量 p，每个人选择能给他带来更大效用的行为。如果大多数人选择官僚行为，创新的回报将很低，并且创新者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得到回报。但如果大部分人选择创新行为，创新的回报会很高，从而使创新也成为一个均衡。一个内点均衡（x 在 0 和 1 之间）是满足下面方程的一个比例 x^*

$$U[I;x^*,p(x^*)] = U[B;x^*,p(x^*)]$$

并且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均衡。所有主体做出同样选择的“角点”均衡也可能存在——一个是官僚行为的均衡，如果满足

$$U[I;0,p(0)] < U[B;0,p(0)]$$

另一个是创新行为的均衡，如果满足

$$U[I;1,p(1)] > U[B;1,p(1)]$$

这个模型的一个轻微变形可以用来考察演化的动态过程。不是假设个人选择创新行为还是官僚行为，而是假设不同的复制率（reproductive rates）是效用水平的函数，从而有

$$d\ln x/dt = k[U(I;x,p) - U(B;x,p)]$$

其中 k 为正的常数。这样均衡集合就会与以前相同，经济收敛到哪个均衡取决于它的历史。历史事件——例如，一个国家对国际竞争开放，这会不同程度地损害官僚企业——可能会使经济从一个均衡移动到另一个均衡，从而影响长期的技术进步率。

寻租者还是生产者。前面模型的另一个变体集中在寻租活动上面（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3; Acemoglu, 1995）。这个变体阐明了为什么当公共寻租和私人寻租使产权变得不安全时，一些国家完全无法增长。一个原因是“寻租，尤其是政府官员寻租对创新活动的伤害可能会大于对日常生产的伤害”（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3: 409）。“公共寻租打击创新，因为创新者需要政府提供的物品，比如许可证、执照、进口配额等”（412）。

Murphy, Shleifer 和 Vishny 考虑了一个农场经济，在这个经济中，个人选择进行三种活动中的一种。个人可以成为“创新者”，在一些经济里可能仅仅意味着为市场生产经济作物（cash crop），关键是他的产出容易受到寻租的影响。或者他可以生产一种生存作物（subsistence crop），在这种情况下，产出不易受到寻租影响。或者，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寻租者，侵占创新者

产出的一部分。均衡是人口在三种活动之间的配置。作者做了一个合理的假设，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更多资源转移到寻租活动中，创新的回报比寻租的回报下降得更快。结果，寻租相对于创新的回报提高，这会产生多重均衡。在一个均衡中，创新者的比例很低，创新的回报也很低，因为寻租者的比例很高。但还存在另一个均衡，情况正好相反。

“集体主义”执行还是“个人主义”执行。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现在都同意一个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组制度是那些提供合约执行的制度。格里夫（Greif，1994）考察了文化因素，它们可能解释为什么两个前现代社会（北非的马格里布和热那亚）沿着不同的社会组织的轨迹演化。为了强调主要思想，他展示的模型中有两类参与者：批发商和代理商。代理商代表批发商的利益进行海外贸易。批发商进行决策：选择集体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方式执行他与代理商的合约。集体主义执行是指批发商惩罚（通过拒绝雇佣）欺骗过团体内任何一个批发商的代理商。个人主义执行是一个批发商仅仅惩罚欺骗过自己的代理商。格里夫表明，如果批发商相信集体主义的执行方式可能发生，一般来说，雇佣一个被发现欺骗过其他批发商的代理商就不符合这个批发商的利益。这使得这种预期能够自我实现。这一结果的直觉很简单：一个已经失去信誉的代理商再次欺骗的损失会很小，所以他比一个有完美信誉的代理商更容易欺骗他现在的雇主。这使人们不大愿意雇佣因为欺骗而名誉受损的代理商。然而，如果批发商相信个人主义执行会发生的话，集体主义执行的动机就不存在。因此，存在两个均衡，一个包含集体主义执行，一个包含个人主义执行。“选择”哪种均衡取决于观念（文化）。

短期来看，依赖个人主义执行的成本比较高，因为它放弃了更强的、团体水平的惩罚机制。但从长期来看，个人主义执行会加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有利于正式的、政府一级的执行合约和裁定冲突机制的出现。这种制度方便了市场的扩张，因此倾向于促进长期增长。格里夫（1994）用上述逻辑解释了西方的历史。

3. *溢出效应和不平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体特征差异产生结果差异的方式。市场会复制、减弱或者放大它们吗？“映射”是唯一的吗？我们举两个例子，在这两个例子里答案都是否定的，因而存在多重的、帕累托排序的均衡。

信息外部性。人们采取的行动通常不仅反映了他们自己的信息，也反映了没有采取这些行动的其他人的信息。当一个人的隐藏特征与采取那种行动的净收益相关联的时候，就是这样。直觉上可能认为理性个人通常会在甄别

时做出有效率的选择。但因为他们的选择产生了“信息外部性”，选择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就像协调问题最早期的一个模型所显示的（Stiglitz 1975）。

模型基于这样一个思想，即教育的关键作用不仅是生产人力资本，而且是根据内在能力甄别不同个人。教育文凭把劳动市场上的个人分成不同的群体。斯蒂格利茨（1975）提出了一个模型，其中教育对内在的能力没有影响，但可以作为甄别的工具。模型探讨了两个简单的问题：均衡是唯一的吗？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吗？

假设个人对自己的能力拥有私人信息。他们的能力越高，他们获得教育文凭的非金钱成本（例如，努力成本）越低。雇主不能直接辨别个人的能力，但他们可以观察到雇员是否有文凭。他们也可以观察到有文凭者和没有文凭者的平均能力。

在选择是否获得一个文凭的时候，人们会比较获得文凭的收益——有文凭和没有文凭工人的工资差距——和成本。成本由 $C=C(z)$ 给定，它取决于能力 z。考虑最简单的情况，一个人或者具有高能力 H，或者具有低能力 L。很容易看到有两个均衡存在，一个均衡甄别出高能力者，另一个均衡没有甄别，条件是

$$C(L) > w(H) - w(L) > C(H)$$

和

$$w(H) - \mu < C(H)$$

这里 μ 代表人口中平均的生产率水平。上面的不等式意味着在没有甄别的均衡中，高能力者和低能力者都获得更高的收入。然而如果所有其他高能力者都获得文凭，那么剩下的高能力者也这样做处境就会变得更好，所以有甄别的情形也是一个均衡。

模型阐释了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互补性的思想。为了认清这一点，假设行动 a 是两点选择，“甄别”或“不甄别”。个人的选择决定存在一个劳动市场还是两个劳动市场（高能力者和低能力者各有一个市场）。如果上面的不等式成立，那么就存在两个均衡，其中只有一个劳动市场的均衡对每一个人都更好。[18]

---

18 Hart（1975）证明过市场集合可能是无效率的思想。最近的探讨见 Makowski and Ostroy（1995）。为什么即使没有 Stiglitz（1975）强调的那种信息不对称问题，还是不可能有完全市场？对于这一问题，Matsuyama（1997：145）指出，“即使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将所有事件都列出来，也不可能为所有事件都建立市场：即使建立市场的成本很小，经济中所有的资源都会被吸纳进去，这样就没有剩余资源去进行这些活动”。

所有权结构：资本主义的寓言。下一个例子考虑拥有不同财富的个人对合约的选择。Hoff 和 Sen（2000）考虑了一个经济，在该经济中，资本市场是不完美的，因此一个财富少的个人获得企业股权或房屋所有权的成本会更高。但股权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为努力工作创造了高强度的激励。对这一问题的标准处理是假设人们之间没有溢出效应。但事实表明外部性是重要的。思想在硅谷的企业之间溢出。一个企业家对一个出口市场的突破，会增加经济中其他企业家的出口机会。一个房屋所有者修葺房屋必然增加周围其他人的房屋价值。[19]因此，存在大量企业家（或房屋所有者）的一个影响是工业区内企业所有权（或社区中房屋所有权）的回报会增加。像在前面例子中一样，某一类型个人所做的选择可能会产生多个、帕累托排序的均衡。一旦我们考虑进另一层面的复杂性——在工业区（或居民区）之间的自由迁徙——协调失灵的后果就会被放大。

更特别的，考虑一个环境，其中财富禀赋的累积分布函数是 $F(W)$（我们暂时把互动环境中的代理人集合看作是固定的）。假设每个企业或者由领薪水或工资的劳动者管理，或者由持有企业相当份额股权的人（“企业家”）管理。资本市场是不完美的：借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这意味着只有当预期回报足以补偿借款的交易费用时，财富少的个人才会选择成为一个企业家。给定经济中 x 比例的企业由企业家管理，每个人选择能给他带来更高效用的活动。令 $V(e,x,W)$ 表示与高努力水平 e 和给定财富水平 W 相联系的效用，并令 $V(n,x,W)$ 表示与同样参数和低努力水平 n 相联系的效用。那么如果存在内点均衡，必定有一个关键的财富禀赋水平 W^*，在 W^* 处个人对于做企业家和雇佣劳动者没有差异；即

$$V[e,x,W^*] = V[n,x,W^*]$$

如果企业家之间有互补性，x 的上升会使左边比右边提高得更多。财富的下降会使左边比右边下降得更多，因为除了消费的损失，借款的交易费用也增加了。因此与更高的 x 相对应的是更低的 W^*：我们可以把截止（cut-off）的财富水平写作

$$W^* = W^*(x)$$

给定经济的财富分布 $F(.)$，与任意的财富值 W 相关的是收入超过 W

---

19 例如，当一个国家一组企业成为成功的出口者，外国买主就更有可能在当地建立办公室，这反过来会提高每个企业扩大出口的努力的回报。在 Morawetz's（1981）对哥伦比亚服装工业的案例研究中强调了这一问题。

的人口比例 x。我们可以把这个比例写作

$$x = 1 - F(W) \equiv x(W)$$

这两个方程联立的解就是模型的均衡。这两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可以有多个交点。如图3所示，可能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在这个均衡里，一个较小比例 $x^{*\prime}$ 的个人购买足够的股票成为企业家（他们投入高水平的努力）；产生的局部正外部性很低；这个结果支持大多数人签订工资合约并生产较低产出的决定。只有财富等于或超过关键水平 $W^{*\prime}$ 的人才会成为企业家。相反，当一个较大比例（$x^{*\prime\prime}$ 或 $x^{*\prime\prime\prime}$）的个人通过购买他们所管理企业的股票而成为企业家的时候，他们产生较高水平的局部溢出效应，从而使那个较好的状态成为均衡。关键财富水平会相应地下降到 $W^{*\prime\prime}$ 或者 $W^{*\prime\prime\pr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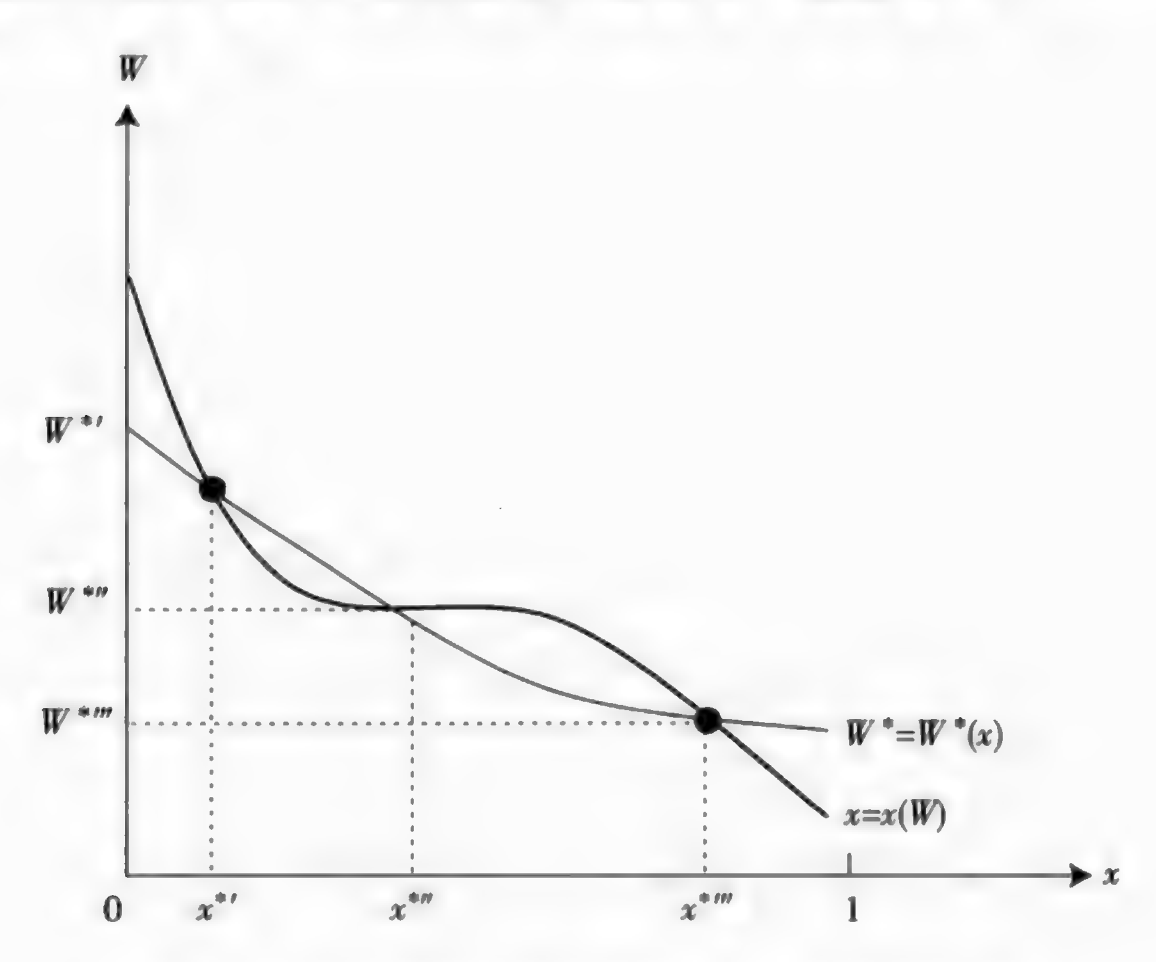


图3　存在异质参与者的模型中的二元稳定均衡

认识到对增长很关键的许多溢出效应是局部的而不是全局的（例如，溢出效用局限于硅谷或者某一个居住区，主体分散在各个工业区或居住区），可以把更高水平的复杂性和现实性引入模型。直觉上人们会认为地区间的自由迁徙会解决协调失灵的问题。如果人们可以无成本地建立新的团体并迁移入新的商业区或居住区，这种情况的确会发生。然而，假如合适的土地是固定供给的。那么土地价格将会均等化，使得那些存在协调失灵的地区对一部分人也是有吸引力的。在这种情况下，迁徙会恶化协调失灵的结果。Hoff 和 Sen（2000）证明当企业家（或房屋所有者）之间的互补性足够强的

时候，穷人和富人将依据“合约类型”和收入划分阶层（stratify）——富人处于有高水平的“资产持有者”和正外部性的区域，穷人处于两者都是低水平的区域。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解释工业化国家的“小部分不发达”（pockets of underdevelopmnet）现象，而不需要假设人们之间能力和偏好有任何内在差异。[20]

4. “大推进”理论：联系效应。Rosenstein-Rodan（1943）的“大推进”理论是早期对发展中协调问题的一个著名的表述。Rosenstein-Rodan 提出了可能产生协调失灵的许多机制。考虑他们的“缺乏联系”（missing linkage）的例子。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企业使用（比如）钢，一个企业生产钢就没有收益，但如果没有企业生产钢的话，使用钢的企业就不可能产生。这些问题在新古典模型中不会出现，因为有一个完全的市场集合（包括所有被生产和可能被生产的商品），并且“实际的”钢价会导致生产钢和使用钢的企业进入市场。即使在没有一组完全市场的情况下，这个特殊例子也缺乏说服力，因为通常单独一个企业就可以既生产钢又生产使用钢的产品。似乎只有当范围不经济很显著的时候，协调失灵问题才会显得重要。

使“大推进”模型具有现实性的关键特征是扩散的外部性（diffuse externalities），其中相互作用效应通过系统范围的变量如总需求、工业对投入品的需求或搜寻成本而发生。Murphy，Shleifer 和 Vishny（1989）通过强调很多种这样的扩散溢出效应而使“大推进”理论正式化了。他们的模型最显著的特征是集中于需求的溢出效应上面：高生产率制造部门的扩张导致更高的收入，这又导致对那个部门产品的更高需求。

尽管扩散外部性对有说服力的“大推进”理论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例如，在全球经济中，一个使用钢的企业可以从国外购买钢，而一个生产钢的企业也可以将钢卖到国外去。国际贸易解决了协调问题，就像 Tinbergen（1967）很早就认识到的那样。至少从长期来看，对一个小型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存在着本质上无限的需求。东亚经济出口导向战略的实践表明有限需求并没有成为限制这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但在其他对 Rosenstein-Rodan 理论的正式模型化中，国际贸易无法解决协调失灵。现代技术通常需要很多种本地投入和服务支持。“大推进”理论

---

20 Durlauf（1999）概述了最近内生分层的群组效应方面的研究。这一文献的贡献是研究了在给定一个相互作用的环境（比如，一个社区、学校或者企业），当个人分组是内生而非固定时，人们之间在行为或结果上的相互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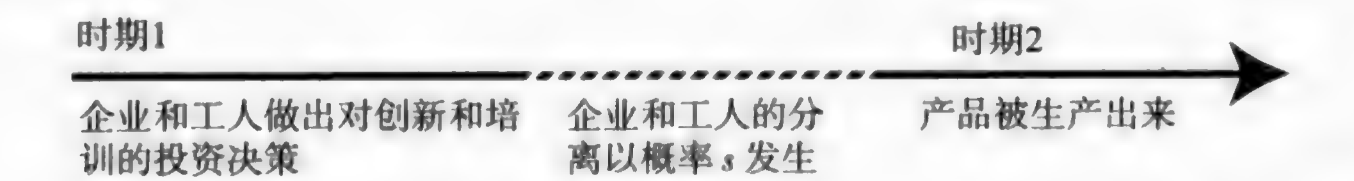
的一个版本强调一系列不同的中间投入品的不可贸易性，这些投入品被用于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先进部门”的生产中（Helpman and Krugman，1985；Rodríguez-Clare，1996；Rodrik，1996）。“先进部门”的扩张增加了对这些不可贸易投入品的需求，降低了它们的平均成本并增加了可得的投入品种类。因为有更多的中间投入品种类，所以生产就更有效率（中间品部门被模型化为一个差异化产品的部门，就像在 Dixit and Stiglitz（1977）中所论述的一样）。因此，当其他所有企业都进入“先进部门”的时候，剩下的企业也进入会更加有利；但当其他所有企业都留在传统的、低技术部门的时候，剩下的企业也留在传统部门会更加有利。因此即便经济对国际贸易完全开放，一个低水平的均衡也可以持续存在。

有几种对待不可贸易投入品的方式。一种方式是它们代表物质投入品，另一种方式是它们代表不同种类的专业技术劳动力，如计算机技工或软件设计者。正如 Rodrik（1996：2）认为的，“工人投资于一种专业技能的决策既取决于对这种特殊技能的需求，也取决于经济中互补性技能的存在”。但这个例子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企业为什么不可以培训它需要的劳动力，从而将外部性内部化呢？下文提出一个两期模型，它证明为什么即使一个企业内部的完美合约也可能无法完全解决工人和企业决策的相互依赖。

5. **“大推进”理论：搜寻成本**。“大推进”理论的这个版本集中于劳动市场的搜寻问题。培训的生产率取决于被培训的劳动力寻找创新型雇主的能力；这个能力转而又取决于经济中创新型企业的比例。为了抓住这一思想，我们粗略考察 Acemoglu（1997）模型的一个简单版本。有两类参与者：一类为企业，它们可能会采用新技术，也可能不采用新技术；另一类为工人，他们可能受培训使用新技术，也可能不受培训。企业和工人的数量都很大并且数量相等，每个企业只雇佣一个工人。有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每个企业与一个工人相匹配；他们联合对培训和创新做出决策，并且他们之间有完全的合约——即没有信息问题和交易费用。在第一期期末有分离的风险。如果分离发生，企业需要寻找一个新工人，工人也需要寻找一个新企业。在第二期，产品被生产出来。

如果工人接受培训，他的企业也采用了新技术，联合产出的价值会提高 α。因为假设技能和技术是强烈互补的，所以如果培训或者创新没有发生的话，技能和新技术就没有回报。令 C 代表两种投资（培训和技术）的联合成本，并令 r 代表利率。为了使模型更有意思一点，假设训练和创新都是潜在有价值的：即 $\alpha > C(1+r)$。

这个经济会出现潜在的协调失灵，因为在第一期期末企业和工人有分离的风险。假设工人和企业的一个特定匹配会以概率 s 受到一个逆向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须寻找一个新的雇员，工人也必须寻找一个新的雇主。时间顺序如下所示：



培训传授给工人技术，使他可以在任何采用新技术的企业使用这种技术。因此，如果劳动市场上没有搜寻成本，企业和雇员之间的分离不会产生损失：如果分离发生，工人只需要转移到另一个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并且培训和投资的所有剩余将会被进行投资的企业和工人享有。但假如搜寻是有成本的，匹配将是不完美的。不能保证投资于新技术的企业与受过培训的工人相匹配。

令 ϕ 代表好匹配的概率。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匹配过程是随机的（但任何假设——只要不是无成本的、完美匹配——都适用）。这样 ϕ 就是采用新技术的企业的比例（等于受到培训的工人的比例）。对于第一期做出投资决定的企业和它的工人来说，培训和创新的联合回报等于 $-(1+r)C+(1-s)\alpha+s\phi\alpha$。这就是说两者不分离的概率是 $1-s$，此时他们获得投资的回报是 α。双方分离的概率是 s，此时他们投资的期望联合回报只有 $\phi\alpha$。

把 $\phi=1$ 代进去，我们看到存在一个所有企业都创新、所有工人都受到培训的均衡。把 $\phi=0$ 代进去，我们看到也存在一个没有培训和创新的均衡。当没有别的企业采用新技术的时候，企业和工人创新和培训的联合期望收益只有 $(1-s)\alpha-(1+r)C$，当 s 充分接近于1的时候，它将是负的。因此，在这个例子中，一个可能的均衡是经济中没有创新也没有培训。有成本搜寻的另一个结果是劳动市场上有不完全竞争，我们在这里没有讨论，但 Acemoglu（1997）探讨了这种情形。这降低了工人培训的回报，并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培训激励。

多重均衡的原因是一个企业找到合适员工的概率取决于市场的厚度（thickness，受到培训的工人的数量）。同样地，工人找到合适的雇主的概率取决于采用新技术的企业提供的市场的厚度。[21] 当然，如果没有分离的风险

21 有关厚（thick）市场的互补性（在凯恩斯背景下）的开拓性工作，参见 Diamond（1982）。

($s=0$)，将不会产生无效率，因为将不会有与未来雇员或雇主的相互作用。无效率的产生是由于工人和他未来的雇主之间以及企业和它未来的雇员之间的外部性不能被内部化，其原因在于与其中一方匹配的另一方的身份是未知的。

概括一下，这个例子说明劳动市场的搜寻成本怎样使企业和工人的决策高度地互相依赖，这种依赖没有反映在价格上面。某些经济由于搜寻成本带来的协调失灵，不会投资于新技术和培训。

知识的差距

前面关于发展障碍的一系列假说强调协调问题（“生态学”）。另外一种不同的假说认为是知识的差距——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的知识差距——导致了发展的缺乏。

有两个独立的问题。一个是对知识流动的阻碍。如果技术转移需要人口流动，那么有疾病的环境会成为一种阻碍。过去500年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互动的历史说明疟疾是非洲正常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障碍（Gallup and Sachs，1999）。外来人口缺乏非洲人已经获得的那种对疾病的抵抗力，可获得的药品也并不完善。[22] Bloom 和 Sachs（1998）估计疟疾的一次致命打击造成的经济影响是使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每年减少超过一个百分点。

另一个问题是对知识的投资不足。知识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即便不是一种纯公共物品，它也有重要的外部性（例如，参见 Arrow，1962a；Gilbert，Dasgupta and Stiglitz，1982；Stiglitz，1999）。阿罗（Arrow，1962b）在他著名的干中学模型中，假设在一个新兴行业中，每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取决于整个行业累积的经验。这种溢出效应意味着市场力量不会带来最优的投资。

溢出效应也出现在获取与生产相关的*局部*信息的过程中。对生产的局部条件是否合适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个人生产者（在他们实验新技术的时候）可以在减少未来时期采用新技术的信息障碍方面发挥作用（Hoff，1997）。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尝试度量这种信息的溢出效应（Besley and Case，1994；Foster and Rosenzweig，1995；Conley and Udry，1999）。例如，Conley 和 Udry 考察了加纳的村庄，在这些村庄里原有的玉米和木薯生产体系被转换为密集的菠萝生产，出口到欧洲。他们的目标是精确地决定农民对其他人的农业生产活动了解多少，以及他们是怎么了解到的。他们发现农民采取的决策以及

22 传染疟疾死亡的主要是孩子。能活到成年的非洲当地人对疾病都有一种抵抗力，而外来人口则没有。

农民菠萝生产的营利性，取决于他们信息网络的局部特征。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被调查的某些地区——而不是具有相似土壤、气候等条件的其他地区——很少种植菠萝树，尽管看起来有很高的潜在盈利能力。信息网络的特征似乎解释了为什么村庄之间存在技术分化。

二、政策视角

前面部分概述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变化意味着政策视角的显著变化。某些变化是明显的：如果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体现为资本的差距，还体现为知识的差距，那么缩小知识差距的政策就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因此，不仅要增加初等教育的可获得性，对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的改善也变得重要（World Bank，1999b）。如果地理环境是重要的，那么政策需要集中于解决地理施加的限制——例如，集中在根除疟疾和移民政策上。在这个部分，我们想超越特定的政策建议，而关注与干预性质和改革战略相关的理论问题。

两种极端的观点："理性发展"和公共选择理论

在过去的很多政策讨论中隐含着政策干预的两种极端观点。一种是基于"理性发展"的假定：所需要的只是为经济中的个人提供有关不同政策的结果的信息，而科斯理性（Coasian rationality）将保证有关各方利用这些信息达到有效率的解。当然，可能会有市场失灵，但是会自发地产生相应的社会制度以解决它们。因此，只有缺乏信息才会导致"无效率的结果"（在这一观点的某些变形中，政府作为经济外部的仁慈独裁者，能够自由地影响经济。因此，一个政策分析者需要做的只是找出哪些政策能够最大化社会福利并把这一信息传达给政府，政府将会实现这一政策）。

今天很少有人再坚持这一观点。如果政策建议者证明存在一组最优的关税并鼓励政府建立一个高度差异化的关税结构，这个建议将会被采纳。但是，关税结构并不取决于政策建议者提出的微弱的净损失观点，而是取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腐败影响——他们会利用差别化的关税结构提供的机会来提高对它们的行业保护。当然，他们也会遵循"游戏规则"，雇佣经济分析者来证明一个行业满足更高的关税保护条件。但是特殊利益集团和政府都知道这些只是为了满足公众对正义（probity）的要求。

第二种极端观点是极端的*公共选择*观点：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只能观察和解释发展戏剧中的演出——我们无法改变政策。根据这种观点，政治力量产生一个均衡的政策集合。不存在规范性干预（normative intervention）的

余地——这一情形被称为**确定性悖论**（determinacy paradox，Bhagwati，Brecher and Srinivasan，1984）。

我们——也可以说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家——反对关于外部建议作用的这两种极端观点。基于可得的信息，均衡通常不是帕累托有效率的。作为对市场失灵的反应而产生的制度可能不仅无法改善这一点，甚至可能使事情更糟糕，就像我们在前面部分所看到的。但外部人可以对结果有影响，并且不是仅仅通过改变参与者信息集的方式产生影响。但我们对于干预影响结果的过程的理解是严重不足的，过去的很多失败可以归结于干预策略的幼稚。

例如，有大量证据表明，将对一个国家的外援建立在它是否采取改革政策的基础上的做法没有作用，至少这种做法无法带来以提高增长并减少不平等和贫困的持久的政策改变。我们不可能“购买”好的政策（World Bank，1999a）。这一点有充分的理由：今天大家都认识到成功的政策需要有国家的“所有权”——不仅有政府的支持，而且有民众的广泛共识——才能得到有效实施。从外部强加的政策将会被规避（circumvented），可能会导致不满，并且经不起政治过程的变迁（参见 Bruno，1996；Stiglitz，1998c）。

政府干预无效的理论

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建议者是否可以影响政策。另一个问题是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是否可以导致好的结果。经济学里有一个古老的传统，认为政府唯一的作用是界定和执行产权以及提供公共物品。除此之外，政府干预很可能是——在极端的情形下，将会是不可避免地——无效的、不必要的或者反生产的。[23]

大多数经济增长的成功案例都包含有大量的政府干预，这一事实强有力地否定了上述的一般性断言。例如，在美国，政府从 1863 年起就在金融市场管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济衰退更加微弱和短暂，而经济扩张时间更长的事实与更好的宏观经济管理会有作用的假说是一致的。即使在产业政策方面，美国也有一个可信赖的历史——从电信业的建立（1842 年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第一条电话线）到政府最近对电信业的贡献（因特网的创立）；从对 19 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农业部门的研究和技术推广的支持到对今天占统治地位的高科技行业中研究的支持。尽管存在以上的大量事实，这里仍然有必要简短地反驳干预无效论的理论基础。

23　一般的陈述参见 Hayek（1978）；在货币政策管理中的应用见 Lucas（1973，1976）；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见 Krueger（1993）。

政府是不必要的：*政府可以做的任何事情，私有部门都可以做得更好*。事实是政府被赋予了私有部门所没有的权力，这些权力在处理经济中盛行的公共物品和外部性问题时是必要的。科斯主义者认为给定良好界定的产权，私人总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24]

政府做的任何事情都将被私有部门破坏。尽管在一些特定的模型中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例如，参见 Lucas，1973；Lucas and Prescott，1974），但一般来讲它并不正确——例如，当政府通过税收改变相对价格的时候。尽管如此，这些模型有一个重要的警示：政府政策的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期的结果有显著不同。

政府通常被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Stigler，1971）。当然，生产者的特殊利益集团存在激励去俘获（比如说）管制过程。但其他集团有抵消这种行为的激励。斯蒂格勒（Stigler）没有解释为什么在一些国家是消费者集团俘获（比如说）电力管制，而在其他国家是生产者集团俘获电力管制。在这里，同样也有一个重要的警示：政治过程是关键的，但政治过程的结果比简单的俘获理论所揭示的要复杂得多。

很多种干预都可以影响结果。下面我们考虑几种干预类型：(a) 解决协调问题的干预；(b) 信息作为一种干预手段；(c) 改变政治过程动态的干预；(d) 改变财富分配的干预。

解决协调问题的干预

上面讨论的一些多重均衡模型表明存在某种干预可以将经济移动到更好的均衡。但正如在分散化经济中均衡行为集合可能不是帕累托有效率的，同样不能贸然得出结论认为帕累托改善会从政治过程中出现（在本部分的结尾，我们提供一些帕累托改善不能出现的例子）。

而且，为了精确地分析干预，需要一个动态的框架。例如，只有在动态的框架中，我们才可以问：一个最初的协调失灵是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传递下去？为什么向前看的、有足够低贴现率的个人不会采纳一条路径（可能包括几次改变行为的选择），使得从一个坏均衡转向好均衡的自我实现移动

---

24 例如，Farrell（1987）证明一个拥有不完美信息的官僚所做的笨拙调停，对两个团体之间的谈判可以是一个更好的起点（与任一团体最偏爱的结果相比）。Hoff 和 Lyon（1995）证明当信贷市场有逆向选择并且贷款人在贷款合约中不能执行排他性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转移政策创造一个帕累托改善——税收转移政策把个人一部分有风险的未来收入转变成一个（几乎）无风险的转移支付，这个转移支付可以作为抵押品。抵押品的增加缓和了激励问题，从而减少了借贷成本，这使每个人处境都变得更好。

成为均衡？存在政策起作用的余地吗？Adserà 和 Ray（1998）探讨了这些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每个主体在两种活动之间做出离散选择（可以被解释为进入高技术部门还是低技术部门）。他们得到了惊人的结论：如果转向更有利活动的正外部性的出现有一个时滞（它可以变得任意短），那么最终结果完全取决于初始条件，除非第一个进行转变的人能获得收益。换句话说，除非作为第一个人进行转变有收益，每个人将理性地等待其他人首先转变，因此就没有人会转变！初始条件因此将决定整个均衡结果。

Adserà 和 Ray 的模型证明在很多情况下，政策都有一个潜在的作用，能够使经济摆脱历史影响。暂时的补贴可以“强制”形成一个均衡，而均衡一旦实现，就不再需要补贴来支持它。我们在下面考察几个这样的干预。

1. 平等权利（Affirmative Action）法案和反腐败计划。。如果趋向新均衡的路径需要观念的修正，而修正后的观念能够支持新均衡，那么法律条例的变化可能强制形成一个均衡。斯蒂格利茨（1974b）表明平等权利法案如何取消一种均衡，在这个均衡中，内在能力相同但历史不同的两个群体（例如种族或族裔）之间的生产率是不相等的。不同群体之间的生产率可能会不同，如果，比如说个人对教育的偏好取决于他们父母的教育，如果因此产生的不同教育水平导致雇主对培训工人的回报有不同预期，雇主的决策可能会将不同的群体锁定在收入分配的不同位置。平等权利法案改变雇主的行为，新的行为创造出新的“历史”，并且也揭示了被歧视群体的信息。修正后的信息可以产生一个均衡，在其中未来的雇主不再想录取歧视性行为。同样地，上面讨论过的梯若尔（1996）的群体信誉模型强调有足够持久性和严厉性的反腐败法案在把经济从一个高腐败均衡（被高腐败的预期所维持）转移到低腐败均衡（被低腐败预期所维持）中所起的作用。

2. 将社会规范制写入法律。遵循 Cooter（2000）的做法，假设惩罚违反社会规范者会有遭到对抗和报复的风险，但是随着愿意惩罚违规者的人口比例增加，这一风险会下降。进一步假设把社会规范（比如说，使用普遍接受的会计标准，或把孩子送入学校）写进成文法里面会降低执行惩罚的私人成本，因为它创造了违反规范者受到民事制裁（civil punishment）的可能。这样做会使个人认为其他人会执行规范，从而预期可以自我实现。因此制定法律可以“挤入”而不是“挤出”（就像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传统分析中那样）私人行动。引申开去，一个由体现社会规范的法律治理的国家（一个“法治国家”（rule of law state））往往不容易产生腐败，而一个由上而下强制执行法律的国家（“法制国家”（rule of state law））将会是成本高

昂的、无效的并且容易产生腐败的（Cooter，1997）。对成文法的一个相关观点是由 Basu（2000）提出来的，他认为政府制定法律能够影响经济的唯一方法是将它由一个均衡转向另一个均衡：如果一个结果（包括与结果相一致的一组规范）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不是一个备选均衡，那么它在任何可能的法律体制下都不是均衡。

3. 暂时性工资下限。在某些情形下经济中存在多重均衡，政策制定者对一些均衡的偏爱胜过另一些均衡，但是这些均衡无法进行帕累托排序。在这种情况下会存在一些干预，通过改变收入分配使经济转向更好的均衡。新古典均衡中多重均衡的经典例子是劳动供给曲线向后弯曲的情形。从而可能会存在一个低工资、高劳动供给和高利润的市场均衡和另外一个高工资、低劳动供给和低利润的市场均衡。资本家更喜欢低工资的均衡，而工人更喜欢高工资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最低工资立法可以“排除”低工资均衡。一旦高工资均衡达到后，最低工资立法将没有约束力。也就是说，不需要付出努力执行最低工资，因为在高工资均衡中，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将没有工人供给。[25]

信息作为一种干预手段

尽管信息本身通常不足以保证更有效率的均衡占主导，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可以成为有效的干预手段，因为它确实改变了参与者的行为（Dixit，1996）。只需要将注意力引向某些相关“事实”，信息披露规则和会计标准就可以改变行为。信息披露也可以使地区标准的非正式执行成为可能。例如，在污染控制领域，有事实表明非正式执行有重要的效果（参见 Pargal and Wheeler（1996）对印度尼西亚地区之间污染水平的研究）。

恰恰是因为信息会影响投票者的行为，所以政府才会花费很大力气对信息保密（Stiglitz，1998b）。尽管没有一般的定理确保私人达到社会最优的披露水平，仍然有强烈理由相信政治过程的在位者会努力压制相关的信息。[26]

事实上，有关信息重要性的信息甚至会影响信息披露的数量和方式。不

---

25 暂时性政策可以强制从一个均衡转移到另一个均衡，这方面的其他例子包括破产法和禁止童工。Miller and Stiglitz（1999）给出一个模型，其中给予债务人更大权力的破产法排除了“坏”均衡；在坏均衡中，有利于债权人的破产会带来很大的利益转移，因此会有大量破产。Basu and Van（1998）证明童工法怎样排除使用童工的“坏”均衡。在产生的好均衡里，实际上没有人愿意使用童工。

26 第一部分文凭的例子阐释了在信息披露过程中有多个帕累托排序均衡的情形，参见 Grossman（1989）。

同的信息披露规则会导致试图规避（circumvent）披露要求的行为；尽管如此，这些行为通常无法完全达到目的，尤其是当披露要求设计良好时。

影响政治过程动态的干预

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过程的性质（包括与利益集团形成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相当多的洞见（Olson，1965；Becker，1983）。例如，“搭便车”问题在决定形成哪些利益集团的时候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在更一般的公共物品提供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样。公共行动影响与利益集团形成相关的成本和收益。由于利益集团形成的成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固定成本，因此影响政治过程动态——从而影响随后的结果——的干预可以被认为是深干预。它们具有不可逆性。

举一个政治过程动态的例子有助于说明我们的观点。假设政府试图将一个垄断企业私有化。存在几个潜在的买主。每个买主都希望确保私有化后的管制使他能够继续享有垄断利润，甚至进一步扩大垄断权力。但每个买主考虑到自己胜出的概率很小，就不愿意付出很多代价去确保这一“集体的”好处（或坏处，取决于一个人的视角）。而且，每个买主都会面临确定其他潜在买主是谁的巨大成本。即便一个潜在买主能够成功地确定其他的潜在买主，如果潜在买主很多，仍然会有“搭便车”的问题，即每个人都公开宣称他自己会通过提高效率而不是利用垄断权力来获得高利润。[27]私有化一旦发生，就只有一方成为“赢家”。不再有集体行动的问题，赢者有动机和资源去对抗加强管制或竞争的法规。因此，在私有化之前，有可能会通过促进竞争的规则（因为私有部门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且可能有（肯定是很弱的）公共利益团体去推动它。[28]改革的顺序——即管制政策是在私有化之前还是之后——是重要的。在一种顺序中，结果可能是一个竞争的或受管制的行业，在这里实现了私有化的利益（以低的消费者价格衡量）。在另一种顺序中，结果可能是不受管制的垄断，当然，这种垄断可能比公共部门生产者的情形更有效率，但是私人垄断者不仅在生产物品上更有效率，可能在剥削消费者上面也更有效率。

深干预应与浅干预区别开来，浅干预通常是债务国和国际金融组织之间

---

27 Palfrey and Rosenthal（1984）给出了一个模型，其中离散公共物品的潜在受益者数量越大，公共物品被提供的可能性就越小。

28 在下文，我们讨论一个与转型经济特别相关的情形，其中政府内部对私有化存在着有组织的抵抗。

谈判的"一揽子""改革"计划的一部分。考虑降低关税的措施。将这种关税改革作为援助条件或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的一部分——这种干预不一定会改变潜在的政治力量。如果不能改变的话，Finger（1998）称为政治替代物（political fungibility）的过程就会出现：制造最初的贸易壁垒的政治力量会寻找其他的、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法规的干预。这些可能有同样的保护作用，但也会带来更大的扭曲。发展中国家对非关税壁垒——包括反倾销措施——的使用增加，与这一理论是一致的。

恰恰是因为历史很重要，干预在长期来说才是有效的。在某一时期对系统的一个干扰会有持久的影响（相反，在新古典和相关的理论里，是基本因素——包括与政治过程相关的那些因素——决定了长期的结果）。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一组特定情形是当存在多个均衡而历史冲击会"选择"其中一个均衡的时候。足够大的干扰会把经济推到一个路径上，沿着这个路径经济会收敛到一个不同的稳态均衡。

改变财富分配的干预

最重要的干预是那些改变财富分配的干预。这种干预会导致一个新的稳态的财富分配 W^*，我们将其定义为

$$W^* = A(W^*)W^*$$

这里 A 是转移矩阵，W 是财富水平向量。我们把 A 写作 $A=A(W)$，以强调转移矩阵取决于财富分配向量 W。如我们在前文讨论过的，财富分配通过许多渠道影响经济绩效。它影响代理问题的严重性（例如，能否进入金融市场）、对风险的脆弱性以及为应对代理问题和风险而产生的制度（如分成制）。这些因素既直接影响结果，也通过对价格、工资、利率和未来时期的财富分配的影响而间接影响结果。

财富分配也通过方便或阻碍个人参与商业活动，来影响对（影响增长的）制度的政治支持。目前的研究考察财富分配和18世纪开始的新世界经济的制度发展之间的经验关系（参见 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Engerman，Haber and Sokoloff，1999）。这些作者发现一开始有更大不平等的社会，往往给获得初级教育、获得土地、公民权利、匿名投票权、创办公司的权利、为发明申请专利并且用法律保护专利权等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在拉丁美洲，这些障碍倾向于使不平等永久化并限制增长。

警告：深干预还是浅干预

当用来促进经济改革的干预不是上面定义的"深干预"时，它们的效果不仅会被一系列政治替代过程所抵消，而且（至少在某些方面）可能是

有害的。再次考虑私有化问题。反对政府经营企业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政府官员会掠夺租金。而私有化消除了这类政治腐败产生的可能。[29]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形下并不是这样。当腐败的政治领导人皈依私有化教义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怀疑。与其说他们是被外来的新保守理论传教士的说教打动而放弃他们的腐败行为，不如说是他们在那些说教中看到一个可以更多地剥削公众的机会。他们认识到通过腐蚀私有化过程，他们不仅可以剥夺一些现有的租金，还可以剥夺未来租金贴现值的一部分。为什么要把这些租金留给未来的政客去攫取呢？因此那么多的私有化案例都受到腐败的困扰，应该感到奇怪吗？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已经知道给“政府的攫取之手”戴上“私有化的天鹅绒手套”，并不会阻碍政府的攫取能力。

同样，我们已经知道在很多情况下，私有化过程对遏止政府的寻租活动只有有限的作用。例如，如果地方当局有管制监督（环境、建筑许可等）的权力，那么商业活动的继续运营就需要当地政府的同意。重要的不是政府用什么借口来“敲诈”公司，消除一种借口仍然会有更多其他的借口。因此，私有化并不会有效地捆住政府的贪婪之手。只有改变政府行为性质的深干预才能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30]

进入黑箱内部

上面提出的问题反映了本文的一个中心主题：现代发展经济学一直在研究并试图解释过去的黑箱。我们怎么解释制度？市场和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在下一部分我们会进一步考察这一问题）？

过去，发展理论和政策通常把某些变量作为外生的制度刚性或政治约束。现代理论移动了我们放入黑箱内部（作为制度刚性）和我们可以在模

---

29 在转型经济中，有人认为即使政府内部支持改革和反对改革的力量过于分化，以至于不能在私有化之前建立一个管制制度，也应该对自然垄断和高度集中的行业进行私有化（Boycko, Shleifer and Vishny, 1996）。但这个观点似乎违反了下面的一致性的直观标准：如果认为政府因为特征 β（分裂的政府）而不能执行政策 α（例如，行业管制），那么也不能认为政府应该实行政策 P（私有化），除非可以证明 P 与特征 β 是一致的。如果改革者有足够的权力进行私有化，那么只有当私有化给政府部门造成的成本比管制给其造成的成本小的时候，改革者不能强加管制的观点才是一致的（在上面的意义上）；也就是说，*政府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私有化*（Hoff and Stiglitz, 2000）。

30 当然，这种问题不仅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在工业化国家。成功的改革需要某种形式的承诺（取消改革的固定成本）。例如，当美国取消扭曲性的农业补贴时——给农民一次性的支付作为补偿——很多经济学家赞成这个改革。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持怀疑态度。农业游说者的力量并没有消失。为什么农民在获得一次性补贴之后，不会努力恢复扭曲性的补贴呢？在这一点上没有真正的承诺——怎样才能有真正的承诺呢？很自然的，他们会等到一个“坏年份”，随着价格急剧下降，就可以要求救济，要求恢复农业补贴。而这似乎的确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型中解释的部分之间的界限。这种界限移动对于我们认识政策有很强的含义。这里我们进一步举两个例子——关于信贷市场和失业——每个例子都是一大批文献的主题。

农村信贷市场。早期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农村的贷款人收取了剥夺性的高利率，并且人们对此束手无策。政策干预必须处理这种约束。因为市场失灵的根源没有得到很好分析，所以很难辨别制度约束的真正性质是什么，这使政策处于危险的境地。假如真的相信农村的高利率只是反映了贷款人的垄断权力，就会把创立一个政府补贴的农村贷款制度作为解决方法，因为这会"提供一种不同于贷款人的制度选择，这一制度会与贷款人相互竞争，消除贷款人的垄断地位，使他回到应有的位置"（Reserve Bank of India，1954，在Bell，1990：297 中被引用）。而事实上，在借钱给穷人的过程中存在信息和执行问题，而正规贷款人并不善于解决这些问题——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农业部门的补贴贷款主要借给能够抵押土地作为担保的大农场主，而小农户继续依赖非正式金融部门。

将分析更向前推进一步——进入非正式信贷部门的竞争结构和贷款人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Hoff 和 Stiglitz（1998）证明对农村银行的补贴甚至不一定会"流向"穷人。补贴通常增加贷款人的数量（在很多情形下贷款人同时还是商人，他们拿走农民农业收成的一部分，作为对债务的偿付）。当非正式部门借款人的收成有很多用途，并且有很多潜在的贷款来源时，贷款人可能更加难以强制执行还款。由于更高的执行成本，对农村银行补贴会导致贷款人收取更高的利率！对农村金融市场上信息和执行问题的认识使近年的政策转向创造微观金融计划和改善穷人可以利用的储蓄制度。

城市失业和城乡工资差距。第二个例子，假设我们相信城市失业存在是因为城市的名义工资是固定的。那么我们可以课征食品税，用所得的收入来资助工资补贴，从而扩大就业。但是我们当然会想到，不管决定工资水平的经济或政治力量是什么，工人们不会如此不理性，以至于不能看穿这种真实工资的下降；市场上所有参与者关心的是真实工资。因此，将分析超越简单的固定名义工资假设，很快就可以得到，应该假设（按某种方式度量的）真实工资为刚性。然而，早期的模型只是简单地假设城市工资的名义水平是固定的，并且城市劳动力的规模（城市就业者和失业者之和）也是固定的。因此，多雇佣一个劳动力意味着把这个工人从零劳动生产率（失业）转移到生产性工作，这显然是合意的。

后来，Harris 和 Todaro（1970）证明以高于农村工资的工资水平额外雇

佣一个工人会导致迁移；雇佣一个表面失业的工人的机会成本不是零，而是等于由引致的迁移所产生的农业产出下降。Stiglitz（1974c）提出一个简单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城市工资被内生决定（效率工资模型）并且迁移使迁移者的期望收入和农村工资相等。在所考察的重要情形下，城市部门多雇佣一个工人的机会成本实际上等于城市工资。影子工资就是市场工资，即便是失业率非常高的情形也是如此。因此，用更根本的信息和激励因素解释表面的刚性改变了早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后者将劳动市场的很多方面看作是固定约束。

理性预期和经济发展的政治障碍

在民主社会，干预通过政治过程来实现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天真地假设这种过程可以确保实现任何帕累托改善；对这种改革应该有全体的一致支持。当一个集团试图以牺牲其他人利益来提高自己福利时就会出现扭曲，但是随着政治过程重新移向“效用可能性曲线”，这种扭曲就会被消除。事实好像并非如此：即使是帕累托改善的改变也常常会遭到反对（Stiglitz，1998b）。深干预理论有助于解释这种现象。在理性预期下，政治过程的参与者预测到任何行动的结果——这些结果不一定局限于直接效果：参与者看穿了政治的动态。如果一个短期的帕累托改善随后会导致经济沿着效用可能性曲线发生在长期对他们不利的移动，那么政治参与者就会反对这种帕累托改善。例如，在位者会被阻挠进行帕累托改善的投资（这种投资给每个人提供直接的净收益），如果这种投资改变了未来政策制定者的身份（以不利于他的支持者的方式）（Besley and Coate，1998）。政治过程的参与者会比较他们目前的处境和政治过程有可能带来的处境。政府（或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ctors））做出承诺的能力有限，尤其无法承诺以后不做出不利的改变，使变化——即便看起来是帕累托改善——变得更加困难。[31]

个人是风险厌恶的并且不太可能了解当前变化的全部后果，这一事实使得改革变得更加困难。一个改革的总收益可能大于成本并且是无风险的，但由于无法在事前确定谁是获胜者，从而给个人带来不确定性。如果不提供补

31 Besley and Coate（1998：151—52）提供了政治失灵的一个定义，它与市场失灵的定义相对应。在两种情形下都是首先定义技术上可行的效用分配集合（technologically feasible utility allocations）。对于政治失灵的情形，这反映了可获得的政策工具——例如税收、转移支付和投资。从而对政治制度进行了模型化。类似于市场失灵，当均衡的政策选择导致一种结果，在其中执行帕累托改善的政策在技术上可行（给定可得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工具、信息等）但却不是均衡选择的时候，政治失灵就会产生。

偿给受损者，改革收益必须足够大以补偿损失的负面风险（downside risk）。多数人投票会导致公民反对这样的改革，以维持由现状产生的收益（Fernandez and Rodrik，1991；Krusell and Rios-Rull，1996）。

Jain 和 Mukand（1999）发展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假设政府只能在事后识别出改革的受损者并补偿他们，但存在做出可置信承诺的政治约束：政策制定者如果违反补偿受损者的承诺，就会受到惩罚（通过投票被赶下台）。在这种情况下，伤害51%多数的改革（同时49%的少数获益）可以被执行，而赢家和输家比例正好反过来的改革则不能被实行。在前一种情形，政府能够做出可信承诺以补偿输家，而在后一种情形则不能，因为即便违反协议，也不会在投票箱前激起反对政府的成功的报复行动。

可置信承诺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丧失经济发展机会问题在独裁统治下以不同形式出现。考虑三种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下，有一个独裁者和很多贫穷的农民，还有一个想推翻独裁者的游击队战士。通过修路，独裁者能够增加农民的财富以及他自己的财富。在只有一个游击者的情况下，独裁者可以从农民那里获得承诺，即禁止游击者使用这条路来攻击独裁者。这样的话，独裁者就会修这条路。现在改变一下情境，假设每个农民都可能变成游击者。订立合约限制所有农民行动的困难变得无法克服，这样独裁者就不会修路。最后，考虑现实情形中的 Mobutu Sese Seko 总统，扎伊尔在位时间最长的独裁者。当卢旺达的 Juvenal Habyarimana 总统请求武装支持以对抗暴动的时候，Mobutu 回答说：

我告诉你不要修任何路……修路没有任何好处……我在扎伊尔掌权已经30年了，我一条路也没修过。现在他们沿着这些路来抓你。（Jeune Afrique，1991；引用在 Robinson，1999：2）。

Mobutu 的观点与奥尔森（Olson，1993）的观点相反，奥尔森认为，在自己国家有“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的独裁者将为了自身利益而提供产权和其他公共物品。如果在确保赋权民众（empowered population）不会试图推翻独裁者方面没有困难的话，这个观点就是正确的。然而有可信证据表明，很多独裁者把不发达的社会看作是维持对国家控制权的关键（Robinson，1999：sect. 4 和其文章的引文）。“对于掠夺性政府来说，‘低水平均衡陷阱’不是要摆脱的东西，而是渴望的东西”（Evans，1995；在 Robinson，1999：3 中引用；增加了强调的部分）。更一般地，在所有国家（不仅是独裁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障碍，都可能来自政治权力受到进步威胁的集团（Besley and Coate，1998；Acemoglu and Robinson，1999）。

对最近改革经验的一些评论

最近东亚自由化和东欧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给那些社会的很多集团带来了巨大成本。过去改革进行的方式也许加强了一种理性的怀疑论，对变化的风险厌恶。例如，东亚的改革者欢呼金融市场自由化，认为它能保证未来的快速增长。工人们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增长提高，而是很快看到了失业和工资削减的灾难性后果。

有很多经济模型，它们对各种政策的结果有不同的预测。如果经济学家不能解决这些差异（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所需证据以决定性地检验相互竞争的模型，而在其他情形，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臆断代替了对经验证据和逻辑一致的推理的深入考察），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除了对结果的“简单观察”，还能怎样做出评判？

事实上，改革的记录让风险厌恶的工人和农民惊恐不安。它们不仅见证了资本市场自由化在过去两年中产生了如此摧毁性的结果，而且也见证了非洲的金融市场自由化导致了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利率（Aleem and Kasekende, 1999），前苏联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带来了生活标准的骤然下降，而不是收入的提高。被评判的不仅是改革还有改革者；他们的信誉以及他们预言的正确性受到质疑，而且在很多情形下发现他们是不合格的。正如需要更大的市场差异，从而投资者可以区分好企业和坏企业，以及管理良好和管理不善的国家；在评价改革、改革过程和改革者的时候也需要有更大的差异性。好消息是，似乎有证据表明世界上的这种差异性正在增加。发展中国家制度能力的提高使这些国家能够更好地将意识形态处方和基于更坚实的证据和理论的处方区分开来。

给定风险厌恶和不明确的改革记录，因此，改革浪潮席卷世界各地也许比缺少改革更加令人惊奇。既得利益者失败了。我们怎样解释这些变化？答案部分地在于民主过程的复杂性和民主运动的力量。民主化过程有一种既得利益者不能完全控制的历史力量。当然，他们会试图控制它；金钱利益会影响并且确实影响了选举的结果，既得利益者会努力使有利于他们集团的许多活动远离公共监督。[32]即使在民主社会，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或者至少不是所有人的权力都一样大。

但经济和政治过程太复杂了，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完全预测或控制它们的

32 例如，金融利益集团会提出强有力的论点支持独立的中央银行，并利用这作为掩护，不仅推动成立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而且促使它的治理不代表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各方。

演变或由它们产生的改革的演变。例如，考虑最近有关透明度的争论。强调财务报告透明度是东亚危机背后的关键因素——这种观点有很强的政治利益。它把责任由工业化国家的贷款人推给了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人。它把指责由推动快速的资本账户和金融自由化的工业化国家——他们没有相应地强调完善的制度和管制监督的重要性——转向没有执行信息披露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并且它为工业化国家——那里似乎存在更大的透明度——提供了担保，即他们不大可能受到类似问题的折磨。

有关缺乏透明度在危机中所起作用的证据是欠缺的。[33]但对透明度的担心一旦产生，它就会不断增长。在对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实施的政府（但主要是私人提供资金）援救以后，人们开始要求高比例融资的机构（对冲基金）也应该增加透明度。将披露要求和其他形式的管制强加到这些机构之上可能不符合某些集团的利益，但除了英国之外几乎每个工业化国家都提出了这种要求，最终美国财政部的一项研究支持增加信息披露的建议。如果金融部门看到提高透明度的要求最终会导致什么后果，他们就会尽早采取不同的方针。但在复杂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参与者只能看到前面的一小段距离。如果策略的相互作用像一局国际象棋比赛，那么在比赛中参与者最多只能看到前面有限的几步棋。

三、结论

在很多方面，发展理论又回到了原地。30 年前或 40 年前，社会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和经济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一样受到强调。理论强调要保持平衡——不仅是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而且包括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发展不仅仅被看作是扭曲的消除和资本的积累。事实上，人们认识到有其他社会因素限制社会的吸收能力——很好地利用资本转移的能力。[34]人们认为种植园经济或二元经济不是发达经济，即便它们会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大大提高了，由此也明白了使市场经济运行所遇到的困难。完全竞争、完美信息、完美的合约执行以及完全市场和合约的假设至关重要，然而在竞争模型的经典表述中根本没有提到后面三组假设（Arrow and Debreu，1954）。我们常常

---

33 对于怀疑透明度是危机的重要起因的经验和实证分析，参见 Furman and Stiglitz（1999）。

34 参见 Rostow（1952，1960）；Adelman and Morris（1965）；Abramovitz（1986）；Stiglitz（1995a）；Temple and Johnson（1998）。

被告知新古典模型“只是一个基准”——思考复杂问题的一个工具——但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在有扩散外部性（diffuse externalities）的现实环境中新古典模型可能会有误导性的含义。我们已经表明正式的理论目前已经扩展到不完美信息和不完全合约的许多领域。这一工作证明在很多不同的背景下，非市场的相互作用会产生互补性，而互补性可能带来多重均衡。决定结果和行为的不只是偏好和技术。行为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是个人所处的环境，以及这个环境中特定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不能从新古典模型中的“基本因素”推导出来。而且，不仅仅制度、价格和选择是内生的；甚至偏好和技术也是内生的。给定历史、信念和机会，某些行为和特性受到奖励，而其他则没有受到奖励。受到奖励的行为和特性会相对增加，而这又会进一步增加这些行为和特性的回报。因此环境或信念的初始差异不仅会持续存在，而且会随着时间而放大。

因而对于发展目标的看法也在演变。尽管对于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 amenity）人们一向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今天在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中环境占有更加重要得多的位置。50 年前我们通常认为快速发展和民主参与之间存在一种权衡（Huntington，1968）。现在我们更可能把它们看作是互补的，更强调发言权和参与权是确保改革在政治上可以持续的手段，并且更加将人们对影响自己生活和生计的政策决定拥有发言权看作是一种基本权利（Sen，1999）。50 年前，经济学家认为不平等增加不仅是发展的必然产物（Kuznets，1955），而且会促进发展（Lewis，1954）。现在我们认识到这种不平等的增加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会有害于增长——不平等会增加信贷和土地租赁市场上的代理成本，会产生限制教育和市场可获得性的政治体制，并且会加剧社会冲突。

尽管社会偏好和价值的演化可能已经改变了不同发展目标的相对权重，现代理论已经重新阐释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已经大大增加——市场建立的基础与我们曾经认为的并不相同——同时我们对改革过程中非经济力量（尤其是政治力量）重要性的评价也提高了。但我们对这些过程的理解还远远不够。我们至少还处于一个“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阶段。也许这是开始新世纪的一种较好的方式。

附录 I　为什么低水平资本不能解释经济不发达

如果缺少发展的根本原因仅仅是缺少资本，那么（给定资本报酬递减）为什么所有经济的收入不随时间而收敛？本附录考察发展的新古典观点，新

古典理论认为不发达的原因仅仅是缺少资本或熟练劳动力。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与私人资本流动的事实不一致。相反，资本缺乏一定是不发达的症状，而不是原因。[35]

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含义

如果所有国家有相同的生产函数

$$Y = F(K,L) \qquad (A-1)$$

产出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对每种要素的回报递减（当另一个要素固定的时候），资本稀缺的国家有更高的回报率。资本会从资本富余的国家流向资本贫乏的国家，在短期内，随着资本回报的趋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将趋同。[36]国民生产总值（GNP）不会这么快达到均等，因为贫穷国家的一些资本被富裕国家的那些人所拥有。但只要储蓄率是相同的，人均收入最终也会相等。如果储蓄率不相同，收入差异完全可以被储蓄率差异所解释（Stiglitz，1969）。

贸易似乎不能使要素价格均等，而且从工业化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比理论揭示的（至少）要弱得多。只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流动才变得显著（见图A-1），并且流动是高度集中的，大多数资本流向中等收入国家而不是低收入国家。不管资本流动是以绝对值衡量（如图的上面部分所显示的），还是以GDP的一个比例衡量（如图的下面部分所示），都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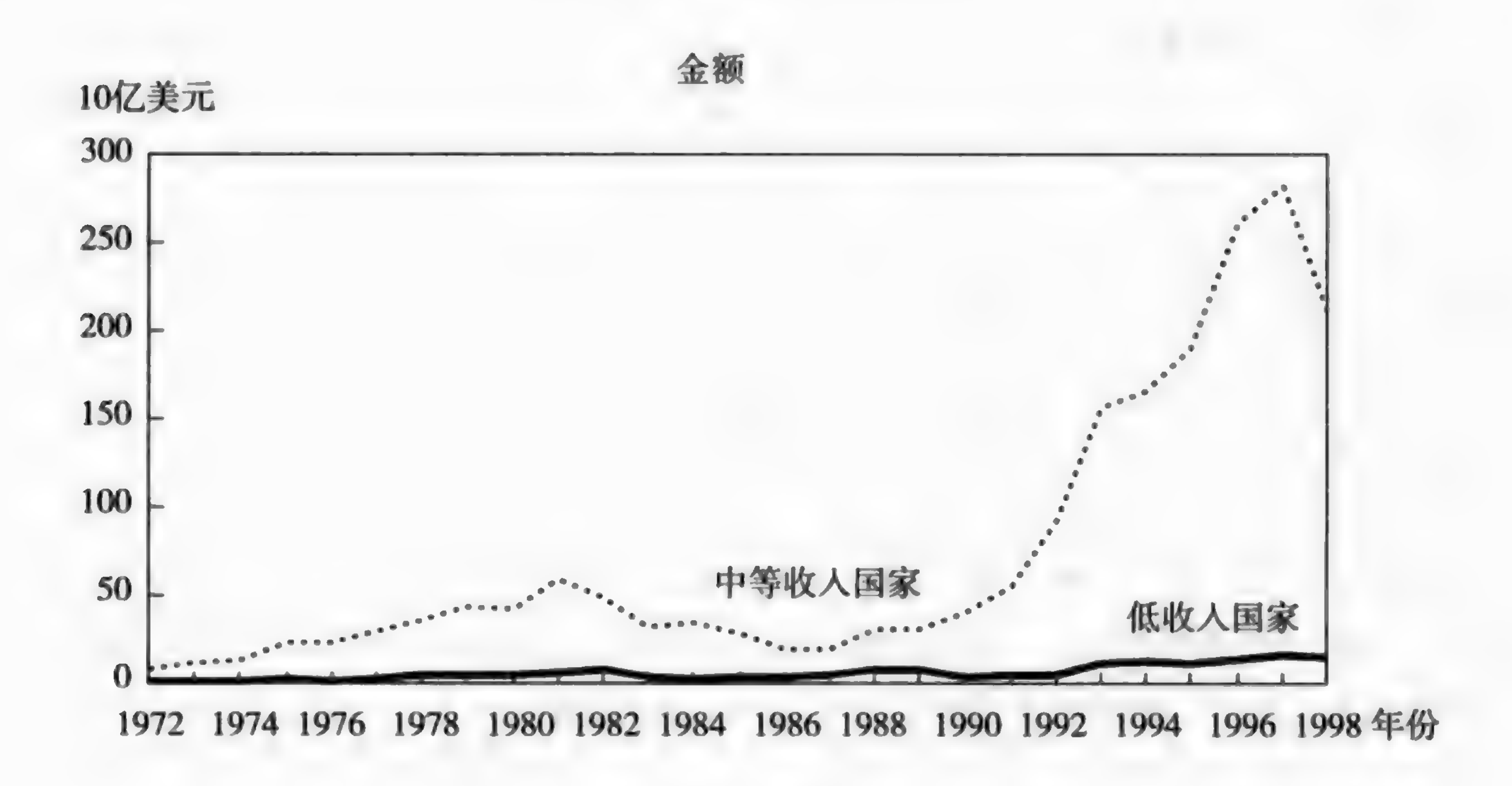
如果资本积累是发展的核心，并且如果国际资本流动是有限的（由于“制度”或“信息”的阻碍），那么提高国内储蓄率的经济特征会确保增长。二元经济模型为W. Arthur Lewis对发展问题的著名论断做出了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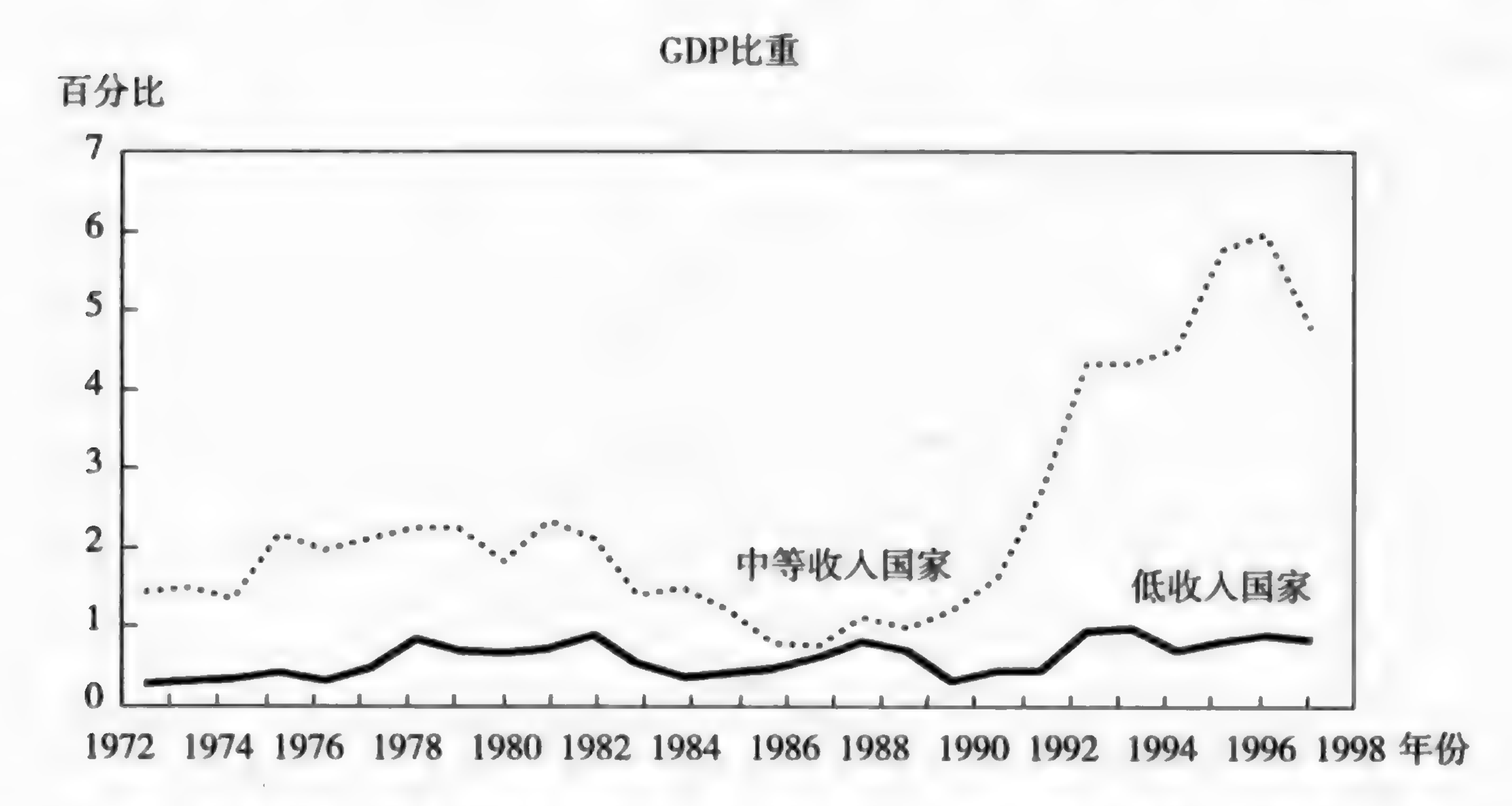
> 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理解一个经济的转变过程——从以前把国民收入的4%或5%或更少的部分用来储蓄和投资，转变为自愿储蓄达到国民收入的12%到15%或更多。这是核心的问题，因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包括与资本积累相关联的知识和技能）。（Lewis，1954：155）

---

35 如诺斯（North）和托马斯（Thomas）在《西方世界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1973：2）一书中所认为的，“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不是增长的原因；它们是增长。”Easterly and Levine（2000）记录了经济增长的四个经验事实，他们认为这些事实没有被要素积累模型很好地解释。

36 参见Stiglitz（1988）。事实上，在资本—劳动比率差别不是特别大的国家之间，要素价格仅仅通过贸易就可以达到均等（Samuelson，1948）。





注：对经济的分类是基于人均收入。在 1998 年，人均收入的分界点为：低收入，低于或等于 760 美元；中等收入，761 美元到 9360 美元。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Analysis（SIMA），World Bank。

图 A－1　对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净私人资本流动，1972—199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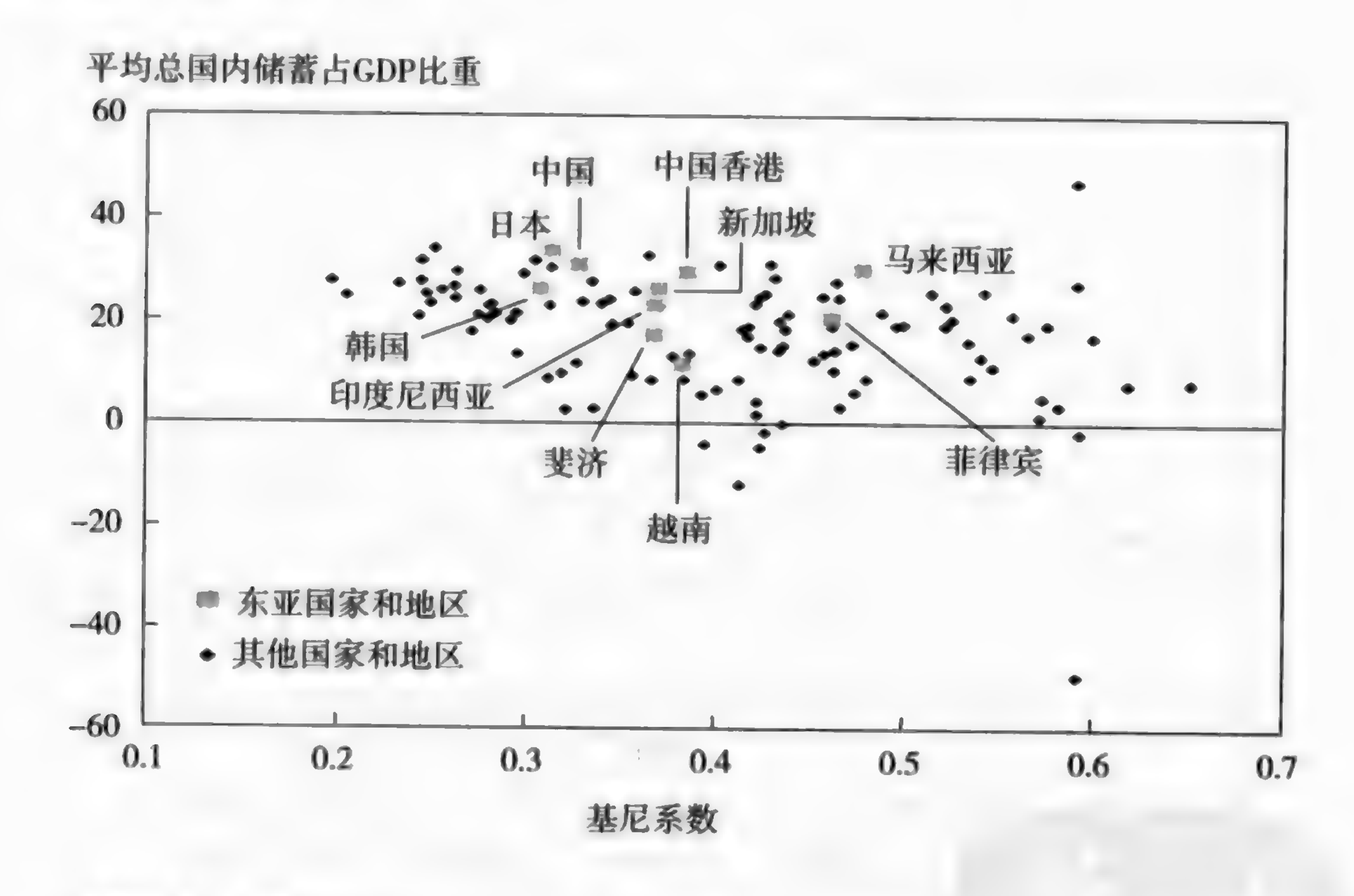
二元经济模型的两个关键假设是（Lewis，1954；Fei and Ranis，1969）：

- 相对于工人或农民，资本家把他们收入的更高比例用于储蓄，所以增加不平等的政策——给高储蓄的资本家以更高利润——会促进增长。
- 在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

如果第一个假设是正确的，确保来自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持续的现成供给的税收政策就会促进发展。这种政策会把城市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从而增加

可以积累储蓄的利润。第二个假设——在“正确”的政策下，劳动的弹性接近无穷大——支持了对资本的强调：是资本短缺而不是劳动阻碍了工业增长。

经验与这些理论并不一致。一个问题是“正确”的政策是不可执行的。例如，在很多国家政府只能对可贸易品征税——通过经销管理局或在港口征税。但是一旦对可贸易品课征一种税收，农民将会从这种商品的生产中转移出去。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农民相信任何农业剩余都将被税收征走，他们就失去了对新的生产机会做出反应的所有激励。例如，如 Krueger（1993）所报告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发展中国家农民获得的价格低于农产品边境价格的 20% 是正常的。税收楔子和政府销售无效率的后果是 1984 年加纳可可的真实生产者价格大约是 30 年前价格的 10% 左右。“农民首先几乎停止了再种植，然后停止采摘果实，毫无疑问，加纳的可可出口下降了”（Krueger，1993：98）。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Analysis（SIMA），World Bank.

图 A-2 东亚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储蓄率与不平等情况，1960—1995 年

东亚的经验也有助于削弱这种理论的地位。东亚经验表明国家可以产生一个非常高的自愿储蓄率，并且不会带来高度不平等。图 A-2 说明在 1960—1995 年东亚经济的储蓄率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其不平等在平均水平或平均水平以下。例如，日本和韩国的储蓄率分别为 33.6% 和 26.2%（相

比较而言，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17.6%），两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大约都是 0.31（相对而言，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0.40）。

高储蓄和低水平的不平等转化为高增长和低水平的不平等。图 A－3 标绘了以两种不同方式度量的增长和不平等。在上面的图中，不平等的衡量指标是最富有的 20% 人口的收入与最贫穷的 20% 人口的收入的比值。在下面的图中，不平等的衡量指标是基尼系数。这些指标表明，东亚国家增长率高于平均水平，不平等在平均水平或平均水平以下。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怎样解释高储蓄率？经验研究表明东亚储蓄率随着增长率提高而提高。一个假设是东亚的储蓄函数与其他地方的储蓄函数相类似，但在这个函数中，储蓄率随着增长率的提高而提高。很容易建立一个符合这种情况的理论模型。[37]

这个储蓄函数的有趣特征是，它可以解释经济趋向新古典模型长期均衡增长率的多重转移路径。根据这个观点，东亚是第一个跳上趋向长期均衡的高增长路径的地区（在这个意义上，东亚的发展不同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早期工业化国家都没有这样高的储蓄率）。如果储蓄率取决于人均收入的增长率 g，如果人口增长率为 n，那么由式（A－1）中总生产函数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形式得到，

$$Y = AK^{\alpha}L^{1-\alpha} \quad (A-2)$$

进而得到

$$\frac{\Delta Y}{Y} = \frac{\Delta A}{A} + \alpha\frac{\Delta K}{K} + [1-\alp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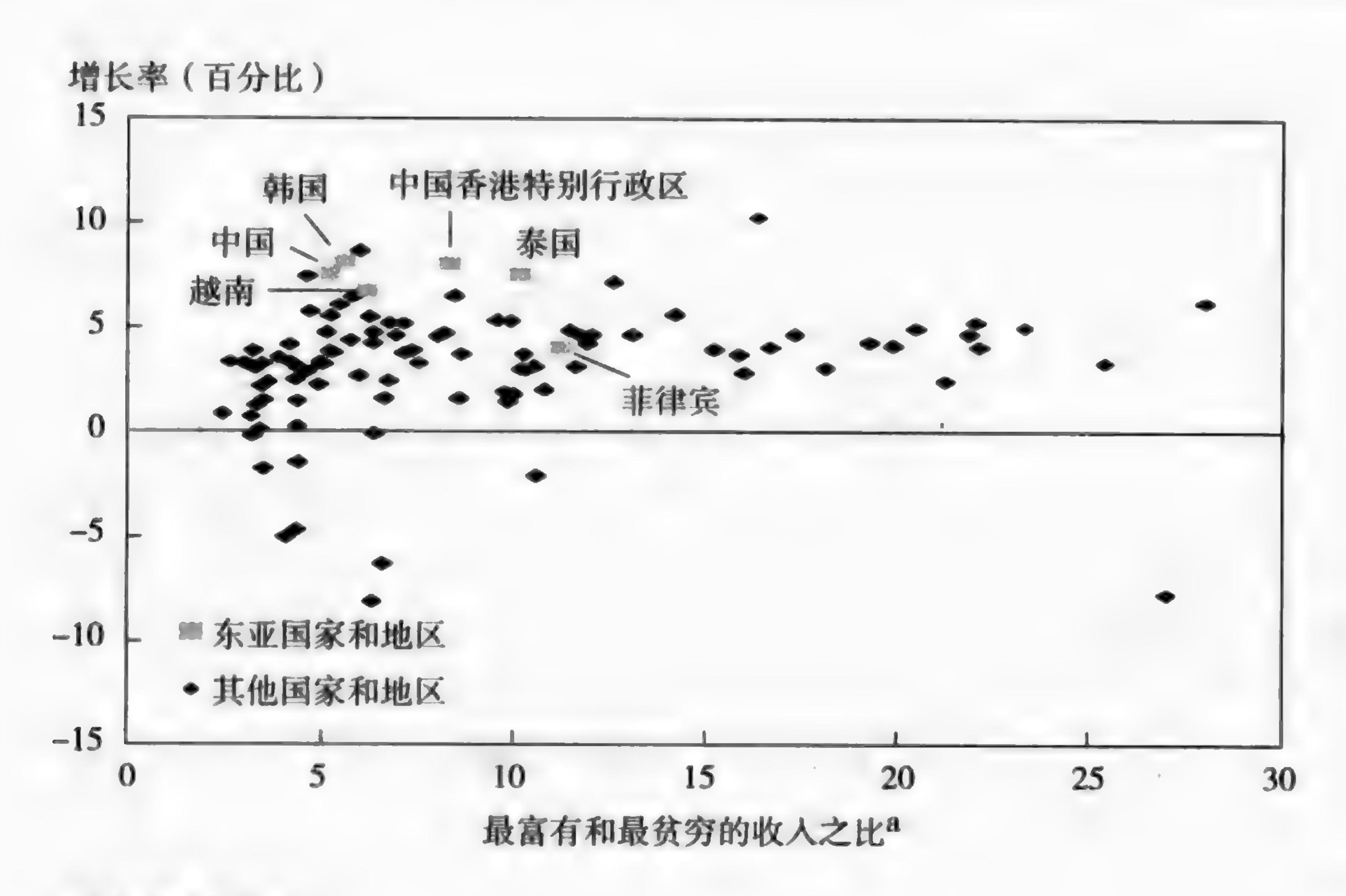
因此（因为 $g = \Delta Y/Y -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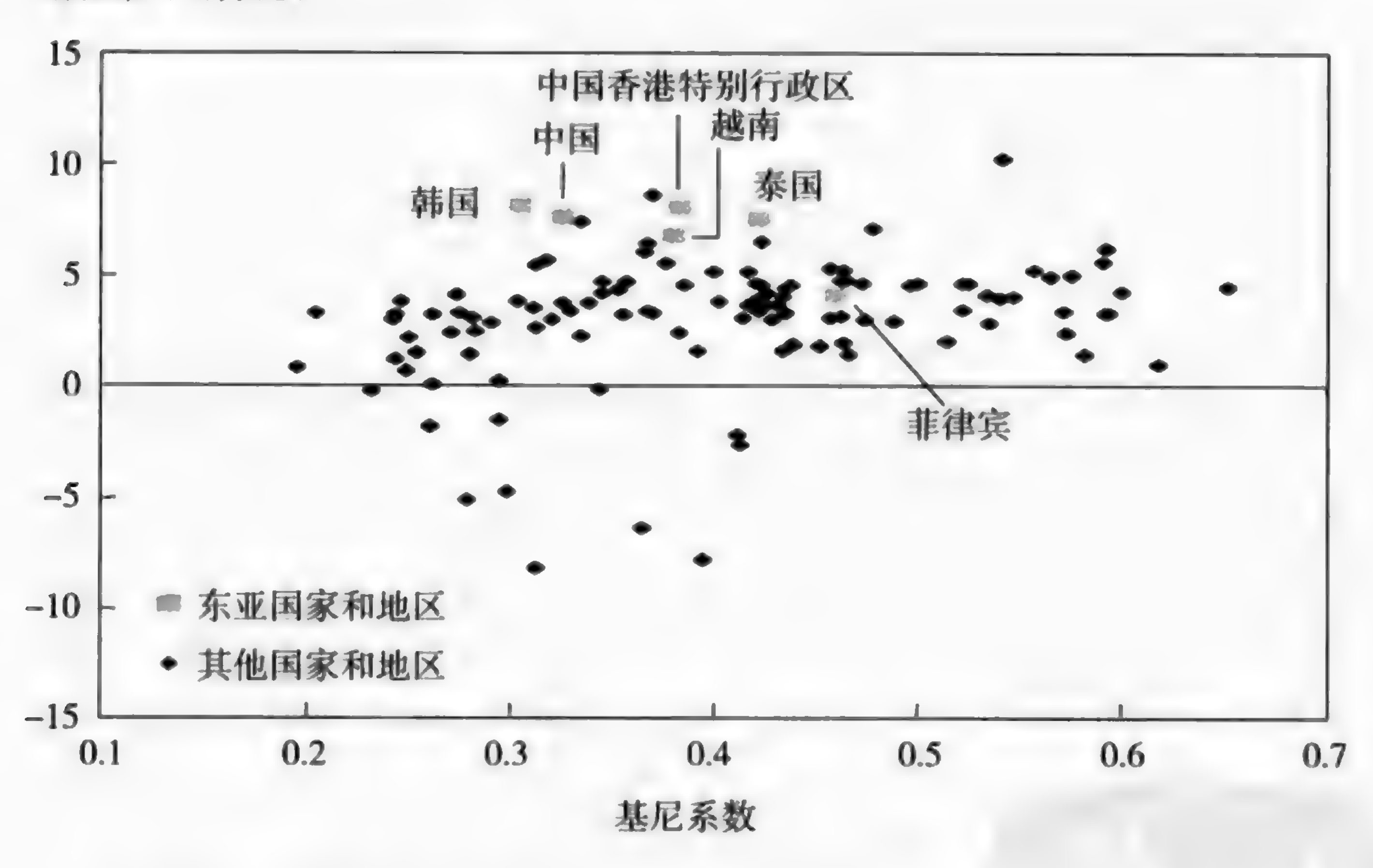
$$g = \Delta A/A + \alpha[s\beta(k) - n] \quad (A-3)$$

这里 $\beta(k)$ 是产出—资本比率，是每个工人所拥有的资本 k 的减函数。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Solow，1956），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 s 被储蓄，稳态增长率被外生技术变化率 $\Delta A/A$ 唯一决定。从稳态以外的一个点出发——例如，一个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因此有 $s\beta(k) > n$ ——模型预测有唯一的一条趋向稳态的转移路径。但如果储蓄率随着增长率的提高而提

37 资本市场约束使消费水平是逆向决定的（backward-looking）：今天的消费（c_t）取决于过去收入的时间剖面。为了简单起见，假设 $c_t = f(y_{t-1})$，y_{t-1} 是上一期的收入，$f' > 0$。当增长率高的时候，y_{t-1}/y_t 就低。因此，c_t/y_t 很低意味着储蓄率很高。以这种方式，对未来收入的借款约束使储蓄率成为增长的增函数。





a. 该比值为最富有的 20% 的人的收入与最贫穷的 20% 的人的收入比。

资料来源：SIMA。

图 A－3 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增长率与不平等情况，1960—1995 年

高，将会同时有多个均衡增长率值，如图 A－4 所示，因此会有渐进收敛到同一个增长率和同一个收入水平的多条转移路径，如图 A－5 所示——东亚的特征是高增长率、高储蓄率路径，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的特征是低增

长率、低储蓄率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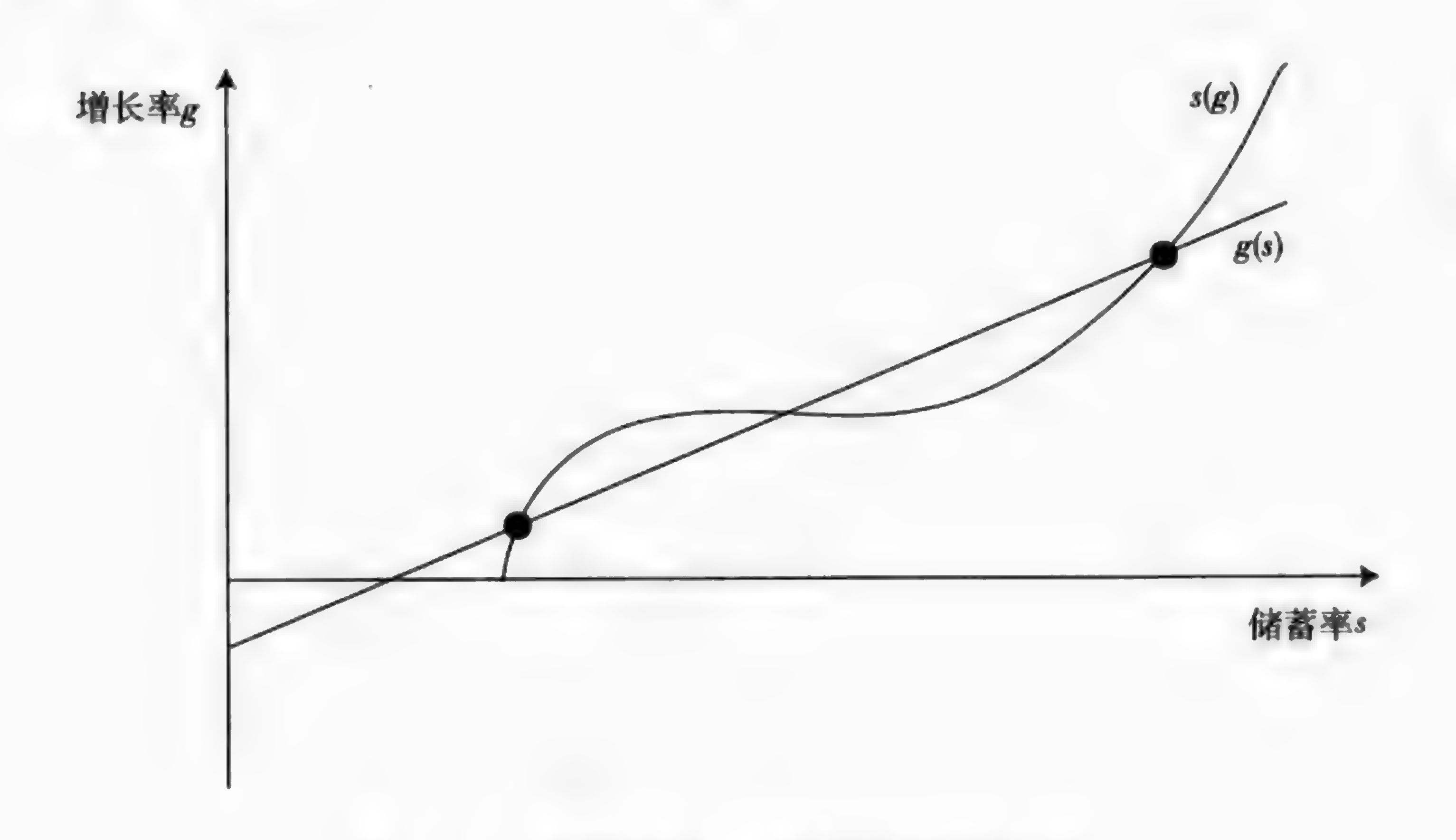


图 A－4 储蓄和增长水平的多重短期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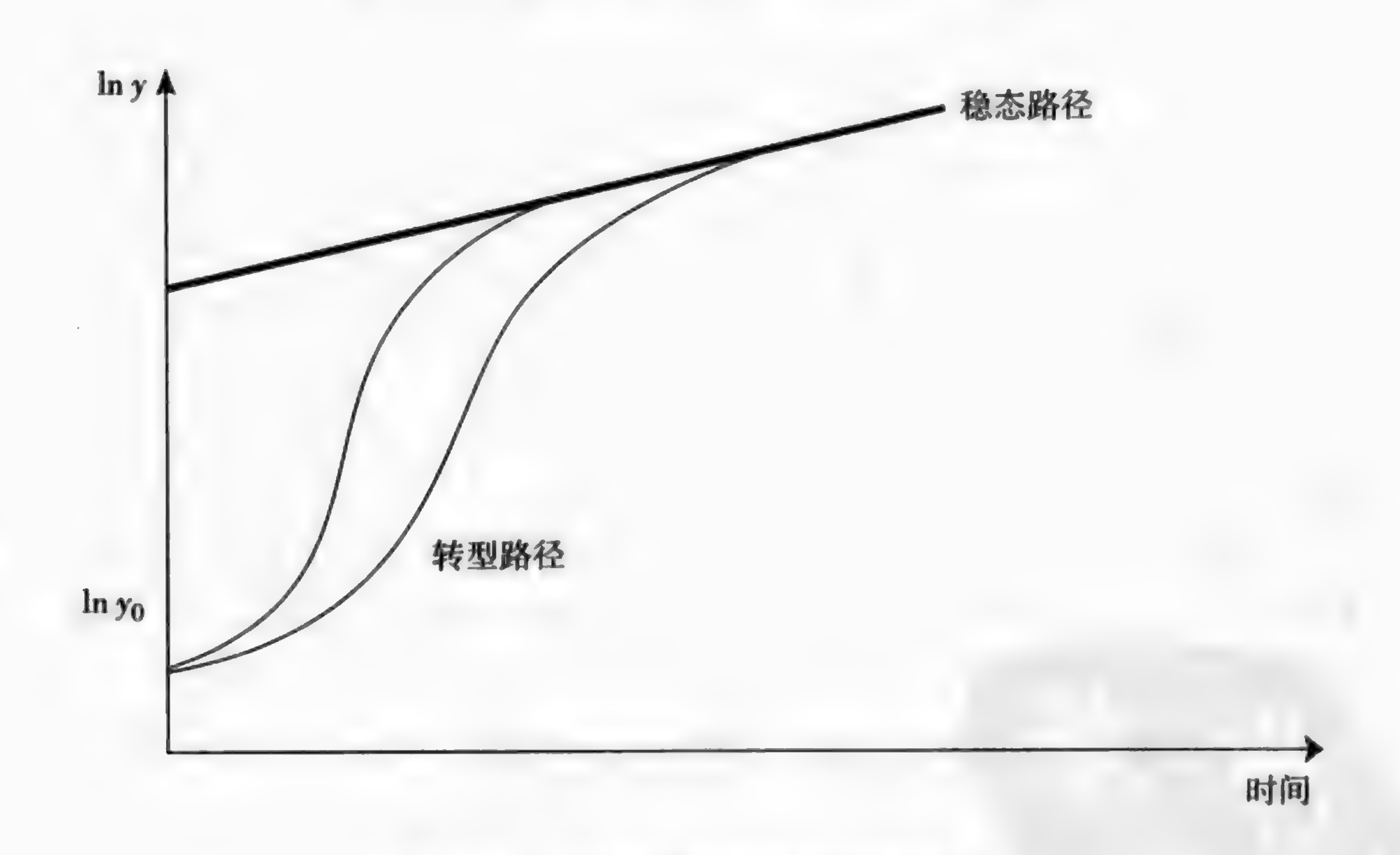


图 A－5 趋向稳态的多重转型路径

本文主要集中于多重均衡，认为即使在长期也可能不存在收敛的力量。这里我们给出一个相反的观点。即使承认新古典模型在长期来说是正确的，经济也会以多个增长率达到长期均衡。有一个生态环境和一组预期能够促进

高储蓄和高增长率，而另外一种组合则不能。[38]

但是看起来尽管高增长率可以解释东亚高储蓄率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其他因素也起到了作用。Stiglitz 和 Uy（1996）认为高储蓄率至少可以部分地归结于公共政策，这些政策促进了用于动员储蓄（尤其是农业部门储蓄）的制度。现代理论强调信息和执行成本，使我们对于促进储蓄的各种政策增加了理解，并改变了认识。如果通过金融机构储蓄的交易费用更小，如果风险下降，并且如果收益提高，那么储蓄，尤其是工业化可以利用的储蓄就会更多。东亚经验为这些效应的量级提供了证据。尽管与金融压抑相连的很大的负真实回报（Shaw，1973）对储蓄有不利影响，但是储蓄的利率弹性相对较低：只要回报是正的，人们更加在乎风险。例如在日本，低交易费用、低风险、低回报的政府邮政储蓄账户成功地动员了大量储蓄。

总之，低资本水平对于解释低发展速度似乎不太令人满意，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低资本水平是增长的障碍，那么资本回报应该足够高以吸引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因此，在市场环境中，问题会得到自我纠正。第二，东亚经济的经验证明至少在某些制度下，经济有可能产生很高的储蓄率和国内投资。这导致我们会问以下问题：*通过放松关于生产函数的某些新古典假设*，是否有方法解释以下事实：当政府对资本流动强加的壁垒已经拆除，资本仍然没有流向最渴求资本的那些国家。我们依次考虑两个可能的解释：（a）熟练劳动力对提高资本富余国家的资本边际产出的作用；（b）总的规模经济。我们给出一个理论模型，它与（a）一致，但它认为（b）没有对贫穷国家的低资本流入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

熟练劳动力的回报递增。生产函数模型说明互补性要素的缺乏——不是普通劳动力，而是熟练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可以解释资本贫乏国家的有限资本流入。但人才流失现象对这个解释提出了疑问。比如，如果印度缺乏熟练劳动力并且这种短缺解释了印度的不发达，那为什么熟练劳动力还从印度迁移到美国?

事实上存在一些简单模型——放弃了规模报酬不变假设的新古典模型——可以解释这种表面的反常。如果生产函数表现出*熟练工人的规模报酬*

---

38 Stiglitz（1973）在很多模型中证明预期在决定储蓄和经济的长期积累路径方面可以起到关键作用。他注意到预期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在不同技术和储蓄率之间振荡，既不收敛到一个均衡增长路径，也不偏离它；经济“只是‘围着它摇摆’”（141）。这些结果并不依赖于不正确的预期，在对不远未来的价格预期实现的时候也会成立。

递增，所有的熟练工人聚集到一起就是有利的。例如，考虑两个岛，每个岛上都有相同的资本和不熟练劳动力（假设不能在两个岛之间流动）的禀赋和熟练劳动力的禀赋，熟练劳动力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岛迁移到另一个岛上。假设生产函数是

$$y = K^{\alpha}L^{\beta}(S+1)^{\gamma}, \alpha+\beta<1, \gamma>1 \qquad (A-4)$$

那么所有的熟练劳动力都会迁徙到一个岛上。在那个岛上，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都会更高，我们把它叫做“发达岛屿”。即使发达岛屿和不发达岛屿有相同的生产函数，情况仍是这样。

Kremer's（1993）的 O 型圈（O-ring）生产理论是具有式（A－4）的关键特征的生产函数的一个显著例子，就是说存在熟练劳动力的报酬递增。O 型圈理论的命名来自“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它因为其上千个部件中的一个部件，即 O 型圈的失灵而爆炸了。爆炸戏剧性地展示了生产过程中投入品的互补性。不管其他组成部分多么好，如果一个部分运转失常，其他部分能创造的价值就非常小（如果有的话）。

为了抓住这一思想，Kremer 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生产函数。他假设在生产过程中有 n 个任务。为了简单起见，假设 $n=2$。每个工人有一个技能 q，q 在 0 和 1 之间。令 q_1 表示完成第一项任务的技能，令 q_2 表示完成第二项任务的技能。企业的生产函数是 $y=Aq_1q_2$。解释模型的一种方法是 q 是正确完成一项工作的概率。在这个解释下，如果两项工作都正确完成，企业产出的价值就是 A，这个联合事件的概率是 q_1q_2。

竞争性均衡由工资函数（用 $w(q)$ 来表示）和工人在企业之间的配置来刻画。给定工资函数，每个企业选择 q_1 和 q_2 以最大化它的期望收入，$Aq_1q_2 - w(q_1) - w(q_2)$。模型的第一个含义是“技术聚集（skill-clustering）定理”：竞争性力量会导致一个高技术工人与其他高技术工人聚集在一起，同样地，低技术工人也会聚集。

很容易明白这一点。考虑任何不同的值 a 和 b。因为 $(a-b)^2 = a^2 + b^2 - 2ab > 0$，那么必定有 $a^2 + b^2 > 2ab$。如果我们令 a 值和 b 值分别代表执行第一项和第二项任务的个人的技能水平，那么当从事两项任务的工人的技能水平相匹配的时候，期望产出要比它们不匹配的时候更高。从直觉来看，“浪费”一个成功概率高的工人（通过给他匹配一个成功概率低的同伴）是不值得的。这意味着不管工资和技能水平有多高，竞争性力量都会导致一定技能水平的工人聚集在某一个生产单位。如果这个模型抓住了经济整体中存在的力量，将会有技术的报酬递增，如图 A－6 所示，并且存在激

励使人力资本流向最富裕的国家——人才外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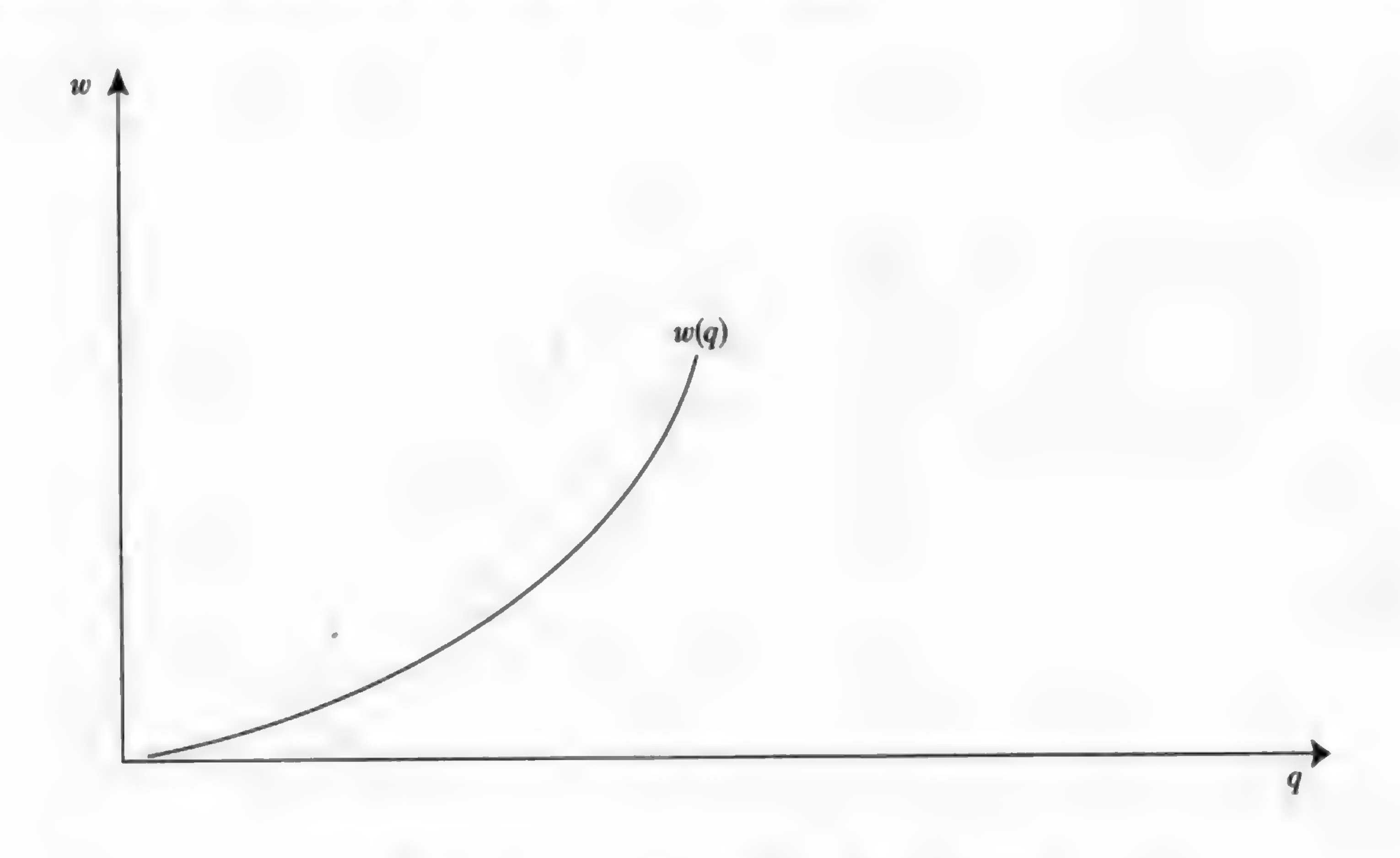


图 A-6 工资率作为工人质量的函数

规模经济。除了技术积聚现象以外，还有第二种方式可以保留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相同生产函数而工业化经济有更高资本边际产出的假设：规模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设规模经济的时候，必须放弃标准的竞争模型，除非认为所有的规模报酬对企业都是外在的（Marshall，1897）。[39]在国家层面的规模报酬上，一个大国会比一个小国更有生产力，从而会倾向于吸引更高的资本投资。尽管这种规模经济是过去 15 年中引起广泛关注的几种发展理论的基础，但我们发现这些理论并不可信，因为它们忽视了产生规模经济的基本单位。[40]当规模经济产生于外部性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仅仅假设外部性被传递给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却没有延伸到国境线以外的地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例如，企业跨国经营），这个假设似乎是有问题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很高，尽管它们的总收入仍然很低（仅仅因为它们是小型经济体）。如果规模经济在整个经济水平发生，那么中国内地应该

39 注意前面部分给出的模型表现出总的规模报酬递增。如果资本和劳动都是流动的，它们都会聚集到同一个岛上。如果只有资本是流动的，它会不成比例地流动到熟练劳动力聚集的岛上。两个岛之间的人均收入会持续存在差别。

40 有关跨国公司在传播新技术方面的作用的讨论，参见 World Bank（1999b）。关于市场均衡的其他假说的含义的讨论，参见 Dasgupta and Stiglitz（1988）。

相对富裕，而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应该相对贫穷。但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把国家或经济作为自然单位缺乏说服力。如果规模经济在城市水平上发生（来自聚集经济），那么贫穷国家中就可能存在富裕城市作为增长极。如果规模经济在行业水平上发生，贫穷国家就可以通过集中于某些特定行业而享有规模收益。[41]

扭曲：哈伯格（Harberger）三角形和克鲁格（Krueger）矩形

如我们在引言中指出的，新古典理论家通常假设政府导致的扭曲——例如，产生于税收、关税和配额——对解释国家之间的不同经济绩效是关键性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不仅在生产活动之间错误地配置资源，导致哈伯格（1964）三角形，而且引发对政府保护的竞争，导致资源耗散在寻租活动（比如游说）中。在一种特定情形下——寻租活动的规模报酬不变——寻租活动会耗散掉租金的全部价值，产生相当于克鲁格（1974）矩形的净损失。

政府导致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摧毁一个经济的发展潜力，但事实表明创造发展的前提条件比取消价格扭曲更加重要。巴西自由化后的经验——这些扭曲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大大降低了——是增长仍然很有限（甚至比更早时期比如巴西的进口替代时期还要有限）。同样地，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的对比说明，在通常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处方中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随着扭曲减少，产出也下降了，这与标准新古典理论的预测形成了鲜明对比（Blanchard and Kremer，1997；Stiglitz，2000）。

在某种意义上，在两类人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似性，一类人把经济落后看作是政府导致的失败，另一类人把落后看作是一种很容易医治的市场失灵（如二元理论经济学家）。两者都认为解决资源误配问题的直接干预——从生产可能性边界内部移动到边界上——是成功改造经济的关键。经济扭曲是有成本的，尤其对于负担不起经济扭曲的穷国来说。减少经济扭曲无疑可以把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减少扭曲——不管是通过计划还是通过取消政府导致的市场扭曲——对于可持续的

41　前面我们证明与非贸易品相关的规模经济可以产生多重均衡（见409－410页）。类似地，Lucas（1988）假设早期的发展者可以“选择”有陡峭学习曲线的行业，但是这个假设不能解释它们持续的更高收入和更高增长率。首先，它假设学习不能跨越国界传播。第二，它没有注意到，如果某些工业有更陡的学习曲线，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通常会反映在更快的相对价格下降速度上；见Skeath（1993）。

增长似乎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42]

附录Ⅱ　协调问题：一个数学处理

在附录Ⅰ，我列举了协调问题的一系列模型。本附录强调它们共同的数学结构。

每个模型有三个组成部分：参与者集合；每个参与者有一个可行的行动集合，即策略集；支付函数。个人的支付函数一般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其他人的行动和价格（价格取决于所有人的行动）。

在模型的一些特殊情形中，其他人行动的影响完全是通过价格；即唯一的外部性是金钱外部性。这样支付函数就可以仅仅写作个人自己行动和价格的函数。唯一重要的是"环境"，它可以只通过价格体系来反映。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甄别模型（Stiglitz，1975）、产权执行模型（de Meza and Gould，1992）以及 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sect. Ⅳ）的"大推进"模型。[43]

表 B－1 提供了一个分类，区分了刻画参与者的三种方式：每个人完全相同（第一列）；个人的支付函数不同（第二列），个人的策略集合不同（第三列）。表格区分了策略集的两种建模方法：连续的（上面一行）或离散的（下面一行）。第一部分描述的模型可以归入这个矩阵定义的六个类别中（I－C，I－D，等等）。尽管在这里我们没有描述其他情形，它们也是这六种类型的组合。例如，在 Acemoglu（1997）的一个版本中，工人的选择变量（培训）是连续的，但企业的选择变量（创新）是离散的。

表 B－1　协调问题模型的分类

行动	参与者		
	Ⅰ. 参与者相同	Ⅱ. 参与者的支付函数不同	Ⅲ. 参与者的策略集合不同
C. 连续的选择变量	研发（Romer，1986） 储蓄（本文附录Ⅰ）		培训和创新（Acemoglu，1997）
D. 离散的选择变量	创新行为（Sah and Stiglitz，1989a） 合同执行（Greif，1994） 寻租（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93；Acemoglu，1995）	教育作为甄别工具（Stiglitz，1975） 创新行为（Sah and Stiglitz，1989a） 所有权结构（Hoff and Sen，2000）	"大推进"模型（Helpman and Krugman，1985；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Rodriguez-Clare，1996；Rodrik，1996） 培训和创新（Acemoglu，1997）

42　对这一点的详细叙述，见 Rodrik（1995）；Stiglitz（1998a）。

43　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环境下，包含很多其他金钱外部性例子的一个一般框架见 Greenwald and Stiglitz（1986）。强调创新导致的金钱外部性的框架，见 Makowski and Ostroy（1995）。

类别 I – C 相同的参与者和连续的行动

第一类模型假设参与者是相同的，个人 i 的偏好（利润）是 $u^i(a^i;\ a,\ p)$，a^i 是个人自己的行动，a 是所有其他人的行动，p 是价格向量——它本身是整个行动向量的函数。每个行动都是一个连续变量。其他每个人行动的增加会提高 u^i（即 $u_2^i>0$）。我们用变量 a 概括所有其他人的行动，因为我们把讨论限制在对称均衡的情形。

假设一个人自己行动的增加是边际回报递减的（即 $u_{11}^i<0$），代表性主体的行为由下面的反应函数描述：

$$u_1^i[a^i;a,p(a)] = 0 \qquad (B-1)$$

也就是说，如果其他所有人都选择某个行动 a，第 i 个主体的激励是选择满足式（B – 1）的 a^i。给定他的环境，在那个点上他将处于最优状态。如在第一部分指出的，对称的内点均衡是满足下面方程的 a^* 值

$$u_1^i[a^*;a^*,p(a^*)] = 0 \qquad (B-2)$$

因为在 a^* 处所有参与者都是最优的。

在这个模型中互补性通过条件 $u_{12}^i>0$ 来刻画，如果互补性充分大的话，将会有多个均衡的 a^* 值（见图 2）。在所有人都选择一个更高行动的均衡里，所有人都会变得更好，因为对于任何给定的 a^i，其他人的行动增加会提高效用（$u_2^i>0$）。一个人从而发现提高 a^i 是最优的，这会进一步增加他的福利。

类别 I – D 相同的参与者和离散的行动

模型的下一个类别假设参与者是相同的，他们的行动是离散的。最简单的情形是只有两种可能的行为或活动（两点选择）。那么对任何行为的支付取决于采取（比如说）第一种行为的个人的比例 x。第 i 个人的效用函数可以写作 $U^i = U^i[a^i;x,p(x)]$，当这个人采取第一种行为的时候 $a=1$，当这个人采取第二种行为的时候 $a=2$。p 值是 x 的函数：$p = p(x)$。这个人把 x 作为给定，选择行动 a^i 以最大化 $U^i[a^i;x,p(x)]$。在参与者是连续统的情况下，满足 $x\in(0,\ 1)$ 的均衡可由满足下面方程的比例 x 所描述

$$U^i[1;x^*,p(x^*)] = U^i[2;x^*,p(x^*)] \qquad (B-3)$$

这说明当 x^* 比例的人口采取第一种行动时，每个人在两种行动之间是无差异的。如果第一种行动的相对回报对 x 是递增的，那么这个模型中存在互补性：即，如果支付函数对于 x 的偏导数，用 U_x^i 表示，满足

$$U_x^i[1,x,p(x)] - U_x^i[2,x,p(x)] > 0 \qquad (B-4)$$

当互补性充分强的时候，每个人对行动 1 和行动 2 的排列会随着 x 的变

化而变化，因此多个 x^* 值满足式（B－3）。

在互补性的情况下，角点解也有可能存在。所有人选择行动 1 的角点解存在的条件是

$$U^i[1;1,p(1)] > U^i[2;1,p(1)] \tag{B－5}$$

所有人都选择行动 2 的另外一个角点解存在的条件是

$$U^i[2;0,p(0)] > U^i[1;0,p(0)] \tag{B－6}$$

式（B－5）表明当其他所有人都选择第一种行动时，对个人来说选择第一种行动是最优的。式（B－6）表明当其他所有人都选择第二种行动时，对个人来说选择第二种行动是最优的。

这个两点选择模型可以被一般化为任意大数量的离散行动。在 Murphy, Shleifer 和 Vishny（1993）的文章中，有三个行动：生产经济作物，维持生存的活动和寻租活动（掠夺）。维持生存活动的回报，用 γ 表示，是外生的，而生产经济作物和寻租活动的回报对于寻租者相对经济作物生产者的比例 n 是递减的。一个内点均衡由满足下面方程的 n^* 值描述：

$$U^i[1;n^*,p(n^*)] = U^i[2;n^*,p(n^*)] = \gamma \tag{B－7}$$

假设在 n 的一定范围内，经济作物生产的回报比寻租活动的回报的递减更加厉害。这意味着在 n 的一定范围内，寻租活动的相对回报对 n 是递增的。在这种情况下，多重帕累托排序均衡可能存在。一些均衡的特征是低的寻租者比例，所有人的支付超过 γ（因此没有维持生存活动的生产者）。其他均衡的特征是寻租者比例很高，所有参与者的支付被压低到生存活动的回报 γ 上。

类别Ⅱ－D 个人支付函数不同和离散行动

在前面的模型类别中，一些人选择一种行动，其他人选择另一种行动。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所以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相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行动——事实上，这也并不重要。所需要的只是个人对他们所做的选择无差异。但是一般来说，存在重要的个人差异。只要这些差异存在，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人选择一种行动，而不选择另一种行动。模型的下一个类别包含个人支付函数的差异。

这些模型的结构是存在一些个人特征（比如反映在他的效用函数或财富上），简单地表示为 c，有一个根据 c 的个人概率分布 $F(c)$。与以前一样，假设人们的行动是二点选择。把 x 当作是给定的，每个人选择他的行动 a^i 以最大化他的支付 $V^i(a^i;x,c)$。［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省略了支付对 $p(x)$ 的依赖］效用函数的结构使我们可以根据 c 对个人排序，使得存在一

个关键值 c^* 满足：

$$V[1,F(c^*),c] \gtreqless V[2,F(c^*),c] \text{ 当 } c \gtreqless c^* \qquad (B-8)$$

这表明特征在 c^* 以上的个人偏好行动 1，特征等于 c^* 的个人对两种行动无差异，特征在 c^* 以下的个人偏好行动 2。

如在方程（B－4）中，互补性由下面条件来定义：行动 1 的相对回报对于采取行动 1 的个人比例是递增的：$V_x^i(1,x,c) - V_x^i(2,x,c) > 0$。当互补性充分强的时候，可以存在 c^* 的多个解。

类别Ⅲ　个人有不同的策略集

协调失灵也可以产生于不同种类参与者的相互作用。考虑一个有两组参与者的情形，他们有不同的策略集——例如，企业可以创新或者不创新，工人可以受培训或者不受培训。为简单起见，我们对每个组用一个参与者来代表，但实际上每个组都包含很大数量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用类别 I－C 的技术来解出每一类参与者的对称均衡。

假设有两组参与者，假设第一组的行动是一个连续的变量，用 a 表示，第二组的行动也是一个连续的变量，用 b 表示。然后，给定 b 和 p，第一组对于 a 最大化支付函数 $v^1[a;b,p(a,b)]$；给定 a 和 p，第二组对于 b 最大化支付函数 $v^2[a;b,p(a,b)]$。

一个内点均衡是以下反应函数的一个解

$$v_a^1[a^*,b^*,p(a^*,b^*)] = 0 \qquad (B-9)$$

和

$$v_b^2[a^*,b^*,p(a^*,b^*)] = 0 \qquad (B-10)$$

如果两组参与者之间有互补性（由条件 $v_{ab}^i > 0$ 刻画），那么可能存在多个满足这些方程的值 (a^*,b^*)。

参考文献

Abramovitz, Moses. 1986.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 (2, June): 385–406.

Acemoglu, Daron. 1995. "Reward Structures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9: 17–33.

———. 1997. "Training and Innovation in an Imperfect Labour Marke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4 (220, July): 445–64.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0. "Political Losers as a Barrier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2, May): 126–30.

Adelman, Irma, and Cynthia Taft Morris. 1965. "A Factor Analysis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d Political Variables and Per Capita Gross National Produc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9 (4, November): 555–78.

Adserà, Alicia, and Debraj Ray. 1998. "History and Coordination Failure."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3 (3, September): 267–76.

Aghion, Philippe, and Patrick Bolton. 1997. "A Theory of Trickle-Dow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4 (2, April): 151–73.

Aleem, Irfan, and Louis Kasekende. 1999. "Reforming Finance in a Low-Income Country: Uganda." Finance Team,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www.worldbank.org/research/projects/finliber.htm>.

Amelina, Maria, 2000. "Why Is the Russian Peasant Still a Kolkhoznik?" *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Forthcoming.

Arnott, Richard,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91. "Moral Hazard and Nonmarket Institutions: Dysfunctional Crowding Out or Peer Monitor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 (1, March): 179–90.

Arrow, Kenneth. 1962a.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3): 155–73.

———. 1962b.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I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609–2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rrow, Kenneth, and Gerard Debreu. 1954.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2 (3, July): 265–90.

Atkinson, Anthony B.,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69. "A New View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Economic Journal* 79 (September): 573–78.

Azariadis, Costas, and Allan Drazen. 1990. "Threshold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 (2): 501–26.

Banerjee, Abhijit V. 2000. "The Two Povertie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Banerjee, Abhijit V., and Andrew F. Newman. 1993.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 (2, April): 274–98.

———. 1998. "Information, the Du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5 (October): 631–53.

Banerjee, Abhijit V., Paul Gertler, and Maitreesh Ghatak. 1998. "Empowerment and Efficiency: The Economics of Tenancy Refor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Processed.

Bardhan, Pranab. 2000. "The Nature of Institutional Impediment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ncur Olson and Satu Kähkönen, eds., *A Not-So-Dismal Science*, 245–68.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dhan, Pranab, and Maitreesh Ghatak. 1999. "Inequality,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CIDER Working Paper C99-108.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asu, Kaushik. 2000.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A Prelude to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su, Kaushik, and Pham Hoang Van. 1998. "The Economics of Child Lab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3, June): 412–27.

Becker, Gary. 1973.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4, July–August): 813–46.

———. 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8 (3, August): 371–400.

Bell, Clive. 1990. "Interactions between Institutional and Informal Credit Agencies in Rural Indi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4 (3): 297–328. Reprinted in Karla Hoff, Avishay Braverman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The Economics of Rural Organiz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186–21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nanke, Ben, and Mark Gertler. 1990. "Financial Fragil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 (1, February): 87–114.

Besley, Timothy, and Anne Case. 1994. "Diffusion as a Learning Process: Evidence from HYV Cotton." Research Program in Development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174.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Besley, Timothy, and Stephen Coate. 1998. "Sources of Inefficiency in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 Dynamic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1): 139–54.

Bhagwati, Jagdish, Richard Brecher, and T. N. Srinivisan. 1984. "DUP Activities and Economic Theory." In David Colander, ed., *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Analysis of Rent-Seeking and DUP Activities,* 17–32.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Blanchard, Olivier, and Michael Kremer. 1997. "Disorganiz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4, November): 1091–126.

Bloom, David E., and Jeffrey D. Sachs. 1998. "Geography, Demograph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0 (2, September): 207–73.

Bowles, Samuel. 1985.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Walrasian, Neo-Hobbesian, and Marxian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6–36.

———. 1998. "Endogenous Preferences: The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Markets and Other Economic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 (1, March): 75–111.

Boycko, Maxim,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96. "Second-Best Economic Policy for a Divided Govern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 (3–5, April): 767–74.

Braverman, Avishay,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82. "Sharecropping and the Interlinking of Agrarian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4, September): 695–715.

———. 1986. "Cost Sharing Arrangement under Sharecropping: Moral Hazard, Incentive Flexibility and Risk."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8 (3, August): 642–52.

———. 1989. "Credit Rationing, Tenancy, Productivity and the Dynamics of Inequality." In Pranab Bardhan, e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rarian Institutions*, 185–202.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Bruno, Michael. 1996. *Deep Crises and Reform: What Have We Learned?* Directions in Development ser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henery, Hollis B. 1975. "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 (2, May): 310–16.

Coase, Ronald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386–405.

———.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Conley, Timothy, and Christopher Udry. 1999.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The Adoption of Pineapple in Ghana." Working Paper, Agrarian Studies Colloquium Series.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

Cooper, Russell W. 1999. *Coordination Games: Complementarities and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oter, Robert D. 1997. "The Rule of State Law and the Rule-of-Law Stat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Development." In Michael

Bruno and Boris Pleskovic, eds.,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 191–2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0. "Law from Or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 Social Norms." In Mancur Olson and Satu Kähkönen, eds., *A Not-So-Dismal Science*, 228–44.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rwin, Charles. 1993.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Modern Library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First published 1859.

Dasgupta, Partha, and Debraj Ray. 1986. "Inequality as a Determinant of Malnutrition and Unemployment." *Economic Journal* 96 (384, December): 1011–34.

Dasgupta, Partha,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88. "Learning-by-Doing, Market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and Trade Policie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0 (2): 246–68.

de Meza, David, and J. R. Gould. 1992. "The Social Efficiency of Private Decisions to Enforce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 (3, June): 561–80.

Diamond, Peter. 1982. "Aggregate Demand Management in Search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 881–94.

Dixit, Avinash K. 1996.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 Transaction Cost Politics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Dixit, Avinash K.,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3, June): 297–308.

Durlauf, Steven. 1996. "Neighborhood Feedbacks, Endogenous Stratific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William A. Barnett, Giancarlo Gandolfo, and Claude Hillinger, eds., *Dynamic Disequilibrium Model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etrics*, 505–3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The Memberships Theory of Inequality: Ideas and Implications." In Elise S. Brezis and Peter Temin, eds., *Elites, Minorities, and Economic Growth*, 161–77.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Dyck, Alexander. 1999. "Privatiz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les, Evidence and Future Challenge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mbridge, Mass. Processed.

Easterly, William. 1999. "The Middle Class Consensus and Economic Devel-

opmen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346. Macroeconomics and Growth,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Easterly, William, and Ross Levine. 1997.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4, November): 1203–50.

———. 2000. "It's Not Factor Accumulation: Stylized Facts and Growth Models." Policy Research Group,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www.worldbank.org/research/growth/wpdate.htm>.

Engerman, Stanley L., and Kenneth L. Sokoloff. 1997. "Factor Endowments,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th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A View from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tephen Haber, ed., *How Latin America Fell Behin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ies of Brazil and Mexico, 1800–1914*, 260–304.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ngerman, Stanley L., Stephen Haber, and Kenneth L. Sokoloff. 1999. "Inequality,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th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Processed.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rrell, Joseph. 1987. "Information and the Coase Theore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 (2, fall): 113–29.

Fei, John C., and Gustav Ranis. 1969.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 (2, May): 386–400.

Fernandez, Raquel, and Dani Rodrik. 1991. "Resistance to Reform: Status Quo Bias in the Presence of Individual-Specific Uncertain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 (5, December): 1146–55.

Finger, J. Michael. 1998. "GATT Experience with Safeguards: Mak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ense of the Possibilities That the GATT Allows to Restrict Import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0. Trade,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Floro, Sagrario, and Pan Yotopoulos. 1991.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Case of Philippine Agricultu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Foster, Andrew, and Mark Rosenzweig. 1995. "Learning by Doing and Learning from Others: Human Capital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Agricul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 (6, December): 1176–1209.

Furman, Jason,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99. "Economic Crises: Evidence and Insights from East Asi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1–114.

Gallup, John Luke, and Jeffrey Sachs, with Andrew Mellinger. 1999. "Geograph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oris Pleskovic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8*, 127–7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ambetta, Diego. 1993. *The Sicilian Mafi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lbert, Richard, Partha Dasgupta,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82.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under Alternative Market Structures: The Case of Natural Resourc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9: 567–82.

Greenwald, Bruce,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86.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e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 (May): 229–64.

———. 1993. "Financial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Business Cycl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1, February): 77–114.

Greenwald, Bruce, Joseph E. Stiglitz, and Andrew Weiss. 1984. "Informational Imperfections in the Capital Markets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2, May): 194–99.

Greif, Avner. 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 (5, October): 912–50.

———. 1997. "Contracting, Enforcement, and Efficiency: Economics beyond the Law." In Michael Bruno and Boris Pleskovic, eds.,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ssman, Sanford J. 1989. "The Informational Role of Warranties and Private Disclosure about Product Quality." In Sanford J. Grossman, ed., *The Informational Role of Prices*, 166–89. Wicksell Lectur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arberger, Arnold C. 1964. "Tax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Welfare." In John Due, ed., *The Role of Direct and Indirect Taxes in the Federal Revenue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rris, John R., and Michael P. Todaro. 1970.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 (1, March): 126–42.

Hart, Oliver. 1975. "On the Optimality of Equilibrium When the Market Structure Is Incomplete."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1 (3, December): 418–43.

Hayek, Friedrich A. 1978.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In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llman, Thomas, Kevin Murdock,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96. "Deposit Mobilization through Financial Restraint." In Niels Hermes and Robert Lensink, ed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219–46. New York: Routledge.

Helpman, Elhanan, and Paul Krugman. 1985.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off, Karla. 1992. Review of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Kyklos* 45 (4): 582–85.

———. 1994. "The Second Theorem of the Second Bes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4: 223–42.

———. 1996. "Market Failur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 Perspective from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24 (4): 411–32.

———. 1997. "A Bayesian Model of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3 (3–4): 400–36.

———. 1998. "Adverse Sel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98-02 (February): 1–40.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Md.

———. 2000. "The Logic of Political Constraints and Reform, with Applications to Strategies for Privatiza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Hoff, Karla, and Andrew Lyon. 1995. "Non-Leaky Buckets: Optimal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and Agency Cos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8 (3. November): 365–90.

Hoff, Karla, and Arijit Sen. 2000. "Homeownership, Community Interactions, and Segrega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Hoff, Karla,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98. "Moneylenders and Bankers: Price-Increasing Subsidies in a Monopolistically Competitive Marke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5 (2, April): 485–518.

Hoff, Karla, Avishay Braverman,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1993. *The Economics of Rural Organiz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amuel.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

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ain, Sanjay, and Sharun Mukand. 1999. "Redistributive Promises and the Adoption of Economic Reform."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nd Tufts University, Medford, Mass. Processed.

Klitgaard, Robert. 1991. *Adjusting to Reality: Beyond "State versus Marke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Calif.: ICS Press.

Kranton, Rachel E. 1996. "Reciprocal Exchange: A Self-Sustaining Syst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4, September): 830–51.

Kremer, Michael. 1993. "The O-Ring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3, August): 551–75.

Krueger, Anne O. 197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3, June): 291–303.

———. 1993.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Krugman, Paul. 1991. "History versus Expect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May): 651–67.

Krusell, Per, and Jose-Victor Rios-Rull. 1996. "Vested Interests in a Positive Theory of Stagnation and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3 (2, April): 301–29.

Kuznets, Simon.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1, March): 1–28.

Landes, David S.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W. W. Norton.

Legros, Patrick, and Andrew F. Newman. 1996. "Wealth Effects, Distribution, and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70 (2, August): 312–41.

Lewis, W. Arthur.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 (May): 139–91.

Ljungqvist, Lars. 1993. "Economic Underdevelopment: The Case of a Missing Market for Human Capit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0: 219–39.

Lucas, Robert E. 1973.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Output-Inflation Tradeoff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3): 326–34.

———. 1976.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 (2, supplement): 19–46.

———.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July): 3–42.

Lucas, Robert E., and E. C. Prescott. 1974. "Equilibrium Search and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7 (2): 188–209.

Makowski, Louis, and Joseph Ostroy. 1995. "Appropriation and Efficiency: A Revision of the First Theorem of Welfare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4): 808–27.

Marshall, Alfred. 1897. "The Old Generation of Economists and the New."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 (2, January): 115–35.

Matsuyama, Kiminori. 1997.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Coordination Problems." In Masahiko Aoki, Hyung-Ki Kim, and Masahiro Okuno-Fujiwara, ed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McCloskey, Deirdre. 1998. "The So-Called Coase Theorem."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4 (3, summer): 367–71.

Miller, Marcus,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99. "Bankruptcy Protection against Macroeconomic Shocks: The Case for a Super Chapter 11."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Capital Flows, Financial Crisis, and Policies," World Bank, April 15–16,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http://www.warwick.ac.uk/fac/soc/Economics/miller/>.

Mookherjee, Dilip. 1997a. "Informational Rents and Property Rights in Land." In John H. Roemer, ed., *Property Relations, Incentives, and Welfar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in Barcelona, Spain, b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97b. "Wealth Effects, Incentives,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 (1, February): 116–33.

Mookherjee, Dilip, and Debraj Ray. 1998. "Persistent Inequality and Endogenous Investment Thresholds."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Mass. Processed.

———. 2000. "Contractual Structure and Wealth Accumulation."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Mass. Processed.

Morawetz, David. 1981. *Why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Are Not Made in Colombia: A Case Study in Latin American and East Asian Manufactured Expor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rduch, Jonathan. 1999. "The Microfinance Promis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 (4, December): 1569–1614.

Murphy, Kevin M.,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89.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5, October): 1003–26.

———. 1993. "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2, May）:409–14.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3, June): 359–68.

North, Douglass C., and Robert Paul Thomas. 1970.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3: 1–17 (second series).

———.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3, September): 567–76.

Palfrey, Thomas, and Howard Rosenthal. 1984. "Participation and the Provision of Discrete Public Goods: A Strategic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4 (2, July): 171–93.

Pargal, Sheoli, and David Wheeler. 1996. "Informal Regulation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 (6): 1314–27.

Piketty, Thomas. 1997. "The Dynamics of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the Interest Rate with Credit Ration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4 (2, April): 173–89.

Ray, Debraj, and K. Sengupta. 1989. "Interlinkages and the Pattern of Competition." In Pranab Bardhan, e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rarian Institutions.*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Robinson, James A. 1996. "Distribution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Some Preliminary Notes." Paper presented at MacArthur Foundation, May 3.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Processed.

———. 1999. "When Is a State Preda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rocessed.

Rodriguez-Clare, Andrés. 1996.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9 (April): 3–32.

Rodrik, Dani. 1995.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Reform." In Jere Behrman and T. N. Srinivasa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3B, 2925–82.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1996. "Coordination Failures and Government Policy: A Model with Applications to East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0 (1–2, February): 1–22.

Romer, Paul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5, October): 1002–37.

Rosenstein-Rodan, Paul. 1943.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53: 202–11.

Ross, Stephen. 1973.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 The Principal's Probl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2, May): 134–39.

Rostow, Walt Whitman. 1952.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Norton.

———.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h, Raaj Kumar,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89a. "Sources of Technological Divergence between Develop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Guillermo Calvo and others, eds., *Debt, Stabil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Carlos Diaz-Alejandro*, 423–46.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 1989b. "Technological Learning, Social Learning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Sukhamoy Chakravarty, ed., *The Balance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285–9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Samuelson, Paul A. 1948.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 *Economic Journal* 58 (230, June): 163–84.

Samuelson, William. 1985. "A Comment on the Coase Theorem." In A. E. Roth, ed., *Game-Theoretic Models of Bargain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n, Amarty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Shaw, Edward. 1973.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keath, Susan. 1993. "Strategic Product Choice and Equilibrium Traps for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 (1, June): 1–26.

Solow, Robert.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1, February): 65–94.

Stigler, George. 1971. "The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2 (spring): 3–21.

Stiglitz. Joseph E. 1969.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among Individuals." *Econometrica* 37 (3, July): 382–97.

———. 1973. "Recurrence of Techniques in a Dynamic Economy." In J.

Mirrlees, ed.,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138–61. New York: Macmillan.
———. 1974a. "Incentives and Risk Sharing in Sharecropp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 (2, April): 219–55.
———. 1974b. "Theori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In G. von Furstenberg, Ann R. Horowitz, and Bennett Harrison, eds., *Pattern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5–26.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Lexington Books.
———. 1974c.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Wage Determin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L.D.C.'s: The Labor Turnover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8 (2): 194–227.
———. 1975. "The Theory of Screening, Educ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3): 283–300.
———. 1987. "Learning to Learn, Localized Learning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Partha Dasgupta and Paul Stoneman, eds., *Economic Policy and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 125–5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Hollis Chenery and T. N. Srinivasa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 93–160.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1989. "Markets, Market Failures,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 (2, May): 197–203.
———. 1990. "Some Retrospective Views on Growth Theory." In P. Diamond, ed., *Growth/ Productivity/ Unemployment,* 50–68.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92a. "Alternative Tactics and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mitava Krishna Dutt and Kenneth P. Jameson, eds., *New Direction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57–80. Aldershot, U.K.: Edward Elgar.
———. 1992b. "Explaining Growth: Competition and Finance." *Rivista di Politica Economica* (Italy) 82 (169, November): 225.
———. 1993. "Comments on 'Towards a Counter-Counter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Theory.'" In Michael Bruno and Boris Pleskovic, eds.,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 39–4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1994a.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and Corporate Change* 3 (1): 65–110.
———. 1994b. "Endogenous Growth and Cycles." In Y. Shionoya and M. Perlman, eds.,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 Industries, and Institutions,* 121–56.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4c.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Financial Markets." In Michael Bruno and Boris Pleskovic, eds.,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1995a. "Interest Rate Puzzles, Competitive Theory and Capital Constraints." In Jean-Paul Fitoussi, ed., *Economics in a Changing World*, vol. 5, 145–7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95b. "Social Absorption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Bon Ho Koo and D. H. Perkins, eds., *Social Capability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96a.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1996b. "Some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1 (2, August): 151–77.

———. 1998a. "An Agenda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Boris Pleskovic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7*.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1998b. "The Private Uses of Public Interests: Incentives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 (spring): 3–22.

———. 1998c.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form." Paper presented to Stanford University, September 17.

———. 1999. "Knowledge as a Global Public Good." In *Global Public Good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2000. "Whither Reform? Ten Years of the Transition." In Boris Pleskovic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tiglitz. Joseph E., and Marilou Uy. 1996. "Financial Markets, Public Policy, and the East Asian Miracl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1 (2, August): 249–76.

Temple, Jonathan, and Paul A. Johnson. 1998. "Social Cap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 (3, August): 965–90.

Tinbergen, Jan. 1967. *Economic Policy: Principles and Design*. Amsterdam: North-Holland.

Tirole, Jean. 1996. "A Theory of Collective Reputations (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Persistence of Corruption and to Firm Qua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3 (1, January): 1–22.

Tornell, Aaron, and Philip R. Lane. 1999. "The Voracity Effe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1, March): 22–46.
World Bank. 199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a. *Assessing Aid: What Works, What Doesn't, and Wh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99: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发展理论与实践

更丰富的政策工具与更广泛的发展目标：迈向后华盛顿共识*

今天我想讨论一下我们对经济发展的理解上取得的一些进展。尤其是，我想以今天的演讲来讨论一下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我的发言围绕两个主题加以具体阐述。第一个主题是对什么能使市场运作得更好，我们已经形成了更好地理解。华盛顿共识认为，要使经济运行良好就需要有自由的贸易、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价格公正。一旦政府处理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让政府避开——私人市场能够产生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增长。显然，所有这些方面对市场的运作都很重要。当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00%时，投资者很难做出很好的投资决策。但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政策很难实现而且有时具有误导性。要使市场运行良好，需要的不仅仅是低通货膨胀，要想解决一些被华盛顿共识忽略的基本问题，还需要有健全的金融规制、竞争政策、有助于技术转移的政策以及政策透明度。

与此同时，我们还加深了对能够提高市场运行机能的工具的了解，我们放宽了发展的目标范围，将其他诸如稳定发展、平等发展和民主发展一类的目标也囊括进来。如今，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寻求互补性战略以同时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然而，在探寻这些政策时，我们也不要忽略其中不可避免产生的权衡。这一点将是我今天发言的第二个主题。

---

*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1998 WIDER Annual Lecture, Helsinki, January 1998。

一、来自东亚金融危机的一些教训

在讨论这两个主题之前，先提出一个许多人心中都有的问题：东亚危机对我们思考发展问题有什么启示。在观察到东亚发展的成功，甚至是奇迹后，认为应该超越华盛顿共识的观点进一步增强。毕竟有一个地区的一组国家都没有严格地遵循华盛顿共识开出的处方，但却不知何故实现了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展。固然它们所实施的很多政策——如低通货膨胀和谨慎的财政政策——都和华盛顿共识非常一致。然而，许多政策和华盛顿共识并不一致，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政策。这一发现正是世界银行所做的关于东亚奇迹的研究（World Bank，1993）基础，同时还激起了人们最近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重新思考。

金融危机以后，人们不再提及东亚经济在发展上的非凡成功，而是开始广泛指责它们现在的糟糕处境。一些理论家利用现在不断困扰东亚的一些问题来说明积极的政府干预体系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他们提到了韩国的政府指导性贷款以及政府和财阀之间的良好关系。但他们忽略了东亚国家在过去30年取得很大的成就。尽管政府不时会犯错误，但其对这30年的成功肯定是有贡献的。这些成就是真实的，并非空中楼阁。任何暂时性的金融混乱都不能或不应该贬低这些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仅包括人均GDP的快速增长，还包括延长了人的寿命，普及教育和减少贫困。

即使这些国家政府自己直接采取行动，也创造了突出的成就，它们创建了最有效率的钢铁厂，虽然私有化理论家们认为这样的成就要么是一种侥幸，要么根本就不可能。我同意政府应该做只有它能够做的事情，而把钢铁一类商品留给私人部门来生产。但我认为许多国家当前问题的核心不是政府做的太多了，而是政府做的太少了。在泰国，并不是政府命令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而是政府管制者没有及时地制止这些投资行为。类似地，在韩国，借贷给杠杆率已经过高的公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韩国同时还存在包括普遍的交叉补贴在内的公司治理问题。错误不是在于政府进行错误的指导性借贷——实际上，许多美国、欧洲和日本银行所面临的问题表明它们也有很严重的呆坏账问题，相反，问题在于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政府低估了金融管制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东亚危机并没有否定东亚奇迹。

僵化的华盛顿共识的版本并没有提供一个合适的框架来理解东亚经济的成功以及它们现在的麻烦。根植于这种观念中的对东亚危机的反应要么是非常有缺陷的，要么是反生产力的。

二、使市场更好地运作

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促进了华盛顿共识的发展。当时，该地区的经济运行非常不好。20世纪80年代初，拉丁美洲国家的GNP连续三年都在下滑。市场运行得如此差，明显是因为公共政策的失败。预算赤字非常高——许多国家的赤字都占GDP的5%～10%——这些财政支出都没有用到生产方面，而是被挪用于补贴机构庞大且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门。由于严格禁止进口且相对不重视出口，公司没有足够动力增进效率或实现世界性的质量标准。

起初，赤字的经费是通过借贷支撑着——甚至包括国外的借款。美国实际利率的上升制止了这种持续的借贷并增加了债务的利息负担，这迫使许多国家采取发行货币的方式来填补持续高额的政府开支和持续萎缩的税基之间的差额。这就导致了严重且不稳定的通货膨胀。在这种经济环境中，货币成为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交易工具，经济行为从进行生产性投资转向了进行保值，而高通货膨胀导致的相对价格的易变破坏了价格体系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信息。面对这些严重的问题，美国经济官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我想此时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再次分析一下这个共识。

许多国家，例如阿根廷和巴西，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稳定，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设计第二次改革。而其他国家则一直都有相对较好的政策或者和拉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例如，在东亚，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有财政盈余，通货膨胀也很低，并且在货币贬值之前通货膨胀率还在下降。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通货膨胀等因素，正如其他许多国家的问题一样，对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法也不能从华盛顿共识中找到。我认为对通货膨胀的关注——这是拉丁美洲国家最主要的宏观经济诟病，是华盛顿共识形成的背景——而导致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并不是最有益于长期经济增长的，还会使人们忽略了其他一些主要的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即金融部门的脆弱性。

在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情况下，对放开市场的关注实际上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由于金融部门的脆弱导致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更进一步讲，对贸易自由、反对管制和私有化的关注忽略了其他一些对形成有效的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的因素，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竞争：竞争最终可能在决定长期经济成功方面比其他因素都要重要。我还将指出其他一些对经济增长很重要的要

素，也是被华盛顿共识所忽略或强调不足的；教育对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认可，但其他如技术的提高等要素却并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关注。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学说的成功是因为它的简单。虽然该共识的许多支持者的思想都是非常复杂而精细的，但经济学家用类似于简单会计架构的方法就可以执行该共识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他们紧盯几个经济指标——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的增长、利率、预算和贸易赤字——然后描绘出整个经济体的状况并给出一套政策建议。甚至已经有经济学家飞到某个国家，着手尝试核查这些方面的数据，并在两周的时间内就为改革政策给出宏观经济方面的建议的一些例子。

华盛顿共识的方法在提供政策建议方面具有重要的优势。它强调首要问题，并建立了一个很容易再复制的框架，然而它在确立发展的先决条件方面的局限性也很明显。而由于这些原因，华盛顿共识并不能为发展中存在的每一个问题都提供最好的答案。自欺欺人地认为其可以做到这一点会导致一些具有误导性的政策建议。相反，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一些思想并非如此简单；用这些观念来解读经济健康的体温计并非易事；而且更糟糕的是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会导致一些权衡的出现，当出现需要权衡的情况时，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描绘出不同政策可能导致的经济结果，但在做出选择时实际上有很大发言权的是政治秩序。经济政策可能并非仅仅是专家们的事！当我们开始将发展的目标扩展时，这些冲突就显然非常重要，在发言的最后部分我会谈及这点。

三、宏观经济稳定

1. 控制通货膨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一些人推荐的维持经济稳定的要素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要控制通货膨胀。如此强烈而预防性地反对通货膨胀有三个方面的假设前提。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货膨胀代价高昂。这就使得人们有动力尝试转移或降低通货膨胀。第二个假设是一旦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它就有不断上升并最终失去控制的趋势。这一观念促使人们在对付通货膨胀时采取稳妥、谨慎的做法。最后，第三个假设是使升高了的通货膨胀再降下来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点暗含的意思是即使和通货膨胀相比较，你更关心失业问题，你也要保持现在的通货膨胀率不变，以避免以后想降低通货膨胀时可能导致的经济大萧条。

所有这三个假设前提都可以用实证的方法进行验证。我在另一篇论文

（Stiglitz，1997）中已经详细阐述了这方面的论证。这里我想简单地总结一下。实证研究只表明高通货膨胀会带来高成本。布鲁诺和伊斯特利（Bruno and Easterly，1996）发现，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40%这一界限的国家会陷入一种高/低增长陷阱。但并无证据表明在该界限之下，通货膨胀会带来高成本。巴罗（Barro，1997）和费雪（Fischer，1993）也证实了高通货膨胀平均而言对增长是有害的，但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是有成本的。对通货膨胀的可变性，费雪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阿克洛德、狄更斯和佩里（Akelod，Dickens and Perry，1996）最近所做的研究表明，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甚至会提高经济绩效。加速理论者的假说（也被称做是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或滑坡定律）也没有得到实证研究明确的支持：没有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与过去通货膨胀有关。

最后，关于第三个命题，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菲利普斯曲线可能是凹的，因此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成本可能小于通货膨胀上升时可能获得的收益。在我看来，该研究关于通货膨胀的影响的结论是：控制高水平和中等水平的通货膨胀应该是一个首要政策，但降低原本就很低的通货膨胀就不太可能明显地改善市场的机能。1995年，超过一半的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在15%以下。对这71个国家而言，控制通货膨胀并非是首要政策之一。在22个国家中，控制通货膨胀可能是维持经济稳定和进行改革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非洲、东欧和前苏联的、通货膨胀率超过40%的国家。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拥有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更少，那时华盛顿共识对通货膨胀的强调也并非那么重要的。

2. 预算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

宏观经济稳定的第二个要素是要削减政府的规模、预算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稍候我会再讨论最优政府规模的问题，现在我想集中讨论一下这一对赤字。和通货膨胀类似，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巨额的预算赤字对经济绩效有害（Fischer，1993；Easterly et al.，1994）。为赤字融资的三种方法都有缺点：内部融资会提高国内利率，外部融资无法持续进行，而发行货币则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简单的预算赤字最优水平是不存在的。最优赤字——可持续赤字的范围——取决于环境，包括经济的周期性状况、对未来增长的期望、政府支出的用途、金融市场发育的程度，以及国民储蓄和国家投资水平。例如，美国目前正在试图实现预算平衡。

在我个人看来，美国的低储蓄率和再次的生育高峰表明其或许应该将目标定位于预算盈余上。相反，东亚国家有很高的私人储蓄，经济增长减慢是

暂时的，因此保持预算盈余的压力相对较小。去年我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经验则是强调最优赤字的另一个决定因素：融资的来源。在过去的几年中，埃塞俄比亚的赤字大约是 GDP 的 8%。一些政策建议者希望埃塞俄比亚降低其赤字。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赤字是由稳定的、可预见的、非常优惠的国外援助来融资的，这些援助不是为了填补预算缺口，而是为了获得高投资回报。在这些情况下——倘若政府投资于初等教育和物质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和能源）一类的关键领域，能够获得较高的回报——政府将国外援助视作是如税收一样的正常的收入来源，并用外国援助来平衡预算也是可以的。经常账户赤字的最优水平通常也是不确定的。我们都知道，当一国的投资大于储蓄时，会出现经常账户赤字。经常账户赤字本身无所谓好坏，而是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尤其是取决于投资的方向。在许多国家，投资回报率都远远超过了国际资金的成本。在这些经济环境下，经常账户赤字就是可持续的。融资的形式也很重要。外国直接投资的优势不仅仅是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还在于其相对比较稳定。相反，泰国去年 8% 的经常账户赤字不仅数额巨大，而且是由短期的、按美元计的债务来对按当地货币计的投资进行融资，这些投资又往往投在如房地产一类的资金过剩且非生产性的产业中。

3. 稳定产出并促进长期增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宏观经济稳定恰恰忽略了最基本的稳定意义：产出或失业的稳定。尽量减少或避免大的经济紧缩应该是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在短期，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当然是无效率的——用纯粹的经济术语来讲，它意味着可以有效利用的资源却被闲置。我所做的一些研究也强调了商业周期本身会对长期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我们认为，当公司处于低迷时期，其现金流降低，对研发进行融资的困难意味着公司应该大规模降低其在研发上的开支。

这样做导致的结果是将减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已经有证据表明这个效应在美国非常明显；在研发的作用不是很大的国家，这点是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一般来说，产出的波动几乎肯定会导致不确定性，从而会对投资造成负面影响。产出的波动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该表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和收入列出了年增长率的标准差中值。中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差是 2.8%。但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差是 5% 或更高——这意味着增长率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欧洲和中亚，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增长尤其不稳定。我们如何在稳定产出或就业的意义上促进

宏观经济的稳定？传统的答案是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和使自动稳定机制发挥作用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肯定是必要的，但越来越多的文献（包括理论的和实证两方面的）强调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微观经济基础。

这一类文献，包括我的研究，强调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并通过信用配给以及银行和公司的破产机制来解释经济的低迷。在19世纪，发达国家大多数的重大的经济低迷都是源于金融恐慌，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大范围的银行破产有时在金融恐慌之前就出现，而金融恐慌本身也总是会导致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大范围的银行破产。在一些国家，管制和监督的改进、存款保险的引入，以及为金融机构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这些措施都降低了金融恐慌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即便如此，金融危机仍持续发生，有迹象表明最近几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更加频繁和严重（Caprio and Kingebiel，1997）。美国声名狼藉的储蓄和贷款协会崩溃所造成的损失表明，即使是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也比大萧条中产生的损失大好几倍。然而如果用GDP占比来衡量，这次的崩溃还排不进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银行业危机的前25位。银行业危机会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1975—1994年，那些没有发生过银行业危机的国家的增长率在慢慢地接近。而经历了银行业危机的国家在危机过后的5年里经济增长率下降了1.3个百分点。显然，建立有活力的金融体系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4. 金融改革

建立健康有活力的金融体系，其重要性不仅仅是可以防止经济危机。有时我喜欢把金融体系比做是经济体的“大脑”。它在从现在拥有多余资源的代理人手中收集资源并增加储蓄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资源被分配给其他人——如企业家和住宅建筑商——他们能够将这些资源用于生产用途。机能良好的金融体系在为这些资源选择生产率最高的接受者方面做得非常好。相反，机能不佳的金融体系则往往会将资金分配到低生产率的投资方向上。项目的选择还只是第一步。

金融体系需要继续监督资金的使用，确保资金继续有效地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还具有其他许多功能，包括降低风险、增加流动性和传递信息。所有这些功能对资本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都非常重要。仅仅依靠金融体系自身，无法很好地实现这些功能。有关金融市场的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市场失灵的普遍存在。不完美信息、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合约在金融部门尤其严重，使得到的均衡甚至不是受约束的帕累托有效的

(Greenwald and Stiglitz, 1986)。一个公正的法律体制再加上管制和监管对减轻这些信息问题和培育有效金融市场条件都是必要的。在成功的金融市场中，管制的意义有四点：维护安全和公正（审慎性监管），促进竞争，保护消费者，以及确保一些弱势群体也有机会获得资金。在许多情况下，对社会目标的追求——如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所规定的确保对少数民族和贫困社区的资金供给——又如确保为抵押提供资金，这是政府组织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的主要任务——或确保为小企业提供资金，这是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中心目标——如果运作得好，也能促进经济目标的实现。与此类似，保护消费者不仅是很有效的财政政策，而且如果人们无法确信经济市场中存在“平等竞技场”，则这些市场会保持薄弱和低效的状态。

然而，很多时候政策制定者都需要在相互冲突的目标中进行权衡。例如，东亚国家实施了金融抑制。这些抑制使得经营银行的特许权的价值上升，使银行不愿承担没有获得担保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有可能对银行部门的稳定有负面影响。虽然这些抑制措施毫无疑问会带来一些经济成本，但更大的稳定性带来的收益几乎肯定会超过这些损失。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机构之前一直努力尝试建立更好的银行体系。然而，实际上，制度改进、信用文化的变化和道德风险等问题比诸如调整银行体系资本一类的短期措施要更难以处理，也更难以取得进展。最糟糕的情况是这些暂时的解决之道甚至有可能会削弱进一步改革的压力。而由于没有专注于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有时会发现同一国家会反复出现类似问题。华盛顿共识是在受到高度管制的金融体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然而许多的管制措施都是用来限制竞争，而不是为了促进管制的四个正统目标的实现。但自由化的教条时常就仅仅成为了教条，而不是建立更好的金融体系的方法。我没有时间深入研究自由化的方方面面，它包括放开存贷利率、对外资银行的开放、取消对资金账户交易的限制，以及取消对银行借贷的限制。但我想就几点问题进行一些概括的讨论。

首先，关键问题不是自由化或者放松管制，而是构建能够确保金融体系有效运行的管制体制。在许多国家，这需要改变管制体制，消除那些只限制竞争和谨慎性行为的管制（并确保对银行有适当的激励机制）。

其次，即使设计出了理想的金融体系，在实施过程中也要非常小心。试图在一夜之间就去除管制，即所谓的“大爆炸”，忽略了顺序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例如，泰国曾经限制银行对房地产的借贷。在自由化的过程中，它

去除了这些限制但没有建立一个更复杂的基于风险的调节机制。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得大规模的资金错误地投入到了房地产行业，造成了房地产泡沫，而这又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意识到很难建立一个活跃的金融部门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像美国和瑞典那样有着精细制度的经济，其金融部门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欠发达的国家面临的挑战就更大了，而它们的制度基础还更薄弱一些。

再次，在所有国家，管制的一个主要目的应该是确保参与者都有正确的激励：政府不能够也不应该监督所有的交易。在银行系统，除非管制使得银行所有者、市场和监管者都有动力有效地利用信息并谨慎地行动，否则自由化是不起作用的。证券市场上的激励问题也同样重要。必须要使得对管理者而言，创造经济价值要比剥夺小股东的资产更有利可图：就像在公共部门一样，私人部门中“寻租”也完全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经验已经证明，在缺乏适当的法律体制的情况下，证券市场无法发挥其最重要的作用——这会损害到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需要用法律来保护股东，尤其是小股东的利益。对宏观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的关注，尤其是对金融基础的关注，对应对货币混乱也有一定的启发。尤其是，当货币混乱是由于金融部门的问题而造成时，传统的提高利率的政策反应有可能是不利于生产的。银行与公司资产和债务的期限与利率经常差别非常大，部分是由于银行有很大的动力利用短期债务来监督和影响向其借钱的公司，而储户会用短期储蓄来监督和影响银行（Rey and Stiglitz，1993）。

因此，利率的上升会导致银行净值的巨额减少——进而加剧银行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所做的实证研究已经确认了利率的上升会增加银行危机出现的概率，而货币贬值则没有明显的效应（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1997）。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可能对利率的变化比对汇率的变化更敏感：期限错配之间还存在经济逻辑，但汇率错配就没有对应的正当理由了。强迫公司降低前者会导致真实的成本。相反，汇率错配仅表现了投机行为的存在。在实际中，不能依靠这些通用的秘方而制定政策，而是应该仔细地观察危机中该国的实际情况：很可能货币错配比期限错配要严重很多，并且虽然以后所采取措施的系统效应会纠正这类投机行为，但当前的政策必须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

5. 竞争

我想回到我们的更大的主题上来：使市场运行得更好。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讨论了宏观经济政策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关注通货膨胀和预算约束：

不管是对宏观经济稳定而言，还是对长期经济发展而言，华盛顿共识下的一套政策既不必要，也不充分。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经济发展需要健康有效的金融市场；然而建立有效金融市场的议程不应该将方法和目标混淆；金融自由化不是问题所在——重新设计管制体系才应该是关键。现在我想指出的是，竞争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方法与目标相混淆的问题处处存在。

政策应该被视作是使市场更具竞争性的手段，然而其自身却被当成了目标；结果在一些情况下政策无法实现其目标。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即建立市场经济的有效性的结论有两个基本的假设：私有产权和竞争市场。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这两方面都缺乏。然而，直到最近，人们开始只强调建立私有产权和自由贸易——并将后者与建立竞争性市场混淆了。我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体，我们不可能认识到它们所能带来的所有好处。

6. 自由贸易

贸易自由化，并最终形成自由贸易，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关键部分。对贸易自由化的强调是很自然的：拉丁美洲国家曾经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而陷入了停滞。进口替代已经被证明了是一个非常低效的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工商企业生产的产品的附加值为负，并且抑制了创新。贸易自由化创造了竞争，但它并不会自动实现竞争的增加。如果存在进口垄断的经济体实现了贸易自由化，那么租金仅仅是从政府转移到了垄断者手中，而价格下降不大。

对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创造性的经济体而言，贸易自由化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条件。在之前受到保护的进口竞争部门制造竞争很重要，而促进出口方面的竞争也一样或更为重要。东亚经济的成功对这点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通过使各个国家利用其比较优势，贸易会使工资提高并扩展消费可能性集。最近的 15 年，贸易的增长率差不多是世界 GDP 增长率的两倍——世界贸易的年增长率为 5%。有趣的是，我们并没有完全明白贸易自由化是如何提高生产率的。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Hechsher - Ohlin）理论认为各个国家将沿着它们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移动，实现部门间的转移。它们将生产更多的它们具有优势的产品并买入它们不具有优势的产品。现实中，贸易带来的收益似乎来自由于效率的增加导致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移，而很少是部门性转移。要明白导致效率增加的原因需要我们了解贸易、竞争和自由化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7. 私有化

在许多国家的某些产业存在着（曾经存在）国家垄断。这就会抑制竞争。但过去十年对私有化的强调更多是出于对激励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竞争的考虑。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对市场经济非常关键的是自由、竞争市场和私有产权。许多国家——尤其是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两方面都缺乏。华盛顿共识对私有化的关注比对竞争的关注更大。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国有企业不仅效率低，而且他们的亏损会增加政府的预算赤字，从而会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私有化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它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并降低财政赤字。基本思想是如果能够建立私有产权，则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会消除浪费和低效率。同时，出售企业也会增加所需的财政收入。在转型经济体中，快速私有化是一种合理的冒险。虽然大多数的人都偏好更有序地改造和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律体系（包括合同、破产、公司治理和竞争等方面），但没有人知道改革之窗会开多久。那个时候，快速和广泛地私有化——并接着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似乎就是一个合理的冒险。我们现在来回顾已经进行的私有化，就会发现私有化的提倡者高估了私有化的收益并低估了成本，尤其是这个过程本身所带来的政治成本并会妨碍进一步的改革。

加上7年的经验教训以后，现在再进行同样的冒险就更不合理了。即使在私有化盛行的时候，我们许多学者就曾提出警告，认为在没有建立所需的制度性基础设施之前——包括竞争性市场和管制体系——不应草率地进行私有化。戴维·夏平顿（David Sappington）和我在私有化的基本定理中证明了私有化能够实现公共效率和公平目标的情况非常少，和竞争性市场实现帕累托有效的情形类似（Sappington and Stiglitz，1987）。例如，如果缺乏竞争，那么创造出一个不受管制的私人垄断企业很可能使消费者面临更高的价格。并且有证据表明，缺乏竞争时，私人垄断厂商可能会承受几种形式的低效率并且非常不具有创新性。

确实，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具有许多的相似性，并且管理上面临着许多相同的挑战。两种模式都需要将责任委派下去——立法机关和大公司的股东都不能直接控制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两种情形下，权力层级关系的终端是经理人，其一般都拥有大量的自主权和决策权。私人企业中也像国有企业中一样会出现“寻租”行为。例如，斯蒂佛和威斯尼（Shleifer and Vishny，1989）以及艾丁和斯蒂格利茨（Edlin and Stiglitz，1995）都证明了管理者不仅有很大的动力进行私人“寻租”，而且有动力采取行动增加其

"寻租"的范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进行的凭证式私有化的大胆试验似乎正是在这类问题上翻的船。问题可能并不是国有企业不能够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而是它们没有提供，并且施加了各种各样的附加约束。

不仅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差别模糊，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一连串的中间模式。例如，保持政府所有权但强化预算约束并自筹经费的公司化（另一种模式是绩效导向的政府机构，其以产出作为其绩效的衡量标准）。有些证据表明许多私有化能带来的好处在私有化之前就已经获得了——公司化的过程和对个人及机构设计了有效的激励机制都会带来这些好处（Caves and Christensen，1980；Pannier，1996）。

中国和俄罗斯的经验是证明竞争而非所有权的重要性的最生动的证据。通过扩展竞争范围而不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中国曾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当然，他们的国有企业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并期望在改革的下一个阶段能够得到解决。相反，俄罗斯将经济的很大一部分都私有化了，而到目前为止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促进竞争。这一点和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经济的大崩溃。这次经济大崩溃的程度和时间长度有些让人无法理解，至少就标准的经济理论而言是这样的。

人们普遍认为前苏联经济是低效的，其产出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军事支出。消除这些低效率应该会增加 GDP，而军事支出的降低则会进一步增加个人消费。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中国经济在过去 20 年中取得的成功对标准理论而言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该经济体不仅避开了彻底私有化的策略，而且也没有采用自由化/华盛顿共识学说所倡导的许多其他政策。但中国的经历是过去 20 年最成功的故事。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点。

如果将中国的 30 个省视做独立的经济体，它们中许多省的人口都超过了大多数其他低收入国家，那么 1978—1995 年增长最快的 20 个经济体都是中国的省（World Bank，1997a）。

此外，1978—1995 年中国 GDP 增长占低收入国家总增长的贡献大约三分之二（中国在 1978 年的 GDP 只是低收入国家总 GDP 的四分之一，它的人口是总人口的 40%）。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比给予我们的重要启发之一是关于私有化和竞争的政治经济学的启发。将垄断私有化会创造出巨额的租金。事实已经证明，要想在不引起腐败和其他问题的情况下实行私有化是非常困难的。企业家将有动力努力获得私有化了的企业而不是投资建立他们自己的公司。相反，竞争政策通常会减少租金，并激励人们创造财富。更进一

步讲，私有化与管制两者的实施顺序非常重要。将垄断私有化会形成非常稳定的利益，这会降低未来进行管制和竞争的可能性。

华盛顿共识是正确的——私有化非常重要。政府需要将其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私人部门没有和不可能进入的领域。政府开办钢铁厂没有任何意义。政府应该将其注意力集中在能够体现其优势的领域，这使得它有别于私人组织。但就像我们已经提到的，私有化的顺序和范围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即使当私有化改善了生产的效率，在实现更广泛的公众目标——没有体现在市场价格中的——时也存在很多问题，而管制可能是一个不完美的替代工具。监狱、社会服务，或者原子弹（或者原子弹最核心的部分，高度浓缩铀）的制造是否应该被私有化，就像一些美国人所提倡的那样？私有化的边界在哪里？通过诸如承包和更富有激励机制的拍卖等方式，也可以将更多的私人生产活动引入到公共生产活动中来。这些方式作为彻底的私有化的替代方式是否有效？这些方式通常都是推崇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所不屑的。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排序问题之所以非常关键，不仅仅是因为私有化所能带来的很多收益只能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才能实现，而且因为会出现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会抑制竞争或者反对限制滥用垄断权的管制。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竞争是成功的市场经济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竞争在经济中一些领域是不可行的——即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然而，竞争的程度和形式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的。新技术扩展了竞争的范围，使其存在于许多原来受到高度管制的行业中，如电信和电力。

然而传统的管制体制严格地区分了管制与解除管制、竞争与垄断，对制定这些领域的政策帮助越来越小。新技术并不要求大规模地解除管制，因为这些行业并不是所有方面都实现了充分的竞争。新技术要求管制体制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来适应这些新的挑战。这些变化必须能够识别出经济体中存在的一些混合型的领域，这些领域的一部分适合竞争，而另一些部分则适合垄断。不能使一个被管制行业的某一方面的市场力量成为其他方面的抑制因素，否则就会对经济效率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8. 竞争政策

虽然竞争的可行范围已经被扩展了，但由于种种原因，竞争常常并不完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已经了解了各种抑制竞争的方法——从暗地串通到掠夺性定价。我们知道，即使存在有很多的生产商，对分配体系的控制仍然可以有效地限制竞争。我们已经意识到对竞争的限制中存在垂直限制的可能性。新技术使促进竞争的可能性增强的同时，也使一些反竞争行为成

为可能，最近发生在美国航空和计算机行业的案例就说明了这点。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有效的反托拉斯法尚需进一步的研究。美国反托拉斯的精细而复杂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明显不适用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它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规则。

竞争政策对制定贸易政策也有很重要的启示。目前，大多数国家都用不同的规则管理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外）。没什么理由地，管理国际贸易方面的竞争法规（例如反倾销法和反倾销税）要比国内的反托拉斯法严格很多。在这些法规下，很多我们在国内看来很正常的价格竞争都被归类为倾销。这种公平贸易的滥用最先出现在发达国家中，但现在扩散到了发展中国家——1996 年，发展中国家向 GATT/WTO 提起的反倾销诉讼首次超过了工业国家。根据反倾销权威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一百年来发展出来的对竞争的性质深刻理解，将公平贸易和公平竞争法完全地结合起来是纠正这种滥用行为的最好方法。

9. 政府作为市场的补充

目前为止，我已经讨论了华盛顿共识在解决宏观经济稳定、金融改革、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等问题上的不足之处。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很重要的思想，但在促进金融部门改革和竞争政策等问题上并没有提出很好的建议。我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华盛顿共识甚至都没有提及的（或者强调不够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应该做什么，而第二个问题是它如何更有效地运行。20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人们都希望政府做得更多一些——支出更多并干预得更多。正是这些需要使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一直在增加。

我已经讨论的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思想基础是拒绝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促进建立一个最小的、不干预的政府。暗含的前提是认为政府差于市场。因此越小的政府越好（即越不差）。从我的评论中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并不相信如“政府差于市场”这类一般性的说法。我认为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是信息不完全和市场不完全的任一经济体的一般性特征。这一观点的含义是要使政府运作得更有效比仅仅缩小政府规模要复杂得多。通常政府都会有很多的事务要处理，精力会比较分散，因此其效率会比较低。一个组织的成功取决于其关注点。使政府更多地关注一些基本事务——经济政策、基础教育、医疗、道路、法律和秩序、环境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是对基本事务的关注不是对最小政府的处方。政府在适当的管制、行业政策、社会保护和福利等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问题并不是政府是否应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它如何参与。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应该将政府和市场看作是相互的替代。我更愿意认为政府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市场的补充，采取一些措施使得市场能够更好地实现其功能——同时纠正市场失灵。我们已经讨论一个重要的例子——在没有恰当的政府管制的情况下，金融部门无法很好地运行（Stiglitz，1993）。经济成功的国家的政府也参与了一系列的其他活动。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是一种有效的催化剂——其措施可以帮助解决（社会）创新提供不足的问题。但是一旦政府发挥了其催化剂的作用，就需要有退出机制。因此，在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抵押体系，该体系节约了借贷成本并使得数百万的美国人能够获得抵押贷款——这导致住宅拥有率居世界首位。但在实现了这点后，现在可能是时候将这一活动移交给私人部门来运作了。在今天有限的时间里，我不能讨论所有的，甚至政府能够作为市场重要补充的重要领域。我只简单地讨论两个领域，其中一个领域对政府的重要作用存在一些争议，而另一个领域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10. 人力资本

很早以前人们就意识到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例如，研究发现，在美国每增加一年教育的回报在5% ~15%。增长核算也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的很大一部分都归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例如，东亚经济非常强调政府提供大学教育的作用，这点对其从农业经济快速地转变为工业经济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因素。而仅仅依靠市场本身，人力资本的提供会不足。以期望的未来收入作担保来借贷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人力资本本身不可以用来抵押。对不太富裕的家庭而言，这些困难尤其严重。在提供公共教育方面，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用其他一些方式使人们更能承受教育支出，并加强对教育的投入。

11. 技术转移

对工业国家研发的回报率的研究发现，对个体回报在20% ~30%，而社会回报为50%，甚至更高——这远远高于教育的回报率（Nadiri，1993）。增长核算往往将人均收入增长的大部分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索洛首先提出的分析将1909—1949年每人小时产出值增加的87.5%归因于技术变化。根据标准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如果韩国只依靠资本积累，则其在1990年的人均收入只会有2041美元（以1985年国际美元计算）。而事实上，它的人均收入为6665美元，是前者的三倍。两个数据的差距来自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量的增加，而这要部分地归因于技术的提高。

市场提供技术不足的情况本身比教育在这方面的问题更引人注目。技术投资也面临和教育类似的融资问题，因为投资不能被用做担保。而且研发投资的风险要大得多，并导致更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更重要的是技术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知识就像是公共物品——你不能排斥其他人享有收益（非排他性），而我对知识的消费不会降低你消费它的能力（非竞争性）。就像美国一位著名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的：思想有如燃烧的蜡烛，你可以用它去点燃其他的蜡烛而不会熄灭原有的火焰。同样地，增加对技术的投资所能带来的社会收益远远大于给单个企业带来的收益。没有政府的参与，在新技术的创造和采用方面的投资就会很少。

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有位于技术前沿，促进技术转移的收益比进行创新性研发的收益要大得多。因此促进技术转移的政策是发展的关键。这类政策的一方面就是投资于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等教育。资助大学的政策不仅仅是为了向某些个体提供人力资本，还是为了利用其可以向经济体中输入思想的外部性。当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很高，而且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是非生产性的公务员。这些国家可能高估了文科教育的作用。相反，韩国通过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技术转移的政策是外国直接投资。例如，新加坡能够快速地吸收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所带来的知识。

最后，我想简单地提一下：技术领先者所采用的政策也很重要。进行知识创造的动力和来自更有效的知识传播的收益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最近许多人——包括发达国家的小公司、全世界的学术界，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开始注意到：发达国家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曾试图保持的平衡其实是低估了技术传播的作用。他们认为这将导致创新速度的整体下降并且对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生活水平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12. 使政府更有效

让我回过头来花一点时间看看这部分谈话的主题：我们如何设计能够提高经济体的生产率的政策？我已经强调了我们不应该把目的和手段混淆起来；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要素可能对解决如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某一类问题是合理的方法，但它们可能并不是解决其他情况下的问题的唯一办法，或者甚至不是核心办法。我已经强调过，提高经济体生产率的战略的一部分是确认政府的适当作用：例如，确认政府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作为市场的补充。此时我想谈谈公共政策中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我们如何才能使政府更有效地完成其承担的任何任务。

今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有效的政府对于发展至关重要（World Bank，1997c）。我们利用了来自94个国家、超过30年的数据，我们的报告指出，不仅仅是经济政策和人力资本，还有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的高低也决定了经济结果。事实上，它们设定了市场运作时所处的整体环境。薄弱的制度环境使得政府代理人和官员有更大的随意性。每个经济体有非常不同的起点，非常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如何使政府更有效率？答案的一部分是：政府应该使其角色与能力相匹配。政府做什么，它如何来做，应该非常清楚地反映了政府的能力——以及私人部门的能力。

低收入国家的市场往往很薄弱，而其政府制度同样也很薄弱。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关注于它们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补充市场就显得更为重要。但能力并非先天决定的。政府可以通过不断改善制度来提高能力。这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建立管理或技术能力。而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制度规则和标准，为政府官员提供激励，使他们为集体利益着想，抑制他们的随意行为和腐败行为。以下五个相互关联的机制有助于增强政府的能力：

第一，对一个专业性且有能力的机构而言，规则和约束非常关键。独立的司法部门，通过分权实现的制度性的制约与平衡，以及有效的监察人都可以抑制政府行为和腐败。

第二，行政工作自身需要变得更有效率，用有竞争力的薪酬吸引有能力的人。

第三，使政府更接近公众并使利益相关者对政策制定和服务提供进行积极反馈，就可以通过这种发言权和合作契约来增强政府的能力。

第四，在公共部门中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可以有很多途径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功效。例如，设计并使用绩效标准、建立以绩效标准为基础的激励机制、招标采购和出售公共资产如频谱执照，以及在对环境和安全的管制中使用绩效标准。

第五，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减少可“寻租”的范围。市场机制，如对自然资源或频谱执照的拍卖，是减少私人部门奋力争取人为稀缺性的动力的一种方法。此外，减少政府自由决定的活动——如授予特许权和施加贸易限制——也能降低“寻租”活动。

四、扩展发展的目标

华盛顿共识建议用一套工具（包括宏观经济稳定、自由化贸易和私有化）实现一个相对较为集中的目标（经济增长）。后华盛顿共识开始意识到

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更多的工具。我已经讨论了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工具，包括金融管制、竞争政策、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促进技术转移的政策。

我发言的第二个主题是后华盛顿共识还意识到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更为广阔。我们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健康卫生和教育的提高——而不仅仅是用 GDP 的增加来衡量。我们追求可持续发展，这包括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和保持一个健康的环境。我们追求公平性发展，这确保了社会中的每个群体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而不仅仅是高端的少数人。并且我们追求民主式的发展，这样公民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相关知识的发展并没有与我们目标的激增保持同步。我们只是开始了解民主化、不平等、环境保护以及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所掌握的促使我们有望制定补充性战略，来向所有这些目标前进。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我们的目标空间是多维的，则不是所有的政策都有利于这些目标。需要进行权衡和艰难的选择。如果要在未来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我们需要提高对这些不可避免的权衡的理解。我想通过讨论四个政策领域来说明这点，两个领域中政策可以实现互补性的目标，另两个领域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权衡。

1. 互补1：教育

提升人力资本是互补性政策的一个例子，这一政策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公平、参与性和民主。东亚经验再次提供了重要的例子。我已经讨论了教育在促进人力资本和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东亚，大学教育还创造了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有助于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是成功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教育——尤其是强调分析性、科学性思维的教育——能够有助于使公民更有效地、更聪明地参与公共决策。

2. 互补2：环境

单一工具可以完成多个目标的第二个方法来自环境政策。我尤其要强调的是降碳的联合履行机制。为了使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最小化，世界需要设计出方案，来降低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的排放，尤其是主要由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降低碳的排放确实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与主要影响污染国的空气污染（与 SO_2 和氧化氮有关）不同，所有排放的碳都会进入大气层，产生全球性的影响，而不管它的发源地在哪里。联合履行机制使发达国家（或者在发达国家的公司）承担起减少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污染排放的责任，而若没有该机制，它们是不会承担这样的责任的。这可能是迈向设计一个有效减少污染排放的机制的可行的第一步，因为这只要求发达国家做出承诺，因而不需要解决在许可证交易体系中或当发展中国家承担义务时所会出现的分

配问题。

联合履行机制的前提假设是降低碳排放的边际成本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区别极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比发达国家的能源有效利用率低。结果，发展中国家降低碳排放的边际成本可能要比发达国家的低很多。世界银行已经成立了一个碳投资基金，该基金使那些致力于降低污染物排放的国家和公司可以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降碳工程。对发达国家而言，该计划可以增加投资量和促进环保技术的转移。这些项目还可以减少被污染空气所间接导致的环境破坏。而联合履行机制使发达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来减少碳的排放。该策略通过改善全球环境而帮助了发展中国家。

3. 权衡1：对技术的投资

并非所有的政策都如投资于基础教育或联合履行降低污染物排放的政策一样。许多政策会要求人们做一番权衡。面对这些权衡并对优先顺序做出选择非常重要。仅仅关注“双赢”的政策会使政策制定者忽略有关“赢—输”政策的重要决策。我要讨论的一个潜在地会带来权衡的例子就是对技术的投资。之前我谈到了投资于高等技术教育的方法可以促进技术的转移并因此促进经济的增长。然而，这种投资的直接受益人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比一般人的境遇好。这就有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出现。更一般地，甚至技术转移都可能增加不平等。虽然一些创新会有益于最差的一部分人，但大多数的技术进步增加的是那些已经更有生产力的人的边际产出。即使并非如此，公共投资的机会成本可能也是放弃了用于反贫困项目的投资。可是，通过增加产出，这些投资可以有益于整个社会。然而，潜在的“涓滴”（trickle-down）效应并不一定会很快发生或广泛发生。

4. 权衡2：环境和公众参与

我想讨论的第二个权衡的例子是环境和全民参与之间的权衡。我们现在知道全民参与非常重要。但是虽然这样，我们也不应该混淆：全民参与并不能代替专家意见。例如，研究证明公众对各种环境卫生隐患的排序与科学研究的结果大相径庭（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1987；Slovic et al.，1993）。在制定环境政策时，我们是应该使人们对他所处的环境感觉好一些，还是真正地降低环境危害？这里需要保持一个精妙的平衡，但更广地传播知识至少可以使公众更有效地参与政策的制定。

五、结论

我现在做一下总结。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提供一套规则来创造一个活跃

的私人部门并促进经济的增长。回顾会发现，该共识的政策建议高度风险厌恶——它们都是为了避免最糟糕情况的出现。虽然华盛顿共识提出了一些机能良好的市场所具备的基本要素，但是不完全，有时甚至具有误导性。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项目是这场讨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证明了东亚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或私有化。我已经在其他文章中详细地讨论过了“东亚奇迹的启发”（Stiglitz，1996），但我的主要观点已经贯穿了今天的整个发言。没有一个强健的金融体系——政府在创造和保持这样一个市场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会很难动员储蓄或有效地分配资金。

除非经济是竞争性的，否则自由贸易和私有化所带来的收益会在“寻租”活动中消散掉，而不是用于财富的创造。而如果对人力资本和技术转移的公共投资不足，市场是不能够填补这一空白的。许多这样的思想以及更多我没有时间讨论的思想都是我所看见的正在兴起的共识，后华盛顿共识的基础。这些兴起的思想，其原则之一是不管该新共识是什么，它都不是基于华盛顿共识。为了使政策可持续，必须要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监控通货膨胀率和经常账户平衡并为其设置条件相对较容易。对金融部门管制或竞争政策使用相同的方法既不可行又得不到理想的结果。新共识的第二个原则是更大程度的谦虚，坦白地承认我们并没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如果想要更好地实现我们的诸多目标，就不仅仅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继续地研究和讨论很重要，全世界范围的研究和讨论也很关键。

21 世纪的发展议程*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中那些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降低贫困、支持政策改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不止一个而是同时好几个国家成功地摆脱了困扰它们几个世纪之久的贫困，这证明发展是可能的。在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由此引起的增长停滞看来已经被我们抛在身后，最近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工业国家。事实上，在1991—1995 年，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为 2.3%，而中低收入的国家增长率为 4.5%。尽管最近的东亚金融危机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但这些并没有使东亚国家的惊人成就黯然失色。韩国的人均收入在仅仅 30 年中增长了 10 倍。在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没有一个人的生活费用低于每天 1 美元，而印度尼西亚已经接近了这个目标。即便在非洲，很多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经历了负增长，现在也开始了增长。像乌干达这样连续几年进行改革的国家，实现了平均六个百分点的持续增长——尽管无法同中国相比，但比几年以前已经好得多了。

那些追求适宜政策的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点已十分明确。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济援助与适宜的政策结合起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对于最贫穷的国家更是如此。当然，这不仅对于接受援助国家是好消息，对那些提供建议并给予援助的国家同样如此：它们可以改变现状。挑战在于理解哪些政策是合适的政策，怎样使援助更有效地促进增长并减少贫困。显然不存在魔力——如果有的话，经济成功的数量会远多于目前已有的成功。过去所强调的信息已经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发生改变的事实——以及许多成功的国家并没有遵循发展共同体（development community）所开出的药方——说明当考虑未来的方向时，至少应该保持一点谦逊。

一、改变的观点

这个时代之所以激动人心，还因为世界变革的快速步伐和与之相伴的观

---

* "An Agenda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7, J. E. Stiglitz and B. Pleskovic (eds.), World Bank, 1998, pp. 17 – 31.

念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使修改发展战略成为必要，即便过去存在一个一直很成功的发展战略。在过去的 10 年中，有三个变化特别影响了人们对于有效发展战略的思考。

1. 社会主义经济的教训

这个事件给我们上了重要一课。将近一百年来，有两种理论相互竞争以吸引那些努力摆脱贫困的人们的心智。社会主义经济的教训看来证明了第二个模型并不可行。但是另外一个结论——市场本身可以提供经济发展的答案——也没有为经济理论或历史经验所证实。正如我在《社会主义何处去》（*Whither Socialism*）的书中所提出的，如果市场产生（帕累托）最优结果的假设满足，市场社会主义就会成功——或者至少不会导致现实中那样的教训。历史经验也并不支持市场本身就会导致发展的观点：几乎所有的经济成功——东亚、美国、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存在广泛的政府参与（government involvement）。在可以比较的发展阶段，亚洲四小龙的政府活动和美国的政府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很少有不存在政府参与的经济成功。

2. 东亚经济的成功

东亚的经验对人们的思想具有深刻影响，它告诉世人发展是可能的，成功的发展要求（或者至少促使）政府执行适宜的政策，而不仅仅是不妨碍市场运行。虽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应该向东亚学习哪些方面，以及东亚经验是否可以在其他地区复制；但是对于政府在东亚发展中起到的关键的催化作用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东亚的成功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这些经济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成为一个增长引擎。比如，美国对东亚的商品出口在 1990—1996 年增加了一倍多，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美国这个时期 GDP 增长的大约六分之一。尽管按人均 GDP 计算，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一股需要认真对待的经济力量。

3.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这一发展部分归功于最近几十年来交通和通信成本的大幅下降。全球化增加了贸易和资本的流动，那些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受益于此。1990 年以来，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增长超过了六倍。东亚的成功是由出口驱动的：生产不受国内经济规模的限制，出口过程的竞争提高了水平，增加了效率，并且出口有助于转移高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工厂可以与美国和欧洲的市场紧密联

系，从而偏好和需求改变可以迅速被传递到生产方面。印度的计算机程序员可以与加利福尼亚硅谷的程序员建立联系。距离缩小了，地理的分割被减少了。这些趋势只是刚刚开始，它们给所有的国家带来了许多新的机会和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带来了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知识和资源差距的希望，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可能比自身前进的速度更快。

全球经济的这些变化必定将指导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战略。

二、变化的目标

另一组变化——发展目标的变化——在影响我们对发展战略的思考同样重要。过去，发展常常被看作只是增加 GDP。如今，发展包含了一组更广泛的目标，包括民主发展、平等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

人们已经认识到生活水平不能完全由 GDP 核算来衡量。教育和健康的改善不仅仅是增加产出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目的。增长本身并不保证其成果被公平地分享。人们还认识到经济不安全对个人和社会都会带来成本。最后，环境不再能被视为给定的外生因素——在增加 GDP 的奋斗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空气污染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法生存。并且，现在已经清楚不可替代性阔叶林的减少虽然增加了测算出的 GDP 数值，但这种增加却是不可持续的。

50 年以前，人们的智慧体现在对快速增长和民主之间的权衡——俄国的增长很快，但却是以失去基本的自由为代价。回头看来，很明显生活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的人们不仅放弃了自由，也牺牲了经济增长。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政治制度下，数以百万计的人忍饥挨饿，直至饿死，而没有公众出于义愤去动员各方努力拯救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将民主发展本身作为一种目标的好处。

这种扩展的目标集合带来了大不相同的发展战略：例如，民主发展导致更加强调政治参与以及政治制度和教育的发展。

像往常一样，我们必须坚持如下观点：虽然增加 GDP 本身不是目标，或者并非唯一目标，但是增加 GDP 对于达到其他目标至关重要。提高一国的教育水平和改善健康状况需要资源，而资源是稀缺的。虽然有些国家没有将其资源用于这些更广泛的发展目标，但这不应与资源增加扩展一个国家机会集合的事实相混淆。

同样，虽然更高程度的政治参与对于民主发展至关重要，但对于实现民

主发展的行动必须不断进行仔细审查。比如，那些可以发表观点的人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在投票出席率很低时，即便是对于民主选举的领导者也会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极端小组更可能表达观点。在某些国家，初选程序的结构产生的离心力看来已抵消了霍太林（Hotelling）所强调过的向心力。这也和选举过程中金钱的影响有关。但是，按照简单的“一人一票”规则的选举程序仍然提供了最系统的保证代表性的方法。

在某些情形下，参与可以改善其他结果（例如，产生的学习的数量）。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对结果的影响更加不确定。一些研究发现，科学家感知到的环境风险对健康影响的排序和非科学家的排序之间没有相关性。那些想保证资金用于改善环境以降低总体健康风险的决策者当然希望更多依靠科学家的明智判断而不是普通参与者的观点——同时也明白更多地用实际健康风险的科学证据教育人们的重要性。

三、对过去的回顾

考虑到世界的变化，我们观念的变化，以及对发展目标的看法的变化，就不会奇怪过去半个世纪中发展战略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发展计划非常流行，而发展经济学不过是一种机械练习。一个国家有一定数量的资源需要进行有效分配。发展战略包括增加这些资源——特别是，增加物质资本的数量——并保证通过发展计划将这些资源最优配置，使各种投资协调进行。这需要政府。因为市场发展得不够充分，无法提供资源配置的信号，或者无法执行它们应该执行的协调功能。即便在这些模型中引入人的行为，也是以一种机械的方法。储蓄率是固定的，工人的储蓄率低于资本家的储蓄率。为增加储蓄率则要求将收入分配从工人向资本家转移。

然而在这一时期，另一流派的思想认为政府本身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经济发展需要有更多的个人积极性和企业家精神，而政府抑制了这种个人积极性。在学术文献中，农民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的数据强化了这种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同发达国家的城市居民一样理性。由此很容易得出结论，政府应该做的只是放手不管，进行贸易自由化，并且消除价格扭曲。发展会随之而来。

这种过于简单的建议忽视了发展计划文献产生的背景：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商品市场，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市场会自行发展。市场不完美——这种不完美意味着市场本身提供的资源配置不会是帕累托有效的——在工业国家中非常常见，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则更加普遍。不仅更多的市场不存在，而且竞

争更受限制，信息更不完美。

这里有一种奇怪的不调和：经济实践者在宣讲自由市场的福音，而经济理论家却开始意识到自由市场存在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的理论成果严格证明了亚当·斯密的见解——看不见的手指导市场达到有效配置——成立的条件。而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主要理论成果是证明了当信息不完美，市场不完全——本质上总是这样——市场甚至不是受约束的帕累托最优。换句话说，考虑到获取信息和建立市场的成本，原则上存在一些可以使某些个人福利提高而不使任何人福利下降的干预手段。

当然，另一流派的思想强调的不是市场不完美，而是政府不完美。他们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至少认为最好忽视市场不完美，而不是试图改进政府的行为（performance），或者利用不完美的政府去纠正市场的不完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将注意力转向宏观经济学：如果政府不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国家就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政府需要量入为出，限制货币供给的增长。

许多政府开始遵循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它们进行贸易自由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消除价格扭曲——然而这并没有带来想像中那样的迅速猛烈的增长。相反，东亚政府采取了一种更不教条主义的方法：尽管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它们仍对市场进行了广泛的干预。它们帮助创造市场并调控市场，还利用市场来实现发展目标。这些国家也经历了最快速的增长。自从在 1997 年 5 月的地中海发展论坛上提交这篇论文以来，许多东亚国家经历了严重的金融混乱。在我看来，这远远不是对东亚奇迹的否定，这种混乱的部分原因是在这些国家脱离了曾经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包括管制良好的金融市场。部分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不能迅速适应改变了的环境，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反应迟钝。

四、新的观点

新的议程从这些经验中汲取智慧，并相应对前面提到过的经济环境变化和目标集的扩展做出改变。新议程认为政府和市场是互补的，而不是可替代的。它既不信奉市场本身即可保证理想的结果，也不将市场缺失（或一些相关的市场失灵）要求政府承担责任作为一种教条。它甚至不问一项活动应该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进行。相反，在某些情形下，新的议程将政府看作帮助创造市场——就像许多东亚政府在金融市场的关键方面所做的那样。新的议程在其他领域（比如教育），将政府与私人部门看作合作伙伴，

每一方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另外一些部门（比如银行业）则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基本的管制，没有这些管制，市场将无法运行。

在这些背后存在一种政府的特殊责任：创造市场所要求的制度基础设施以使市场有效运行。这种制度基础设施至少包括有效的法律和实施它们的法律机构。如果市场要有效运转，必须要有良好的定义清晰的产权；必须存在有效的竞争，这需要执行反托拉斯法；并且必须对市场有信心，这意味着合约必须是可强制执行的，反欺诈法是有效的，并反映社会中广泛接受的行为法则。利用法律保证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例如，限制证券市场上的内部人交易）不仅仅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没有这些法律，投资者将不愿意将资金投放在证券市场上，以免被欺骗。

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还有其他一些方面。

保证银行体制健全的金融管制不仅仅增强了存款者对银行体系的信心，而且动员资本，还保证了投资的有效配置（对于过度风险承担带来的危险和银行资本不足时的掠夺行为（looting），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银行危机以后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政府对教育的支持保证了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人的供给。

政府提供基础设施，或者提供管制，保证私人所有基础设施以合理价格提供。

政府通常在开发和传播技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借助于农业扩展服务（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s）。

政府可以帮助促进平等，减少贫困，东亚的政策有利于整体的增长。

在以上每一个领域，都可以在市场失灵理论中找到政府行动的理论基础。例如，知识（特别是知识的生产）是一种公共物品，像其他公共物品一样，会存在供给不足。但是在这些领域，政府行动的理由也可以在历史记录中找到：在那些政府很好地执行这些功能的国家，其经济表现也更好。

政府的确切职能随时间会发生变化。过去认为电信和电力是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是不可行的。政府或者应该密切管制这些产业，或者自己负责生产。如今，部分由于技术的变化，部分由于观念的变化，人们认识到如果存在适当的管制结构，竞争在大多数部门中是可行的。人们需要的不是解除管制——不是天真地将管制去除，而是重新设计管制，也就是，改变管制的结构，当竞争可行时促进竞争，当竞争不可行时，则保证垄断权不被糟糕地使用。

五、改进政府职能

一旦认识到政府在发展战略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下一步就是决定如何改进政府的职能。关于市场和市场失灵人们了解很多，但是对于政府和政府失灵则了解得少得多。然而，我们至少知道以下这些情况。

如果利用市场和类似市场的机制，政府可以变得更有效率。在购置或者处置政府资产时，利用拍卖可以增加透明度（从而增加对政府的信任），改进资源配置，并且改善政府的预算状况。政府管制并不针对特定的交易或行为，而是用来建立激励，以使得私人企业以合理方式行事——例如，保证银行有足够的净现值。同样，政府可以要求商业企业购买火灾保险，让保险公司保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例如安装喷水消防系统），同时也保证保险公司有适当的激励。

受到较少诱惑的政府屈服于诱惑的可能性更小。相机行动，例如配额权的分配，给腐败提供了可能。腐败对经济增长有副作用（部分通过提高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从而阻碍了投资），并且破坏了对政府的信心。因此，使用透明的、类似市场的机制具有双重优势。

政府应该不断重新检查它们所实行的管制的合理性。历史进程通常使得管制不再适应今天的情形：管制的目标可以用更为低廉的成本达到。例如，在度量烟囱排放所造成污染的工具产生以前，要求生产技术满足一定的环境标准可能是合适的。但是一旦具备可靠的监测工具，管制应该集中在产出方面（这里指污染排放水平），而不是投入方面（技术标准）。

政府机构的质量依赖于其工作人员的组成和素质。这些转而又部分依赖于内部的招聘、培训和提升机制，并且像任何企业一样，这部分依赖于工资，而低工资以及报酬和结果之间的不匹配会减少产出并导致低绩效。

政府可以鼓励竞争和利用竞争：政府可以创造相互竞争的公共代理机构，可以允许私人代理机构与公共代理机构竞争。市场经济的成功是基于深层制度提供的激励之上的，而这些又是基于私人产权和竞争之上。尽管对于私人产权和竞争的相对重要性存在不断的争论，在许多背景下看来竞争是更加根本的因素（有些人将中国的成功看作这个命题的一个见证。更狭义地，对面临竞争的国营企业的研究表明它们像私有企业一样有效运行。在大型组织内部，不管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委托—代理问题都存在；提供个人激励的问题在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之间差别并不大）。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报告的一个中心主题是竞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出口的竞争）。

六、改革的顺序

由以上讨论得出的直接结论是激励很重要：激励在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中都很重要，政府应更广泛地运用激励指导其行为，还应该采取行动以改进私有部门中的激励（对银行部门的各种约束是采取行动改进银行激励的例子）。

通过对改革的顺序进行安排，政府不仅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的绩效，还能影响持续改革的动力。例如，考虑在一个大的封闭经济中，在贸易自由化和有效竞争法实行之前进行私有化会有什么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私有化将使政府垄断转化为私人垄断。消费者（或者使用私有企业的产出作为投入的企业）可能会得不到任何收益（真实价格实际上可能增加），总体的经济绩效可能不会改善（在私有企业内部增加的效率被更高价格引起的效率损失所抵消），并且可能创造出既得利益，使其存在激励并拥有资源反对实施有效竞争法的努力。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管制机构，但它可能被那些它本应管制的对象所俘虏而达成妥协。

或者考虑在有效的管制法实施以前，对一项公用事业私有化会有什么结果。对于未来管制机构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政府从出售资产中应得的收益少于应得收益。也存在一种可能性，使用者（包括消费者和企业）会面对更高的价格，并且会形成既得利益，使其存在激励并拥有资源以抗拒有效的管制改革。此外，如果缺乏有效的管制机构，产业私有化以前所追求的其他公共目标——比如普遍服务——可能被抛弃。高利润，低售价，以及减少的服务都将削弱公众对继续进行改革的支持。

可以建立一个管制机构以保证私有化带来的某些效率改善被消费者和其他使用者所分享，并且改进其他社会目标（例如普遍服务）。在原则上私有化可以增加经济效率并达到其他社会目标；而在实践中，在缺乏有效的管制机构时，私有化不会达到以上任何目标。这两个命题不应该混淆。

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都没有给出清晰的指导。（即便在私有化的情况下，主要的理论命题——私有化基本定理——也说明私有化保证福利提高的条件限制性是如何之强。）理论可以预测在某些理想情况下，市场经济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不可避免的次优环境，其中为纯理论基础的理想情形并不满足，理论没有给出清晰的指导。对于改革次序的理论指导更加不清晰：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做出这些决策，必须依靠经验和判断，以及对跨国经验进行仔细思考的指导。

七、高收入国家的角色

我们大部分的讨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要成功进行经济增长需要做什么。但是对此高收入国家也有很多事可以做。

私人资本向中低收入国家流动的巨幅增加对于那些创造了有利投资环境的国家来说，受益匪浅。但是这种流动的数量之大不应该掩盖它们过于集中的事实：占发展中国家 GDP 总值一半的十个国家得到了 75% 的资金，只有少数几个低收入国家得到了相对其经济规模效果显著的资金。此外，这些私人资本流动没有进入经济的所有部门——例如，健康和教育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公共部门。

这就是为什么官方发展援助的下降如此令人烦恼的原因。1996 年，官方援助以占高收入国家 GDP 的百分比度量，几乎达到了 50 年来的最低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削减恰恰发生在有更多证据表明这种援助有效的时候。

如果实行适宜的经济政策发展援助将增进经济增长，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中更是如此。的确，援助不能买来改革，并且对于那些能够自力更生（help themselves）的国家，发展援助效果最好。但是作为本地能动性（local initiative）的一种补充，援助能够增加改革的正效应，并且通过帮助建立政治推动力，使改革可以支撑下去。更重要的是，援助是知识转移的有效工具，并且如下面所指出的，即便是在最贫困的国家，经过适当组织（well - deployed）的知识传播也可以大大增进其发展前景。

某些最不愿提供援助（least forthcoming with aid）的高收入国家强调贸易的重要性。但是这里在华丽的文辞和现实之间同样存在差距。例如，虽然鼓吹市场经济的优点，西方生产商却谴责以国际价格销售过剩铝的俄罗斯企业倾销，并鼓励政府实行贸易限制。作为另一种选择，他们提议建立一个国际同业联盟限制全球的产量并提高价格——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发达的经济怎能一方面宣讲竞争和自由市场的福音，而当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又转向管理贸易和市场限制？有许多其他的例子，但关键一点是清楚的：发达国家应该是行为榜样。它们更能够吸收贸易模式改变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冲击。为什么它们可以轻易接受“政治压力”作为它们偏离开放政策的理由，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同样理由却难以接受？

八、在发展议程中世界银行的作用

有些分析者认为私人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巨幅流动使得世界银行变得不必要。显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一般来说，世界银行和各开发银行的理论基础可以被总结如下。

私人资本流动是有目标性的。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得到很少的资本，并且这些资本中很少进入关键性部门，比如健康和教育，而这些部门与私人资本流动是互补的。

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吸引资本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设施方面（法规和法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基础设施是一种公共物品；因此不能期望私人资本为它的建立提供足够的援助。此外，在相互竞争的私人机构总在寻找对它们有利的规则和规定的世界中，世界银行可以作为一个诚实的中介。

尽管私人资本流动在形式上比以前更加多变——现在有了实质性的股权流动——但是仍然存在重大的空白。

在收集信息和提炼关于成功发展的实践和政策的知识方面，世界银行有明显的优势。知识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如果留给市场本身，则会出现供给不足。

在某些情况下，世界银行和其他某些多边开发银行会发出信号，证明某个发展中国家实行了稳健的政策，从而提高它的信誉，这会给未来继续保持这些政策提供额外的激励。

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不仅在提炼使发展中国家更加有效地增长的知识方面负有特殊责任，而且也有特殊责任来保证这种知识转化为适当的行动——包括他们的贷款做法。前面引用过一项研究表明当存在适宜的经济政策时援助的有效性。这项研究的另外一面是：当不存在适宜的经济政策时，援助可能对经济增长没有效果。这项发现形成了一个道德困境：如果一项贷款没有增加经济体系中的资源，除非它明确是为了实现其他社会目标，否则会使后代更加贫困，因为后代继承了债务。即使实现了其他一些社会目标，也应该考虑进行这种权衡。

资金的可替代性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就资金可替代而言，问题不是所资助的项目的质量，而是额外的资本流动会带来什么结果。关于可替代性程度的证据（或者在哪些情况下资金更加可替代）仍然有些模糊不清。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除了交通和通信部门，援助资金一般是可替代的，外

部融资显著替代（而不是补充）国内支出。但是，生活在没有适宜的经济政策的最穷国家的人们不可以被忽视。他们需要通过提供建议和技术援助来建立适宜的政策。另外，要在某些特定领域（比如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一旦采纳了适宜的经济政策，这些投资就可以支持增长。当发现政府缺乏能力时，就必须找到有效的支付援助的途径。

九、结论

在这一讨论中勾画出的21世纪的发展议程比过去包括了更广泛的目标。这个发展议程包括国家的角色转变——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包括政府在帮助建立市场方面的催化作用。包括在某些领域政府更长期地管制市场。这个议程还要求政府改进自己的行为，这部分地可以通过广泛利用类似市场的机制实现——通过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利用和创造竞争。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家来说，新的议程要求实行两类国家都经常抵制的那种开放。相互间的收益是很明显的：发展中国家会继续成为工业国家的增长引擎，以更低价格为其消费者提供更多类型的产品，并为其投资者提供更高的回报。对于发展中国家，资源和知识的转移会使增长得以继续。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这个议程中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什么，如何最好地发挥这种作用，必须经受一个持续不断的重新检验的过程。

在此议程中不存在教条或教条主义方法的位置。对于基本经济改革的一般共识——使通货膨胀保持在中等水平，限制财政赤字的规模，避免在经济中引入大的扭曲，对外部竞争开放经济——进行集中探讨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并且对一些国家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共识有变成教条的危险，并且作为教条，有时候可能被不适当地应用。

这一共识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它的简单性。但是未来10年的政策议程并不会严格遵从这种像饼干切割机一样简单的共识。管制体制和法律以及其他制度结构应该更好地适应于每个国家的特定环境。在很多情况下，改革在技术细节上比这种共识所表明的要复杂得多。例如，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设计促进电力和通信行业竞争的管制极其困难。

有必要从理论和历史中学习，从更好的实践中学习，从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中学习。但是得出正确结论时必须小心。

如今的世界与30年，20年，或者甚至10年以前的世界都不同。私人资本流动在如今比过去更加重要；这提供了新的机会——也提出了新的挑

战。某些东亚经济相对较少利用外资的事实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更广泛利用这些资本流动的问题并没有很大相关。

• 某些最成功的经济并没有遵循这里提出的所有关键建议。中国的经济增长占了所有低收入国家 GDP 增长的很大一部分。中国集中于创造新的企业并促进竞争而不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如果中国采用另外的战略，这些成功的企业会增长得更快吗？大多数观察者持怀疑态度。在 1997 年金融危机时，韩国由于经济制度失败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然而无论如何这个制度使其人均国民收入在 30 年内增加了十倍，这种记录是那些遵循当今提出的任何建议的大国所无法与之相比的。

• 在一组环境中成功的政策在另外的环境中可能并不适用。从而需要进行分析以找出那些决定政策成功的因素，并且进行反事实的理想试验（缺乏某种计划或者政策时会发生什么）。关于最佳实践的例子可能提供有用和有说服力的奇闻轶事，但它们无法替代分析。

• 要注意不应该将手段与目标相混淆。宏观经济稳定，削减赤字，甚至企业改革，本身都不是目标，而是上面所描述的更广泛的发展目标的手段。如果政府通过削减对基础设施或人力资本的关键投资来减少赤字，增长实际上会受损。如果政府为了削减赤字而减少食物补贴，将导致骚乱，损害了国家的政治稳定，这有可能使国家对外国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吗？

• 目的也不应该与手段混淆：改善教育和健康是增加 GDP 的基本手段，但是它们本身也是目的。

• 扩展的目标集合是新发展议程的关键方面。但是尽管人们认识到存在更广泛的一组目标，这并没有放松资源有限所导致的约束。用我的一位同事的话说，这些问题必须用温柔的心和坚强的头脑来解决。其中存在一种困难的权衡：有可能在今天更多的减少贫困，然而其代价是更少的资源——从而导致未来有更多的贫困。

• 东亚经验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平等，并减轻贫困。寻找这种政策——并且实施这种政策——必将处于未来发展议程的中心位置。

• 如果真正相信民主发展，必须认识到技术顾问作用的局限性。他们可以对不同政策的结果提供判断。但是新发展战略的根本部分包括创造制度和改变文化——进入一种变革和科学的文化，并在变化中对现存的实践加以质疑，不断地探索另外的选择（当然，这些文化变革是半个世纪以前发展文献广泛讨论过的主题）。决定如何最好促成这些变化要求许多本土知识

(local knowledge)，但人们并不清楚发展顾问是否具备这种本土知识，或相应的专门技术。民主选举的政府应当对经济权衡和政治结果做出最终判断。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顾问，也适用于发达国家的顾问。尽管如此，需要强调的很重要一点是，许多领域具有技术性专业知识高度相关的特征。例如，建立有效银行管制的某些基本原理适用于所有国家。

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发展不仅仅是物质资本的积累，甚至不仅仅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它包括减少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知识差距，还包括其他转变，比如导致人口低增长率和经济结构变化的转变。

未来的 10 年发展中国家必定会经历快速经济增长，贫困将大幅减少——我对此充满信心。这是一个奋斗历程，其中存在很大的挑战，但是也有很多机会。

对那些为政府提供建议者的挑战是要在国家的角色和私人部门的角色之间，在那种教条主义观点（这是过去许多政策建议的特征）和不可知论（它们对那些努力做出影响成千上万人生活的艰难选择的国家很少给出指导）之间实现一种很难找到的平衡。

参考文献

Arnott, Richard, Bruce Greenwald,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94.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6(1): 77–88.
Burnside, Craig, and David Dollar. 1997. "Aid, Policies, and Grow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777.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Daves, D.W., and L.R. Christensen. 1980.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Public and Private Firms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Canadian Railroad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8 (4): 958–76.
Drêze, Jean, Amartya Sen, and Athar Hussain, eds.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eyzioglu, Tarhan, Vinaya Swaroop, and Min Zhu. 1997. "Foreign Aid's Impact on Public Spending."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610.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 Public Economic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Greenwald, Bruce,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86.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e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 (3): 229–64.
——. 1988. "Pareto Inefficiency of Market Economies: Search and Efficiency Wage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8: 351–55.
Hellman, Thomas, Kevin Murdock, and Joseph Stiglitz. 1997. "Financial Restraint: Towards a New Paradigm."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Research Paper, Stanford, California.
Pack, H., and J.R. Pack. 1990. "Is Foreign Aid Fungible? The Case of Indonesia." *Economic Journal* 100 (March): 188–94.

——. 1993. "Foreign Aid and the Question of Fungibil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5 (May): 258–65.

Sappington, David,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87. "Privatization, Information, and Incentive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6: 567–82.

Slovic, Paul, Mark Layman, and James H. Flynn. 1993. *Perceived Risk, Trust, and Nuclear Waste: Lessons from Yucca Mountai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tiglitz, Joseph E. 1990.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In Thomas P. Hardiman and Michael Mulreany, eds.,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Dubli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1994. *Whither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96. "Some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1 (2): 151–78.

Stiglitz, Joseph E., and Marilou Uy. 1996. "Financial Markets, Public Policy, and the East Asian Miracle."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1 (2): 249–76.

Stiglitz, Joseph E. 1997. "An Agenda for Developmen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Pleskovic, Boris,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7.*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Taylor, Lance. 1979. *Macro Model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McGraw-Hill.

USEPA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1987. *Unfinished Business: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A Policy Research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 *Adjustment in Africa: Reforms, Results, and the Road Ahead.* A Policy Research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a.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1997.* Washington, D.C.

——. 1997b.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 1997c.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迈向新的发展模式：战略、政策与过程*

1998 年年初，我在赫尔辛基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WIDER）的一次演讲中提出，[1] 我们需要超越华盛顿共识：[2] 在华盛顿共识之外，还有更为广泛的发展目标；华盛顿共识给出的政策建议显然并非发展的充分条件。事实上，一些获得发展的最成功国家反而是最少遵照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华盛顿共识经常把手段和目标混淆了：它把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本身作为终极目标，而不是把他们作为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公平的和民主的增长的手段。我在演讲中指出了华盛顿共识走入歧途的很多方面。它过于关注价格稳定，而非增长和产出稳定；它没有认识到对经济稳定而言强化金融制度与控制财政赤字和增加货币供给同样重要；它强调私有化，但很少注意市场运行所需的制度基础，尤其很少注意竞争的重要性。

现实已经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在今天的演讲中，我想超越这些失败的共识，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尤其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提供理论基础。我的理论基础以一个广泛的发展概念为基础，并伴之更为广泛的发展战略视野，以及对国际援助作用和国际援助的提供方式完全不同的看法。后面的演讲由五部分组成。第一，我将描述一个更为广泛的视角。第二，我将解释为什么华盛顿共识和较早的发展模式会失败：它们都把发展理解得太过狭隘。我将简要概述一些关键因素，包括东亚和俄罗斯最近发生的事件，帮助我们认识旧方法的不足之处。第三，我将以更广泛的发展视野为基础，概括出我所谓的发展战略的关键原则。第四，我将概括出这

---

*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9th Raul Prebisch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October 19, 1998, UNCTAD pp. 1 -46.

1 Stiglitz (1998a).

2 在这个演讲中，我所理解的华盛顿共识概念与我的同事 John Williamson (1990) 最初概括的有所区别，是 Williamson 创造了这个术语。Williamson (1997) 自己也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共识已经演化为表示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处方，而不是他最初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拉丁美洲进行改革时使用的更具描述性的用语。正如我在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WIDER）演讲中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下的政策取向常常是错误的，它们并非取得实质性发展的充要条件。

些新的发展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五，我将以一些一般性的观察作为总结，这些观察集中在贸易的重要性以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新的发展模式为基础对促进发展所做的工作上。

一、作为社会转型的发展

发展代表一种社会的转型，从传统的关系、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的对待健康和教育的方式、传统的生产方式转变为更“现代”的方式。例如，传统社会的一个特征是认为世界生来如此；现代观点承认变化，认识到作为个人和社会，我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例如减少婴儿死亡率、延长寿命、提高生产率。这些变化的关键是转向“科学”的思维方式，识别出影响结果的关键变量，依靠可获得的数据进行推断，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东西。

所有的社会都是一个混合体。即使在更为“先进”的社会，也仍然存在与传统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部门和地区，以及与传统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人。但是，在更为先进的社会，这些只占相对较小的部分，而在较不发达的社会，这些就占统治地位。事实上，许多欠发达国家的一个特征是较先进的部门没能广泛地渗透到社会之中，产生很多人所谓的“二元”经济，在这里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可能与非常原始的技术共存。

转型本身不是终极目标，但是转型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转型使个人和社会能更多地控制自己的命运。发展通过拓宽人们的视野和减轻其孤立感，从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发展减少了疾病和贫困带来的痛苦，不仅延长了寿命，也提高了生命的活力。

给定发展的这一定义，显然发展战略必须定位在促进社会转型、明确转型的阻力和潜在的有利因素。这些要点概括了新发展战略的部分内容。从转型社会的视角看待发展不仅对政府和援助机构的行为有深刻的含义，而且对它们如何去做，例如如何参与和合作也有深刻的含义。因此，本篇文章为我们重新思考如何最好地促进发展提供了分析框架，过去几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二、对新发展战略的需要

过去50年的经验表明：发展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尽管少数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缩小了它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且使数百万的公民脱离了贫困，但是更多国家实际上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贫困

问题更加严重。即使以每天1美元的最低标准衡量，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数也有13亿人。[3] 即使他们已经严格遵循过去的战略，也不能保证获得成功。而且，很多最成功的国家（代表低收入国家里实现增长的最大一部分）实际上并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推荐”的战略，而是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1. 什么发展不对：对过去理念的批评

很多旧的发展战略都只注意到了转型的一些细节，但是因为没有看到更为广泛的内容而失败了，并且经常败得很惨。大多数发展战略都狭隘地集中在了经济因素上。经济因素是重要的，毕竟，区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一个特征是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人均GDP。但关注经济因素不仅混淆了手段和目标，而且混淆了原因和结果。之所以混淆了目标和手段是因为更高的GDP本身不是目标，只是改善生活水平和实现更美好社会的一个手段，更美好的社会应该伴随较少的贫困、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高的教育程度。与库兹涅茨（Kuznets）的观点相反，总的来说，人均GDP的提高应该伴随贫困的减少。[4] 之所以混淆了原因和结果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现代化的社会变迁既是GDP增长的原因，也是GDP增长的结果。

在40多年的时间里，发展被看作（至少是那些“主流”人士）主要是经济问题——增加资本存量（或者通过国外转移或者通过国内更高的储蓄率），改善资源配置。这些变化将会带来更高收入，并且希望获得更高的可持续增长。[5] 除了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的无效率（反过来，这与更大的市场缺失或失灵概率有关）之外，其他方面欠发达国家被描绘成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左派经济学家和右派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如何最好地改善资源配置以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左派经济学家把这些根本性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通过计划模式推进发展的理念，就是让政府利

3 尽管处于绝对贫困（生活在每天1美元水平以下）的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从1987年估计的30.1%下降到了1993年的29.4%，但贫困人口的总人数却从12.3亿人上升到了13.1亿人（World Bank，1996）。一些最贫困国家的人口激增使得反贫困斗争愈加艰难。

4 例如，Deininger and Squire（1996）发现，在88个长达10年的增长时段中，有77个都伴随有贫困的下降。尽管从今天的有利条件看，这一结果似乎并不令人惊讶，但它看起来与库兹涅茨曲线的传统看法有矛盾。库兹涅茨认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会与不平等的增加联系在一起。事实上，Deininger和Squire发现在经济增长期间不平等下降的概率与上升的概率是一样的。不过，库兹涅茨缺乏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广泛的跨国数据，他的结论只是基于几个国家的数据。

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撑这种发展观念的增长理论文献却强调高储蓄率只能暂时性带来高增长率。

用这些计划模式来代替缺失的或不完美的市场，从而引导经济体内更有效的资源配置。相反，右派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是问题的根源：一旦政府不再干预经济，市场本身就能导致有效的资源配置。因此，双方都把发展问题视为改善资源配置的问题，他们只是在改善资源配置上采取不同的战略。一方追求的是用政府来补充市场，而另一方追求的是降低政府的作用，政府本身被看作是发展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政府为自己要求了一个根本不合适的角色。总体来说，政府让自己扮演了过多的角色。政府不仅没有能力承担资源配置的主要角色，而且政治过程的激励使得政府不管有什么样的能力通常都不会用于增加国民生产，而是用于把租金转移给有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从这个角度看，解决办法只能依靠市场，尤其要消除与保护主义、政府补贴以及政府所有权有关的政府强加的扭曲现象。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宏观经济问题上，转移到“调整”财政失衡和误导性的货币政策上。如果宏观经济失衡，市场不可能运转，至少不可能很好地运转。

我们注意到这三种发展战略都把发展看成是技术问题，需要技术性的解决方法——更好的计划规则、更好的贸易方式和定价政策以及更好的宏观经济结构。三种发展战略都没有深入到社会中去，也不相信这样的参与方法是必要的。经济学的规律具有普遍性：需求和供给曲线以及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在非洲和亚洲与在欧洲和北美同样适用。这些科学规律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历史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视野狭隘之外，这些理念对历史背景也缺乏了解。它们没有认识到：（a）在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成功的发展结果包含了政府的积极作用；（b）在政府积极参与（或按照这些教条的说法，政府干预）之前的数十年中，很多社会没能得到发展，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是特例而非规律；（c）更糟糕的是，在更大程度的政府参与时期之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不仅是经济高度不稳定，而且存在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像老年人和低技能工人这些社会大群体，任何进步通常都与他们无关，他们在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中变得愈加贫穷。

事实上，这些狭隘理念忽略的一个难题就是表面上很发达的国家的某些地区也没能获得发展，比如意大利南部。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之间没有贸易壁垒，两个地区整体的宏观经济体制也一样；南部甚至还受益于专门用来鼓励发展的经济政策。但在北方发展起来的同时，南方却停滞了。这一现象本身就意味着对发展的理解要超出技术方法的认知；例如，尽管贸易自由化很

有价值，但是不能解决意大利南部的问题。

2. 对事件的定义

过去1/4世纪里发生的三大事件在帮助我们塑造发展战略的观点上起到了核心作用。

中央计划经济的教训和“冷战”的结束

第一个事件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教训和“冷战”的结束。在这一事件上，一些人注意到了一个教训——政府在经济中扮演太大角色导致的无效力(和危险)。从这一教训出发，一些人直接得出相反的结论：应该依赖市场。

证明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相等的经济模型从根本上说带有误导性，[6] 部分地是因为这些模型没有抓住制度（不只是抽象的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部分地也是因为它们没有抓住狭隘定义的经济与一般定义的社会之间的连接的重要性。[7]

“冷战”的结束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意识形态的争论应该结束了，大家应该一致同意尽管市场是经济核心，政府也必须发挥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取决于国家、政府能力以及市场制度建设。换言之，发展建议应该与各国国情相适应。

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

第二个事件是很多国家遵循了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教义，这些都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中心观点，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取得增长。技术性方法，即华盛顿共识开出的药方，明显是不够的。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奇怪，正如我过去注意到的，历史并不让人感到鼓舞。很多理论经济学谈到发展问题时强调了市场的局限性，而它们本应该既对历史上的“市场失灵”，也对最近俄罗斯和东亚的“市场失灵”提供深刻的洞见。

在很多方面，俄罗斯的问题与东亚的问题看起来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一会儿我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俄罗斯，我们看到一个转型经济体面临巨大的政府赤字和严重的政治问题。但是，两个地方也有一些共同之处，那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华盛顿共识都失败了，并且是因为相似的原因：没能理解市场经济的微妙之处，没能理解私人产权和“实现正确价格”（即自由化）

6 Stiglitz (1994).

7 传统视角欠缺的最明显例子就是前苏联过去10年的经历（将在下面讨论），尤其是与中国的成功相比，中国努力找到了非常符合自己国情的战略。衡量中国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战略设计：如果把中国各个省份都看作是独立的“数据”点，那么1978—1995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20个经济体都是中国的（World Bank，1997a）。

不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充分条件。任何经济体都需要一个制度基础。公平地讲，俄罗斯的“失败”要比东亚的失败显著得多，东亚在超过 1/4 世纪的时期内取得了显著增长、稳定和贫困的下降。东亚的银行缺少充分的监督，而俄罗斯的银行不仅缺少监督，甚至不能履行为新成长的企业提供资本这一核心功能。我们都知道经济学的标准理论强调，任何经济体既需要私有产权也需要竞争。华盛顿共识尽管有时在口头上关注后者，但强调的重点在前者，它认为在私有产权下，至少所有者有动力去提高效率。对分配和竞争的担忧——或者甚至对正在被财富过度集中所摧毁的民主过程的关心——可以在后面解决！因为努力扭转了公平和效率之间通常的得失权衡，俄罗斯成功地给自己套上了通行的经济法则。从无效率的中央计划到分散化的价格机制的改革，以及从无效率的国家所有到私人产权和利润激励的改革，本应该增加了产出，即便这是以不公平的略微增加为代价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俄罗斯的不公平程度迅速增加，同时又试图收缩经济，据估计产出规模下降了 1/3。生活水平随着 GDP 的下滑而急剧下降，人口寿命缩短了，健康状况也在恶化。人们终于认识到，没有正确的制度基础，利润动机加上资本市场的完全自由化不仅不能提供财富创造的激励，相反会刺激人们掠夺资产并把财富转移到国外。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东亚奇迹

第三个事件是东亚奇迹：东亚国家的快速增长证明了发展是可能的，并且也证明了成功的发展能够伴随贫困的减少、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甚至是民主化进程。但是对提倡技术方法的人来说，东亚国家的奇迹让他们深感困惑。这些国家并没有遵照标准的发展处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发挥了很大作用。它们遵循了一些标准的技术处方，例如（总体上）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没有采用其他处方。例如，与私有化相反，政府实际上新建了一些高产钢厂，更普遍的做法是利用产业政策推动特定部门的发展。政府对贸易进行干预，尽管更多的是促进出口，而不是限制特定进口。政府也管制金融市场，实施适度的金融约束，降低利率，增强银行和企业的盈利能力（与金融压抑相反，金融压抑会导致负实际利率）。政府采取的很多政策只是过去被忽视的领域；比如，包括极力强调教育和技术，缩小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鸿沟。[8] 尽管个别政策的影响还没有定论，这些政策在整体上显然起到了很好作用。或许如果这些国家遵循自由

8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是 19 世纪美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化和私有化的全部教义，很可能会实现更快的增长，但是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在某些情况下，比如金融约束，有一些事实以及相当多的理论表明了这些政策确实促进了增长。

但是，东亚最重要的经验是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这是任何到过这一地区的人们都已见证的事实。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转型远未完成：部分国家的一些部门仍然非常僵化，没有采取现代技术和商业模式。尽管东亚今天面临的危机提出了有关东亚奇迹的很多问题，但转型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这些国家在一些年份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它们的人均GDP在进入21世纪时将是半个世纪前的若干倍，并且也远远高于采取其他发展战略的国家的人均GDP。同样重要的是，东亚国家的贫困率尽管肯定高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也只是半个世纪前的很小比例。识字率仍将接近普及水平，健康标准仍将保持较高水平。认真解读东亚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什么战略导致了这些辉煌的成就——可以发现，这里反映的很多观点已经结合在了发展最快的国家发展战略里了。[9]

东亚危机

在这里，我不再深入解读危机的原因或严重程度，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广泛探讨了这些问题。[10]不过，可以从有关发展战略设计上学到危机的重要教训。过去一年中，这些教训并没有从世界上完全消失，即使在我看来有时它们变得有点糟糕。

为了说明关于发展的观点如何由于危机而发生变化，我们需要回溯到1997年。世界在短短一年中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一年多以前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扩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以包含资本市场自由化要求的问题出现过争论。对冲基金的批评者被看作是金融“勒德分子”（Luddites)，他们想扭转历史进程和不可避免的自由市场的统治。

现在，人们广泛认识到即使追求良好经济政策的国家也会受到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尽管与短期资本流动相联系的风险和市场失灵（包括与传染和系统失灵相联系的外部性[11]）现在变得非常明显，但收益并不清楚，尤其

---

9 见 World Bank (1993) 和 Stiglitz (1996)。

10 例如，见 Furman and Stiglitz (1998)；Stiglitz (1998b)；Stiglitz (1998c)。

11 对紧急救援机制的争论及紧急救援机制本身的出现为一个观点提供了压倒性的支持，即短期资本活动的私人和社会净回报之间存在显著差别。这种差别至少意味着需要反省政府行动来矫正市场失灵，因为它给无数人带来了巨大成本（尽管可以肯定，如果危机反应政策得到了较好设计，其中一些成本很可能会下降）。

具有高储蓄率的亚洲国家更是如此。[12]但东亚危机提出了华盛顿共识本身的问题：问题的来源只是早期政策处方中没有强调的内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识别这些新的潜在问题的来源的过程中，很多流行的讨论已经把注意力从另一组问题中转移了出来，这组问题与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有关，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是华盛顿共识的核心部分。

因此，尽管遭遇经济问题的东亚国家因为金融制度脆弱性而受到广泛惩罚，华盛顿共识也没有强调脆弱的金融制度也是宏观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同过多的政府赤字一样重要，最近的很多讨论忽略了金融市场自由化（经常基于外部压力而推进）在造成金融制度脆弱性中扮演的角色。[13]废除管制比创造金融市场运行必需的制度基础要容易很多。关于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管制困难的最近例子——即使在最发达国家——我们只需考虑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紧急救援，在公司崩溃之前，以美国为基础的大型对冲基金的风险头寸超过了1万亿美元。[14]

事实上，可以认为发达国家过度的风险贷款和金融部门监管不充分造成了危机。我们现在认识到每一个借款人都对应着一个贷款人，贷款人和借款人一样要受到谴责。因此，如果要谴责东亚的借款人，那么发达国家的贷款人同样也要受到谴责。在某种程度上，外国银行是边际贷款人，他们甚至要受到更多谴责：贷款给韩国企业，这些企业再利用贷款进行投机（或贷款给银行，这些银行再发放大量贷款给企业，企业再利用贷款进行投机），外国贷款人知道这些企业的债务—权益比率远远高于任何金融分析员所要求的谨慎水平。然而，那些被认为是管理良好，同时又是受到被认为是成熟的管制当局监督的银行，却放出了这些贷款。而且，这些贷款也不是出于政府的压力。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某些国家不良贷款只是产生于裙带资本主义，

12 见 Furman and Stiglitz（1998）提供的事实证据和理论讨论，他们解释了自由化不能带来高增长（例如，见 Rodrik，1998）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讶的原因。

13 Demirgüç－Kunt and Detragiache（1998）事实上证明了金融市场自由化和经济危机之间有系统的相关关系。

14 紧急援救引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对处理东亚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如果对冲基金的一个合伙人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个前副主席，那么紧急援救是否意味着裙带资本主义吗？监管者真的没有认识到危险的大小吗？如果真是这样，对于世界上最成熟的管制者的管理能力，这又意味着什么？这些管制者有着最长的管制传统，延续了几乎一个半世纪。如果不是这样，对于他们对金融市场的理解又意味着什么？或者政府的防御作用（传染的威胁）只是一种掩饰吗？尽管联邦基金宣称不介入，相机抉择的管制力量提供了暗含的威胁（在不合作的情况下，以更强的监督相威胁）和承诺（如果紧急援救成本很高的话，承诺节制管制）了吗？通过不向市场披露所有相关信息，所有的参与者故意试图限制透明度吗？

而在另一些国家则产生于市场过程的自然作用?[15]

东亚危机不仅引起人们对金融制度的强烈关注，而且引起人们对政治和经济生活更为广泛的关注。例如，缺乏透明度也被广泛地归结为导致危机的原因之一。但并没有经济计量上的证据支持这个结论[16]——当我们回忆起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些国家的三次主要危机时，这种怀疑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国家都处于世界上透明度最高的地区。但强调透明度是颇受欢迎的，因为提出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的重要性。透明度对决策参与的有效性是重要的。在我看来，对一个转型社会来说参与是成功的获得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三、新发展战略的原则

新发展战略把社会转型作为核心发展目标。人均 GDP 的增长无疑是成功的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家不采取更为广阔的发展视角，甚至这一目标也无法实现。如果获得成功，新发展战略不仅会提高人均 GDP，也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一点可以通过健康和识字率水平的提高得到证明。新发展战略有助于减少贫困——我们的目标是消灭贫困，比较成功的经济体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至少按绝对贫困标准来说确实如此）。新发展战略也是可持续的，能够改善环境。真正的社会转型将提高一些根本性政策的可持续概率，能够经得起伴随民主过程而时有发生的盛衰变化。

我们对新发展战略原则的讨论分为三部分：发展战略是什么，它们与计划有什么不同；如何才能促进全社会的变化；为什么参与和所有权如此重要。

1. 发展战略的概念

公司越来越认识到公司战略在引导它们思考和进行长期投资时的作用。发展战略需要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而不能被视为过去那种详细的规划模式和发展计划，过去的做法最初产生于中央计划机制的工作模式。尽管发展战略在某些方面不如旧有的计划文件详细，但在很多方面更富有进取性，因为

---

15 例如，没有证据表明由于政府压力导致了泰国过多的房地产贷款。

16 尤其是参见 Furman and Stiglitz（1998）。他们证明了东亚的透明度平均来说（至少根据标准的度量）不低于没有发生危机的其他国家：东亚发生危机的国家已经有 30 年的显著增长，但与危机前相比透明度是增加了而不是下降了。

它们提出了一个战略，不仅是为了资本积累和资源开发，也是为了社会转型。

发展战略需要阐明转型前景，从现在起未来10—20年后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这个前景可能包括一定的量化目标，例如贫困减半、普及初等教育。但是，这些只是转型过程中的要素或目标，而不是转型本身的前景。

转型前景需要包括对制度转型的看法，新的社会资本和新能力的创造，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取代传统制度，这些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日渐削弱。在某些情况下，新制度还会包含有旧制度的成分，这里有一个演化和适应的过程。某些转型可能非常困难，或者是衔接层面上的困难，或者是执行层面上的困难，比如传统上歧视妇女的社会如何才能达到较高的平等程度，同时又能保持传统的价值观？

发展战略有时与蓝图描绘联系在一起，蓝图就是描绘社会向何处去的地图。但是，这一比喻具有误导性，理解其中的原因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过去的计划和未来的发展战略之间的区别。发展过程使我们现在很难描绘出一幅蓝图或表明未来10年经济向何处去的路线图，更别说未来1/4世纪的情况了。这样做需要太多我们现在无法获取的信息和知识。过去，那些发展计划文件没能考虑到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重大的不确定性。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没有穷尽的可能性，尽管在原则上一项发展计划能够给出经济做出的反应，但实际上很少能够做到。

相反，发展战略是一份活的文件，它需要阐明发展战略如何产生、修正和被采用的以及参与过程，还需要阐明获得所有权和共识的手段，以及如何充实细节。

发展战略履行了诸多功能，因为它阐明了未来前景：

发展战略和优先次序。所有社会都受到资源约束，贫穷国家更是如此。除了一般的资源约束，还有政府能力约束，即政府能够解决的问题数量的限制。尽管有很多紧迫需要，但确定发展战略的优先次序是首要的。优先化的关键内容就是清楚先后顺序：什么任务必须在其他任务之前完成。例如，在私有化之前有必要建立竞争和管制框架；或者在资本市场或金融部门自由化之前有必要建立金融管制框架。

发展战略和协调。在传统经济理论中，价格履行了经济所需的所有协调功能，但这需要一系列完全的市场。显然，这一假设在不发达国家不能成立。知道经济往何处去就非常重要：例如，如果经济将进入发展的“下一”阶段，适当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制度建设都必须到位。如果缺少任何必

要的组成部分，成功的概率将会大大下降。不仅不同级别的政府内部和政府之间的不同机构需要协调，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以及私人部门的不同机构之间都需要协调。

无论在主旨上还是在细节上，发展战略提供的协调类型显然不同于指令性计划设想（实际上从未实现过）的协调类型。指令性计划把自己看作是对缺失市场的一种替代，试图为各种产业的投入产出决策提供详细的协调；而发展战略关注更加广阔的前景，包括引入新技术或进入新产业。

作为共识建立者的发展战略。建立发展战略的过程本身就发挥了有益作用，不仅在国家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在关键的短期目标和中期目标上达成共识，另外还在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些必要组成部分上达成共识。达成共识不只是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部分（避免了对社会资源的要求超过可获得的数量时产生的经济破坏[17]），而且也导致了对政策和制度的“所有权”，反过来提高了政策和制度成功的可能性。

2. *促进全社会转型：超越个别“飞地”和个体项目*

如果社会转型是发展核心，问题就演变为如何带来这些转型。发展战略的一个主要角色是作为催化剂，例如识别某个国家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领域。识别出这些领域，并且将信息公开，成为一项公共物品，这就是政府的责任。

转变整个社会。为了有效地发挥发展战略的催化剂作用，需要在发展战略中纳入鼓励全社会转型的富有进取性的目标。以前，我们经常注意到在发展上的努力成功地转变了技术，但在社会转型上却没有成功。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二元社会，这个社会中有一些较为先进的技术，但却少之又少。在某种意义上，二元社会（只有孤立的“飞地”发展起来了）反映了发展过程的失败。我们的目标是要弄清楚什么部分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些“飞地”没能成为发展的支柱，也就是说成为它们狭窄范围之外地区发展的催化剂。

许多发展项目也有同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较高的项目回报，一个项目可以说是“好”的。但是，该项目可能对发展没有影响。当然，高回报总比低回报好。但是，如果利益不能被社会广泛分享，不能认为这个项目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在某些情况下，发展影响的缺乏可能源于*项目的替代性*：一个国家想进

17　对恶性通货膨胀影响的分析，通常认为是由资源和目标之间的失衡引起的。见 Bruno and Easterly（1998）。

行一系列项目，一些项目的社会回报很高，而另外一些项目的社会回报很低或者甚至是负回报（有时他们主要是为了让统治精英富裕起来而设计的）。国家把好项目“卖”给援助捐赠者，从而把自己的资源从那些好项目中转移到社会回报低的其他项目中。弄清与项目相关的附加性问题（除非满足一定条件，否则不会发生的事情）通常是非常困难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知道边际贡献可能与乍看上去的表现很不相同。

政府起到促进作用还表现在政府推行的某些项目能够促进社会学习，即国家能够从这些项目中得出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经验教训，例如关于一个行业的生存能力。投资收益不仅是项目的直接回报，而且是其他项目能从该项目的成败中学到东西。因为这些学习的收益不能完全为私人主体所独享，所以这类经验在私有部门几乎没有。因此，政府决定实施某个特定项目的关键方面应该是该项目的经验是否能被按比例放大和推广。一个项目的成功仅仅是因为巨额的不能被广泛利用的资源的投入，或者仅仅因为一种垄断性的投入，这种项目就不能成为可以按比例放大的好的备选项目。

我们给出一些例子来具体说明。例如，为一个学校提供更多教科书的项目可以提高该学校的教学效果，但是如果不能为所有学校提供类似的教科书，这个项目对发展的影响就很有限。相反，如果一个项目是开发一门新的课程，该课程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个国家的条件，能够更有效地激励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这个项目就会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如果一个项目能够表明，地方参与教育以及地方控制农村学校能够增加学校的责任心（比如在萨尔瓦多[18]）或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比如在尼加拉瓜[19]），就可以动用有限的多余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或者事实上，甚至是全球范围内）复制这种项目。事实上，这种地区参与本身促进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尝试，已经超出了教育本身。这种项目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不仅其他人可以从项目本身的运作中直接学到东西，而且在学习过程中互动地解决了教育问题，社区也学会了如何解决其他问题，如何互相参与形成共识。如果政府确实希望通过项目来达到转型效果，项目能否按比例放大必须成为政府关注的核心。

3. 参与、所有权和局外人作用

把发展看作是社会转型，这种理念对于发展的努力方向、援助过程必须如何组织都有很明显含义，我们将在本部分一一解释。

---

18 Jimenez and Sawada (1998)。

19 King and Ozler (1998)。

为什么外部强加的转变不能起作用

结论似乎显而易见：有效的转变不能是外部强加进来的转变。事实上，从外部强加的转变可能会使转变变得容易，同样也可能会引起抵制，从而给转变造成障碍。发展的核心是思维方式的变化，但是不能强迫个人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虽然可以强迫他们采取一定的行动，甚至强迫他们发表一定的言论，但是不能强迫他们改变想法。

这一点在最近的前苏联国家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得到了有力印证。所有人都非常明确地表达了需要健康的宏观政策，似乎是每个人都宣称百分之百赞同那些政策——包括那些实际行为明显偏离信念的人。

事实上，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时确实会阻碍转型。强加条件的过程不仅不会鼓励受赠者发展他们的分析能力，反而会削弱他们获得分析能力的激励和利用那些能力的信心。过多的条件强化了传统的层级关系，而不是在讨论转变的过程中让社会的大部分群体参与进来，从而改变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这些强加的条件不是对那些可以充当社会转变促进因素的人进行授权，而是强调了他们的无能。这些强加的条件并没有促成公开对话（对民主而言十分关键）的建立，还认为，说得好一点公开对话是不必要的，说得坏一点甚至是反生产力的。

所有权与参与

因此，成功的发展战略的关键要素是所有权和参与。我们再三看到所有权对成功的转型的重要性：从外部强加的政策可能在表面上被不情愿地接受了，但很少会按照预期设想被执行下去。为了取得期望的所有权和转型，发展战略的过程必须具有参与性。发展不可能只是捐助者和政府之间的谈判问题。发展必须触及更深层的东西，必须涵盖和支持市民社会里的各个群体，这些群体正是需要强化的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他们声援那些通常排除在外的社会成员，促使他们参与发展过程并增加了所有权。[20]通过吸纳这些群体，战略形成过程才有可能获得承诺和长期参与，这对发展的可持续性非常必要。如果发展战略需要适应一国的特殊情况，所有权和参与也是必要的；我们的研究表明，有较高参与水平的项目事实上更加成功，其原因部分是因为这些项目对受益者的需要和能力很少做出错误假设。[21]

外部机构，包括捐款者，可以通过劝说来鼓励所有者，即通过列举理论

20 在发展战略的表达中，评估这种声音的分量时需要谨记这些群体是否具有代表性。

21 参见 World Bank（1998b）；Isham，Narayan and Pritchett（1995）；World Bank（1995）。

和经验证据说明某个特定战略和政策比其他方法更可能带来成功。但是，当战略和政策是由本国人自己制定出来，由本国自己控制时，所有权的涵盖程度才可能更大。

一些热心于所有权和参与的人暗含地认为这些参与过程本身已经足够。尽管社区中的个人会积极参与讨论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但是这一过程不能只是简单的交换意见。首先，要想使参与完全有意义，应该以知识为基础，因此教育和能力建设具有关键作用。其次，仅仅号召大家参与并不能解决激励问题：个人（和群体或组织）的参与需要一定激励。特别地，如果参与者感到他们的意见不被听取，他们的观点在决策中不被考虑，保持他们持续参与的积极性将是困难的。必须让人感到决策过程是公平的，反过来要求参与到建立决策制度安排的过程之中。即使参与具有完全的代表性，每个人必须受到适当的激励去采取所希望的行动。事实上，参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政策制定者对什么激励是必要的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制度、激励、参与和所有权可以被看作是互补的，任何一个要素单独来看都不是充分的。

参与和所有权非常重要，因此结论已经很清楚：外部人的参与不能代替当地人的所有权。不过，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讨论到，外部人确实在促成过程的实现，而且在帮助提供资源和知识发挥了应有作用。

参与和建立共识的需要

某些政府解决冲突的能力有限是实现发展的一个障碍。解决冲突的能力是社会和组织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通常在给一些群体带来收益的同时给另一些群体带来了损失。如果对发展过程有平等感、公平感，通过参与产生拥有感，并且致力于达成共识，则改革会得到更多拥护，即转型过程有了更多参与。很多例子（比如加纳）表明了共识的形成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中的重要性。相反，通过统治精英和国际机构之间的协商形成的一个决定，比如取消外部强加的食品补贴，不可能对实现共识有作用，因此也不可能推进成功的转型。

四、新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尽管不同国家之间发展战略的细节各不相同，一个共同点却是，既然发展战略勾勒了社会转型的一种方法，就必须涉及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

发展目的

特别地，发展战略必须包括私有部门、国家（公共部门）、社区、家庭和个人发展的相关内容。发展战略的不同组成部分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例如，个人的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教育；但是提高技能对私有部门的战略来说也非常重要，而且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带来的工资增加对家庭产生了很强的支持作用。

(a) 私有部门的发展。过去，发展战略通常过于集中在政府，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计划”成为了公共部分的行动计划，是在为政府描绘蓝图。但是，考虑到我们看到的发展战略具有更加广泛的作用，从私人部门开始我们的讨论就很自然了，毕竟私人部门通常处于中心位置。

一个关键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强大的、竞争的、稳定的和有效率的私人部门。在战略要素中能够促使这个目标实现的包括：

- 法律基础，提供（和执行）竞争法、破产法和更广泛的商业法；
- 管制框架，鼓励私人在可能的地方提供基础设施，最大化可竞争的范围，确保在竞争不可行的地方不滥用市场权力；
- 在私人不能提供基础设施的地方，由政府提供基础设施；
- 稳定的宏观经济结构；
- 稳定有效的金融体系，这需要一个管制框架，这个管制框架不仅能确保安全和稳定，而且能增强竞争、保护存款者、创造信心（即通过保护投资者免于市场权力的滥用，让人相信在证券市场具备“公平竞争环境”）以及识别出社会上被忽视的群体；
- 调整战略，消除经济中因为干预有效资源配置而产生的扭曲。

没能建立对市场经济的一些关键性制度预期也许是很多前苏联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失败的因素之一。没能为银行、证券市场和金融部门建立健康的法律和管制环境现在被更加广泛地认为是东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金融部门对发展的重要性不仅反映在世界银行的研究中，而且反映在东亚危机发生前世界银行提出的“战略合同”（Strategic Compact）里。[22]

如果想要发展私人部门，必须有适宜私人部门发展的环境。这个环境的关键部分就是劳动力质量——受过教育的、健康的劳动力是必需的。

(b) 公共部门的发展。发展战略需要特别关注公共部门。毕竟，如果政府连自己的事情都不能管理，怎么期望它管理（或者甚至以适当方式产生影响）其他事情？公共部门战略背后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确定政府的角色——政府应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这些事情。问题不在于某个特定活动应该

---

22 关于“战略合同”的描述，见 http：//www. worldbank. org/html/extpb/annrep97/overview. htm。

由公共部门承担还是由私人部门承担，而是两者之间怎样实现最好的互补，就像伙伴一样共同努力促成发展。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什么任务应该由什么级别的政府承担，以及政府怎样最有效地与“市民社会”互动，从而创造出最有益于整个社会转型的条件。

公共部门战略的核心部分[23]包括：（ⅰ）公共部门关注自己必须履行的独特职能，比如，为私有部门创造有利环境，这一点已经在前面讨论过；确保人们能够广泛地获得健康和教育；激发消除贫困的动力。（ⅱ）加强公共部门的能力，包括发展有效的政府服务和公共部门的重组，以更有效地利用激励、市场和类似市场的机制。（ⅲ）政府承担的责任以及工作模式需要和政府能力要匹配。

(c) **社区的发展**。尽管某些活动在国家层面上（或国际层面）上进行得十分有效，但是社区附近的很多生活中心和社区通常是带来社会转型的最有效工具。国家层面的政府太遥远了，人们有意义的参与机会少之又少。精心设计的发展项目（比如通过社会基金融资的那些项目）可以促进社区发展。社区层面的参与使得项目选择能够反映社区内的需求和偏好，而且项目设计能够反映本地信息，确保本地条件、偏好和特殊情况都能充分考虑。同样重要的是，地区参与能够产生承诺，这对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非常必要。而且参与项目本身也成为转型过程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参与和发展有效性之间关系紧密。

(d) **家庭的发展**。成功地提高人均收入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源于家庭内部决策。另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是女性教育，这也是家庭内部决策。女性教育的影响反映在女性教育下一代的关键作用上。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家庭不仅负责提供教育，而且负责提供营养和健康。更广泛地讲，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家庭发展的重要性和家庭内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正如我们已经意识到家庭作为一项发展工具的力量，我们也意识到在世界很多地方经常有家庭功能障碍的例子，包括家庭暴力。

(e) **个人的发展**。最后，社会的转型必须包括个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转型。发展必须包括个人能力的增强，从而能够控制更多力量并影响他们的生活，这样他们可以享受更加丰富、更为健康的生活。教育和健康处于个人发展努力的核心内容。

---

23 参见1997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World Bank，1997b）。

资源、知识和制度

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思考发展战略的框架，主要集中在五个层面——私人部门、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人。发展战略分析框架的第二种方法强调的不是运转的层面，而是必须提供的东西：

(a) *资源*。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发展不只包括资源，还必须包括资本回报，如果定义得更广一些甚至还包括人力资本。资本回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补充性投入的可获得性，比如管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良好运转的制度。然而，资源显然是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战略必须勾勒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开发，以及自然环境保护的相关计划；鼓励储蓄和投资以及填补两者之间缺口的计划；学校及其资金支持的计划；利用和恢复自然资源的计划。

(b) *经济管理*。欠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资源匮乏，这就是为什么最重要的是把可得到的资源合理调度。全面的发展战略必须识别出经济中最重要的扭曲，并去解决它，以及全面考虑政策的社会成本和分配效应。相应地，现代经济管理中的要素比传统意义上的更加广泛，传统的经济管理主要集中在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上。

(c) *知识管理*。发展不仅要缩小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上的差距，而且要缩小知识上的差距。事实上，知识和资本是互补的：知识的提高增强了资本回报，而更多的资本为利用最近获得的知识提供了机会。把知识纳入发展战略要求创造出吸收和适应知识的能力（通过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研究机构），投资于技术以促进知识传播并且创造知识。因此，发展战略需要勾勒出知识管理战略。世界银行越来越向着这些方向思考，它把自己想像成一个*知识银行*，其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国家之间缩小知识差距。[24]世界银行可以提供跨国经验，当跨国经验与本土知识结合后，就有可能有效地选择发展政策、程序和项目。

(d) *部门和次国家战略*。在很多情况下，把一个人的注意力从整个经济收缩到某个部门、某个行业（医疗部门或农业）、某个地区、城市（城市战略）或农村地区是有用的。在城市里，我们关注的各种要素被迫拥挤在一起，包括基础设施、环境、健康和金融。在一些方面，城市是整体经济的微观缩影，全面解决城市问题对全面解决整体经济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而且，很多城市在实现现代化上比农村地区更加成功，因此在努力实现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城市是自然的。

---

24 Wolfensohn (1998); World Bank (1998a)。

（e）社会和组织资本。对成功转型而言，除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之外，其他资本形式也必不可少，这就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包括协调交易和解决争端的制度和关系。因为在政策讨论中常常被忽视，我们将稍加详细地阐述这一点。传统社会通常具有较高水平的组织和社会资本，尽管这种资本的形式可能不会促使转型的实现。但在发展过程中，这种组织和社会资本经常被破坏。转型可能会弱化传统权威关系，而新的迁移模式会切断社区的联系纽带。问题在于新的组织和社会资本创造出来之前，这一破坏过程可能已经发生，从而使社会失去良好运转所需的必要的制度结构。[25]

社会和组织资本不可能从国家外部移植过来，而必须从内部发展出来，当然，来自外部的有关关键要素的知识能够促使社会/组织资本的创造。变化的步伐和改革的模式必须适应各自国家创造社会/组织资本的能力。事实上，这一因素可能是转型速度最重要的约束。在早期的发展文献中，即人们认为区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主要因素是物质资本时，对一国的吸收能力有相当多的讨论。[26]从本文的观点看，问题不在于吸收资本的步伐，而在于社会转型的步伐。

中国的例子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很快吸收数额巨大的物质资本。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对道路、学校、能源、电信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巨大，很难相信更多的资源不能被有效地使用。但是，仅仅提供这些要素并不能构成发展。

最近有很多关于能力培养的讨论。能力培养中（相对）容易的部分是提供个人能力、教育、技能和发展所需的知识。能力培养中的困难部分是社会/组织资本的发展，包括使社会良好运转的制度。关于这一点包括了很多方面：

- 有利于私人部门发展的环境，包括市场及其良好运转所需的法律基础；

25 俄罗斯的最近经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开始将近10年后，在无效率的中央计划体制被更为分散化、市场导向的体制取代后，在扭曲的价格体制总体上被取消后，在私有产权被重建并作为激励机制（在以前的体制之下是如此缺乏）之后，产出水平仍然不足转型开始前的三分之一。一些根本性的资源可能有所恶化，但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还存在。对这一现象的解释：组织和社会资本的破坏过程事实上在以前的体制下已经开始了，并且一直持续着。政策制定者没有做出充分努力去发展新的基础，也没有做出充分努力提供市场必需的法律基础，包括破产法、竞争法、合同法及其有效执行。

26 Rostow（1960，pp. 143－44）。

• 知识环境，新知识能够被吸收，能够适应该国的特殊国情并被投人使用；

• 政策环境，包括做出有关发展战略的关键决策的能力。

一致性、相关性和完整性

从以下两点来看，我们已经描述了构成有效的发展战略的各个组成部分：发展战略必须运转的各个层面以及发展战略必须提供的各个建筑模块。但是，总体并非部分的简单相加，部分之间不仅必须互相一致，而且必须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路线图——未来的前景以及实现这一前景的框架相结合。

这里设想的发展战略不是短期的 1 年计划，甚至也不是中期的 5 年计划。增加营养以及加强学前儿童教育的成果要在 10 年或更长的时间之后才能完全感受到。前景必然是长期的，与此同时也必须指出，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为了使其变得有意义，前景和行动必须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设定，这需要设定优先顺序、鼓励合作并考虑全球和地区环境。

优先顺序。我们知道成功的发展需要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上面列举的行动以及更多的行动。以前我们强调，给定资源约束——包括我们的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行政能力——我们需要设定优先顺序。前面已经提出，发展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确立这些优先顺序。现在我们可以详细描述出设定优先顺序的原则，以及多数欠发达国家可以通用的优先顺序。特别地，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需要关注杠杆效应——识别出这采取有限行动可以产生大规模影响领域，或者缺少这方面的行动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领域。尽管特定的优先顺序根据不同的国家而有所不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要素。

• 最重要的是教育，因为如果没有教育，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发展，不能吸引和建立现代工业，农业部门也不可能尽快地采用新产生的技术。但最根本地还在于，如果发展表现为社会转型，教育能够促使人们学习、接受和帮助产生这种转型。教育是发展的核心。

• 基础设施，特别是通信和交通运输，对现代社会的商业活动非常重要。对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孤立感也是必要的，这正是不发达的一个最致命的方面。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只要政府建立了合适的管制或法律环境，很多基础设施可以由私人来提供。这件事必须被放在非常靠前的优先位置。

• 健康——因为不健康的人不可能成为有生产力的劳动力，因为基本的健康标准应该被看作一项根本的人权，因为某些疾病可以被根除或者至少被控制住，但是仍然在折磨数百万欠发达世界的人们、经常夺去他们的人格

尊严，这是很不合理的。不过，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在维持整体健康方面，已有的行动和医疗服务的供给同样重要，这些行动包括对危险行为（比如吸烟）提出警告以及鼓励其他健康行为（比如健康饮食）。

• *知识*——和教育类似，因为知识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和教育及健康类似，因为知识可以导致一个更高生产力的社会。知识的力量是巨大的：随着知识的增加，在有限资源条件下生产的产出可以成倍增加。

• *能力培养*——因为最终而言，成功的发展和成功的转型必须来自国家内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必须有制度和领导能力来促进、吸收和管理变化过程以及变化后的社会。

伙伴关系和国家援助战略。一个国家自己的发展战略为思考该国的转型计划提供了整体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各种捐助者，包括世界银行，可以在该国的发展努力中扮演合作伙伴，识别出自己最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些角色不只是带来资本转移，也包括提供对发展和能力建设必不可少的知识。

但是，伙伴关系不仅局限于国家和援助提供者之间。回想到发展必须实现整个社会的转型，因此整个社会都必须参与其中。发展战略需要勾勒出这种参与如何才能发生。比如，应该阐明对政府作用的看法，并在公共部门内部提出一个分权化的体制框架——需要描述出私人部门和市民社会发挥领导作用的领域，更广泛地说，需要描绘出政府、私人部门和市民社会之间可以构筑“伙伴关系”的领域。

与全球和地区环境相一致。我们已经强调，发展战略的五个组成部分是互相关联的，例如，私人部门的战略必须有公共部门的战略作为补充，国家层面的战略必须有社区层面的战略作为补充。在各个层面，战略都必须与它所处的环境相一致，无论是较高层面还是较低层面莫不如此。所有战略都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全球环境创造了新的机会——巨大的商品国际市场，因此一国的增长不再受限于国内需求，而且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为补充国内资源提供了可能。但是，这些机会也伴随着新的挑战。例如，严重依赖商品出口和资本进口也使本国经济容易受到国外市场盛衰的影响，外国经济下滑会降低一些出口机会，或者投资者情绪的突然变化会急剧减少从国外流入的资本。这些风险大小与一个国家管理自己经济的水平高低没有什么关系。需要政府采取强力行动，以及强势的经济制度来渡过难关——即便这样做也会对经济带来很高的成本。对很多欠发达国家来说，影响可能是灾

难性的，历史经验也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结论。新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在利用新的全球环境的同时，必须减少国家参与全球活动中面对不可避免的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

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共同拥有我们的地球，因此必须共同保护我们地球的稀缺资源，包括空气。保护我们的大气——避免温室气体的积累——是一个国际公共物品的典型例子，由此获得的收益属于所有人。[27]如何解决这些国际间的集体行动，发展战略需要提出自己的看法。

如果从社会转型的透镜来看待发展，全球发展的另一方面变得特别重要。我们已经看到某些国家在进行这一转型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很多正处于转型早期阶段的国家可以学习他们的经验。随着更多的成功（和失败）经验的产生，这些成功（和失败）经验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每个国家都可以从这些经验中学到一定的经验和教训。经验的传播无疑在东亚国家的持续发展中起到了作用。

同时，很多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根据所在地区的发展背景来制定。小的国家尤其如此，而内陆国家更是如此，对他们而言，接近市场非常关键。但是在地区层面需要处理的不只是运输问题。例如，无数的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最显著的是水资源问题）只有在地区层面才能解决好。

五、从开放中学习：贸易、外资和新发展战略

对外部世界开放在哪些方面符合了新的发展战略的视野？我们把发展看作是社会转型（而不只是物质或甚至人力资本的积累），这种理解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这一问题的透镜。揭示了贸易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尽管不是通过经济学家传统上强调的机制。

贸易和发展转型

关于这一点我们先做一些解释。在标准教科书的国际贸易模型里，对外国商品开放主要是通过影响进口商品的市场价格而带来利益。如果印度尼西亚在国内生产一辆中型汽车的成本是 40 000 美元，但是进口同样类型的汽车只需 20 000 美元，于是对汽车进口开放就产生了净福利的增进：消费者的福利增加大于印度尼西亚制造商的利润减少。印度尼西亚可以把之前用于生产汽车的资源——剩余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土地——转移到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比如作为经典例子的纺织业）。排除贸易条件效

---

27 关于国际公共物品概念的讨论，例如，见 Stiglitz (1995)。

应，由此导致的效率提高使得印度尼西亚因为贸易自由化而变得更好，即便我们不假设其他国家相应地开放他们的市场。比较优势的魔力在于穷国也能从贸易中获益，即便在绝对意义上该国的生产率在所有商品上都比贸易伙伴的生产率低。

标准模型告诉了一个重要故事，但远不是故事的全部。还有很多模型以直接有益于社会转型的方式发挥作用。考虑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Heck-sher-Ohlin）贸易模型与我们在实践中看到的事实之间的差距。首先，严格的实证研究和国别经验都说明，参与全球市场带来的增长效果要比标准模型预测的大得多。[28]很多增长回归的实证研究发现，衡量对外开放的一些指标——不管是贸易比率，还是价格扭曲指数，或者是平均关税水平——都与人均收入增长紧密相关。[29]那些实行自给自足的国家（特别是小国、穷国）通常发现自己在发展中远远落后了，部分原因显然是他们闭关锁国的政策。然而，在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贸易能够带来的预期收益相对较小，仅仅是供给—需求图形中众所周知的哈伯格三角部分。显然，标准模型丢弃了一些东西。[30]

第二个问题是，行业层面的事实也与标准模型不一致。回想标准模型，贸易引起经济在行业间的转移，沿着他们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移动。但在实际中，贸易的主要收益似乎是来自生产可能边界本身的向外移动，而很少是跨行业的移动。实际上，贸易不仅使一国经济能够以较低成本消费“一篮子”给定商品，而且也使该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给定的开放之前的系列商品成为可能（并且任何数量上的增加都可以被生产者的哈伯格三角所解释）。

对外开放带来了什么？事实提供了有力证明，对外开放带来了生产技术的提高。当我说到“技术”时，心里思考的是比任何特定商品生产背后的技术蓝图都要更加广泛和更加重要的东西。这里的“技术”是指能够影响投入转化成产出的方式的任何东西——不只是蓝图，也包括市场和非市场制度以及组织生产模式。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投入转

28 Romer (1994).

29 Sachs and Warner (1995).

30 最重要的贸易收益可能来自商品种类的增加——尤其是生产过程的投入品——开放的贸易体制提供了获得这些商品的可能（Rodriguez - Clare, 1996; Stiglitz, 1997b）。也就是说，贸易不只是降低了国内已经可以获得的商品的价格，而且还提供了在自给自足情况下无论付出多高价格都无法得到的更多商品（诸如半导体或数控机器工具等）。新的投入品降低了进口国家的成本并刺激其创新。

换成产出的效率不同，[31]贸易缩小了这种差距。

如果我们关心的是社会转型，那么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保证开放能够带来这种广泛转型的实现。关键是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不能限制在小“飞地”里，即使那些“飞地”能够暂时提高我们的国民产出统计指标。例如，有一个远离国家人口基础的某个地区，该地区的金矿资源可能在吸引 FDI 和增加矿物出口上非常成功，但是对促进长期发展作用不大。在设计政策鼓励开放和获得开放的潜在利益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能够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转型力量。简言之，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二元经济，而是发达经济。

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如何发挥的？我们的理解并不完全，但理解程度正在加深。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有关贸易的东西，FDI 具有类似的重要性，因为当资本以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一个国家时，通常同时进来的还有专业的管理、技术性人力资本、产品和加工技术，以及海外市场渠道——所有这些在传统发展中国家都很缺乏。事实表明，如果社会上建立起合适的互补性的政策和结构，FDI 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并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对 FDI 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 FDI 看成是一个“飞地”现象；在更为现代化的进程中，FDI 通常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周围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应该吸引 FDI，而不应该害怕 FDI。跨国公司间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因此外国公司得到越来越少的垄断地租，而东道国则分享到越来越大的投资收益。

国际架构和金融流动的含义

最近几个月，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反思和反省，涌现出重新设计国际金融架构的大量讨论。这里勾勒出的新发展战略对这一设计过程具有重要含义。例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短期资本？首先，注意到短期资本特别不稳定，过去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即使 FDI 流入没有出现显著减弱趋势，很多危机发生国的短期资本已经出现完全反转趋势。其次，短期资本不具有 FDI 带来的那些附加收益——在旧的发展观念里，附加利益被认为从属于资本积累，但是，当我们通过新发展战略透镜重新审视时，附加利益成为了核心。由于今天

---

31 1998/1999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World Bank，1998）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报告中强调是（广义上的）知识而不只是物质投入或甚至人力资本非常重要。在标准的经济模型中，

$$Q = Af(\underline{x}, \underline{y})$$

这里的 Q 表示产出，A 是效率衡量指标，$\underline{x}$ 表示要素投入向量，$\underline{y}$ 表示贸易投入向量。标准理论认为，贸易投入向量 $\underline{y}$ 是市场价格 $\underline{v}$ 的函数；由于自给自足产生的 $\underline{v}$ 的扭曲导致在任何给定的 $\underline{x}$ 上 Q 都比较低。相反，在上面讨论的新视角下，贸易可能在导致 A 上升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短期资本的不稳定，不能以短期资本为基础进行好的长期投资。同样重要的是，短期资本本身不会带来发展转型（同样地，对冲基金不会带来发展，尤其是如果他们走向破产）。事实上，在国内储蓄率很高，因此边际投资质量相对较低的社会里，短期资本可能阻碍这种转型。由资本流动的突然反转引起的高发展成本——失学年限，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失业——很容易就能淹没这种资本流动产生的任何边际收益，正如东亚曾发生的一样。

对发达国家的意义：它们的责任是什么？

显然，通过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完全参与到世界中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发展中世界的贸易政策日程——或者说是至少由西方世界提倡的发展中国家的日程——最近几年狭隘地集中在了贸易自由化上面，要求发展中国家通过减少贸易壁垒以实现自由化。为了对这一观点进行补充，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反问一下，发达国家在贸易政策领域负有什么责任？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列出所有这些责任，我只是指出一些现象，通过开放，诸多发展已经明显延迟了转型发展进程：

- 第一，乌拉圭回合贸易协定——给全世界的消费者、生产者和纳税人带来了收益——在保证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开放市场方面做得不够。考虑各地区净收益的经验估计，按照协议刚刚签订之后的时期进行估算：根据这些估算，撒哈拉南部非洲是乌拉圭回合的净损失者。[32]无疑，非洲没有得到收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取消本国贸易壁垒上做得太不够了，因此失去了降低成本的机会，也失去了刺激国内效率和创新的机会。但是，乌拉圭回合给非洲最有能力出口的产品提供的进入新市场的方式也相对较少。正如东亚经济体的经验所示，通过贸易提供的大部分学习机会都在出口市场，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与成熟的消费者之间建立起联系，并且与世界上最优秀的生产商一比高下。在出口市场上的成功需要不断学习，出口中的获胜者会把这些经验教训带回国内并运用于国内市场。注意，在这里并不是说缺乏市场通道是非洲出口的唯一或甚至最重要的障碍。非洲国家仍然可以做很多事情以使出口者的日子好过一些，包括改善通信设施，改进交通设施，或者减少出口上不必要的官僚阻碍。但是，为了促进我所提倡的发展转型，发达世界开放市场通道是需要特别强调的领域。

- 第二，一个相关的观点，我们必须继续努力阻止西方世界新保护主义趋势。过去的20年间，通过创造性的新举措阻止进口的事情呈现上升趋势。这些例子包括令人讨厌的反倾销声明，以通常没有什么经济意义的法律

---

32 Harrison, Rutherfold and Tarr (1995).

提供暂时庇护；没有什么正当理由的抵消性关税；[33]对转基因产品设置壁垒，转基因产品可能会日益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更多依赖这些产品。发达国家的首都通常存在大量的报酬很高的法律和游说行业，这些行业在设计限制竞争的新手段上具有很强的创造性。从平等的角度看，我们有必要像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一样努力消灭这些创新。

• 第三，知识产权（IPRs）的国际保护应该实现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使用者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企业和消费者，他们通常是技术的改造者和使用者而不是发明者，也包括全世界的学术团体（发达国家的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过确保发明者投资在研发上的回报，给他们提供激励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知识是生产过程的关键投入，无论在农业还是高科技产业莫不如此。而且，和生产的物质投入不同，知识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被无限分享。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把知识的创造比喻为在黑暗中点燃蜡烛：其他蜡烛可以被第一支蜡烛点燃，而第一支蜡烛不会因此减少它的力量和光亮。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可能会终结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传播和再创造的良性循环。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并不能阻止我们提出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今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专门开辟一部分来讨论知识产权问题。[34]

所有上述情况下，我们不仅应该力求建立好的政策，而且在政策设计过程中需要追求公平和开放。如果没有这种公平感，发展中世界将从最近几十年的改革中倒退回去。更糟糕的是，伪善的感觉会强化不公平感：特别是发达国家鼓吹开放信条时，它们自己却采取限制性的做法。发达国家鼓吹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痛苦的自由化措施时——可能必须承担就业和产业上的损失——它们自己却使用反倾销和保护措施来保护自己受到不利影响的产业。而且，当它们的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时也采取这些措施，从而将失业扩大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点，这与很多欠发达国家的情况明显相反，欠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很高，失业保护措施也不充分。而且发达国家在要求欠发达国家处理它们面临的政治问题时，发达国家自己却求助于这些保护主义措施，以此来应对国内更为严重的保护主义情绪。

正如本周前我在 Fiesole 演讲中所说，之前的意见已经开始摇摆，现在在反对开放上又存在矫枉过正的风险。[35]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增加国际贸易和

33 有关这些阻碍的讨论，见 Finger (1993) 以及 Stiglitz (1997a)。

34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orld Bank (1998a).

35 Stiglitz (1998d).

金融架构的平等来减少钟摆摇动的动力。发展中世界从开放倒退回来毫无疑问将推迟极其需要的发展转型。

六、结论

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是可能的，但发展也不是必然的。我们已经知道发展不仅是技术调整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转型问题。

在一些公开言论中，我谈到了华盛顿共识的破灭，华盛顿共识提供了一系列政策处方，却没能促进发展转型，无论是它的目标还是它的工具都太狭窄了。在本次演讲中，我们试图提出一个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发展模式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我所提出的远不是革命性的：在世界银行内部和更广泛的发展社会里，最近几十年对健康和教育问题越来越多关注，我们已经超越GDP 指标，开始关注寿命和识字率。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强调建立安全网。对民主、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等目标上的共识在不断增长。在这里，我们试图提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观念，因此成功的发展必须集中在整体上——社会转型。我们为这一任务进行了充分准备，准确地讲是因为我们逐渐把更加广泛的问题纳入到我们的视野——尽管很多时候我们对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不够，比如竞争和金融市场的作用以及更广泛的制度基础。

在这里也要指出，成功的发展转型不仅影响我们所做的，也影响我们如何去做。的确，这种更加广阔的视角不仅影响战略和政策，也影响过程。由于提倡开放、合作和参与，这些词语很多时候听起来似乎是呼吁正确政治路线的灵丹妙药。在我看来，这些词语背后是一种发展理论，并且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过程可以导致更成功的发展结果。

然而，诚实的习惯让我不得不再说一句。在呼吁社会转型时，我们忽略了一个中心问题：向什么样的社会转型以及转型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且，一些人担心发展会摧毁传统的价值观。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和传统信念之间会存在冲突。但是现在的发展非常注意文化价值的保存，部分的是因为很多其他力量被弱化时，这些价值观充当了社会黏合力量。维持社会组织和强化社会资本是成功的发展转型的关键部分。而且，关注与成功的发展相关的很多进程非常重要——母亲不一定就会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婴儿期死掉时，她们也看到了新生命对新知识的吸取和对更多机会的接纳——这一点反映了几乎恒久不变的价值。

但我相信开放尤其是过程开放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些有利于建设更加开放的、更加民主的社会。对我来说，这些本身就是有价值。

参考文献

Bruno, M. and W. Easterly. 1998. "Inflation Crise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1(1), February, 3-26.

Deininger, K., and L. Squire. 1996. "A New Data Set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0(3), 565-591.

Demirgüç-Kunt, A. and E. Detragiache. 1998.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April 20-21.

Finger, J. M., ed. 1993. *Anti-Dumping: How It Works and Who Gets Hur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Furman, J. and J.E. Stiglitz. 1998. "Economic Crises: Evidence and Insights from East Asi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Forthcoming.

Harrison, G. W., T. F. Rutherford, and D. G. Tarr. 1995. "Quantifying the Uruguay Round." In Martin, W., and L. A. Winters, eds.,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307).

Isham, J., D. Narayan, and L. Pritchett. 1995. "Does Participation Improve Performance? Establishing Causality with Subjective Dat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9(2).

Jimenez, E. and Y. Sawada. 1998. "Do Community Managed Schools Work? An Evaluation of El Salvador's EDUCO Program," Impact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Reforms Working Paper Series,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Group, World Bank, February.

King, E. and B. Ozler. 1998. "What's Decentralization got to do with Learning? The Case of Nicaragua's Education Reform," Impact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Reforms Working Paper Series,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Group, World Bank, April.

Rodriguez-Clare, A. 1996. "Multinationals, Linkag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4 (September), 852-73.

Rodrik, D. 1998. "Who Needs Capital-Account Convertibil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7,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May): 55-65.

Romer, P. 1994. "New Goods, Old Theory, and the Welfare Costs of Trade Restric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pp. 5-38.

Rostow, W.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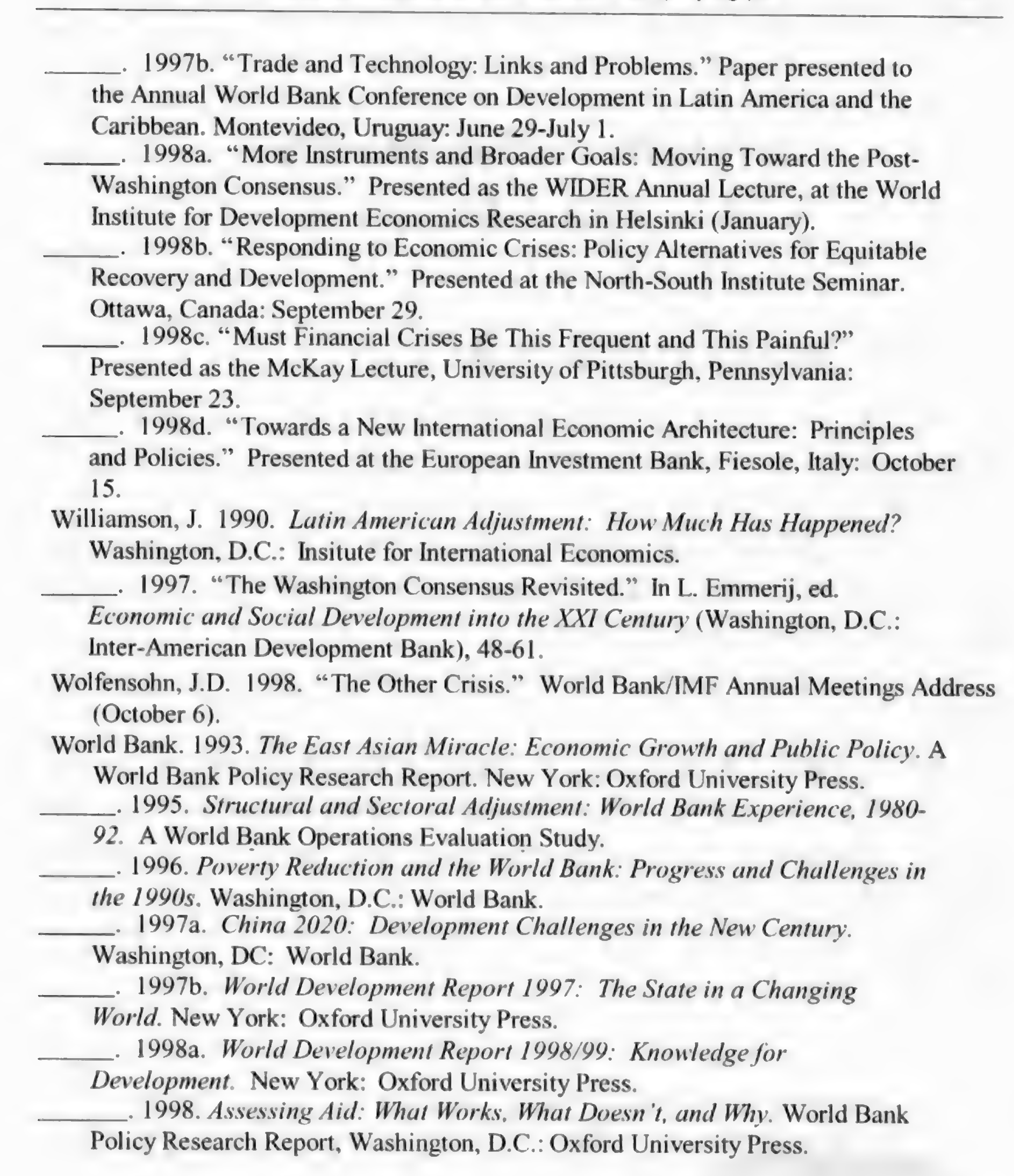
Sachs, J. D. and A. M. Warner. 1995.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5.

Stiglitz, J. E. 1994. *Whither Socialism?* The Wicksell Lectures, 199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______. 1995.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United Nations Background Paper 7,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July.

______. 1996. "Some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1(2): 151-77.

______. 1997a. "Dumping on Free Trade: The U. S. Import Trade Law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64:2 (October), 402-424.



______. 1997b. "Trade and Technology: Links and Problem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Montevideo, Uruguay: June 29-July 1.

______. 1998a.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Presented as the WIDER Annual Lecture, at the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in Helsinki (January).

______. 1998b. "Responding to Economic Crises: Policy Alternatives for Equitabl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Presented at the North-South Institute Seminar. Ottawa, Canada: September 29.

______. 1998c. "Must Financial Crises Be This Frequent and This Painful?" Presented as the McKay Lectur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September 23.

______. 1998d. "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rchitectur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Presented at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Fiesole, Italy: October 15.

Williamson, J. 1990.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______. 1997.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 In L. Emmerij, 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48-61.

Wolfensohn, J.D. 1998. "The Other Crisis." World Bank/IMF Annual Meetings Address (October 6).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_. 1995. *Structural and Sectoral Adjustment: World Bank Experience, 1980-92.* A World Bank Operations Evaluation Study.

______. 1996.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World Bank: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in the 1990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______. 1997a.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______. 1997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_. 1998a.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99: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__. 1998. *Assessing Aid: What Works, What Doesn't, and Wh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Washington, D.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市场经济下的发展战略框架：目标、范围、制度与工具*

一、引言：市场经济下的发展战略的定义

在政府、市场经济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合作关系（partnership）中明确责任和指定责任，以促进基本发展目标的实现，以及确定政府如何在合作关系中履行自己的责任。

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和市场相结合。这种结合的平衡、结构和功能是发展战略的核心，而不是简单地把某个领域划归政府或划归市场，更恰当的类比是在合作关系里双方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政治过程决定责任的分配。本文[1]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分析基础，帮助我们考察如何进行责任分配。

发展战略的首要组成部分是基本目标以及根据这些基本目标对长期任务分配的分析。显然，任务分配的性质随着世界经济环境和国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政府目标的变化和重点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在第二部分将要讨论这些问题。第三部分接着讨论制度和工具。制度的细节和政府采用的工具的确切性质是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与责任分配本身同样重要，决定了合作关系的实际运作。[2]

---

* "A Framework for a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a Market Economy", with Nicholas Stern, i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E. Malinvaud and A. K. Sen (e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p. 1 – 28。本文借鉴了联合国发展战略和市场经济小组的大量讨论和著作。作者感谢小组的所有人员，尤其感谢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的 Amartya Sen，Istvan Szekely 和 Vanessa Glasmacher 的有益评论。

1　本文是 Malinvaud et al.（eds.），*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的一章（2 volumes），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7 年。

2　这里不是僵化地把任务分配到一个部门或另一个部门，也不只是把目标分配给特定工具和制度。我们关心的是政府和市场是如何运作以及怎样运作的。因此，它与 Tinbergen 非常有影响的“目标—工具”方法有着根本性不同（Tinbergen 暗含把经济想像为可以由 N 个方程组成的集合来描述，用 N 个“工具”或控制变量组成的集合来决定被称为目标变量的值。Tinbergen 认为，目标可以被移动到理想水平。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目标可以被“分配”给工具）。

二、目标和范围

1. 目标

本文列举了发展战略范畴内一系列的非常广泛的目标。尽管所有这些目标可以总结为“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它们远远超出了提高人均GDP这一标准目标。它们包括了促进教育和健康，维持和改善环境，加强和保护所有公民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并从中获益的机会。其中某些目标是实现其他目标的重要手段，但是不要忘记它们也有自身价值，例如改善教育不仅带来收入的提高，也直接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改善医疗水平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也直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对生活水平的关注包括了对个人的关注，因而包括了对分配和大众的关注。减少不平等和贫困可以被看作目标或工具，更为平等的社会才能运转得更好。这不仅因为减少不平等和贫困能避免收入和财富巨大差别带来的政治紧张，还因为平等主义政策导致更多的社会人力资源得到最大可能地使用。在广泛的发展要求里，不同的经济、社会或政治运动强调平等主义议程的不同方面。比如，某些人认为应当优先保障教育和医疗的平等权，而不管这种做法对不平等的短期影响；而其他人可能更直接地关注可测量的指标，例如，通过安全网保障所有人的吃、住等基本需要不至于落在最低限度之下。[3]

我们用“生活水平”这一字眼相当广泛地定义了发展战略的目标，并且考察了决定生活水平的要素。但是，发展战略还有更多特定的目标（或许可以称之为中间目标），这些目标取决于国家对自己的定位。因此，比如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妇女识字率应该成为高度优先实现的目标，但在民众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这个目标就不那么紧迫了。

然而，我们必须询问有关社会目标起源的更深层次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认同发展战略的所有目标，同意每个目标的轻重缓急，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简单。但这样的一致意见从来没有出现过。目标和支持目标的战略产生于政治过程。如果对目标和战略具有广泛的共同承诺，这种战略可能比没有共同承诺的情况下运行得更加有效。但是，广泛的承诺可能并不存在。如果不存

3　关注结果还是关注机会部分地反映了对待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的不同视角。某些人认为，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国家有责任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而利用这些机会则是个人的责任。如果某些人没能很好地利用给予他们的机会，就会产生不平等的结果，个人应该承担责任。其他人则认为，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国家需要扮演更为广泛的角色，帮助这些群体或者塑造偏好，或者克服障碍，促使他们获得并利用这些机会。

在，政府将面临两难困境。政府可以只是提出达成一致意见的政策，也就意味着只能提供狭小范围的选择。或者，政府可以尝试去建立共识。某些建立共识的方法可能完全没有吸引力，比如发动对外战争或进行大规模宣传。其他方法则更加积极，包括不同集团之间的讨论过程等。在某些情况下，广泛的共识可以来自共同的价值观、传统和文化，也可以来自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如何达成共识以及如何产生这种黏合力，并没有任何现成的万能公式。从政治角度来看，试图强行达成共识总是令人深为担忧和不可接受的。[4]

在这里我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仅仅是提醒大家注意建立和执行战略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对能够实现什么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以及对诚信和成就尤其是与预期或者政府承诺相一致的成就的历史回顾，可能会使战略的推进更为容易。

支撑战略的制度以及战略本身必须考虑不确定性、信息缺乏和对组织预期实现目标的限制性条件。因此，任何希望得到精确控制的最优结果的努力都有可能事与愿违——当然，如果可以选择，人们并不是故意做得更坏而不是更好。显然，人们的信息和能力是有限的，因而建立能在各种环境下运行良好的战略和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把稳健性看作战略和制度的重要特征。

稳健性和目标形成与对计划和战略的任务理解的不断变化有关。早期的计划模型体现了在（强制性）直接控制和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化。随后，计划模型转向了委托—代理模型，这类模型考虑了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问题。后一阶段的模型仍然（隐含地）假定计划者掌握全部信息，但对家庭和企业的控制能力有限。计划模型保留了那些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但是增加了重要的额外约束，即计划者只能利用他们控制的有限工具（如间接税和直接税）来引导企业和家庭按照他们偏好的方式行动。这些模型对理解计划问题的重要特征非常有用，但是也只是抓住了完整故事的某一方面。

一个更加广泛的视角更加强调知识缺乏，知识的缺乏既包括对经济结构也包括对相关参数的缺乏。虽然考虑到有限信息以及信息随时间的变化，虽然仍有可能建立一个最优的贝叶斯计划，但是，用任何实际可用的方式解决这种问题的困难的重点已经转变为如何制定出一套能够在广泛的相关环境下良好运行的稳健的发展战略和制度。

---

4 一些国家通过公共教育系统成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政治过程有时通过强调差别或产品差异性又产生了瓦解共识的反作用。

上述正式模型描绘了计划者在政治框架之外的工作。计划者在解决最优化问题。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并且每个人都按最优化方式行事，似乎没有理由不采用最优化战略。从一个更为广泛的视角可以看到，计划以及（更一般地）经济决策的所有方面都是高度政治化的：有赢家也有输家，或者至少某些人比其他人赢得多。尽管没有正式的政治约束——比如政府不断地执行不久之前刚刚在政治上被否决的政策——政治上的压力确实能够影响不同战略执行的难易程度，以及特定过程被采用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政治过程甚至会否决一项从静态视角看可以带来帕累托改进的建议，原因就在于该项建议影响到了关于特定利益集团利益的未来选择或决策。例如，在美国最近提出一项建议，对进一步发展水电站的权利进行拍卖，那些按照低于市场价格水平享受电力供应的人立即对建议提出了批评，原因不在于他们可能遭受的直接损害，而在于他们担心该项建议使得他们现在获得的隐性补贴凸显出来（电价低于机会成本，尽管等于或高于生产成本），以及从长期看增加了取消补贴的可能性。[5]

2. 合作关系的基本要素

合作关系的基本要素是责任分配以及融资和决策框架。在这两个领域都有很多责任分担安排。长期以来，我们认识到融资和生产并非同一问题——政府可能提供融资支持，但是把生产留给私人主体（比如美国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或者政府也可能参与生产，但是依靠传统定价机制获取收益（比如公用事业服务）。融资上的分担安排可以非常透明（尽管最终支出对象常常并不直接）。以教育为例，大多数政府为初等教育承当了大量的融资责任，但是把高等教育的部分融资责任推给了学生和家长（尽管政府通常提供教育贷款，有时是按照比较优惠的利率提供）。[6] 但是，分担决策（sharing decision-making）通常更加复杂。在很多部门，复杂的规章制度制约着个体行为者的决策。

5　正式地，可以用动态博弈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个博弈里，参与者有不同的目标、有限的信息和以及对收益的不同理解。政府可以被认为试图改变博弈的参数（或者参与者对博弈的理解），或者政府本身就可以看作是博弈的一个参与者。

6　这一划分背后有其合理性，到了一定的年龄，个人应该对自己的决策负责。在这一时点上个人成为参与者，而政府为他们提供机会，个人可能利用也可能不利用这些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以这种“前瞻式”方法而不是“后瞻式”方法（即根据个人的家庭出身）评估分配结果。另一方面，父母为他们的子女做决策，政府也许认为他们有责任使这些决策对孩子有利，尤其是在父母行为会对孩子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的情况下。

基于理论进步和经验积累，关于政府和市场责任如何有效分担的共识越来越多。市场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上是第一位的。但市场本身往往不能产生社会所需的结果。政府的中心责任就是为市场运作提供制度基础：国防、法律和秩序；宏观经济稳定；维护公共健康的环境；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允许、保护或强化市场经济中的有效参与；提供安全网。在提供教育和健康、建立物质基础设施和技术上存在共同分担的责任，当然各国之间对责任的表述不尽相同。

3. *政府作为主要参与者的领域*

把私人部门放在生产的核心地位意味着我们是反对政府生产和支持私有化的。但是也有很多重要的注意事项：例如，必须有保证市场竞争的方法；当政府推进私有化时，必须保证政府获得公正的价值——得到较少价值不仅会刺激腐败，将来也会有税收扭曲的沉重负担。

制度基础。政府必须提供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这种制度基础超出了法律框架（合同法、民法、破产法和竞争法），包括了影响关键行业（比如电信和金融服务部门）的管制结构。保证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是必要的，因为金融部门不仅在资金有效分配上发挥重要作用[7]（如果对金融机构的稳定性没有信心，储户不会把储蓄放进来，金融机构也就不能发挥中介作用），还因为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来源之一。

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必须作为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8] 这一基本的和根本性功能必须由政府履行。

我们不讨论国防、法律和秩序问题。我必须再次强调，这样做绝不是有意低估它们的重要性，这些领域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同样非常重要。事实上，很多经济发展的灾难都与秩序瓦解有关，尤其是内外战争。

我们在分担责任背景下考察健康和教育问题，并将在下文做进一步的讨论。在这里，我们仅仅强调政府有责任提供公共健康，确保私人可以获得这种公共服务，并且对私人行为进行规制。

提供安全网（safety net）属于这样一种领域：在这里政府行为既可被看作对目标的直接追求（目标包括平等感和归属感），也可被看作实现其他目

7 “东亚奇迹”的产生部分是因为这些国家能够产生数额巨大的储蓄，也因为他们能够将巨大的储蓄有效率地进行投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边际资本—产出率会随着储蓄率的上升而剧增。

8 宏观经济稳定、健康的财政管理和稳健的、管制良好的金融部门在提供高储蓄和有效分配储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因为高储蓄及其有效分配支撑了“东亚奇迹”。

标的工具。如果安全网不充分，就会阻碍影响经济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变革。充分的安全网由哪些内容构成？我们怎样才能或应该怎样提供安全网？显然，答案也会因为各国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较为贫穷的国家——征税能力有限——可能不得不重点依赖家庭和地方社区提供安全网。但是，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国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设计不好的安全网所带来的负激励效应，以及提供安全网非常沉重的成本。较为发达的国家越来越强调个人责任。这不仅出于对效率或成本的考虑，很多评论者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需要（或者，不那么严格地说，是政府政策的一个目标）。对政策评估不仅要依据政策对结果（特别地，对个人收入）的直接影响，而且要依据政策对机会的影响，[9] 以及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掌握自己的生活。不过，人们一致同意，文明社会应该提供某些保护以避免赤贫。

环境问题。前面我们强调了发展战略目标必须是提高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环境质量。某些发展战略以牺牲现在的清洁环境换取更快的经济增长，这种战略通常被生活水平指标的局限性所误导的，或者说这种发展战略故意忽略了生活水平指标的局限性。这种政策可能比“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更加糟糕，社会迟早将遭受损失，尤其是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通常要比一开始就避免污染（空气、水、有毒废弃物）的成本高很多倍。[10]政府必须通过管制、税收和其他机制促使私人行为者考虑环境后果，承担市场激励不能促成的但从更广泛的环境视角看也是生产性的投资。

自然资源的枯竭反映了不同类型的问题。只要其他资本存量的增加超出补偿部分，增长就是可持续性的。但是，增长战略必须明确认识到这种需要，提供资本存量的增长，并且资本存量的增长必须超过能够抵消资源枯竭的部分。[11]

4. 共同分担责任的领域

经济增长的标准分析提出了增长的三大来源：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

---

9 这可以反映在（尽管不完美）转移矩阵里的转移概率（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者的机会或中等收入者变成高收入者的机会），这里每个人的概率都受到他个人决策的影响。

10 在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间接环境威胁来自水供应和水处理的不充分。至少有三个主要的环境问题与空气污染有关：与城市的汽车和工厂的颗粒物排放有关的，家庭烹饪产生的，以及酸雨产生的（主要来自燃煤公用设施）。当然，很多其他环境问题正在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生计，包括森林退化、自然资源开发和其他工业活动污染。尽管与每一个问题造成的环境损害都很大，但是仍然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解决。

11 同样地，不可再生资源应该被认为是资本组合中更重要的一部分（除了传统资本和可再生的资源外），应该考虑它们的损耗。更一般地说，当期和跨期权衡应该放在资本存量（包括环境）的整体范围内进行考虑。

本的增加、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尽管最近几年有关各个部分的相对重要性存在争议，[12]全面的增长战略必须涉及所有三大领域。每个领域里合作关系的具体内容都不相同，我们进行讨论时，不是按照它们在整个增长战略里的相对重要性依次进行，而是按照合作关系中政府角色的重要性依次进行。

教育。不管制度安排如何，长期以来教育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共同承担责任的领域，那些实现成功发展战略的国家，政府已经普及了初等教育（包括女性教育），并且建立了广泛的获得更高教育的渠道。我们注意到，教育本身不只是一个目标，即丰富人们的生活，它确保了机会并提高了生产率。如果发展中国家需要吸纳先进技术和组织方法，缩小它们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教育是必须的。

技术。促进技术转型和发展的积极政策已经成为最成功的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些产业政策的性质仍然是发展战略颇有争议的一方面。尽管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许多欧洲国家在推进技术方面有许多可选择性的有效政策，[13]经济学家仍然对它们的产业政策表示怀疑。[14,15]必须认识到，提供竞争性和开放性应该是产业政策的核心，因为竞争性和开放性对技术变迁过程非常关键。

尽管对政府促进技术进步的积极政策的范围和性质存在争议，人们对政府必须建立实现快速而有效的技术转型和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基础几乎不存在异议。这种制度基础包括强大的、基础广泛的教育体系，加上高层次（和组织良好）的科学和工程内容。教育必须提供学习新思想的技能，以及适应新思想的灵活性。建立标准和控制质量，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系统也是必要的。

---

12 索洛剩余或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至少在过去20年里美国是这样的，而人力资本已经日益重要。当然，很难说这种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模型或测算方法人为造成的。

13 例如在美国，政府铺设了第一根电缆并发展了互联网。政府在农业生产率的巨大增长中也发挥了主要作用。政府参与基础研究，带来了生物技术产业的重要突破。在很多国家，民航工业（包括喷气发动机）受到军事研究的重大影响。政府资助的研究（或对受管制产业的研究）产生了晶体管、激光、计算机以及许多其他发明，这些发明已经改变了现代社会。

14 这种认识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他们认为政府在挑选成功者上不如私人部门有效。这一依据没有抓住要点。问题不在于挑选成功者，而在于识别出溢出效应。

15 在某些情况下，产业政策集中在把资源从低经济回报（比如投机性的房地产投资）活动中转移出去，而不是集中于把资源转向个别的高回报项目上。

储蓄和投资。大多数成功的东亚国家采用了增加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政策，避免采用阻碍储蓄和投资的政策。前面已经涉及一些这方面的政策——下述内容显然属于经济合作关系中政府的责任范围：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保持低财政赤字（或可能的话，要有盈余），提供一致审慎的监管以满足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需要。但是，东亚各国政府甚至做得更多：帮助创建市场，例如债券和股票市场，通过保证市场监管机制给投资者以信心，以及帮助创造市场提供的交易工具的需求。东亚各国的发展银行提供了长期融资，并且有争议地通过很多风险分担和信号机制，帮助引导私人部门投资到特定的重要领域。[16]基于同样的原因，邮政储蓄银行，对其他银行的审慎监管，以及公积金制度都有助于鼓励储蓄，通过增加利用金融中介的途径，以及通过增加储蓄者对资金安全的信心。[17]我们可以从这些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

5. 不断变化的任务

在很多领域，政府现在的活动范围比以前发展战略讨论的要小。

信息服务。尽管政府仍然必须为自己的活动制订计划（事实上，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就是公共部门计划的形成），各个国家的政府计划（或更广泛地说，与未来经济走势相关的信息服务）对私人部门的作用各不相同。在某些国家，通过私人部门的信息服务提供诸如短期和中期预测，这种服务已经得到充分发展，新增的公共部门信息服务可能没有什么价值。但在其他经济体内，政府能提供重要的信息服务，远远超出了统计数据的收集和传播。这种服务能否超越标识为经济“计划”的作用，这可能是语义学的问题，但是信息服务能够为经济提供指导，下面我们很快会重新讨论到这一问题。事实上，不管私人部门的信息服务是否存在，私人部门都应该对政府的视角感兴趣并且知道政府的视角。

物质基础的提供。政府活动范围已经发生急剧变化的另一领域是物质基础的提供（例如，*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4）。50 年前，很多人简单地假定政府应该提供基础设施。这一观点忽略了历史经验给出的教训：在 19 世纪的美国以及很多其他国家，公路和运河都是由私人部门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政府所有权的一个关键论点就是需要政府参与建立通行权。人

16 这样做的机制在脚注 1 所指一书的第 10 章有详细的讨论，并且与多边开发银行（MDBs）希望的发展中国家对投资的激励作用的机制相类似。

17 这些账户的回报通常很低，说明在进行储蓄时考虑更多的是安全性和便捷性而非高实际回报。

们也认识到，滥用私人垄断权的可能性很大，而且管制提供的保障很不充分。尽管这些论点非常具有说服力，现在对政府垄断内在缺陷（包括效率损失和租金耗散）的认知和理解也逐步加深。与此同时，在基础设施的许多领域竞争显然实际上是可行的，这包括发电[18]以及电信部门的几乎所有领域，当然“本地回路”（local loop）除外。[19]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财政预算有限，需要为投资融资，以及国有企业的亏损趋势都意味着私人部门提供基础设施具有明显优势，这种优势大于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提供者之间的国际竞争反过来可能改变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能够以优惠条件获得外国资本和技术，而竞争和国际监管经验会降低它们受剥削的风险。

责任分配。发展战略和责任分配必须随着技术变化（比如电信业），世界经济变化（全球化和运输成本下降使得出口导向战略以及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变得容易，不断上升的实际利率给政府财政带来了更大压力），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而改变。贫穷国家的市场不够发达，公共机构也不发达。因此，尽管贫穷国家对政府干预的需求和范围可能更大，但政府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干预能力可能更加有限。发展保证了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制度进步，而且我们预先并不清楚在任何特定发展阶段应该更多还是更少地依赖公共部门。例如，贫穷国家的政府收税时困难更大，因而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贫穷国家的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上的作用相对有限——或者至少在服务定价上既要补偿成本，又要为政府带来一些净收益。

我们描述的政府活动领域远远超出了“守夜人”的职责，“守夜人”只负责提供国防、法律、秩序以及市场的制度基础。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作用必须受到财政和制度约束的限制。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我们并不建议政府对总体投资水平和投资分配承担直接的责任。相反，过去的发展计划理论强调快速的资本积累和基础工业投资，政府被赋予很强的作用。[20]对出口机会的悲观主义导致了对进口替代战略的强调（隐含地假设给定这些限

---

18 除了发电，对于多少电力应由公共部门提供，答案并不清楚。例如输电线路可能仍然是自然垄断（不管是政府所有、私人所有还是政府管制）。

19 甚至在这里，新技术（蜂窝电话、交互光缆）可以很快使竞争变得可行。

20 旧的方法与更为封闭的经济相关。在封闭经济里，物质平衡方程通过本地生产得到满足。由于人们对市场导向能力缺乏信心，很自然地希望由政府来提供导向。在开放经济里，可贸易商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任何缺口都可以通过进出口的扩张或收缩来解决。旧的方法也是基于对发展过程的理解，它所理解的发展过程过于强调资本品的积累，而较少强调生活水平的改进。跨期最优化模型通常指的是发展的先后次序，类似于前苏联经济所追求的。

制，发展进口替代的边际回报超过发展出口的边际回报)。东亚国家的成功和前文总结的全球化现象不仅结束了出口悲观主义，而且证明了促进出口对技术转移和增强国内工业竞争力都是有效的战略。

应该认识到这里描述的发展战略的核心直接来自发展战略需要克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就是低生活水平，特别是低人均收入。人均收入低部分是因为工人缺少训练、缺乏资本和技术，但是，部分也是因为技能、技术和资本的使用没有效率，从而导致单位工人产出很低。市场竞争和开放为提高效率和促进技术转变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但是，还是有很多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做的事情。政府能够促进储蓄提高，能够发展出提高稀有资本分配效率的金融制度。政府能够促进教育，教育不仅直接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且是技术转移所必须，并且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政府能够直接促进技术进步和转移。最后，基础设施是私人投资的重要补充并直接改善个人生活水平。尽管政府不需要自己提供基础设施，但是必须保证基础设施以好的方式提供出来。

虽然上述发展战略的要素还不具有普遍意义，已经取得人们一些共识。有争议的内容仍然是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上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以及这种战略应该是什么样的。在大多数东亚国家，政府做得更多：帮助建立市场机构（比如发展银行），帮助建立市场（比如债券和股票市场），决定促进哪个行业（有时在非常细节的层面上，比如钢铁、塑料和化工行业；有时在相对宽泛的层面上，比如出口行业）以及抑制哪个部门（投机性的房地产）。东亚各国政府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它们勾勒了未来发展方向并调度资源的流向。[21]

更全面地看，国家战略和公司战略有相似之处：都要找出问题和机会，并且提出解决问题和抓住机会的可能方法。政府部分地发挥了信息收集和传播作用，部分地发挥了建立国民共识的作用。因此，随着新加坡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政府认识到如果要继续保持增长，国民经济必须转向高附加值的部门。尽管很多精明的商界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公共讨论可以更加广泛地传播这一思想，并且在给定了公共投资（在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上）和私人投资的互补性，这种讨论提供了双方合作的基础。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不同于公司。国家的目标不是单一的，不一定是共享的，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界定。个人能够并且应该比公司雇员有更大

21 事实上，有证据显示，例如日本发展银行只提供了总资金的很小部分。发展银行不只是提供指导，还提供贷款监督服务，这些活动能增加贷款偿还率。

的自由追求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利益。

三、南北关系和发展战略

前面对发展的讨论特别关注了南北关系的两个方面：资本和技术。人们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和技术知识，因此需要资本转移和技术援助。东亚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资本产生和建立技术转移条件（工业、人力资本的发展、竞争和开放）上做出巨大成绩。尽管发展中国家自身承担了主要责任，富裕国家可以在提供资本和技术上做出真正贡献。但更重要地，富裕国家可以帮助建立发展战略赖以成功的条件。

10 多年来，工业化国家以相当一致的声音为市场和竞争唱赞歌。因为它们也面临预算短缺的问题，所以努力推动贸易而非援助，鼓励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以便进行投资。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对自己的承诺遵守得很好：常常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条件，同时却不要求给予自己同等优惠对待。

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有口是心非的时候。例如，随着一些转型国家试图进入世界市场，他们却发现工业化国家以纺织品配额、反倾销威胁以及报复性关税关闭了转型国家进入世界市场的大门。尽管发达国家坚持认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必须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一旦出现市场侵蚀以及不利于本国工业的比较优势转变时，发达国家常常会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尽管工业化国家坚持要求知识产权保护，它们在制止知识产权所有者对贫穷国家的歧视上并不积极。比如，医药公司在同一药品上对贫穷国家收取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其他富裕国家。

其他问题，从国际视角来看也是最难的问题，与国际环境这一公共物品有关，[22]比如与全球变暖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许多发展中国家最有可能受到这些环境公共物品的负面影响，但是每个国家都想让其他国家减少污染而自己不减少污染。国际社会已经日渐认识到，如果在主要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比富裕国家更多地把煤作为主要能源）之间都不进行合作，到 21 世纪中叶温室气体浓度将增加到潜在的危险水平。不断增长的国际共识（反映在里约热内卢国际公约上）已经认识到不断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如果降低温室气体减排的效率较高，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就会降低。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包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保护技术——

---

22 一些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也在上面有所讨论。

会在未来发展战略的设计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重要的能源政策领域。

四、多边发展银行和发展援助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依赖贸易机会和其他援助形式。作为外部参与者，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反复和长期关系中，多边发展银行能够建立信任和理解，并能超越资源提供做出更有价值的贡献。[23]从东道国角度来看，相对于私人投资者或单一合作国提供的贷款，它们更愿意接受多边发展银行提供的贷款，以及承认多边发展银行的潜在贡献，因为多边发展银行在这种交易中追求的不是狭隘的个人利益。由于多边发展银行也参与到多边借贷项目里，它们有动力关注宏观经济表现，并且有能力去执行作为借贷项目一部分的贷款条款，确保健康政策环境的维持。当然，贷款条件主要来自多边发展银行对良好政策的分析以及它们促进发展的目标。因此，支持多边发展银行参与的主要理由就是它们能够直接起到改善政策和投资与增长条件的作用。

多边发展银行长期参与发展问题还有进一步的好处：它们发展了可以用来评估和设计项目计划的“集体记忆”。它们甚至还可以发挥知识库的作用，储存关于什么有用以及什么没用的信息。这些知识非常重要，因为许多计划和项目，比如电信部门的私有化或大坝建设，很可能由一个特定国家一次性承担。

但是，多边发展银行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促成良好政策或促进公共投资。随着国际私人资本流动不断上升，多边发展银行作为参与其中的投资者可以发挥核心作用，体现、扩大和改进这些资金流的质量和影响。多边发展银行作为积极参与者的事实可以鼓舞其他参与者，包括私人投资者，后者认识到多边发展银行的参与强化了与东道国政府之间关系的强度和可信度。反过来，如果多边发展银行参与其中，东道国政府对私人投资者也会更有信心，因为私人投资者也非常重视与多边发展银行的长期关系。私人投资者也重视自己的信誉。这种互相信任的结果使得各种私人项目得以实现。

最近关于多边发展银行的市场导向哲学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领域。它们的任务不仅是促成市场经济所需的政策、制度和基础设施，而且通过直接参与私人投资过程为私人投资本身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这是公共机构和市场之间合作关系的又一例子，不存在公共机构对市场的替代。

---

23 因此，与向普通投资银行的借款相比，多边发展银行的借款者有更大激励去履行贷款条件和承诺。多边发展银行比大多数私人贷款者能更好地执行主权担保。

五、制度和工具

一致的发展战略需要对制度和工具进行描述，这些制度和工具会说明哪些任务由政府部门承担，哪些由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分担。制度运行以及工具建立方式的细节对战略能否成功非常关键，因此有必要把它们的设计看成是战略本身的一部分。

1. 制度为什么重要

我们强调制度，需要先对制度给出解释。在所有可能的解释中，词典的定义通常包括“在一个经济体或社会里建立起来的习惯、法律或关系”以及“为特定目的建立的组织”。因而，关注制度也就是关注关系、组织和做事方式。

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很少关注制度，而是主要集中在技术、禀赋和个人主体（以及他们的偏好）上。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假定最终结果由这些基本要素决定，不需要关注交易赖以发生的上层建筑。诸如分成制反映了一种制度安排，但是对结果没有显著影响——如果有显著影响，必然产生与基本经济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影响到这种制度安排，并最终带来制度安排的改变。

相反，制度分析一开始就假定制度至少在短期和中期能够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当然，如果基本经济力量和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巨大冲突，制度必然面临变迁压力。但是，这种变迁可能发生得很慢，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根本不会发生。因此，最初能够很好地解决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制度最终会演变为一种障碍。制度塑造了变迁，也被变迁所塑造。

制度对节约交易成本非常重要。拿分成制来说，里面包含了一些特殊条款（包括分成比例）。现代经济理论预测和想像了非常复杂的状态依存合约，即便产出是唯一可观察到的变量，只有在严格条件下，才会出现线性合约关系，即支付给地主（股东）的部分与总产出呈现固定比例关系。但是，偏离一个简单的标准合约（比如五五分成）带来的谈判成本很大。如果地主提出一个合约，佃户会担心地主有特殊信息并尽力使合约符合自己利益。相反，如果佃户提出一个新合约，地主可能会认为工人这样做表明新合约可能对自己不利，地主就会完全拒绝这个合约。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当合同法模糊不清时（经常是这样），对非标准合约的解释需要依靠合约起草者。这方面的原因为使用标准合约提供了进一步的根据，也为合约形式的缓慢演化提供了根据。

分成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制度案例。在其他情况下，参与者可参与的活动以及制度需要规定合适行为的活动非常广泛。某些情况下，关系可

以归属为正式的经济术语——例如，以业绩为基础的合约加上有限数量的业绩指标——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用一两个变量来体现理想行为的所有相关方面。例如，工人们必须训练新雇员，但是很难监督这种训练程度，更不用说找到衡量其质量的合理指标，因此需要用制度来规范这类行为。[24]

更一般地，制度提供了激励和管制了行为，促使在复杂情况下人们的行为能够强化组织目标，而在复杂情况下，简单的货币回报结构不能提供适当的激励。对这种合作关系进行制度设计的中心问题是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尤其是保证合作行为的激励机制，从而能够提高经济效率。

阻止串谋行为也很重要，串谋可以定义为某个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合作行为，这种合作是以牺牲一般利益为代价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利行为能够保障经济效率，不需要也不追求市场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亚当·斯密自己对这一论点非常明确）。但是，这种观点的局限性现在已被广泛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建立合作关系的意愿非常明显：通常，工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通过非人格的价格体系来协调。

经济制度也能解决和避免冲突。因此，不同团体之间可能存在短期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建立论坛来交换不同团体的看法（例如，协会、政府和雇员组织）。他们之间可以通过建立一种制度来仲裁和监督行业或合约内不同团体的行为。

2. *成功的制度和不成功的制度*

我们很容易识别出运作良好的制度安排，它表现在：各合作方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合作良好，没有冲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我们也能识别出运作不好的制度安排，表现在：制度变迁被官僚需要所限制，或存在伴随着普遍腐败和欺骗的“强盗资本主义”。

但是，识别出好制度安排的各种要素却有点困难。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提供了合适的激励，避免和解决了冲突，能够使各方致力于社会建设活动，不会鼓励一方为了获取自己利益而采取牺牲其他人的利益的行动。它们很大程度上依靠信任，[25]而不是明确的合约执行，但

---

24 有时候，有人认为当市场失灵时就需要制度。因此，保险市场的缺乏使得非正式的保险制度（比如家庭保险）产生。一些家庭可能会对行为进行规范，例如，只有对那些曾经努力帮助过自己的人才会提供援助。注意，这里没有正式合约，也没有明确表述什么是“充分的努力水平”。

25 通常，它们被设计出来以促进长期关系的建立，如果没有这种长期关系，很难建立信任。例如，工资快速提升的公司为工人留在公司提供了很强激励。

是它们也靠一些执行方法（如果没有执行方法，长期关系也不能有效运作）。

激励相容和动态一致。我们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和工具必须遵循激励相容和动态一致的要求。经济主体应该有激励遵守或尊重分配和承诺。他们今天为未来的一些可能性所做的计划，必须与未来可能性发生时他们想做的事情相一致。例如，前苏联指令系统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没有工作激励，所以在计划里对任务和努力的不切实际的分配，在实际工作中是激励不相容的。同样地，对物品的非贸易配给总体上也是激励不相容的，因为根据任何配给，都会有对配给商品进行贸易的激励。在这种体系下，不可避免将会产生大规模违背规则的行为。反过来产生出犬儒主义行为，进一步侵蚀了行为标准以及对规则和政府的接受性。

制度刚性。正如在简化决策过程中制度不能很好地适应特殊情况一样（例如，分成合约中每一对人的经济情况），同样道理，制度也不能对经济情况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因此制度必然存在一定风险，最好的情况是制度不能充分满足当前经济的需要，最坏的情况是制度将成为变革的障碍。制度变迁缓慢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一些我们已经提示过。制度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新制度的设计和建立也是公共物品的提供，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因此，新制度设计是高风险、高成本的活动，具有逆向个人激励特征。[26]而且，世界太复杂了，以至于通常两个团体评价变革的结果时可能处于不同的立场。再次，风险厌恶会造成维持现状或放慢变革的倾向。

制度的互相依赖通常需要同时改变几项制度安排，从而可能产生了协调失败：给定社会里的各种制度，即便可以轻松改变某个特定制度，却可能需要费力的同时改变几个制度。政府可以促进制度变迁的实现，政府能够解决协调失败和“搭便车”问题。但是，把制度的再设计交给政府会产生一系列其他难题。因为几乎任何制度再设计都会对公平产生很强影响，政治过程可能会阻断对任何特定集团带来很大负面影响的制度变迁。[27]

制度和经济转型。由于制度安排不完全或运转不良带来的问题可能会在

26 尤其是假定了法庭或者怀疑者在解释合约时，会做出不利于改革提出者的判断。

27 对公平的这种关注使得表面上无效率的社会安排得以维持。例如，尽管对公共用地不受管制的利用会导致过度放牧，但围上栅栏（这可以保证效率）会使那些不能接近公共用地的人的生活更加糟糕。表面上似乎是帕累托改进的建议可能会遭到反对，因为发觉（或害怕）这些建议会给某个集团造成负面影响从而改变未来政治过程的动态性。

快速转型时期变得最为严重，这时候制度还没有机会去适应变化的情况。事实上，成功转型的核心包括了对新制度的约束。尽管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压力是执行合约的有效机制，随着社会发展，更大的流动性使得社会压力机制不如以前那样有效。但是，用来执行（隐性）合约的长期关系还没有发展起来。从理想的角度上讲，制度应该既易于变迁也能适应变迁，但这个要求太高了。

尽管上面的例子还远不够全面，它们确实体现了在市场体系有效运转条件下，所需制度和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一般地说，可以这样来总结这些问题，如果市场经济想要运行良好，它需要特定类型的制度基础。理解和分析制度设计非常重要。[28]制度基础的建立和保护是一个重大挑战，我们将在本部分的结尾处再次简要地讨论这一问题。

3. 公私合作关系的基本制度安排

通过考察公私合作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良好运行所需的一般制度安排，我们开始对制度和工具进行更详细的讨论。我们用三个标题对这些一般制度安排进行分组：民主和开放，治理以及合约/信任/长期关系。

民主和开放应该既被看作目标，也被看作制度或工具。显然，在中短期内民主和开放并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有很多非民主国家取得成功增长和转型，但是通常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没有实现民主的情况下获得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应该成为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民主制度能够为市场经济运作带来很多重要益处。第一，它们促进了对经济和合同法的其他结构，以及这些结构变迁的政治认可。第二，它们为其他制度安排提供了某些稳定性，并且能够促使制度变迁的实现。第三，它们通过对执行的检查和制衡，能够提高治理质量。第四，它们能够迅速注意到严重问题。例如，森（Sen）指出，自从 1947 年独立以来，印度的民主制度对防止出现严重的饥荒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过程需要能够对发生严重饥荒的可能性做出迅速反应。[29]

公共管理的高标准和高水平提供了制定经济决策所需要的有效和稳定的

---

28 但是，历史不仅对决定制度演变很重要，而且对从制度结构中的均衡很重要。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影响到对其他参与者的行为的理解。存在多重均衡时，它们影响所出现的均衡。

29 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在新的信息时代，独裁政府阻止信息流动所需的控制水平，几乎会不可避免地抑制经济发展。

环境。关于经济增长的许多比较研究认为，治理水平是经济绩效的关键性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并不令人意外，我们已经讨论过，合理可靠的治理对市场运行非常重要，对投资决策尤其重要。在理解良好治理的决定因素时，应该认识到在民主社会里至少有一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因为统治者必须不时地去说服那些被统治者，他们是按照后者的利益最大化行动的。因此，尽管没有哪种政府形式就一定有好的治理或不合格的治理，民主却有一个根本的检验标准：不好的政府会被推翻。因此非民主政府能达到的最坏限度在民主社会很少能够达到。

治理不只是政府的事情，也是企业的事情。事实上，高水平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非常关键。在公司治理情形下，目标问题看起来不太重要：管理者不是从股东利益出发最大化股票价值吗？但是信息不对称，股东投票（以及获得合理投票所需信息）的有限激励，加上替换现有管理者的有限能力都给了在位管理者很大的抉择权。很多事实表明，他们经常这样做，不只是巩固自己的权利，甚至牺牲股东利益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公司外部的投资者对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具有关键作用。如果投资者不清楚公司资源如何使用，就不会通过贷款或股票为公司注入资金。但是，高水准的商业行为不只是从强健的公司治理中产生。在商业事务中，必须有关于透明度、信息以及国家和有效公司治理共同执行行为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些标准，外部融资（贷款、股票或其他金融工具）体系不能有效地运转。这就是强健的法律和会计体系（能够阻止欺诈）对现代资本市场发展如此重要的原因。因此制度——法律、规章、习俗，包括会计体系、欺诈法、证券交易委员会——既组成了金融市场，也决定市场怎样健康运转，即投资者是否有信心把他们的钱放在金融市场的某个机构，以及市场是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

我们强调了制度关系中的激励和长期合约。这些都是产权定义的组成部分，由产权定义所支撑。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权利受到法律支持，但人们不应该采取过于法律化的手段。关键问题是信心，即履行承诺和义务的信心。[30]信心来自社会关系，也来自法律支柱。例如，在很多东亚（或其他）国家，合约及执行合约的正式法律结构非常脆弱，但是通过社会和其他制裁，执行力却很强。

---

30 政府行为能够增强信心，例如政府行为可以增加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从而增加了银行为了保持其特许权而诚信经营的可能性。

4. 特殊例子：公共责任

现在我们转向制度运行方式重要性的一些特殊例子。依照前面部分的模式，首先关注政府责任领域，其次关注政府和私人共同分担的责任领域。正如本文所认为的，宏观经济问题显然与政府责任有关。我们用两个例子强调制度安排和相关工具的重要性：税收政策和管理，以及中央银行的运作。

税收政策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在这个例子中，税收工具（税基和税率）的设计应当既能反映政府目标，又是激励相容的。在市场经济中，资源必须由政府从纳税人中收取。相反，在指令经济中，至少在理论上政府对资源有首要索取权，[31]剩余的部分才提供给消费者。许多转型经济体的税收崩溃以戏剧性的方式使这些问题突显出来。

设计一个仅仅考虑个人反应（激励相容）的税收政策并不足够。征税是必需的，这需要承诺和管理能力，也需要被纳税人接受。如果税收体系是透明的、简单的以及税收能够被有效利用，这些要求将很容易得到满足。征收和执行的制度安排对经济有效运转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有效的征税安排，就会产生犬儒主义，从而降低国家的合法性并破坏良好的治理。不能有效执行的税收体系会使很大的任意夺度权落入官员中。这些都会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国家没有能力履行它的基本职能。因此，有效设计和管理的税收体系是经济良好运转的核心。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良好治理的一个关键指标是政府有能力征收自己设定的税收。

经济发展能够加强税收当局的征税能力。更为先进的技术使得政府能够监督原先不能监督的交易，但是这些技术进步也为私人部门逃税提供了新的方式。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政府不可能监督乡村里双方之间的每一笔贷款，但是政府能够监督成熟金融市场里的交易。另一方面，成熟的金融市场有能力重新组织交易以规避税收。例如，如果政府在本国范围内对贷款征收，交易的地点很容易改变。

为了说明市场经济下强健制度的重要性，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央银行的运作。作为一项制度，中央银行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拒绝政府不负责任地扩大信贷。中央银行也必须有能力执行金融制度的标准。如果没有这种执行力，市场经济运转至关重要的交易者信心就不会存在。再次，如果需要市场经济良好运转，中央银行的制度结构设计——权力、责任、义务和激励就非

31 在实践中，旧体制下东欧和前苏联在农场、工厂和流通环节的管理者具有很大的转移资源的权力。

常重要。

在民主社会里，中央银行的独立程度是一个权力制衡问题。中央银行控制的变量非常重要，因此需要民主责任制。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可以对政府不负责的行为进行制约。最为成功的经济体发展出来的制度安排都对中央银行赋予了很大的自主性，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公众监督又会对中央银行形成制约，保证了中央银行的最终决策能够考虑更广泛的国民利益。[32]

上述两个例子强调了一个一般性原则，即良好的治理包括了表现信用、能力和正直的行动和政策。这些应该被正确地制衡、训练、奖励和惩罚所支持。提供这些支持的体制非常关键。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因此，虽然可能很难重建或创造良好的治理，但是能够被创造出来，而且通过民主过程设计出来的良好体制以及警戒，包括新闻自由，都是这一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

5. *特殊例子：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承担的责任*

现在，我们转向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承担责任领域，给出制度和工具重要性的相关例子。我们简要分析四个例子：基础设施、健康、教育和产业政策，它们不仅对经济运行非常重要，而且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生活水平非常重要。

基础设施。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基础设施*不再只能由政府提供。人们观念改变的部分原因是政府垄断表现很差，公共财政压力不断增加，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经常产生很大亏损的事实。人们通常认为，政府作用应该受到限制，技术变迁已经使很多领域变得不再具有自然垄断性。如果私有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它们的行为常常受到管制。管制手段可被运用于价格、回报率、资本金要求和准备金、把供给者和消费者引入市场的途径、质量和环保义务等。

对管制者的制度安排以及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产业表现具有重大影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管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保证行业内的竞争，只要是竞争可行的。技术变迁和分类计价（例如，发电可以与输电和配电分开）使得真正的竞争在这些部门的某些领域越来越具有可行性，尽管在过去这些部门整体上具有自然垄断性。在其他领域，诸如供水，允许竞争和自由进入的技术难度更大。这种情况下，为了市场发展而促进竞争（即在一定时期内实行

---

32 应该注意到，同全体大众相比，银行界（长期债券持有者）更加强调控制通货膨胀而不是减少失业。

垄断特许）以代替市场内的竞争，并在授予垄断许可后对价格和服务进行严格管制，这些做法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管制者需要进入那些市场竞争不能控制供给者，因而不能激励供给者很好运作的领域。

如果通过拍卖获得服务提供的权利，控制的棘手问题就出现了：要想让拍卖价格最高，就必须承诺不施加新的约束，但是社会福利就无法实现最大化。结果非常类似于政府作为垄断者经营企业的情况。因此，必须对价格和服务进行一些管制。

理想的做法是拍卖“暂时”垄断权，只有在企业运作良好的情况下（从社会利益角度），垄断权才可以被延续。这样做也带来了其他问题：最初拍得垄断权的企业要么会在长期资本上投资不足，要么会在企业专有资本上投资过度，从而在下一轮的投标中获得优势（而不管这种做法会对社会利益产生什么影响）。

基础设施的实质性部门仍将由公共部门提供，这是由技术、历史和政治决定的。例如，大部分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公路、铁路仍然主要属于公共部门。另一方面，电信越来越多为私人部门提供。然而，在基础设施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提供的重要例子，随着私人部门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最好的做法就是支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继续融合，两者之间在什么地方融合主要依赖于技术，并随着技术变化而发生变化。

正如政策和战略的其他方面，基础设施部门管制者的信用、能力和正直对基础设施部门的绩效非常关键。如果游戏规则不明确，不能得到合理利润，投资者不会进行长期投资。消费者不会也不应该接受榨取地租和滥用特权的私人垄断，或没有充分的政治和民主监督的私人垄断。但是，一个国家通常面临的挑战是在私人垄断和公共垄断之间的进行选择，私人垄断受到能力有限的政府管制者的制约，而公共垄断具有私人垄断的大部分缺点，以及自由利用财政填补亏空的缺陷。

在基础设施私有化进行良好的领域，改进后的激励提高了经济效率。尽管基础设施（不论公有还是私有）通常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向私人部门转移基础设施能减少利用生产性活动进行“寻租”（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例如，不管其经济效益如何，把基础设施建在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地区，或不关闭这些地区已有的基础设施）的诱惑。提供基础设施的这些挑战是政府的任务——制度创造，制度如何运行，以及它们使用的工具对服务质量和服务成本非常重要，这些服务不仅影响消费者的生活水平，也影响到生产的有效

性。细节决定成败。

健康。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承担责任的第二个领域是健康。大多数国家都有积极的公共健康部门和私人健康部门。与健康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在很多方面比像与电话有关的公共政策更为复杂。首先，健康本身就是个人生活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是个人能够享有生活其他方面，以及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因此，健康在所有国家都被普遍看作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而且，健康状况不好具有很强的外部不经济。个人具有保护健康（好的公共健康）以及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相应地，政府有责任确保一定的基本健康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的性质并不清楚，比如，它们是什么，应该怎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远未达成一致意见。第二，良好的健康与公共健康和生活方式（部分地取决于收入，也取决于教育、文化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关系更大，而与医疗服务的关系稍弱。第三，信息对任何形式的医疗服务都非常重要。个人掌握了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关于自己健康的信息，个人也通常对医疗科学和医疗实践一无所知。

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篇幅内把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都阐释清楚。下面主要集中于医疗服务，尽管我们并不否认公共健康对健康状况、状态的重要性，公共健康包括清洁水供应、污物处理、免疫、空气污染等。与提供医疗服务相比，改变生活方式以及饮食、吸烟、饮水和其他习惯是改善健康状况成本更低的方式。然而，医疗在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预算和国民收入中占据了很大比重。与医疗提供相关的制度对医疗供给的质量和覆盖范围，以及进而对人们的生活和焦虑都有很大影响。

医疗产生三个相关的难题：如何组织医疗供给，如何对供给提供财政支持，是否需要定量配给以及怎样配给。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影响医疗部门的效率，也影响医疗服务供给的公平程度。例如，体制的设计可能影响到双层医疗体制的发展范围。一些人认为，医疗服务的平等供给本身就是我们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特别的平等主义者）。[33]

消费者和供给者（毕竟他们被认为知道消费者需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上消费者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有限（因为消费者不是治疗和信息的重复购买者），最终导致了对甄别和初始供给的各种制度安排。在很多国家，包括英国，普通的医疗工作者可以做出基本诊断并开出药方。如果觉得

---

33 尽管这一看法被很多人接受，但健康本身与医疗的联系并非那么紧密，这一事实表明应该更根本地关注健康状态的平等，或获得充分健康状态的机会的平等，而不是医疗本身。

有必要，病人会被转给专家医治。在这种组织形式下，交易成本比在付费服务体制下低得多（尤其当付费服务与保险公司的医疗赔偿结合起来时，保险公司必须关注保险欺诈和滥用保险）。与此同时，按人头计费的体制使得医生倾向于减少医疗服务的提供，[34]尽管付费服务体制可能产生提供过多服务的激励（尤其当很大一部分医疗成本由第三方承担时）。

在美国，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依赖所谓的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sations，HMOs）。在这个体系内，每个人向彼此竞争的健康组织缴纳一定费用，这些组织的总体工作绩效可以按照病人统计数据进行评定。个人雇佣医生来有效地管理自己的医疗服务，而不是自己来管理。于是，这些管理医生之间的竞争性市场就形成了。这种组织形式（像付费服务一样）既可以在公共部门也可以在私人部门里产生。按人收费计划倾向于向同一计划中的病人提供等同的治疗，但不同的计划会提供数量和质量显著不同的服务——相应的价格也不同。[35]

甄别和初始供给（基本医疗）的制度安排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改变而改变。如果从更广泛的人口出发，有较低业务水平的医务护理人员也可以提供很有价值的服务。尽管事实上较低业务水平的医务护理人员（可能）比水平更高人员会犯更多错误，但是相应的水平更高的人员需要更加昂贵的训练和花费。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这一问题：基本医疗和专家医疗之间的平衡问题是否真正地反映了对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评估。

关于健康的私人市场融资有两大问题：因为支出具有很大变动性，融资不可避免需要通过保险公司，而保险具有逆向选择问题。[36]保险公司对这一问题的措施有如下几种情形：获取个人健康状况和个人风险信息，使得每个参保团体按照他们的保险精算风险进行支付；或者限制保护措施；或者要求

34 关于医疗服务质量声誉的信息会削弱这种激励机制。

35 因此健康维护组织不解决进入不平等的问题，除非有一个标准计划（以标准成本），并且任何人都不允许提供标准计划之外的服务（即使这样，也会有一些不平等，因为这些计划会试图挑选出更加健康的人口，允许他们或者支付较低的成本或者接受额外的服务。一家健康维护组织如果设在没有电梯的建筑物的第五层，就会抑制有心脏问题的病人去看病，正像有很多喜欢运动的医生的健康维护组织会鼓励病人锻炼身体）。正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医疗，这是一项基本原则；另一些人则认为，一个人应该可以购买他想要的任何数量的任何物品，这是一项基本原则（只要医疗服务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弹性，富人购买额外的医疗服务不一定会导致穷人得到更少的医疗服务）。

36 保险也有道德风险问题。因为个人不完全承担医疗成本，就会出现过度消费，部分人甚至不关心自己的健康。

减扣赔偿。人们对这些做法是否合意并没有一致看法，但是这些做法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对资源的无效利用（比如保护不充分）；第二，某些参保团体面临的风险溢价如此之高以至于它们不买保险，因此当其成员生病时需要由整个社会为他们买单。[37]作为应对措施，许多政府要求至少最低限度的义务保险，或提供公共部门安全网。[38]

向所有人提供医疗的社会承诺的潜在的哲学根据似乎很有吸引力：每个人都有生存权利，这种权利不应该以收入为条件（健康是一项基本权利）；健康的人口更具有生产力（工具视角）。社会公正性要求为那些健康状况不好的人提供帮助，这一原则已经被广泛接受。[39]但是，医疗服务需求可能与一些特定的标准相关，比如延长寿命，这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因而，必须有医疗配给，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社会都面临内生于信息问题的“错误权衡”：没有给需要的人提供服务，但是给不需要的人提供服务。在多数情况下，配给形式会以非正式的方式在医疗服务部门的内部决定。提供更正式的并且能够获得广泛道德支持的方法并不容易。

教育。教育提供了进一步的例子。出于对教育服务的权利和成本/质量的考虑，会导致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的结合，在此，制度安排会对结果产生深刻影响。我们在这里也不会深入地谈论细节问题，很多问题已经在其他地方涉及。教育使得人们能够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这可以被看作一种权利。教育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在许多国家，父母或监护人让孩子接受教育，以及国家为一定年龄阶段的儿童提供受教育机会已经被看作是一项义务。同健康一样，也可以认为个人有权利购买他想要的私人教育。[40]

但是，难点在于教育的权利到底多大以及应该怎样提供教育。同健康一样，有教育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无限制的权利，也不意味着由国家来提供教

---

37 正式地，这里产生了“搭便车”问题——不管他们是否有资源，政府不能承诺向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服务。这一问题类似于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政府不能说不帮助那些在工作期间没有进行充分储蓄而在退休后不能为自己提供像样生活水平的老人。

38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个主要问题是公共部门医疗服务费用的不到位。考虑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财政约束，它们自然会尽可能地收取费用。收费能够增加资源利用的效率。但是它在减少一些人过度消费的同时，也会导致另一些人消费不足（相对于理想的医疗水平而言）。

39 事实上，人们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健康问题是个人行为所致吗？在一些文章中，我们谈到了公共医疗的供给削弱了对健康生活的激励。

40 同健康一样，教育供给也是有弹性的，所以一些人的更多消费不会导致其他人的更少消费（至少从长期来看）。教育的不平等和医疗的不平等不能等同。获取教育的不平等能导致社会分化和分裂以及贫困阶层和精英阶层的永久对立。

育。对于成人（比如18岁以上），我们可以认为个人和家庭有责任自己解决教育问题。但是我再一次强调，相关市场非常不完美，制度安排非常重要。通过贷款为教育融资不像看起来那么直接明了。人力资本不容易作抵押，银行跟踪借款学生的成本很高。这种跟踪需求进一步说明在公共部门可以比私人部门在这方面管理得更加有效。[41]国家可以比私有部门更好地对个人进行低成本实时跟踪。国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例如通过税收或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上述跟踪。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关系的制度安排最终依赖于产业或活动的结构。[42]

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不应该挑选获胜者，我们并不清楚政府是否比市场做得更好。产业政策也不应该判断某些生产或消费行为内生地比其他行为更好。前共产主义国家通过牺牲服务部门来促进重工业发展，这种做法是理想主义和偏见的一个明显例子。由于对选择施加限制，极大地损害了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有关资本市场、风险和技术外溢方面，存在一些重要的产业政策问题。

资本市场通常不能为风险较高、期限较长的投资项目提供融资和分担风险。政府或许能够通过提供适当的保护、保险或促使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建立来帮助私人市场的发展，其他的选择还有发展银行。

有许多以技术知识为基础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发展需要投资支持，但是通过知识产生的收益不能完全为投资者所有（其他人可以分享收益）。这就是具有外溢或正外部性的领域。政府通过提供知识产权能够部分地进行帮助。另一方面，这种制度不仅有管理上的成本，而且更根本的是限制了知识的获得。知识一旦被生产出来，传播成本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政府应补贴或直接参与研发活动。这些观点实质上就是为什么计算机芯片的生产确实比土豆片的生产更值得政府支持的原因。

不断变化的战略。在本文的大部分篇幅，我们都在描述市场经济中政府

---

41 在美国，直接贷款项目提供了私人部门不能提供的贷款形式（比如根据个人收入每年进行还款），并且它们整体的贷款成本似乎要比私人部门的贷款成本低。可以设计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向私人部门借贷必须拍卖掉自己的放贷权利，从而保证了支付给私人企业的溢价不会过多。

42 我们仅仅涉及了教育中公私合作关系的一个方面。在诸多国家，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教育中的作用仍然存在争论。争论通常包括效率之外的问题。私人生产的支持者认为竞争将提高效率。私人生产的批评者认为教育在很多方面与传统商品不同，标准的竞争模型在这里不适用（例如，消费者不清楚他们购买的是什么；消费者父母而不是消费者自己进行决策；在任何地方，通常只有有限数量的学校，所以竞争顶多也是有限的）。私人体制会导致更多的社会分化，对经济有长期的不利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对公共教育的批评力度更大，但是，如果用竞争市场提供教育，教育市场竞争的不完美竞争会产生更多的根本问题。

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容。但是，我们还没有关注转型过程，或者说一种发展战略向另一种发展战略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转型问题可以归结在我们一直描述的战略类型中。在一个动态经济里，正如上面所述的，适当的公私结合要被用于投资、增长和改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战略得到广泛重视，一些国家面临着战略转变问题，从不重视市场转向重视市场。事实上，许多国家面临着体制内产业和制度的历史遗留问题，历史体制强调政府对经济活动细节的控制，或者通过公共所有，或者通过对私人活动施加很强的限制（包括反对贸易的倾向）。因此，从一个体制转向另外一个体制的任务非常艰巨。[43]

在战略转变过程中，竞争、预算硬约束和宏观经济稳定在促进战略转变和建立正确的激励方面至关重要。这些都可以很快实现，但是制度建设需要更长时间，也需要很多努力。这些任务的广度和深度意味着这一过程不能延迟——不会很快或自动发生。建立法律框架、法律制度、金融制度和重组产业需要时间。国家必须在自己的重新设计中发挥积极作用。

如果实际利率很高，投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将缺乏吸引力。现在的高利率时代使得这些问题更加艰巨。因而，提高世界储蓄水平和减少不确定性至关重要，只有这样实际利率才会下降。

然而，在认识到制度改变的困难后，一旦制度建立起来，我们也会理解在调整过程把事情做好的重要性。我们不能轻率地说："这个制度安排只是为了现在，以后再进行调整。"产权和特殊利益很快建立起来，即便是暂时的制度安排也有自我维持的方式。因此，在私有化之前打破政府垄断会比直接私有化一种垄断容易得多，而且在反托拉斯法通过后，通过执行法律来阻止受限制的垄断行为也更为容易。

六、结论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关于发展过程、政府作用和计划作用的观点发生了

---

43 任何变迁面临的挑战就是它对不同集团的不同影响。反对变迁的通常是受到不利影响的人。即便赢家得到的远比输家失去的多，输家还是会对变迁进行有效抵制。甚至当他们得到损失补偿时也会抵制变迁。补偿通常只是对短期损失进行补偿，他们担心补偿最终会取消，从而使他们变得更加糟糕。允许那些规模较小、组织良好、在特定变迁中受损的集团支配社会变迁，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制度僵化。"水涨船高"的说法太过随意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政策必须考虑那些受到不利影响的人们。受损者认为，应该只是关注公平（在很多情形下，意味着只是保护那些正在享受租金的人们，例如从控制政府垄断中得到租金），这在长期上会导致每个人都变得更差。

很大变化，我们对发展是可能的充满信心。尽管市场处于最成功发展的核心，政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认识到，政府的作用应该而且已经受到限制，政府作用应该比以前的计划文献里设想的指令和控制方法要小很多。我们对政府面临的限制有了更好地理解，既有对资源的限制也有对控制的限制；我们对政府行为影响经济活动的种种间接方式也有了很好地理解。

在考虑发展战略时，思考一下国家战略和公司战略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有用的。两种战略都包括了三个组成部分：设定和阐明目标，提出组织设计，明确一系列议程。当然，一项有意义的战略必须是能够执行的。我们认为可以把发展战略的目标表述为提高生活水平（不只是增加 GDP），以及其对环境、教育、健康、机会（广义上的）和政治权利的影响。同时，我们认识到国家的目标和公司的目标有很大的不同。民主过程可以选举政府来进行治理，但是并不意味着在目标上达成了共识，也不意味着目标是明确的。一些政府把它们的部分工作看成是建立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不应该期望这些价值观具有在公司中那样的黏合力。

过去的计划模型实质上是完全信息、完全确定和完全控制下的最优化模型。通过价格、税收和奖励（就像委托—代理模型体现的激励相容）引入间接控制时，模型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很不相同的模型把政府和私人主体看作是动态博弈的参与者。在这个博弈中，政府和个人讨论并建立规则，政府由不同的个人和团体组成，他们各有自己的议程。我们认为，分析政府的作用应该利用委托—代理和博弈论方法才能使之更加丰富。制度设计不只是一个最优化问题，也是在现有基础上找到各种情况下都能良好运转的制度的问题。因而，发展战略必须建立在对目标更广的解释基础之上，包括目标来自哪里，目标必须通过什么制度起作用以及目标必须与什么制度一起起作用。

制度或组织设计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把经济中的各种参与者/制度看成一种合作关系。发展战略关注合作关系中的责任分配，以及建立影响经济中的每个参与者的制度基础（通过影响激励、信息流和交易成本）。这个制度基础不仅包括了基本的法律结构（定义了产权，包括适用于知识产权、合约、破产和债务的法律），而且保证了竞争市场以及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健。政府必须建立起合作框架，保证物质基础设施（保护消费者免予基础设施控制者滥用垄断权力）、教育和健康的供给。

作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这里建议的组织方法显然不同于与前苏联中央计划委员会（Gosplan）相关的组织方法，也不同于标准的企业行动计划。“中央首脑”（central headquarters）只能（幸运地）的对经济参与者进行有

限控制，尤其是在民主社会，他们掌握的经济参与者的行动信息非常有限，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作为发展战略一部分，制度确实影响行为，但是它们并不直接控制经济参与者的行动。政府的作用不仅是帮助创造制度及其赖以运作的制度基础（例如审慎监督的银行、债券和股票市场证券交易委员会），而且从国家利益出发通过合作行动的方式建立起支付机制。[44]给定不确定性和有限信息，找到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良好运转的制度安排，从这一意义上强调制度安排的普遍性非常重要。

发展战略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它的决策内容：鼓励哪个部门、不鼓励哪个部门；是否以及怎样在初级和中级教育、基础研究和技术改造上投入更多资金。这里存在公司战略和国家战略表达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公司战略通常以确立公司的资源和特殊性质开始，关注这些资源能够产生（动态）比较优势的领域，并寻找利基市场——公司的租金不会因为竞争者的进入而很快被侵蚀的领域。国家战略也可以从确定基本的特殊资源开始。它们也关注动态问题：既可以发展国力又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竞争力的领域。

然而，国家战略主要关注政府相对于市场自身作用的特殊作用。因此，国家战略特别关注市场失灵，即资本市场不完美带来很大溢出效应和局限性的领域。它还特别关注政府在创造条件促进市场繁荣的作用——不仅包括制度基础，还包括宏观经济稳定，这对长期经济表现非常关键。竞争和开放对技术进步非常重要，技术进步本身又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因此，国家战略和公司战略的根本不同在于，政府主要关心或应该关心的是让其他团体从政府行动中获益，而公司主要关心自身利益。当然，以这种方式看问题，我们并没有假定存在一个仁慈的、全知的政府。发展战略应该考虑的是，根据政府的行为、能力和知识，政府期望得到什么。

这使我们直接考虑到战略的执行——不考虑执行问题的战略不是一个好战略。执行能力依赖于战略本身的动态一致性。如果存在显著违背承诺的激励，人们就不会相信战略。程序、制度和工具应该足够简单，能够与参与者的能力相匹配，而不管参与者是公共主体还是私人主体。在这一阶段，我们只能强调执行问题的重要性。发展战略的执行（至少像这里想像的）反映了公共部门内部的组织决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必须是重组公共部门的战

44 关于这一领域的最近一些文献提出了一种观点，要建立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也是激励相容的政府干预，换言之，即使当政府不会被迫遵守承诺时，也要通过对政府进行支付以促使其采取行动。

略，按照公共部门更有能力执行发展计划的方式进行重组。正如前面指出，这就要求计划是激励相容（负责执行计划的人这样做符合自己的利益）和动态一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执行计划的人按照所承诺的或最初计划去做符合自己的利益）。我们知道很多政策能够增加成功执行的可能性，它包括：对业绩、能力和正直进行反复检查和奖励；支付“效率工资”，即不要把工资压低于体力和精力的消耗水平；对项目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事前和事后评估；设计各种政策以减少政府官员腐败的可能性。

我们认识到，关于国家的适当作用和政府经济发展战略不可能达成共识。相当普遍的共识可能只是出现在以下需求上：国防、法律和秩序；市场和合约的基本制度基础；宏观稳定性。但是，这里陈述的观点远远超出了政府作为“守夜人”的角色。如果没有一个积极的政府去创造良好的条件，对变化做出反应，与市场一起提供单靠市场不能提供的健康、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市场本身不能带来生活水平的广泛改善。国家作用的定义方式和国家服务的传递方式，可能是一个社区长期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农业组织理论

农业组织经济学：理论、实践与政策*

本文代表了农业组织经济学时代的到来——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农业组织经济学致力于研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中的市场和非市场制度。农业组织经济学研究这些制度如何影响资源的配置和分配，这些制度如何演化以及如何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过去 20 年中，这一领域一直在缓慢而稳定地发展，日益兴旺；到 1987 年我们计划出版一本关于农业组织经济学的书时，已经有许多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

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正确地指出，经济分析需要考虑制度因素。但是他们常常不能解释这些制度的起源，从而无法预测制度如何随着新的经济条件而发生变化——就像制度在过去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一样。

农业组织经济学将解释农业部门的经济制度作为它的目标。经济制度是指一个公共的规则体系，它规定了个体之间可以进行哪些交易，同时为这种交易提供激励。农业部门中的经济制度包括市场和产权、土地和牲畜的占有（使用）权体系、家族内部共同保险的责任，以及由隐性合约或者社会规范决定的其他交换制度。

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一样，农业组织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的很多方面体现了对经济问题的“理性”反应。这里的理性是指给定个体所拥有的信

---

* “The Economics of Rural Organiz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K. Hoff, A. Braverman and J. Stiglitz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1993, pp. 1 – 29 (selection from book).

息和机会，他们将选择促进自身目标实现的行动。[1] 但是，正如阿罗（Arrow，1951）所强调的，"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有很大差异。而下文将要讨论的最新研究，已经证明在不完全市场、不完美信息或者相互支持的社会制裁网络（mutually sustaining networks of social sanctions）的情形下，结果通常不是帕累托有效率的，即不是"集体理性"的。

一、农业组织经济学的起源

在过去的30年中，由阿罗和德布鲁（Arrow and Debreu，1954）严格表述的新古典模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标准"模型；以其作为基准，其他模型可以方便地与之比较假设和结论的异同。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所有人拥有相同的信息，并且没有交易费用；尽管个人可能不是全知全能的（perfectly informed），但在模型中个人不能利用资源获取更多信息，个人信念也不受其他人行为或行为结果（比如市场中出现的价格或者交易的商品数量）的影响。[2] 这些假设的一个含义是所有商品的市场都存在，包括期货市场和各种风险的市场。[3] 经济关系可以被简化为价格关系，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以换取货币，然后一个经济关系就结束了。因此，这个模型中不存在市场和产权以外的制度。

当市场机制运行良好时，标准的新古典模型是分析资源配置的强有力工具，但它不适合处理市场缺失、价格无法调整到市场出清水平时产生的数量约束以及非市场交换的情形。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试图解释下面两个问题的

1 理性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中的使用至少还有两种其他方式。一些人认为理性仅指个人行为具有一致性；另一些人则认为理性是指在一个外界的观察者看来，个人的行为显示出对目标的"理性"追求。因此，如果个人的主观概率与客观频率存在显著差异，尽管他们的行为具有一致性（满足理性的第一种含义），但并没有合理地追求他们的实际目标。最近的实验心理学文献提供证据表明，人们的行为通常不满足理性的第二种含义。

2 尽管阿罗—德布鲁模型可以容纳某些信息不完美——个人不需要知道明天是否会下雨——但是不得不排除其他的信息不完美：比如，当明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能够确定是否已经下雨。所交易的"商品"在分析中被视为原始概念。

有些人试图扩展阿罗—德布鲁模型，以包含内生性信念（例如，Radner，1968）、交易费用（例如，Foley，1970；Hahn，1973），或者不完全市场（例如，Borch，1968；Diamond，1976）。现在来看，这些早期的尝试都不太成功。他们都采用了高度限制性的假设，当放弃这些假设时，阿罗—德布鲁模型的所有基本命题都变得不再可靠。例如，我们下面将指出，只有在非常限制性的条件下，经济才是帕累托有效的——即使考虑进信息费用和与建立市场相关的交易费用。参见 Greenwald and Stiglitz（1986，1988）以及 Stiglitz（1985）对一些结果的评论。

3 这个结果还要求凸性假设——生产没有固定成本。这是整个阿罗—德布鲁模型都隐含的假设。

正式模型才发展起来（现在这方面研究仍然非常活跃）（a）现实经济中许多市场特别是风险市场缺失；（b）许多交易不仅仅基于价格。这些研究涉及对新古典模型进行扩展，使其允许交易费用和个人拥有信息差异的存在。至少从亚当·斯密开始，人们从直觉上就认识到上述理论扩展的本质意义;[4] 但是通过将其纳入正式的模型，这些研究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新古典经济学原有的理论承认商品、信贷和劳动的交换通常不是通过非个人化的价格机制来实现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有它识别出的基本经济力量——例如供给和需求法则以及产权——才是重要的。唯一相关的制度分析是执行产权和合约的法律结构。

相反，基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研究，新的概念框架认为：由于我们无法实现完美市场所依赖的条件，价格制度内在地受到约束。由于交易费用以及更根本的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一些市场不存在，另一些市场则无法被近似地看作竞争性市场。在这一新的理论框架下，制度至少有两个重要作用：首先，它们是对市场缺失的反应；其次，它们有助于克服（或者，有可能恶化）阻碍完全竞争市场形成的信息问题;[5] 但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很有可能会限制许多市场上的竞争。

解释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特殊现象的需要，促进了这一新概念框架的形成，而且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域——农业组织经济学。冒着过于简化的危险，我们将这一领域的起源归于三篇论文：张五常（Cheung，1969），阿克洛夫（Akerlof，1970）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74）。张五常和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主题是解释分成制——这种制度非常普遍，但却显得没有效率，因为工人收入似乎低于工人努力的边际回报。阿克洛夫的文章论证了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可能摧毁一个市场或者使之变得非常不完全。

1. 价格制度的缺陷：交易费用

张五常（1969）提出分成制产生是因为它具有分散风险的优点，同时它的交易费用低于保险合约和有例外条款（escape clause）的固定租金协议——例外条款规定在哪些条件下，租金支付可以延迟或者减少。[6] 他认为

4　关于逆向选择，参见Smith（1976 [1776]，p. 379）；关于道德风险，参见Keynes（1936，p. 144）。

5　Arnott and Stiglitz（1991）。

6　Cheung写道（1969，p. 32）：随着增加例外条款的交易费用增加——特别是定义市场上不同水平“饥荒”的费用和在每一种饥荒水平下通过谈判减少租金的费用——从这些条款中能得到的收益会非常小，从而市场不再进一步（对例外条款）“细化”。转而选择一种替代性工具，即分成合约，在其中隐含了多种“例外”条款，并且租金支付也不再是固定的。

分成合约会规定所需要的劳动努力，从而分成制不会导致无效率。这些合约都非常灵活，因此工人的任何额外劳动事实上都可以得到完全补偿。

Cheung 的文章可以被视为科斯（Coase，1937）企业理论引发的经济学交易费用方法的大量现代文献的先驱者之一。交易费用方法强调合约成本在形成一个经济中制度安排时的重要影响。[7] 这种方法着重研究由交易费用所导致的市场交易的特殊（通常是非价格的）形式，并且将交易而不是市场作为基本的分析对象。巴德汉（Bardhan，1989，p. 4）用其主要贡献者的名字将交易费用方法命名为“Coase-Demsetz-Alchian-Williamson-North（CDAWN）”学派。[8]

2. 价格制度的内在缺陷：逆向选择

第二篇对农业组织经济学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是乔治·阿克洛夫在1970年关于质量不确定性和“柠檬”效应的论文。他称这篇文章为“一种努力尝试，为‘在不发达国家中开展商业活动很困难’的观点提供一个理论框架”（Akerlof，1970，p. 488）。

他认为商业困难的原因在于逆向选择。当商品被市场交易的一方（通常是卖者）视作是有差异的，而被另一方视为是无差异的（通常是买者），[9] 这时逆向选择就会出现。拥有最高质量产品的卖方将会撤离市场，因为其产品不能同其他产品区别开来，而只能按照市场平均质量定价。更一般的，市场中以次充好的卖者会将诚实的交易者挤出市场。阿克洛夫的文章描述了逆向选择可能导致的一种（尽管是极端的）结果——零交易。这篇文章还描述了由这种信息问题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例如故意向大米中掺石子并以（纯）大米的价格出售，以及发展中国家范围非常有限的信贷市场。阿克洛夫的论文提供了也许是第一个可以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模型。

阿克洛夫（1970）的论文，以及阿罗（Arrow，1963）、斯彭斯

---

7 这种方法也为分成制提供了不是基于风险的解释。例如，Murrell（1983）证明了当土地质量和未来价格都不可知时，如果租赁关系持续多个时期，那么分成租金相对于固定租金协议将更有效率。分成租金的价值随着价格的变化而波动，这节约了合约的再谈判成本。

8 参见 Williamson（1979）和 Eggertsson（1990）对这一学派的概述。Williamson（1985）引用了采用交易费用分析方法的一组实证研究。

9 正如注释2中所说的，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商品被作为原始概念。对于商品的定义是明确的，而且对于出售的商品质量的信念不受市场上发生的任何事情的影响，包括商品出售的价格。Akerlof 正是对这个假设作了变化。

对于逆向选择问题的更早期讨论及其对市场失灵的含义，参见 Arrow（1963）。关于几个发展中国家市场中逆向选择的案例研究，参见 Klitgaard（1991，chapter 3 – 5）。

(Spence，1973)、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75）以及罗斯切尔德和斯蒂格利茨（Rothchild and Stiglitz，1976）的文章是一大批关于逆向选择文献的先驱。这些文献讨论了对质量不确定的商品（工人、土地、投资项目或者管理者）的区分问题。他们强调了辨别哪些商品更有生产力、更有效率，或者在其他方面更好的困难和（从个人和社会角度的）重要性，以及市场如何对这些信息问题做出反应。[10]这些文献表明：一旦我们将新古典模型扩展，使其包含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扩展的模型就会推出某些市场特别是风险市场的缺失，而其他很多市场会是薄的（thin），因而竞争是不完全的。

3. 价格制度的内在缺陷：道德风险

除了逆向选择，还有第二个原因使得市场机制内在地受到信息问题的限制，这就是道德风险。道德风险的正式提出比逆向选择还要早一些。当个人采取行动最大化自身福利但却损害其他人的福利，而信息问题使他免予承担由其行为带来的全部损失，这时道德风险就出现了。道德风险问题最初是由阿罗（1963）和鲍利（Pauly，1968，1974）在他们关于医疗保障和保险市场的研究中正式提出的。在保险的背景下，道德风险问题是指被保险人在买了保险后变得更不谨慎：因为如果发生事故，损失的一部分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而在决定行为的谨慎程度时，被保险人不会考虑保险公司的成本。这说明存在道德风险时，某些形式的保险市场可能不会存在；政府干预会解决一些问题，但也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政府补充不完善的保险市场的尝试也将面临破坏私人保险市场的同样的道德风险问题。[11]

4. 非价格控制作为对市场缺失的一种反应：委托—代理关系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阻碍许多市场中交易的进行，有可能会产生其他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这一角度为分成制提出了许多解释。这些解释与张五常的解释大不相同，并且在效率方面的含义也很不一样。

当监督工人变得不可行（或者成本非常高）时，像张五常那样假设雇主可以完美地控制工人行为就是不合理的。相反，监督工人的高成本将会使基于努力的合约变得不可行。一种有效的激励佃农的方法是激励性合约。斯

---

10 许多文献强调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性，即一些人对产品质量知道得比其他人更多。更近期的文献关注当所有参与者都不知情时会出现的问题，必然存在某种学习过程。

11 保险市场也受逆向选择问题的妨碍，Rothschild and Stiglitz（1976）已经正式地说明了这一点。Hazell，Pomareda and Valdés（1986）记录了发展中国家在农作物保险项目中遇到的一些信息和激励问题。

蒂格利茨（Stiglitz，1974）认为由于佃农努力和他所面临风险的市场不存在，分成制是对这种市场缺失的一种反应。与分成制削弱了佃农激励的标准教义相反，这篇文章认为相对于传统的工资合约，分成制（类似于工业经济中的计件工资制）事实上有更强的激励作用。[12]分成制对于地主和佃农都更有利，因为：（a）相对于监督成本很高的工资制度，地主的监督成本下降了；（b）相对于监督不完全的工资制度，产出增加了；（c）相对于工人支付地租但不能利用风险市场的情形，佃农承担的风险下降了。

因此，尽管斯蒂格利茨同意张五常分成制有效率的论断，但他并不同意张五常的结论——Cheung 认为在没有分成制时产出是相同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其他早期的学者认为分成制会削弱激励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存在监督成本，分成制要优于其他制度。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张五常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种“交易”费用，监督工人努力的费用。[13]

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不完美信息框架下的其他研究认为分成制的出现是由佃农努力的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缺失共同导致的，[14]或者是由佃农和地主共同努力的市场缺失导致的（Eswaran and Kotwal，1985）。在后一种模型中，分成制是地主和佃农之间的一种合伙人关系。其中地主提供专业的管理服务，而佃农则负责监督他自己和他家庭的劳动。一份分成合约为双方都提供了努力的激励，从而相对于只为一方提供激励的租金和工资合约，产生了更好的结果。由于随经济发展而来的信息扩散趋向于使所有人都能得到技术知识，这个模型解释了随着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分成制会让位于固定租金合约的现象。

斯蒂格利茨（1974）关于分成制的文章和罗斯（Ross，1973）同时期的文章是委托—代理关系理论方面大批文献的先驱。这些文献强调在保险市场和分成制中出现的激励问题，也同样出现在资本、劳动、土地和产品市场里更广泛的经济关系中。[15]这一文献认为许多观察到的制度安排是对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激励问题的反应。为了在另一个背景下阐明代理理论的解释力，

12　关于分成制文献的一个简单的综述，参见 Stiglitz（1987）。

13　然而 Cheung 强调签订复杂的应变性（contingency）合约带来的高交易费用，这是正确的。制定与产出成线性相关的合约的成本相对要低得多。奇怪的是，许多正式的委托—代理文献似乎忽视了这个基本常识：这些文献中常常包含高度复杂的非线性合约。

14　这一逻辑可以一直追溯到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Binswanger and Rosenzweig，1984，p. 644）。

15　Arnott and Stiglitz（1988）表明了同一个正式模型如何应用到分成、雇佣和信贷合约中。

我们在下面讨论它是怎样被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中的合约的关联性(interlinking of contracts)。

合约的关联性描述了合约双方同时在几个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情形，而一个交易的条款依赖于另一个交易的条款。证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中存在广泛的关联合约。[16]对关联合约的一种简单解释是，这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实物交易。关联合约存在的原因是为了避开不完全市场以及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17]这并不奇怪，因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外部性的基本形式（Greenwald and Stiglitz，1986）。跨市场的合约关联可以将这些外部性部分或者全部内在化。

例如，地主可能将肥料的补贴销售与分成合约联系起来。由此带来的肥料使用的增加，一般会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而这又会提高工人工作的激励，从而（相对于农民租用土地的制度）可以部分抵消分成制下工作激励的下降。

合约关联另一种常见形式是信贷和销售之间的关联。在发放大额贷款以前（以及发放贷款期间），贷款人会要求首先成为未来借款人的产品的唯一批发商。这将有助于潜在的贷款者对农民的偿还能力和意愿做出判断（从而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由此可以提高农民获得贷款的可能。从这些方面来说，合约关联可以带来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善——即能够使合约双方的处境更好。但是能否实现这种改善还依赖于一般均衡效应（在当事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或者依赖于合约关联对于双方谈判力量的影响（在非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将在下文讨论这个问题。

5. 非价格控制作为对市场交易的支持

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完全依赖价格激励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这就是为什么除了产权体系以外，不存在其他制度的原因。引入信息不对称使价格机制不足以提供效率，从而为其他制度的产生创造了激励。类似于分成制和关联合约的安排，可以通过价格以外的方式发生作用，从而削弱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影响。将一个时期的交易与其他时期的交易联系起来的法律制度也可以减轻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

16 关于关联贷款人，参见带星号脚注所指书中的第7、8、9、10章。

17 关于关联合约的理论文献非常多。参见 Braverman and Stiglitz（1982，1986）以及 Braverman and Guasch（1984）。Bardhan（1989，chapter 12）做了一个简单的综述，Bell（1988）则做了一个涵盖广泛的文献综述。

希尔（Heal，1976）对跨期联系（intertemporal linkage）的作用给出了一个阐释。希尔考虑了一个农业经济，其中相邻的村庄每一时期都要交换一部分农作物。这些农作物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在交换的时候，生产者知道其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买方则不知道。这种情况下的一期模型正是阿克洛夫（1970）提出的“柠檬”市场理论，但是希尔证明在多时期的情形下存在一个均衡，其中不会出现逆向选择。在只有一期的情况下买卖双方之间的外部性，在多期的情形中被内部化了。更一般地，相对于单期关系，在重复关系中，欺骗——无论是在努力程度（道德风险）还是在质量（逆向选择）方面——而不受惩罚变得更加困难。[18]

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非市场的控制手段被内在化为道德准则。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程度依赖于这些道德准则。在一场具有启发意义的争论中，阿罗（Arrow，1968）向鲍利（Pauly，1968）强调道德风险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本书（指带星号脚注提及的一书——译者）对农村借贷市场的研究证明了交换的范围依赖于亲缘关系和非市场制度。

二、农业组织经济学在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的地位

在前一部分，我们把农业组织经济学的起源追溯到基于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新的新古典范式的出现。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把农业组织经济学放在发展经济学的其他研究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在过去的40年中，发展政策的重点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相应的研究方向也发生了转变。在这些转变中有三个主要的因素：（a）计划；（b）制度主义传统；以及（c）芝加哥学派。我们将农业组织经济学视作制度主义传统和芝加哥学派的理性主义方法相结合的结果。

1. 计划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被模型化为一个经济必经的、一系列明确的阶段（就像一个人要经过许多明确的阶段才能成熟一样）。[19]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的产出和政府的职能也有不同。发展的早期阶段的根本特

18　在无限期和折现率为1的假设下，可以得到有效率的结果。当折现率小于1时，情况变得非常微妙；如果折现率足够低，也可以得到有效率的解，虽然这可能要求非常复杂的策略。参见Abreu（1988）。

19　这一传统的经典性研究是Walt Rostow（1960）。发展阶段的观点历史悠久：马克思认为发展过程要经过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阶段，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最后到共产主义。

征是高比例的资本积累，从而为重工业的扩张提供资金。

公共政策的市场失灵方法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政府需要通过干预来矫正一系列明确的市场失灵——即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和市场缺失。关于计划的文献认为缺失的市场中最重要的是期货市场——在未来交割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市场。这种观点认为需要政府计划投资以纠正这种市场失灵，尤其是重工业，由于高昂的固定投资和沉没成本使得在国内市场难以展开有效竞争，特别需要政府干预。但是大部分计划文献都没有充分考虑国际竞争的可能性。

线性规划和动态规划中的最优化技术为计划者提供了市场之外的另一种分析方法。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国家相继采纳了发展计划和规划。

在过去的 50 年中，出现了对计划的偏离。就像学术潮流的许多其他转变一样，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由发生的事件推动的，另一方面是由观念的变化推动的。在那些计划曾经扮演了特别重要角色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效并不显著。而且在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在所有的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计划都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另一个导致计划在经济中重要性下降的原因是世界经济的开放：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对重工业缺乏竞争和计划实践所强调的物资平衡问题的顾虑都变得不再重要。制定产业政策也许仍然是有必要的，但是普遍的计划指导经济已经不适用了。

在放弃计划实践的同时，经济学家也更加强调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在发展经济学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宏观经济的计划模型对城市—农村之间的人口迁移以及激励和选择问题不够重视。微观经济问题，比如项目和管理团队的选择，和投资发生的部门和产品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处理这些问题需要企业家才能。由于它的等级制度，政府的官僚主义不仅无助于企业家才能的产生，而且会将稀缺的才能从与企业家才能紧密相关的风险承担活动转移到安逸的行政事务职位上去，并且通过施加管制使得企业家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

因而对于发展的计划方法，存在几种截然不同的批评。首先，它低估了国际贸易提供的机会，并且假设政府能够控制资源配置的各个方面。计划的拥护者可以很容易地反击这种批评：只需要建立更好的计划模型，包含国际贸易环境、政府的有限控制，并且对政府无法控制的家庭和企业的行动做出行为假设（behavioral assumption）。

第二种批评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缺乏计划，而是缺乏企业家才能。计划过程可能不仅无助于经济发展，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

最后一种对计划的批评来自对政府干预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日益重视。经济学家不能忽视公共选择和政府内部的激励问题。最好的经济计划，也可能被责任和执行的低劣程序（lax procedures）所抵消，或者被面对市场力量寻求保护的既得利益者所破坏。

2. 制度主义传统

发展经济学的制度主义传统强调非市场制度的经济职能。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利用社区力量来解决争端的制度。在美国制度主义学派的领袖人物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看来：

> 如果交易要和平地进行而不诉诸交易双方的暴力，就必须在交易中存在另外一方，就是法官、牧师、酋长……他们能够在交易双方所属群体的集体力量的协助下做出决定并解决争端。(Commons，1924，p. 67)

因此，经济问题是不能从法律、社会和政治体系中孤立出来处理的。

制度主义传统还强调经济和政治条件的相互依赖：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权力分配的变化，而这反过来会导致经济条件进一步变化。“一般来说，均衡并不存在”（Myrdal，1982，p. 312）[20]。

制度主义传统使人们注意到新古典经济学高度选择性的制度假设，并且使人们注意到需要把实际制度和观察到的习俗作为经济分析中所用数据的一部分。但是大多数制度主义文献是描述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这些文献没有提供一种经济行为的理论，因此无法替代新古典理论。并且，它们没有提供一种评判社会福利的标准。因此，制度主义文献不能为解释政府加速发展过程提供理论基础。制度考虑在宏观发展政策所强调的计划过程中不起作用，并且很难被纳入这种分析之中；计划过程不强调决策单元，即组成社会的家庭和企业，而仅仅关注他们生产和购买的商品以及他们提供或使用的投入。

3. 芝加哥学派

发展经济学中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芝加哥学派。在将近半个世纪里，芝加哥大学的伟大经济学家，包括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阿伦·迪雷克特（Aaron Director）和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

20　Myrdal 的研究被普遍认为是制度主义最成功的著作，并且与美国制度主义传统略有不同，参见 Brofenbrenner（1985）的综述。在本书（带星号脚注所指一书——译者）第 16 章中，对哥伦比亚土地改革政策的分析试图刻画 Myrdal 所描述的那种相互依赖。

Schultz)，不仅更加完全地阐明了经济理性和竞争市场的含义，而且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学可以扩展到市场分析以外更加广阔的环境中，包括对政府管制机构的行为和家庭内部关系进行解释。舒尔茨和其他学者证明了经济学方法（相对于人类学方法）对贫困国家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他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贫困国家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仅对价格和其他市场因素非常敏感，而且给定所能得到的信息、制度和技术，他们对资源的配置也是有效率的（Schultz，1964）。

使芝加哥学派同经济学其他传统区分开来的不是它的实证性内容——给定面临的机会集合，个人进行最优化——而是其规范性内容（见 Reder 1982 年的综述）。芝加哥学派的许多成员认为私人行动可以实现*全局*（globally）帕累托有效率产出。资源配置的*全局*帕累托有效是指在不使其他人处境变坏的前提下，没有人的处境能够变得更好。相反，两个人之间资源配置的*两两*（pairwise）帕累托有效是指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采取行动，在不损害其中一人的情况下改进另一人的处境。委托—代理模型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它们都是两两帕累托有效的，但是这相对于全局帕累托有效是一个较弱的标准；由委托—代理模型得出的结论对于个人行为的"集体理性"不像芝加哥学派那么乐观（Akerlof，1984）。

一般来说，芝加哥学派把信息视为一种普通商品，可以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价值的原理来获得和提供。例如，斯蒂格勒在对信贷市场的分析中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中获取（生产）完全信息不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存在不完全知识的市场中就不存在'不完美'"（Stigler，1967，p. 291）。这个分析没有考虑不完美信息对市场竞争结构和市场是否出清的影响，这些问题将在本书霍夫和斯蒂格利茨（Hoff and Stiglitz，1993）中讨论。

芝加哥学派对制度的看法是矛盾的。在贝克尔开创的芝加哥学派的一个分支中，制度可以由标准的理论来解释，而经济学家不辞劳苦地解释制度的事实也正表明制度可能是重要的。然而，芝加哥传统内的另外一个强大分支则认为制度是有效率的。因此，用集中于有效资源配置的简单模型所能得出的资源配置，是对市场配置的很好描述。根据这种观点，私人部门的制度只是一个有趣但不重要的因素。这两个分支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矛盾。在短期内，现有的制度可能并不能保证经济效率，特别是当政府干预抑制了这些制度的自然发展时。在这些情况下，制度的确是重要的。对制度的经济分析让我们明了制度的演化方向以及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制度会如何演化。

如果我们想要研究社会怎样配置资源（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那

么我们只需要研究有效的资源配置——对这种观点，科斯（1960）给出了也许是最清晰的阐述。他分析了存在外部性时，产权的分配带来的结果。他提出：如果没有交易费用，产权分配不同对结果没有影响。只要交易各方不受干预，他们就会达到有效率的解。[21]在有交易费用时，产权配置不同会导致交易费用不同，交易费用不同转而也会对产权配置产生影响。

在发展经济学中，张五常（1969）对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做了杰出的阐释。尽管他提出交易费用能够解释分成制，他也认为分成制的结果（产出水平）与忽视分成制时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同，即分成制没有弱化激励。

科斯的观点强调产权分配的重要性，而产权本身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制度，并且与其他制度一样，产权制度会向着提高经济效率的方向演变。本书（带星号脚注所指一书——译者）第14章和最近对公共财产处理的研究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支持。[22]传统经济学家一直在哀叹"公用地的悲剧"，例如在公共草地上过度放牧和在公共渔场中过度捕鱼（Hardin，1968）。英国的圈地运动——事实上是产权的变化——受到肯定，因为它能带来效率的提高，即使其导致的收入分配结果并不值得称赞。在最近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性（local）公共财产资源（农村里的池塘、草场、河床和薪材等）的研究中，发现了对公共财产使用的很多种限制，要么通过慎重的分配，要么通过隐性的规则，有时还利用精心设计的监督和惩罚机制来强化。这些约束大大限制了与公共持有财产相关的效率损失。这些成功例子中的关键因素是公共财产的使用仅限于同一个小规模社区的成员，并且社区成员共同依赖于公共财产。

这些发现表明局部性（local）制度可以解决地区性公共财产资源有效使用的问题。相反，私有化并不一定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在亚马孙盆地，一些公用地的私有化，由于配套了不明智的税收政策，反而恶化了公用地的使用情况。那些因为养牛农民砍伐森林而受到损害的个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过于软弱，并且在地理上也过于分散，从而难以同养牛者进行谈判以达成协议。[23]

---

21 这有时被称为科斯定理，尽管被称为科斯猜想会更合适。这一结论只在非常苛刻的假设下成立——包括没有"搭便车"（公共物品）问题，并且谈判的每一方对其他各方的偏好都有完美信息。对此的批评，参见 Farrell（1987）或者 Stiglitz（1985）。

22 参见在 Ostrom（1990）及 Dasgupta and Maler（1991）中的引用。这几位作者并没有采纳 Coasian – Chicago 的观点，而是试图确定在哪些条件下个人更可能有效率地使用公共财产资源。

23 参见 Dasgupta and Maler（1991，p. 116）。

4. 农业组织经济学

农业组织经济学消除了几种相互竞争的研究方法之间的隔阂——计划、制度主义传统和芝加哥学派。农业组织经济学和制度主义者一样，强调制度在解释经济行为时的重要性；也像芝加哥学派一样，坚持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但是通过对一系列个人特定（individual-specific）的信息约束进行模型化，可以得到与芝加哥学派非常不同的结论：即一般来说，个人理性和最优化与社会理性不一致。即使“二元”关系——任何两方之间的关系——都是两两帕累托有效的，并且在给定其他经济关系不变的情况下不能获得改善时，全局市场均衡仍然存在改善的余地。政府能够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使得一些人的福利得到改善——例如，通过实施小组借贷计划（group lending programs）或者促进一个地区农作物多样化从而减少总收入波动。这些措施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利的，尽管由个人来实施时私人成本会大于私人收益。[24]

关于制度，阿克洛夫（1984）已经严格证明如果存在相互支持的社会制裁网络，经济上没有好处的制度也可能持续存在。例如，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Arnott and Stiglitz，1991）证明了提供保险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的产生是由于道德风险导致市场无法提供保险——事实上可能使社会的处境更糟，尽管如此，这些制度仍是均衡的一部分。

与计划方法一样，农业组织理论认为某些形式的政府干预是有益的，但是它所强调的市场失灵的类型与计划方法不同。农业组织理论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满足未来需求的投资协调方面的大部分问题。市场价格和影子价格之间的差异的确存在，并且如果政府可以轻易地消除这种差异，政府当然应该这样做。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失败的关键。与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一样，农业组织理论也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至少部分地解释了这些社会发展的失败。但是与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农业组织理论建立了正式的模型来解释这些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设计政策和制度以改善制度的绩效是农业组织经济学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因此，尽管和芝加哥学派一样假设经济人理性并且可以对经济激励做出反应，农业组织经济学否定了芝加哥学派的三个主要命题：（a）在没有政

24 这一论证可以用更严格的方式表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会导致普遍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一般不能通过两两安排（例如分成制或合约关联）被完全内部化。不仅如此，在风险市场不完全时，价格分布是一种公共物品（Greenwald and Stiglitz，1986）。

府干预时，制度必定是有效率的；（b）因此，要研究市场资源配置，只需要研究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模式——可以忽略制度；（c）除了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形，产权（财富）分配对于达到有效资源配置没有影响。

政府干预的另一个原因是：即便演化过程在长期可以清除无效率的社会制度，它的速度也是很慢的。如果凯恩斯（Keynes）关于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格言——“在长期我们都将死去”——是正确的，那么在这里也一定是这样：制度的演化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在某种意义上，芝加哥学派和计划学派之间存在奇特的紧密联系：他们都相信资源配置过程可以独立于制度来研究。然而我们应该记得封建主义和传统社会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的，它们不是自发地在所有地方涌现出来。根据当今的观点，显然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无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识别工业革命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所必需的社会安排方面是否正确，有一个结论必定是对的：个人能够采取福利最大化行为的社会环境对于短期均衡和社会的长期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现在应该很清楚，农业组织理论与早期的市场失灵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两者在几个关键方面存在差异。第一，农业组织理论并不关注计划方法强调的市场失灵——满足未来需求的投资的协调失灵，也不关注标准的部门间的外部性，[25]以及公共物品的供给等。所有这些的确很重要，并且目前为止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农业组织经济学关注的市场失灵是家庭和企业面临的由信息不完美和市场不完全造成的大量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劳动、土地和产品特征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市场缺失带来的问题。第二，由于这些市场失灵在经济中非常普遍，要在原则上和实践中纠正它们，将会比纠正早期分析所关注的市场失灵更加困难。

5. 收入分配、经济效率和农业组织理论

芝加哥学派和农业组织理论都因为过分关注效率问题、忽视分配问题而受到批评。对芝加哥学派来说，这样做有充分理由：正如我们提到的，科斯主张（至少）均衡的基本性质可以独立于产权分配来研究。[26]但是在讨论农业组织理论的近期发展时，巴德汉（Bardhan，1989，p. 238）评论说：

---

25 也不是不太正式的“大推进”理论（Rosenstein - Rodan，1943）或者部门之间的联系效应（Hirschman，1958）。

26 当然，这也是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所传达的主要信息。

如果（旧制度主义者）错误地忽视了制度的微观基础，现在转过来我们应该确保我们的委托—代理博弈和道德风险的理论不会掩盖我们的研究现象中基本的——通常来说是丑恶的——权力关系。[27]

并不是所有的分配问题都可以在新古典框架中合理地模型化，但是正如巴德汉随后所指出的，很多分配问题都是可以模型化的。[28]

对现代经济学家关注效率而忽视分配的批评，存在第二种完全不同的反应。近来，经济学家已经建立了配置效率依赖于财富分配的模型。Hoff 以及 Hoff and Lyon（1992）强调效率和分配问题不可分离是信息不完美和市场缺失的经济中的普遍结论。[29]例如，如果个人拥有私人信息，可以证明一个经济利用外部投资机会的能力对财富分配的微小变化是高度敏感的。这一结论破坏了市场效率性质的传统观点。如阿罗和德布鲁所证明的，一个完全的市场集合可以实现一个稀缺资源集合所能达到的最大可能产出，并且能够穷尽交易所能带来的所有收益。但是一个现实的（realizable）市场和非市场制度的集合，由于受到个体间信息不对称的约束，常常无法实现（最优的）生产或者交易效率。Libecap（1989）和 Kanbur（1992）强调了生产效率依赖于财富分配的另一个原因。他们关心的是地区性公共财产资源的管理（特别是渔业和灌溉系统）。如果所有个体拥有相同的能力和禀赋，通过比较有效率的公共财产管理和自由进入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可以得出在公共财产制度下所有人的处境更好。但是如果个体的禀赋非常不平等，那么通过一致协议（unanimous agreement）建立有效率的公共财产管理制度需要一种支付机制。经验研究表明尽管这种支付机制（sidepayments）存在，它们至多也是不完全的。因此，当存在高度不平等时，有效率的合作协议不太可能出现，并且随着不平等加剧，现存的合作协议很有可能被破坏。

三、农业组织经济学的教训

与经济学的其他新分支一样，通常会面临两个问题：我们是否学到了新

27 Carter（1985）从制度主义传统的参与者—观察者角度，详细阐述了这种批评。

28 Braverman and Srinivasan（1981）描述了关联对分配的影响是不明确的，而 Basu（1986）构造了一个模型，其中存在一个三方的关联关系（例如，店主、房东—雇主和佃农之间），相对于三方关联不存在的情形，房东能够将佃农的效用水平压得更低。

29 这一点可以正式表述为：信息不完美导致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s）和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s）。这些约束使得经济只能达到次优状态，经济状态还随着福利分配的微小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产权分配会产生真实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斯所强调的交易费用。

的知识？我们获得了什么普遍原理或者重要信息？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两个方面。

1. 一些新颖的结论

学者们热衷于寻找普遍原理的例外，以及与流行的传统智慧矛盾的事例。某些特例，比如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吉芬商品（Giffen goods），在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问题是这种特例在政策导向的学科——例如发展经济学——中是否会有作用。

我们的研究挑战了许多主流智慧，但不是唤起人们对特例的注意，而是关注于市场缺失和信息不完美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假设完美信息和完全市场的传统新古典模型才应该被视做特例*。但是许多主流智慧都是基于传统新古典模型的推理。实际上，在顶级研究生院中，替代的范式只是在最近10年中才部分地取代了标准的完美市场模型。[30]

这里有三个特殊的例子，每一个都来自一个重要的政策领域：

- 在信贷政策方面，我们挑战了认为政府干预可以矫正农村非正式信贷市场中利率远高于政府资金机会成本的问题的观点。这种挑战是基于政府金融中介的管理问题，非正式部门的信息费用，以及贷款人之间信息费用差异带来的市场分割。

- 在税收方面，我们挑战了长期以来支持土地税、反对产品税的理论。和风险承担的结果一样，由管理失误导致的不平等对于这两种形式的税收也有所不同。当完美的风险市场不存在时，土地税使农民承担风险所导致的损失，可能抵消增加激励所带来的收益。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观点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有效率的税收体系应该是一个包括产品税的税收组合(portfolio of taxes)。

- 在福利政策方面，我们推翻了扶贫计划中现金补贴总是优于实物补贴的观点。当很难确定谁是穷人的时候，实物补贴会提高援助的针对性，这种收益会超过扭曲穷人面对价格带来的成本。

制度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经济学家）会说，上面的每一个结论他们早就知道了。他们也许是对的。问题是其他经济学家，那些使用更加严格理论模型的经济学家并不同意上述结论。从前认为土地税不会带来扭曲，只有没有受过良好训练或者反动的经济学家才有可能质疑土地税！我们的论述将有

30 新的范式有时被称为信息经济学。如果把新古典理论广义地定义为系统地探讨在约束条件下理性的个人主义行为的含义，那么信息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的。

助于说明许多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中都隐含有误导性的假设。通过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实际制度的了解，以及通过建立包含制度环境因素的模型，我们相信这将对政策讨论做出重要的贡献。

2. 一些普遍的教训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尝试概括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

除了价格和收入之外，市场还通过许多其他渠道相互作用。传统的经济理论强调市场间的相互作用——但是那些相互作用通常由价格和收入主导，或者仅限于价格和收入的相互作用。农业组织经济学对在实际中观察到的更加丰富的市场间相互作用形式提供了一个解释。

图1显示了我们强调的其他的相互作用渠道。如图1所示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商品市场，以及信贷和土地的正规和非正规市场。尽管在特定的环境中需要更清晰的定义，在这里我们用非正规信贷市场指个人主要用自有资金进行贷款，而非正规土地市场指市场上的交易依照习俗法（customary law）进行。证据表明，由于正规贷款人主要贷款给较大的农场主，通过正规信贷市场起作用的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改变非正规市场上借款人的构成，而不是（像一般均衡理论表明的那样）削弱非正规贷款人的市场力量，从而降低他们索取的利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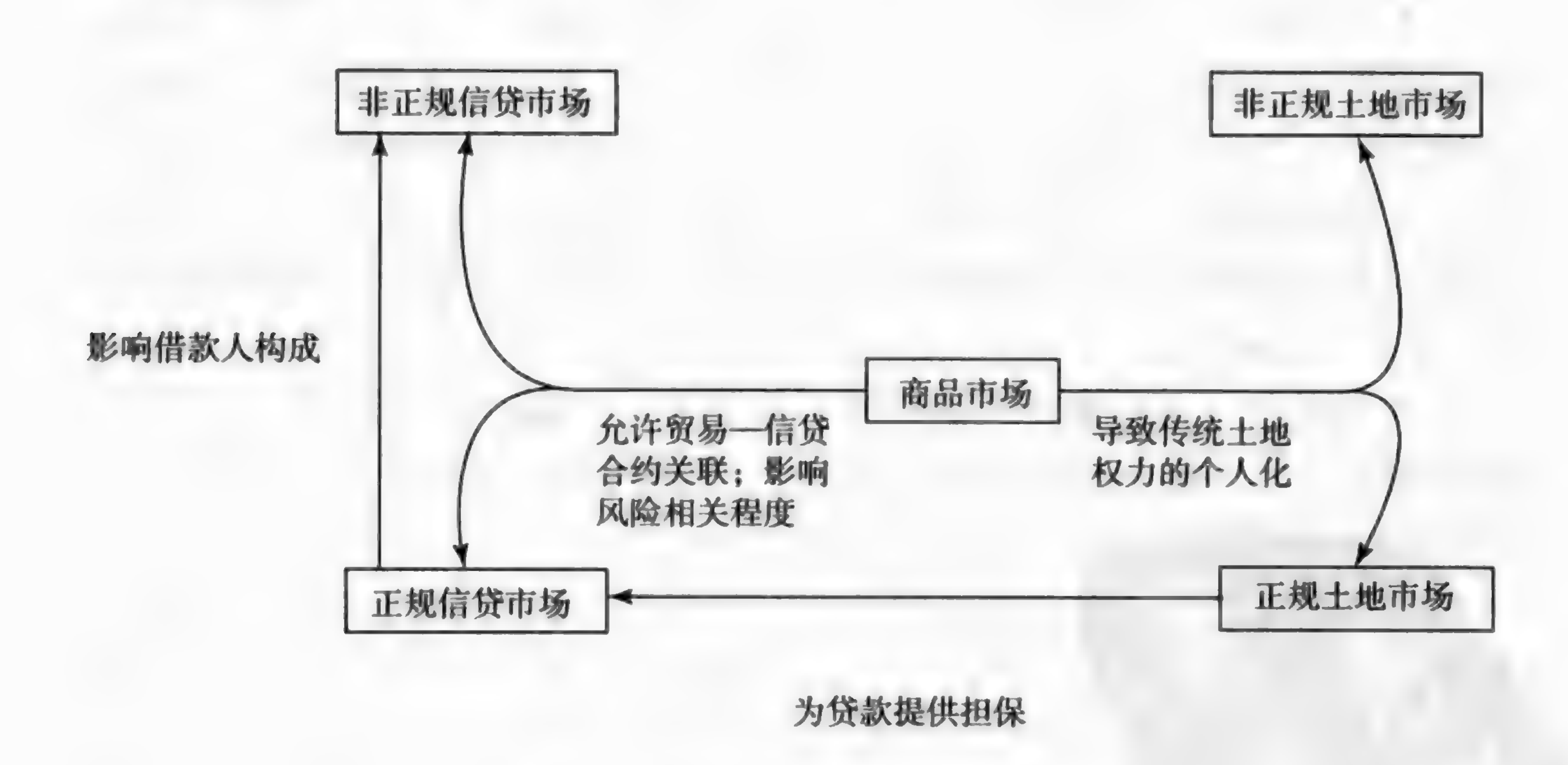


图1 市场的非价格相互作用

交易者—放款人是第一部分概述的商业领域非正规信贷的主要来源。证据表明了生产商业化导致非正式部门出现了交易—信贷合约的关联，成为担

保的一种替代。生产商业化又反过来促进了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发展。[31]生产的多元化减少了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这使得正规和非正规信贷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

证据表明，生产商业化通过创造对新的投入品组合的需求，使得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中传统的土地权利体系发生了变化，使转让和脱离土地更加自由。结果是正规和非正规的土地市场共同扩张。

发放给农民的银行贷款通常都要求以土地作为担保。证据表明当习俗法允许异族之间土地买卖时，拥有土地增加了农民进入正规信贷市场的可能。因此，正规信贷市场的运转部分依赖于正规土地市场的范围。

*新的市场失灵意味着新的政策方案。*尽管当存在完美信息和完全风险市场时，大量依赖土地税也许是合意的；但如果信息和风险的市场不完全，就不是这样了。相对于产品税，土地税会使承担风险导致更大的社会成本；在征收产品税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有效地集中和分散风险。在存在管理失误时，土地税将会引起更大程度的不平等，从而相对于产品税会导致更低的社会福利水平。

当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关键原因时，更多更好的信息以及更透明的市场和制度，将会是最关键的解决办法。这就解释了在信贷监督和执行中引入同伴作用的小组借贷计划为什么能够成功。[32]

*信息不完美的一个结果是，进行市场干预的理由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复杂，而且干预的副作用也增大。*市场不完全自然会要求政府干预。有时，这是由于对问题的成因认识不够全面。例如，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主要是由于贷款人面临的甄别（screening）、监督和执行问题。在本书（带星号脚注所指一书——译者），提供了充分证据表明政府干预市场时，他们也会像私人贷款者一样面临所有这些问题，尽管有时在形式上略有不同。

这与早期的市场失灵方法所设想的市场干预显著不同。例如，在信息完美的情况下，与污染相关的市场失灵可以很容易地矫正：所需要的只是征收污染税，也许还需要对污染行业中的企业征收特许税（franchise tax）。计划

31 关于菲律宾的进一步证据，参见 Floro and Yotopoulos（1991）。

32 Klitgaard（1991，chapters 4 and 5）提供了更多的例子，说明公共干预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和误导的激励，并且有助于创造合约的缔结机会和履行机制。一次特别成功的干预例子是印度奶制品发展委员会，他们成功地推广了一种手动的检测牛奶中油脂含量的器械。这项革新消除了牛奶销售商用水稀释牛奶的激励，从而促进了城市牛奶市场的发展，并且提高了养牛农民的收入。

方法则强调与某种信息问题相关的市场失灵：满足未来需求的投资的协调。计划——即使是指示性计划——是纠正市场失灵所需要的“所有措施”。但是没有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有希望解答或者解决处于农业组织理论核心的信息问题。[33]

“新”、“旧”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政府矫正一些“标准”的市场失灵的能力会因为信息缺乏而受阻碍。这一点在我们的论述中得到说明：如果信息是没有成本的，那么很容易建立一个确保水资源被有效率使用的水市场。而历史上配置水资源的许多规则都可以被视为对水供给相对充裕的环境中信息限制的反应。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压力增大，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水的稀缺价值提高了，这些传统规则变得没有效率。我们考虑了很多替代性制度，使得水资源在竞争性用途之间得到合理配置。

农业推广服务的公共提供，既可以被看作旧的市场失灵，也可以被看作新的市场失灵。知识在很多种情形下是一种公共物品，是一种传统的市场失灵。而对推广服务的设计导致了对推广人员进行监督和提供激励的问题，这是一种新的市场失灵。

有效的政府干预需要考虑对局部性制度的可以预见的影响，这些制度应该被看作内生的、局部理性的，而不应该是原始社会结构的非理性残余。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的想法。第一个是，许多政府鼓励在农业部门中建立正式的信贷制度。这些正式的信贷制度将与非正规信贷市场（本地贷款人）相互作用。相对于政府支持的银行，本地贷款人拥有信息优势。那些对银行来说无利可图的贷款可能对本地贷款人或商人来说仍是有利润的，因为本地贷款人与借款人的亲近关系使得监督和执行的成本下降，而本地商人可以将借贷和销售合约相关联来减少执行成本。因此对正式信贷进行补贴的影响，将取决于非正规市场上竞争的性质。如果非正规信贷市场是垄断的，补贴不太可能使非正规市场上的借款人受益。如果非正规信贷市场是张伯伦式（Chamberlinian）的垄断竞争，那么信贷补贴的所有或者部分收益将会消散掉，因为这些补贴将导致非正规市场中进入水平的无效率（Hoff and Stiglitz, 1993）。只有当非正式信贷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时候，对正规信贷市场的补贴

33 大家对这里的区别应该是很熟悉的：Lange 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都可以用来解决市场过程的一些信息缺陷（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部分地产生于期货市场的不完全），从而得到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Hayek and von Mises 认为信息问题要复杂得多，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永远无法解决信息问题，参见 Stiglitz（即将发表）。

才能使非正规市场的借款者受益，即便是这样，在某些特殊情形下，也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结果。

第二个例子是，政府为了稳定农产品价格，在农产品价格较低时收购并储存农产品，而在农产品价格高时将其拿到市场上出售。这种稳定价格的活动趋向于取代私人的储备。这种替代转而会增加政府稳定计划的成本，并且如果公共储存的成本高于私人储存，将会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

第三个例子是，给耕种者分配土地的计划可能被掩盖的转租安排所破坏。菲律宾 1972 年的土地改革将产权重新分配给耕种者，并且禁止土地改革的受益者向佃农出租土地。我们的论述记录了新的永久性劳动合约的出现，它们是对租佃合约的替代。实践证明，这种新形式的劳动合约似乎没有旧的合约那么有效率，并且产生了新的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者，这个阶层几乎没有任何希望成为土地所有者。

*政府干预可能会改变经济或者政治权力的平衡，从而破坏政府干预的本意。*我们对哥伦比亚土地改革的案例研究说明了这一点。20 世纪 30 年代，在没收土地的威胁下，土地改革的初始阶段试图以没收土地相威胁，迫使大农场实现现代化。这项政策增加了那些完成现代化的农场主的财富和政治力量，而他们又利用新增的力量去获取大量偏向大规模农场运营的公共补贴。这导致大农场相对于小农场的财产价值提高，阻碍了用完全补偿的方式平均再分配土地的可能，从而使农场的规模分布变得永久化；这种分布在经济上无效率，并且激化了社会矛盾。

*随着经济发展，可实现的交易类型及其带来的交易费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点在合约执行方面十分显著。在传统社会中，正常情况下，社会压力足以确保合约履行。存在传统的法庭以处理争端，对不服从法律判决的惩罚往往是有效的。在二者出现不一致时，习俗法也可能取消成文法的强制执行。

而在发展的后期，一些国家在确保合约履行方面可能处于最差的情形：传统的执行机制已经弱化，但还没有被有效的正式法律结构所替代。我们研究了巴基斯坦的放款人所面临的高昂交易费用，以及以色列农业合作部门贷款控制的崩溃。

声誉机制是合约履行的习俗和正式法律制度的一种替代。但在发展的初始阶段，高利率盛行，声誉机制可能不起作用。在发展的过渡阶段，人口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抑制习俗和声誉机制的运行。

尽管政府在矫正新、旧市场失灵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同时扮演了另

一个潜在的角色——提供社会性创新。公共物品理论提出了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市场会产生过少的社会性创新：因为创新的大部分收益都分散给公众，而不是被创新者得到。市场可能处于一种无效率的纳什均衡；即不存在自发的协调机制，使经济“转换”到一种更有效率的均衡。[34]在我们看来，这种形式的协调——制度变革的协调，而不是计划模型所关注的那种协调——才是最为重要的。

通过政府干预建立小组借贷计划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种社会性创新。组内的激励安排可以替代财产担保，因为如果组内某一成员不履行合约，那么每个成员都要受到处罚；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保证小组在使用借款时更加谨慎。但是在没有广泛的局部实验之前，很难知道如何在某一个地区最优地组织借贷小组计划。由于改进借贷小组计划带来的大部分社会收益不能被任何个人、小组或者贷款人得到，那么理性的行为是等待其他人去承担实验的成本，等实验成功时再去模仿。因此，这种实验将会更少，除非政府作为改革的催化剂，帮助组织借贷小组计划。

四、结论

对于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来说，前面讨论的大部分内容看起来不过是常识。那么为什么要称之为新“农业组织经济学”？其中的常识其实并不寻常，在经济学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显著。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的许多发展文献都忽视了这里所强调的问题。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很难将这些因素纳入正式的发展和计划模型，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强调这些因素的制度主义文献没有跟上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它们是非理论性的甚至是反理论的。我们希望本书能够解决这些困难，通过书中各章我们表明现实的农村制度可以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进行分析，并经受严格的假设检验，而且关于制度的简单数学模型可以被结合进正式的发展模型中。

---

34 North（1990）采纳了类似观点解释某些制度尽管不是优化行为的结果，仍然持续存在。North 区分了制度（游戏规则）与组织（企业、政党、家庭农场等）。他认为，由于改变制度的高昂固定成本、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网络外部性和普遍的信息问题，自由竞争一般来说不可能在制度层面出现。然而如果没有完全竞争，有效率的制度没有理由一定会消灭无效率的制度。Hoff（1992）简明地总结了 North 的观点，并且与博弈论的观点建立了联系。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breu, Dilip. 1988. "On the Theory of Infinitely Repeated Games with Discounting." *Econometrica* 56 (2): 383–96.

Akerlof, George.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ative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488–500.

——. 1984. *An Economic Theorist's Book of Tal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rnott, Richard,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88. "The Basic Analytics of Moral Hazard."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90 (3): 383–413.

——. 1991. "Moral Hazard and Nonmarket Institutions: Dysfunctional Crowding Out or Peer Monitor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 179–90.

Arrow, Kenneth. 1951.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 (5): 941–73.

——. 1968. "The Economics of Moral Hazard: Further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537–39.

——. 1973. "Higher Education as a Filte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 193–216.

Arrow, Kenneth, and Gerard Debreu. 1954.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2: 265–90.

Bardhan, Pranab, ed. 1989.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rarian Institutions*. Oxford, U.K.: Clarendon.

Basu, Kaushik. 1986. "One Kind of Powe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8: 259–82.

Bell, Clive. 1988. "Credit Markets and Interlinked Transactions." In Hollis Chenery and T. N. Srinivasa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 Amsterdam: North-Holland.

Binswanger, Hans, and Mark Rosenzweig, eds. 1984.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Employment and Wages in Rural Labor Markets in Asi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orch, Karl M. 1968. *The Economics of Uncertain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averman, Avishay, and J. Luis Guasch. 1984. "Capital Requirements, Screening, and Interlinked Sharecropping and Credit Contrac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 359–74.

Braverman, Avishay, and T. N. Srinivasan. 1981. "Credit and Sharecropping in Agrarian Societ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9: 289–312.

Braverman, Avishay,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82. "Sharecropping and the Interlinking of Agrarian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695–715.

———. 1986. "Landlords, Tenant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3: 313–32.

Brofenbrenner, Martin. 1985. "Early American Leaders—Institutional and Critical Trad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6): 13–27.

Carter, Michael R. 1985. "A Wisconsi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Micro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s: The Insufficiency of Pareto Efficienc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9: 797–813.

Cheung, Steven N. S. 1969.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ase, Ronald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6: 386–405.

———.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Coleman, James S. 1984. "Introducing Social Structure into Economic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84–88.

Commons, John R. 1924. *Legal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Dasgupta, Partha, and Karl-Goran Maler. 1991. "The Environment and Emerging Development Issu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iamond, Peter. 1967. "The Role of a Stock Market in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Technological Uncertain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759–73.

Eggertsson, Thrainn. 1990.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swaran, Mukesh, and Ashok Kotwal. 1985. "A Theory of Contractual Structure in Agricul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352–67.

Farrell, Joseph. 1987. "Information and the Coase Theore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 (2): 113–30.

Floro, Sagrario, and Pan Yotopoulos. 1991.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Case of Philippine Agricultu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Foley, Duncan. 1970. "Economic Equilibria with Costly Marketing."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 276–91.

Greenwald, Bruce,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86.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e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0 (2): 229–64.

——. 1988. "Pareto Inefficiency of Market Economies: Search and Efficiency Wage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 (2): 351–55.

Grossman, Sanford, and Oliver Hart. 1983.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Econometrica* 51: 7–45.

Hahn, Frank H. 1973. "On Transaction Costs, Inessential Sequence Economies and Mone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0: 449–61.

Hardin, Garrett.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243–48.

Hazell, Peter, Carlos Pomareda, and Alberto Valdés. 1986. *Crop Insurance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sues and Experien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eal, Geoffrey. 1976. "Do Bad Products Drive Out Goo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 499–502.

Hirschman, Albert O. 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off, Karla. 1992. Review of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by Douglass North. *Kyklos* 45 (4): 582–85.

——. Forthcoming. "The Second Theorem of the Second Bes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37.

Hoff, Karla, and Andrew Lyon. 1992. "Collateral,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Pareto-Improving Labor Taxation." Working Paper 92-13. University of Marylan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ollege Park, Md.

Hoff, Karla,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93. "A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 Rural Credit Marke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Jan., Anaheim, Calif. Processed.

Kanbur, Ravi. 1992. "Heterogeneity, Distribution and Cooperation in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Management."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844. Washington, D.C.

Keynes, John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Klitgaard, Robert. 1991. *Adjusting to Reality: Beyond "State versus Marke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Calif.: ICS.

Libecap, Gary. 1989. "Distributional Issues in Contracting for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5: 6–24.

Murrell, Peter. 1983. "The Economics of Sharing: A Transactions Cost Analysis of Contractual Choice in Farming."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4: 283–93.

Myrdal, Gunnar. 1982.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stitutional versus Conventional Economics." In George R. Feiwel, ed., *Samuelson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Boston: Kluwer-Nijhoff.

North, Douglass.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uly, Mark. 1968. "The Economics of Moral Hazard: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531–37.

——. 1974. "Overinsurance and Public Provision of Insurance: The Roles of Moral Hazard and Adverse Selec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8: 44–62.

Radner, Roy. 1968.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under Uncertainty." *Econometrica* 36: 31–58.

Reder, M. W. 1982. "Chicago Economics: Permanence and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 1–38.

Rosenstein-Rodan, P. N. 1943.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ern &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53: 202–11.

Ross, Stephen. 1973.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 The Principal's Probl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134–39.

Rostow, Walt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thschild, Michael, and Joseph E. Stiglitz. 1976. "Equilibrium in Competitive Insurance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 629–50.

Schultz, Theodore W. 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Adam. 1976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ted by Edwin Cann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pence, Michael.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 355–74.

Stigler, George J. 1967. "Imperfections in the Capital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5: 287–92.

Stiglitz, Joseph E. 1974. "Incentives and Risk Sharing in Sharecropp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 219–55.

——. 1975. "The Theory of Screening, Educ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 283–300.

——. 1985.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 A Perspective." *Economic Journal* 95: 21–41.

——. 1987. "Sharecropping." In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Peter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 Forthcoming. *Whither Socialism? Perspectives from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Williamson, Oliver.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1979.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 233–61.

——. 1985. "Reflections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44: 187–95.

分成制与农业市场的关联性*

欠发达的农业经济体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相互关联。[1] 地主通常是信贷提供人，他也会经常买进和卖出佃农的产品，又时常将原材料（比如肥料）卖给佃农，有时甚至会将消费品卖给佃农。

这些现象怎么解释？如果要对地主这些看似妨碍了自由交易的行为进行限制，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福利影响？本文所要阐述的就是这些问题。

过去，那些对农业市场上各种合同之间相互关联的现象进行理论分析的研究都认为，这些相互关联的合同其实就是强者剥削弱者的一种手段（参见 Amit Bhaduri, 1973, 1977 的论文）。然而，这种观点根本没有说服力：如果地主能剥削佃农，使其收入仅能维持生计（以前的研究通常都是这么说的），那么地主为什么没有简单地通过压低佃农的分成比例来达到这一目的？地主采取其他措施之后能从佃农那里剥削出更多东西吗？

我们在本文中提出的一般性分析方法，既适用于竞争性的经济环境，又适用于非竞争性的经济环境；同时，这种分析方法，不但能研究所有合同条款都根据最优化决策制定的情形，而且还能研究部分合同条款是外生确定的情形。[2]

我们的分析以欠发达的农业经济体中最明显的两大特征为基础：

（1）地主不会根据佃农的投入（即劳动的努力程度）来支付报酬。原因在于，地主一般无法观察到佃农劳动的努力程度。佃农通常也不会用一个

---

* “Sharecropping and the Interlinking of Agrarian Markets,” with A. Braverm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4), September 1982, pp. 695 – 715. 我们感谢 Hans Binswanger，T. N. Srinivasan 和一位匿名审稿人富有价值的评论。同时感谢 Vivianne Lake 和 Tribhuwan Narain 在文章编排上的帮助。

1 对这些现象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Pranab Bardhan（1980）以及 Hans Binswanger et al.（forthcoming）。对于美国在 19 世纪的情况，请参见 Joseph Reid（1979）的论文。

2 近年来对此问题进行阐述的其他研究主要包括 Clive Bell and Pinhas Zusman（1980），Pradeep Mitra（1982），Reid（1976），Braverman and Srinivasan（1981）等人的论文。尤其是 Mitra 的研究提出并讨论了最关键的问题，即道德风险与各种合同之间相互关联的现象之间的关系。对于存在道德风险时均衡状况会发生哪些变化（包括道德风险对经济的分权化有哪些影响）这个问题，更一般化的讨论，请参见 Richard Arnott and Stiglitz（1980）的研究。

固定的租金总额去租地主的土地。因为对佃农来说，这种租佃方式的风险太大。[3] 于是，合同协议至少要含有某种形式的分成条款；[4] 结果就导致使佃农无法获得努力劳动所产生的全部边际产品。

（2）地主无法完全识别佃农的行为；对于自身劳动努力水平的高低、劳动努力的配置，以及生产技术的选择，佃农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当然，对于这些决策，有一些是地主可以很容易监督的，但是，也有许多同样重要的决策，地主进行监督的成本会非常高。

这两个事实——佃农对自身的行为有相当大的决定权，以及由于租佃合同必定要包含某种形式的分成条款，所以佃农的行为会对地主的期望利润产生重要影响——有许多更深层次的含义。尤其是，这意味着地主有动力去诱导佃农以有利于地主的方式行事。佃农的贷款数量，获得贷款的条件，购买的商品，以及商品的价格，都会对其自身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的许多分析主要是为了说明，地主（或者说他贷款给佃农的条件）不但能诱导佃农借更多的钱，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能诱导佃农更加努力地劳动或者从事地主更喜欢的活动。比如，如果地主降低贷款利息，那么（在非常合理的前提条件下）佃农会受其诱导而借更多的钱；在限制性更强的条件下，佃农受其诱导就会不断增加借款数量，直到他现在必须要偿付的款项（包括利息）即将要超过贷款利率降低之前他要偿付的债务总额时为止。如果对违约的惩罚非常严厉（比如，违约后佃农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债务），那么佃农就会更加努力地劳作，以避免出现违约的情况。[5]

类似地，地主会发现，佃农采用的生产技术都是风险很小的技术。如果佃农采用平均收益更高，但是收益的方差也更大的生产技术，那么地主的收入也许会增加。地主同样也会注意到，佃农会以极度厌恶风险的方式

3 此外，如果佃农有可能无法支付固定的租金（这种可能性受佃农本身行为的影响），那么从地主的角度看，这种租金固定不变的租佃协议并不是最合适的协议（参见 Stiglitz and Andrew Weiss (1981) 的分析）。而且，在这种租金固定不变的租佃协议中，佃农甚至无法完全获得其行为带来的边际收益（当然也可能不会完全承当其行为产生的边际成本）。

4 参见 Alfred Marshall (1920)，张五常 (Steven Cheung, 1969)，Bardhan and T. N. Srinivasan (1971)，Reid (1973)，Stiglitz (1974)，Bell and Zusman (1976)，David Newbery (1977) 以及 Newbery and Stiglitz (1979) 等人在此之前对分成制的讨论。

5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我们的分析中，佃农并不是只关心短期利益，而没有长期考虑的。在他借贷款的时候，他就知道，以后他将要（而且是“必须”要）更加努力地劳作，并且会在决定借多少贷款时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如果佃农只关注短期利益，那么各种市场之间相互关联的现象，会比我们在此所讨论的关联现象更加明显。

行事。原因在于，佃农考虑到，如果不能偿付那些尚未清偿的债务，那么后果就会很严重。因此，地主就会要求他的佃农只能从他自己这里借钱。地主对佃农收取的利息要高于市场利率，这会使佃农对自身贷款的数量进行一定限制。结果就是，地主要向佃农提供一份在其他方面更有吸引力的租佃合同。

对土地市场与产品市场相互关联的现象进行分析的思路与此相似。佃农购买的生产投入品（比如肥料）数量，可能会低于地主希望投入的数量；加大生产投入所增加的收益，有一部分会被地主占有。正如我们在其他文章（Braverman and Stiglitz，1981a）中所指出的那样，平常的成本分担规则（即地主分担成本的份额等于其分享收益的份额）只能部分减少这种扭曲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并不能完全矫正这种扭曲。当增加肥料投入能诱导佃农增加其劳动投入时，地主就有动力去通过分担更高比例的成本来鼓励佃农多使用肥料。

类似地，虽然消费某些商品（比如酒）可能会降低佃农的劳动努力程度，但是消费有些商品却能使佃农的劳动努力程度提高。对于地主来说，有利的选择是：在佃农消费后一类商品时对其进行补贴，而在其消费前一类商品时进行限制（既可以通过在地主自己的商店里对这类商品确定较高价格的方式，又可以用以货代款的方式支付佃农的报酬来实现这一目标）。

因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1）相互关联的市场能增加地主和佃农的期望效用，相互关联的市场肯定能使效用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

（2）相应地，不管是竞争性市场，还是垄断市场，一般都具有相互关联之特征。

（3）尽管各种市场相互关联之特征，使得效用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但是当存在这种关联现象时，在竞争均衡状态下，佃农的福利状况也许（但并不是必然）会恶化。

（4）即使是在只有一个地主的情况下，各种市场相互关联之特征也许（但并不是必然）会改善佃农的福利状况。

在对各种市场相互关联的现象进行一般性分析时，我们同时还得到了与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合同协议有关的几个问题的答案。尤其是，我们的分析表明：

（5）如果一个处于垄断地位的地主可以根据需要自行确定成本分担和收益分享规则，那么控制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并不能为他增加任何收益；反

之，如果他并不能自行确定成本分担和收益分享规则，那么控制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就能增加其收益。

（6）一个处于垄断地位的地主，只有当其控制商品市场的行为能改变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时，他才能因此而获利。

应该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分析同样也适用于租佃合同的部分条款（比如分成比例和土地耕种面积等）是内生的，部分条款是外生的情形。[6]然而，即使分成租佃合同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本文所要分析的主题），我们也不应该（像许多解释马歇尔的理论的研究者所做的那样）[7]将分成租佃协议视为无效率的合同协议。当获取信息需要花费成本，并且存在较大的风险时，分成租佃制既让地主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同时又保持了对佃农的激励。[8]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考察信贷合同和租佃合同相互关联的现象；第二部分研究产品买卖合同与租佃合同相互关联的现象；第三部分指出在劳务合同和消费品买卖合同之间也可能存在相互关联的情况；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本文前面几部分所采用的分析方法的均衡分析框架，利用这种分析框架能考察卖方垄断、买方垄断、竞争性市场以及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均衡状态。

一、相互关联的信贷和租佃合同

在本部分我们将通过分析指出，无论是否存在纯粹的租佃制度（在此制度安排下，地主的收入部分取决于佃农的行为，并且无法完全监督佃农的行为[9]），

---

6 我们的分析还适用于以前的文献所讨论的情形，即各种合同互相关联的特征为地主提供了一种手段，利用这种手段，地主通常能规避法律（比如禁止高利贷）和习俗（比如产出应该在地主和佃农之间“公平”分配）的限制（Braverman and Srinivasan，1981）。所有这些情形都可以视为本文所分析的一般化情形的特例。

7 马歇尔认识到，在市场的不完美性非常明显，并且某些市场不存在时，分成合同能发挥重要作用（参见 Christopher Bliss and Nickolas Stern，1981，第三章）的分析以及 Jerald Jaynes（forthcoming）。

8 Stiglitz（1974）和 Newbery（1977）分析了最优线性合同协议。斯蒂格利茨即将出版的著作研究了最优非线性合同。在这些研究中，工人（佃农）唯一能改变的变量是其自身的劳动努力程度。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还考虑了生产技术选择问题。

9 尽管要得到我们的分析结果，只需要假设不能完全监督佃农的行为（并且以观察到的行为为基础确定相应报酬的合同协议能得到完全的实施），但是我们在模型中假设，所有这些（与劳动努力和生产技术选择有关的）行为根本没法监督。显然，有些行为（比如种了什么作物）是很容易监督的，因此就可以推断，在这些方面如果违反了合同规定，那么就可以依照合同协议办事。然而，对于有些行为，要想在合同中做出（明确的或隐含的）规定，那是很困难的，因此也就很难监督这些行为，并实施与此相关的合同条款。比如，“最优的”收割时间一般都是作物生产期内的气候条件和佃农对收割季节气候状况的预期的复杂函数。早一点收割，虽然平均收成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在收割之前作物受坏天气毁坏的）风险却小了很多。

地主的收益都会受到佃农贷款决策的影响。[10]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既会考虑佃农的劳动努力配置决策，又会考虑其生产技术选择，比如何时除草，除草的频率多高，何时播种，何时收割，撒播哪种作物种子，施哪种肥料，用多大的量，什么时候施肥，怎样施肥等。在这些决策中，地主可以很容易监督部分决策，但是也有一些同样重要的决策，地主进行监督的成本会非常高。佃农对其自身的劳动努力和生产技术决策具有一定决定权，并且他的行为会影响到地主的收益这个事实，就是道德风险问题。

1. 一般模型

首先，我们建立一般模型。在接下来的各个小点中，再分析这个一般模型的一些重要的特殊情形。

我们假设存在纯粹的分成租佃协议。[11]佃农分享总产出的份额为 α，地主的份额为 $1-\alpha$。产出 Y 是下列因素的函数：（1）用 e 表示的佃农的劳动力努力程度；[12]（2）用 θ 表示的外部环境因素（比如气候）；（3）用 Ω 表示的技术选择。假设 Ω 的值增加就表示风险变大（后面会对此进行讨论）。因此，

$$Y = Y(e,\theta,\Omega) \tag{1}$$

不过，如果我们将此生产函数写成下列形式，就会极大地简化分析，

$$Y = gf(e) \tag{1'}$$

其中，g 为正的随机变量，而且其密度函数为 $(Eg \equiv \bar{g}):h = h(g,\Omega)$。

可以将佃农的效用[13]视为其收入 $y=\alpha Y$，劳动努力程度 e，生产技术 Ω，其余那些他能控制的变量 z，以及用 q 表示的一组由地主控制的变量的函数：

$$u = u(y,e,\Omega,z,q) \tag{2}$$

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会考察这个一般化设定的几个特殊情形。比如，如

10　实际上，在更加严格的条件下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如果承租人没有足够的资本事先就把租金付清，并且如果产出的波动性足够大以至于承租人有可能无法支付事先确定的租金，那么即使在土地租赁合同为租金固定的承包合同时，依然会出现我们所讲的道德风险问题。

11　然而，这个模型远非是能使我们的结论成立的最一般化的模型。因此，尽管我们只讨论纯粹的分成租佃合同，但是实际上当不存在破产可能性时，对于所有非固定租金合同，我们的分析结论都成立。

12　显然，e 实际上表示一个投入品向量，其中包括肥料和机器设备等。

13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会清楚地说明，佃农的效用函数其实是一个类似于间接效用函数的导出效用函数。

果 z 为佃农从地主那里购买的商品消费量，q 为地主设定的商品价格，c 为佃农消费的其他商品数量，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佃农的效用函数写成

$$U = U(c,e,\Omega,z) = U(y - zq,e,\Omega,z) \tag{2'}$$

类似地，考虑一个初始财富为 W_0 的佃农希望能借钱用于当前消费的情形。假设地主收取的利率是 r，佃农的借款总额为 B。用 c_i 来表示第 i 期的消费。于是，我们就可以将佃农的效用函数写成

$$U = U(c_0,c_1,e,\Omega) = U(W_0 + B,y - (1 + r)B,e,\Omega) \tag{3}$$

（此为式（2）的一种特殊情形）。[14]

佃农在生产函数为式（1）的条件下，通过选择 e、z 和 Ω 来使其期望效用最大化，

$$\max_{(e,z,\Omega)} Eu(y,e,\Omega,z,q) \equiv V(\alpha,q) \tag{4}$$

其中，决定佃农的分成份额 α 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它可能直接受地主的控制。根据此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我们可以求出作为受地主控制的变量的函数的佃农的劳动努力水平、技术选择和其他变量 z 的值，即 $e = e(\alpha,q)$ 、$z = z(\alpha,q)$ ，以及 $\Omega = \Omega(\alpha,q)$ 。

为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地主是风险中性的。地主的期望收入 $\bar{P}$ 由两部分组成：直接从佃农的劳动成果中得到的收益 $(1 - \alpha)f(e)Eg$ ，以及从关联活动中获得的收益 $\pi(q,z)$（此部分收益可能为负）。于是，

$$\bar{P} = (1 - \alpha)f(e)\bar{g} + \pi(q,z) \tag{5}$$

因此，在前面第一个例子中，假如地主卖酒给佃农的价格为 q，那么

$$\pi(q,z) = (q - q_0)z(q) \tag{6}$$

其中，q_0 为地主购进（或生产）给定商品的价格。在第二个例子中，地主借钱给佃农收取的利率为 r，此时他从此项关联活动中获得的收益恰好等于，他收取的利率与他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可以得到的报酬率的差乘以贷款总量得到的积。[15]

地主的决策问题现在就变得很简单了：在满足佃农的参与性约束之条件下，他选择 q 和 α（假设 α 是控制变量；q 实际上可能是一个由多个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去使其期望收益最大化，即

---

14 在这两个例子中，“q”是地主卖商品或者借贷款给佃农的价格。然而，地主不一定非得只采取线性定价的方式，他可能会通过非线性定价的方式对佃农施加一系列约束。参见脚注 21。

15 从关联活动中得到的收益可能是一个随机变量。于是，π 就表示平均值，并且 π 可能是 e 和 Ω 的函数。要考察这种情况，只需要对我们的分析略做改动。

$$\max_{(q,\alpha)} \bar{P};\ s.t.\ V(\alpha,q) \geq \bar{U} \tag{7}$$

（对 q 而言）此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是

$$\frac{d\bar{P}}{dq} = (1-\alpha) \times \left[\bar{g}f'(e)\frac{de}{dq} + f(e)\frac{d\bar{g}}{d\Omega}\frac{d\Omega}{dq}\right] + \pi_q + \pi_z\frac{dz}{dq} - \lambda\frac{\partial V}{\partial q} \tag{8}$$

其中 λ 为式（7）中的约束条件的拉格朗日乘数。式（8）的关键含义是：地主意识到，改变 q 不但会对其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即对其作为贷款人或店主的收入的影响），而且在其对佃农的劳动努力水平或生产技术选择产生作用后，会间接影响到地主的收入。在我们的分析中，这就是关联活动之所以会发生的根本原因。

在下文，我们将对此展开更加详细的分析，尤其是要确定，在哪些条件下地主会对佃农的活动（比如借款活动）进行补贴，又会在哪些条件下对佃农的行为进行限制。

尽管地主想诱导佃农向他借钱并因此而对利率进行补贴的那些情形，与地主想限制佃农借款行为的那些情形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这两类情形在执行成本上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在后一类情形中，地主要对佃农进行监督，而在前一类情形中就不需要监督。

分几步展开我们的分析。首先，我们分析佃农对其尚未清偿的贷款所必须承担的义务，是怎么影响其自身行为的。我们分别考察了这种义务对佃农劳动努力程度的影响（第一部分第 2 ~ 3 点）与其对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第一部分第 4 点）。然后，我们利用这些分析结果去确定地主的最优策略（第一部分第 5 ~ 6 点）。第一部分第 7 点考察了由违约条款（佃农不能偿还借款，就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抵偿）所导致的特殊问题。第一部分第 8 点将指出，当违约的概率为正时，对于贷款人为什么希望能影响借款人在土地租佃市场上的行为这一问题，分析的思路是一样的。因此，这扩展了我们对各种市场之间相互关联现象的分析。

尽管我们绝大部分分析都局限在局部均衡情形中，但是第一部分第 9 点的分析将表明，我们的分析同样可以拓展至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之中。

2. 佃农的借款行为对其劳动努力程度的影响

在本小点中，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佃农必须要偿付总额为 $(1+r)B$ 的债务给地主这个事实，会如何影响其劳动努力程度？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假设不同时期的消费和劳动努力决策相互分离，这样就将前面提出的一般模型特殊化了。这便于我们分析未清偿贷款的影响，而无须关注这些未清偿贷款是如何决定的。并且我们只考察未清偿贷

款对劳动努力程度的影响，而假设生产技术选择是给定的。

令 $\hat{B} = (1+r)B$ 为佃农必须要偿还给地主的债务总额，c 为佃农的消费，于是就有

$$c = \alpha Y - \hat{B} \tag{9}$$

佃农现在选择使下式最大化的劳动努力水平

$$\max EU(c,e) = \max_{\{e\}} EU(\alpha g f(e) - \hat{B}, e) \tag{10}$$

其中 U 为 c 和 e 的凹函数。我们可以求得上述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16]

$$\alpha f'(e) EU_c g + EU_e = 0 \tag{11}$$

对式（11）全微分，并利用 U 的凹性，显然就会得到

$$d\left[\int (U_c \alpha g f' + U_e) h dg\right] / d\hat{B} = -E(U_{cc}\alpha g f' + U_{ec}) \gtrless 0 \tag{12}$$

由于 $U_{cc}<0$，所以根据式（12）表示的条件，就有如下命题：

命题1：若 $U_{ec}\leqslant 0$，则增加借款数量就会使佃农的劳动努力水平上升，地主的收益因此就会增加。

$U_{ec}\leqslant 0$ 这个条件是非常合理的。它表示增加消费能使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上升或保持不变。[17]

3. 劳动努力与违约

现在考察与违约后果有关的下列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的影响：用劳动抵偿债务或者破产。贷款协议中用劳动抵偿债务的条款是指，如果佃农无法清偿其债务，那么他必须要提供一定量的劳务给贷款人。我们假设，对于佃农而言，为贷款人提供劳务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所以，这就意味着，他会尽力避免那些可能会使其产出低于某个水平，从而使他无法清偿贷款而必须要用劳务去抵偿债务的概率上升的因素。显然，在贷款协议中加入用劳动抵偿债务的条款，就会提高佃农的劳动努力程度。

对于厌恶风险的佃农（见图1（a））而言，在模型中考虑用劳动抵偿债务条款的方法是，假设佃农消费的（或者是在债务总额给定的条件下，收入的）边际效用 U_c 非常高，即在 c 的值非常小时，U_c 会趋向于无穷大（见图1（b））。我们在图中描绘的状况是，在极端情况下，佃农会选择一

16 本文的所有分析都不考虑角点解。

17 没有不确定性时，消费和闲暇的收入正规性条件就可以保证命题1成立。在另一组条件下，该命题也会成立，即除了正规性条件之外，收入的方差还要足够小。

个能避免用劳动抵偿债务这种情况发生的最低努力水平。因此，佃农选择 e 使得下式成立

$$\alpha f(e) g_{\min} = \hat{B} \tag{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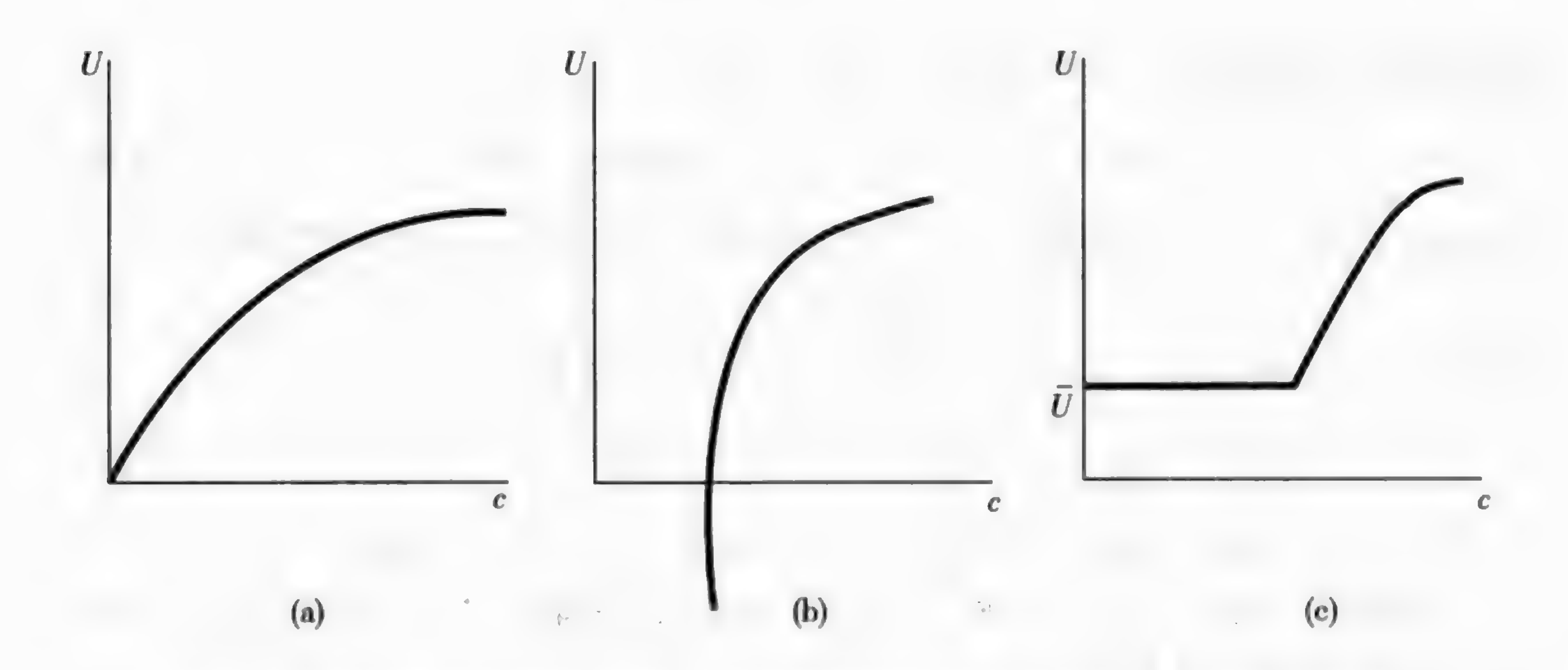


图 1　（对于给定的债务总额）在不同违约条款下作为收入之函数的效用

其中 $g_{\min}$ 为 g 的最小值。于是

$$de / d\hat{B} = 1 / \alpha f' g_{\min} > 0 \tag{14}$$

贷款协议中的破产条款是指，当借款人的收入足够低时，他就不偿还贷款，并且在他不清偿贷款时，确保其生存下去的最低消费水平 $\hat{c}$ 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在贷款协议中加入破产条款会降低佃农的劳动努力水平。原因在于，此时他不必完全承担“坏”事件带来的后果。在模型分析中，如果佃农的效用函数并不是“非常严格的”凹函数，那么破产条款就会致使其效用函数在某些区域变为凸函数（见图 1（c））。由凹函数变为凸函数这种变化，意味着破产条款改变了佃农的风险态度，使其在某些区域由厌恶风险的人变成了爱好风险的人。[18]

当存在破产的可能性时，我们可以将佃农的消费写成

$$c = \max\{\alpha g f(e) - \hat{B}, \hat{c}\} \tag{15}$$

令 g 的临界值为

18　在第一部分第 4 点中会讨论这种情况。

$$\hat{g} = (\hat{c} + \hat{B}) / \alpha f(e) \tag{16}$$

若低于此临界值，就会破产。于是佃农的目标函数式（10）就变为

$$\max_{\{e\}}\left\{\int_0^{\hat{g}} U(\hat{c},e)hdg + \int_{\hat{g}}^{\infty} U(\alpha gf(e) - \hat{B},e)hdg\right\} \tag{10'}$$

由此我们就可以求出一阶条件

$$\int_{\hat{g}}^{\infty} [U_c\alpha gf' + U_e]hdg + \int_0^{\hat{g}} U_e hdg = 0 \tag{11'}$$

并且因此就可以得到

$$\frac{de}{d\hat{B}} \gtrless 0 \quad 当 -U_c\alpha\hat{g}f'\frac{1}{\alpha f(e)} - \int_{\hat{g}}^{\infty}[U_{cc}\alpha gf' + U_{ce}]hdg \gtrless 0 \tag{12'}$$

借款数量增加使得破产的概率上升。这种效应会减少劳动努力的边际收益，即式（12′）中条件不等式左边的第一项总为负。当且仅当该条件不等式左边的第二项大于第一项时，借款数量增加对佃农劳动努力的总影响才为正。可以用下面的命题和评论来总结本节的分析。

命题2：如果佃农的贷款协议中包含用劳动抵偿债务的条款，那么增加借款数量就能提高佃农的劳动努力程度，地主的收益也会因此而上升。

评论：如果佃农的贷款协议中包含破产条款，而没有用劳动抵偿债务的规定，那么增加佃农的借款数量并不能使其劳动努力程度提高。

由于地主的期望收益明显取决于佃农的劳动努力程度，所以佃农的借款数量通常都会对地主的期望收益产生影响。在必须要用劳动抵偿债务的规定下，这种影响对地主是有利的。但是，如果佃农可以破产，那么增加其借款数量，就会对地主的期望收益产生负面影响。

4. 佃农的借款数量对其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

现在我们假设，佃农的决策只是选择生产技术Ω；佃农的劳动努力程度固定不变（比如，要获得某一水平的产出，需要付出的劳动量是确定的；超过此劳动量，所能得到的收益极其微小）。由于我们在此主要关注的是佃农承担的风险，所以首先考虑一组平均收益相同的项目，即

$$\int_0^{\infty} ghdg = 常数 \tag{17}$$

或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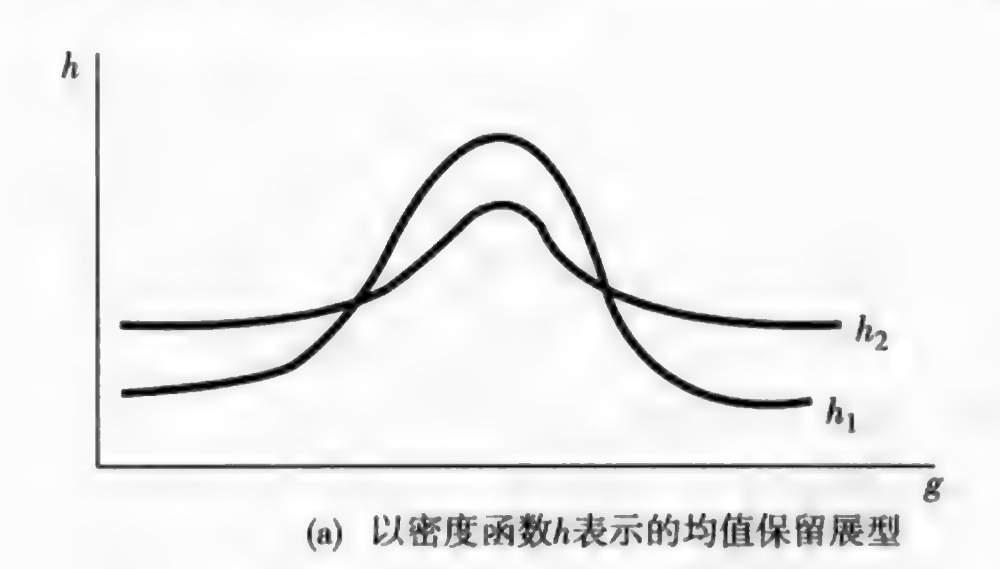
$$\int_0^{\infty} gh_{\Omega}dg = 0 \tag{18}$$

因此风险更大的项目就是风险较低的项目的均值保留展型。[19]换言之，令 H 为风险的分布函数，风险更大的项目就可以写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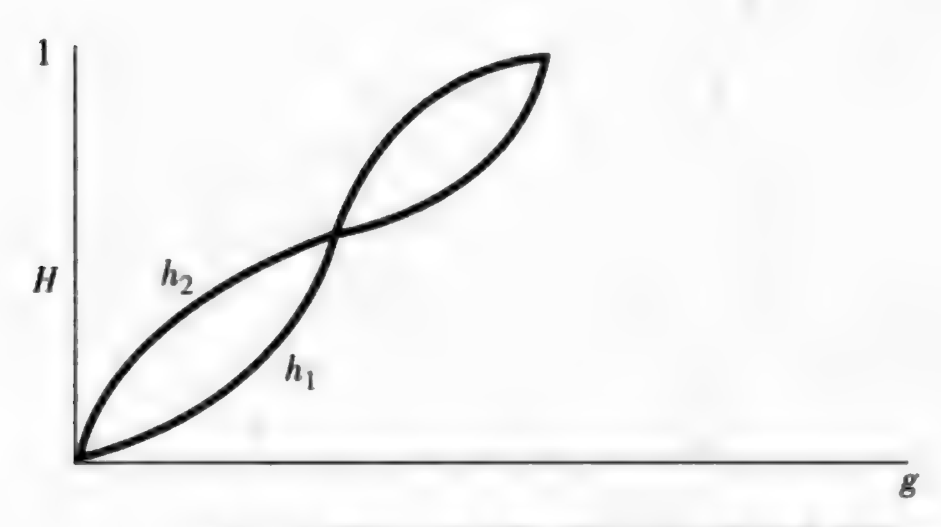
$$对所有\ x > 0,都有\int_0^x H_\Omega dg \geq 0 \tag{19}$$

$$\int_0^\infty H_\Omega dg = 0 \tag{20}$$

我们在图 2 中画出了 H 分布的一个均值保留展型，即权重由中心向两边的尾部转移。在图 2 中，我们既画出了以密度函数表示的均值保留展型，又画出了以累积分布函数表示的均值保留展型。



(a) 以密度函数h表示的均值保留展型



(b) 以累积分布函数H表示的均值保留展型

图 2 以 g 的分布表示的均值保留展型

与第一部分第 2 点的内容一样，我们在此假设不同时期的消费和劳动努力决策相互分离。于是，佃农选择生产技术的一阶条件就是

19 对均值保留展型的讨论，请参见 Rothschild and Stiglitz（1970）以及 Diamond and Stiglitz（1974）的分析。

$$\int Uh_{\Omega}dg + \int U_{\Omega}hdg = 0 \tag{21}$$

假设 $U_{c\Omega}=0$,[20]立即就可以得到

$$d\Omega/d\hat{B} \gtrless 0 \quad \text{当} \quad -\int_0^{\infty} U_c h_{\Omega} dg \gtrless 0 \tag{22}$$

对上述条件不等式分部积分两次，并且利用式（18）和式（20），我们就能得到

$$d\Omega/d\hat{B} \gtrless 0 \quad \text{当} \quad -\int_0^{\infty} U_{ccc}\left[\int_0^{x} H_{\Omega}dg\right]dx \gtrless 0 \tag{23}$$

利用式（19），显然就有

$$d\Omega/d\hat{B} \gtrless 0 \quad \text{当} \quad U_{ccc} \lesseqgtr 0 \tag{24}$$

根据式（24），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且仅当佃农的效用函数为二次函数时（此时 $U_{ccc}=0$），其借款数量才不会影响到他所承担的风险。否则，佃农承担的风险会随着其借款数量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下列几种特殊情形值得关注：

第一，假设贷款协议中含有用劳动抵偿债务的条款，于是在 c 的值非常小时，U_c 会非常大，即它会趋向于无穷大。因此，根据式（22）显然就有，佃农的借款数量增加会使其能够承担的风险下降：佃农此时只关心风险分布的较低的那个尾部，在此较低的尾部上，U_c 非常大，并且密度的转移 h_{Ω} 为正（见图2（a））。所以，增加借款数量会使佃农变得更加保守。

在前面所分析的特殊情形中，Ω^* 是 Ω 的最大值，它能使下式成立

$$\alpha g_{\min}(\Omega^*) = \hat{B} \tag{25}$$

其中，$g_{\min}$（Ω^*）为 g 对生产技术 Ω^* 的最小值。由于 $g'_{\min}$（Ω）为负，所以

$$d\Omega^*/d\hat{B} = 1/\alpha g'_{\min} < 0 \tag{26}$$

Ω 的值提高意味着风险的分布上升，这实际上表明对于给定的 Ω，g 的最小值下降。

第二，假设佃农的绝对风险厌恶程度递减。正式地讲，绝对风险厌恶程度的定义是 $A \equiv -U_{cc}/U_c$，所以 $A' = -U_{ccc}/U_c + U_{cc}^2/U_c^2$。于是，绝对风险厌

20　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们都假设 $U_{c\Omega}=0$；如果我们将 U 的表达式写成 $U=U(c,e)-V(\Omega)$，就可以将 $V(\Omega)$ 视为技术 Ω 的“成本”。进一步地，如果所有可以采用的技术都有同样的平均产出，那么要求得内点解（即 $\Omega>\Omega_{\min}$，其中 $\Omega_{\min}$ 为风险最低的生产技术），就要求 V'（Ω）足够大。

恶程度递减就意味着 $U_{ccc}>0$。因此，根据式（24）就可以发现，借款数量增加会使佃农能够承担的风险下降。

第三，假设贷款协议中含有破产条款。假如佃农的效用是其消费的线性函数（当不存在破产时，他就是风险中性的），那么现在他就变成爱好风险的人了；更一般地讲，假如佃农厌恶风险的程度不是“很强”，那么他就可能变为爱好风险的人（见后面的图3）。于是，借款数量增加就会使其承担更大的风险。

我们在分析中所考察的技术选择，会使得平均产出不变，但是会导致产出的分布上升。根据我们的分析，技术选择上的变化并不会对风险中性的地主产生影响。然而，在许多情形中，风险更高的生产技术，其平均产出也更高。例如，“绿色革命”中有些高产品种（HYV）种子，其平均产出的确要高于常规种子，但是这些种子非常容易受到降雨量的影响，当天气条件不理想时，这些种子的收成确实会低于常规种子（还可以参见脚注9说明的另一个例子）。[21] 如果这些风险更高的技术并不能大幅提高平均产出，那么只要佃农的绝对风险厌恶程度递减（或者贷款协议中含有用劳动抵偿债务的条款），其借款数量增加就会导致他所能承担的风险下降。然而，佃农承担风险能力的下降此时就会对地主产生影响，他们的期望收入会因此而减少。

正式地讲，我们假设

$$Y = g\lambda(\Omega)f(e) \tag{27}$$

并且 $\lambda'>0$（我们在前面就假定 Ω 的值增加就表示风险变大）。现在，对于修改之后的佃农目标函数，其一阶条件就不再是式（21），而是

$$\int [Uh_{\Omega} + U_{\Omega} + U_{c}g\lambda'(\Omega)f(e)]dg = 0 \tag{28}$$

于是就可以得到

$$d\Omega/d\hat{B} \gtrless 0 \quad 当 \quad -\int [U_{c}h_{\Omega} + U_{cc}g\lambda' f]dg \gtrless 0 \tag{29}$$

---

21 可以认为，地主和佃农签订的合同是能够对种子的选择做出明确规定的。但是，正如我们在脚注9中所说明的那样，还有其他许多与生产技术有关的决策是无法在合同中做出具体规定的，或者说，即便是做出了具体规定，也很难监督和实施。当然，要对此展开更加详细的分析，并不是说将佃农的行为简单地分为“可以观察到的”与“无法观察到的”两类就可以了。与制定决策、签订合同以及监督和实施合同条款都需要花费成本一样，观察佃农的行为也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对于地主而言，这些成本的高低部分取决于他是否居住在劳动地点之外。因此，什么条款应该在合同中做出具体规定，应该是内生决定的。

如果 λ'充分小（λ'的取值范围由 U_{ccc} 的大小决定），那么我们前面的分析结论就不会受到影响。可以用下面的命题和评论来总结本节的分析。

命题3：当贷款协议中含有用劳动抵偿债务的条款时，或者当佃农的绝对风险厌恶程度递减时，佃农借款数量增加会使其所能承担的风险下降。此时，他就不会选择那些平均产出更高，但风险也更大的生产技术。这样就会降低风险中性的地主之收益。

评论：当贷款协议中含有破产条款时，佃农承担因借款数量增加而带来的风险的能力会增强，与贷款协议中含有用劳动抵偿债务的条款时相比，现在他选择的生产技术的平均产出更高，并且风险也更大。这样的选择会提高风险中性的地主的收益。

上述分析结论清楚地表明，地主的收益关键取决于，佃农是否向他借钱，以及如果向他借钱的话，借款的数量有多大。正式地说，地主影响佃农的生产技术决策的手段是，使佃农在生产期末支付的租金等于$\hat{B}$以及他从产出中得到的收入之和。重要的是，佃农的行为受租金和债务两者之和的影响，并且地主要知道这些值有多大。换言之，（不管是租金还是债务）虽然佃农承担的义务也许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重要的是，地主必须要能控制租金和债务之和。这就是地主使土地租佃合同与贷款合同相互关联的动机之所在（实际上，可以将佃农在生产期末支付的租金视为，在生产期初就支付的租金与期初到期末的贷款之和。在这一意义上讲，租金和贷款的义务是相同的）。

5. 地主贷款给佃农的均衡条款

我们首先考虑佃农借款数量增加会使得地主的期望收益下降（即佃农的借款行为有负外部性）的情形。在此情形中，虽然地主想限制佃农的借款数量，但是他不会一分钱都不借给佃农。限制佃农的借款数量显然会降低其期望效用；因此，在竞争性经济环境中，佃农就要求地主在其他方面给予一定的补偿，以弥补因限制其借款而产生的损失。于是，地主为了诱使佃农接受借款限制，就得以“优惠”利率借给佃农一定数量的资金，但是佃农的借款数量一旦超过给定的水平，地主就要收取非常高的利率，以限制这种“过度”借款行为。即使地主不能直接禁止佃农向其他贷款人借款，这种制度依然能发挥重要作用。原因在于，在此制度下，佃农向其他贷款人借款的成本会非常高：由于佃农总是会先向出租土地给他的地主借钱，所以其他潜在的贷款人肯定会对那些没有租种自己土地的佃农收取非常高的利率。

如果佃农向其他贷款人借到的资金数量是可以观察到的，那么在竞争均

衡状态下，土地租佃合同就会规定，分成比例（或者合同的其他条款）是佃农债务总额的函数。在此情形中，土地市场和信贷市场相互关联时的均衡状态，与两个市场相互分离时的均衡状态，是完全相同的。然而，如果对佃农的借款行为进行监督，以及收集相关信息需要花费成本，那么对于地主而言，由他自己来向佃农贷款自然更有利。

在佃农的借款行为有正外部性的情形中，地主就有动力去对佃农的借款行为进行补贴，并鼓励佃农向他借钱，这样佃农为了偿还贷款就要更加努力地劳动。Bardhan and Rudra（1978）指出，在西孟加拉地区，地主经常以低于市场利率的利息贷款给佃农，有时甚至会向佃农提供免收利息的消费信贷）。

现在正式分析地主的最优合同。我们将佃农的效用函数写为 $U^*(c_0,c_1,e)$，其中 c_0 为 0 期的消费，而且 $c_0 = W_0 + B$；W_0 表示佃农的初始财富，[22] B 表示佃农的债务总额；c_1 为第一期的消费，并且 $c_1 = \alpha f(e)g - B(1+r)$，其中 r 表示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利率。[23]一般而言，r 是 B 的函数；地主确定"贷款函数" $r(B)$，同时佃农选择贷款规模 B。由于我们假设所有佃农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选择的 $\{r,B\}$ 的值都是相等的。[24]有许多贷款函数都能诱使佃农选择同样的利率和贷款总额组合 $\{r,B\}$（实际上，任何使佃农的福利状况好于 $B=0$ 时状况的利率和贷款总额组合 $\{r,B\}$ 都能根据某个贷款函数推导出来）。因此，我们在假设地主能直接控制 r 和 B（或者是控制 $B(1+r)$ 和 B）的条件下，分析地主的行为。[25]假设 ρ 为地主的资本成本，我们可以将最优贷款视为地主的下列最优化问题的解[26]

$$\max_{\{B,B(1+r)\}} \bar{P} \equiv (1-\alpha)f(e) + (1+r-(1+\rho))B \tag{30}$$

---

22 为简化分析，我们在此假设 W_0 是一个参数。比如，它表示佃农以前存下来的储蓄总额。显然，在更加一般化的模型中，W_0 会受到合同条款的影响。

23 在此我们忽略佃农的借款行为对生产的直接影响。对这种影响的分析，参见第一部分第 7 点内容。

24 参见 Braverman and Guasch（1981）对自选择分离均衡的讨论。在此均衡中，异质性的佃农会从地主提供的贷款函数 r（B）中选出的利率和贷款数量组合 $\{r, B\}$ 并不相同。

25 如果佃农是异质性的，那么贷款函数的精确设定将变得更加重要。尽管这样，假如借款人的类型只有有限的几类，那么同一组选择仍然可以从多个贷款函数中导出。只有在借款人的类型为一个连续统这种特殊情形中，最优的贷款函数才会产生决定性作用。

26 在接下来的计算中，我们假设分成比例和土地耕种面积是外生给定的。当然，也可以认为它们是经过最优选择之后确定的。它们到底是外生给定的，还是经过最优选择之后确定的，这不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对此，请参见本文附录。

其中，为了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 $Eg=1$。此最优化问题的约束条件为

$$EU^{*}(W_0+B,\alpha f(e)g-(1+r)B,e)\geqslant\bar{U}$$

与前面一样，我们假设 U^{*} 对于 c_0 和 c_1 是可分的，即 $U^{*}=u(c_0)+U(c_1,e)$。于是，利用包络定理，并使用恒等式 $\hat{B}\equiv B(1+r)$，就可以得到

$$-\frac{dU^{*}/d\hat{B}}{dU^{*}/dB}=\frac{EU_c(c_1,e)}{u'(c_0)}=\frac{(1-\alpha)f'(e)de/d\hat{B}+1}{1+\rho}=-\frac{d\bar{P}/d\hat{B}}{d\bar{P}/dB}\tag{31}$$

相反，在竞争性信贷市场上，如果佃农和地主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是相同的（必须承认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那么就有

$$\frac{u'(c_0)}{EU_c(c_1,e)}=1+\rho\tag{32}$$

比较式（31）和式（32），我们就可以得到下列命题：

命题 4：如果 $de/d\hat{B}>(<)0$，即佃农借款数量增加能使其劳动努力程度上升（下降），那么地主提出的最优合同就会使佃农的借款数量大于（小于）其在竞争性信贷市场上的借款数量。

为了同时控制借出的资金总额（B）和应收贷款总额（$\hat{B}$），地主必须采用非线性贷款函数。[27]在脚注 27 中，我们讨论了地主只能收取线性利率的情形（显而易见，对地主能限制佃农的最高借款总额这种中间状态，可以用同样的分析框架去进行研究）。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都要注意到，佃农可以选择以储蓄的形式持有一定数量的初始财富，或者是选择借更少的贷款以确保其在第一期的消费；然而，即使佃农

27　在前面的分析中，地主提供的合同既要确定他借出的资金总额 B，同时又要确定其应收贷款总额 $\hat{B}=(1+r)B$。然而，地主不会允许佃农以利率 $r=(\hat{B}/B)-1$ 借到他想借的所有资金。地主会采用非线性利率函数去使佃农一直处在同一条期望效用曲线上。在第五部分，我们将考虑，假如地主不能采用非线性利率函数，并且不能通过降低分成比例 α 或土地耕种面积来对其因利率下降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此时期望效用约束不再是紧的），那么会发生哪些后果。我们注意到，如果地主不能限制贷款水平，或者无法“强迫”佃农贷款，但是可以宣布利率 r 不等于资本成本 ρ，并且还能改变分成比例 α，那么我们可以用下式来替换式（31）

$$\frac{EU_c g}{EU_c}=\left[1-\frac{1-\alpha}{\alpha}\frac{f'e}{f}\frac{\partial\ln e}{\partial\ln\alpha}-\frac{(r-\rho)}{f}\frac{\partial B}{\partial\alpha}\right]\div\left[1+\frac{\frac{(1-\alpha)}{\alpha}\frac{f'e}{f}\frac{\partial\ln e}{\partial\ln\hat{B}}}{}\frac{\partial\ln\hat{B}}{\partial\ln r}\frac{f}{rB}+\frac{dB}{dr}\frac{(r-\rho)}{B}\right]$$

地主确定的利率 r 是大于资本成本 ρ，还是小于 ρ，这取决于佃农的风险厌恶程度、劳动努力程度对分成比例（α）和应收贷款总额（$\hat{B}$）的弹性，以及应收贷款总额对利率的弹性。

完全了解借款总额为 B 时的后果，地主也会尽力诱使他借上这么多贷款。[28]

6. 违约条款

上一点的讨论并没有考虑违约条款。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用劳动抵偿债务的条款，会提高佃农的劳动努力程度，但同时会降低其风险承担能力。于是，就其对风险中性的地主的收益的影响而言，这两种效应是完全相反的。破产条款产生的影响又与用劳动抵偿债务的条款的影响完全相反：它会降低佃农的劳动努力程度，但是会增强其风险承担能力。所以，地主到底更倾向于在合同中采用哪一种违约条款，这取决于与劳动努力有关的道德风险问题更严重，还是与佃农的生产技术选择有关的道德风险问题更严重。例如，假如可以很容易监督并实施佃农的劳动努力程度，那么道德风险问题主要就体现在佃农的生产技术选择上，于是风险中性的地主就会更倾向于采用破产条款。另一方面，如果与佃农的劳动努力程度有关的道德风险问题，比与其生产技术选择有关的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那么地主就会更倾向于采用以劳动抵偿债务的条款。

7. 生产性贷款

为简化分析，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分析都假设：贷款只能用于消费，并且前期的借款总额与当期产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放松此假设，只需要对前面的分析略加修改。[29]假设产出不但是劳动努力程度的函数，而且还是借款总额的函数：[30]

28　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下列情况，即

$$\frac{EU_c(\alpha fg,e)}{u'(W_0)} > \frac{(1-\alpha)f'(e)\left.\dfrac{de}{d\hat{B}}\right|_{B=\hat{B}=0}+1}{1+\rho}$$

在此情形中，地主会诱使佃农向他借钱，但是若没有成功，则 $B=\hat{B}=0$。我们应该要注意到，也可能会出现下列情况，即

$$\left.\frac{EU_c\ (c_1,\ e)}{u'\ (c_0)}\right|_{B=\hat{B}=0} < \frac{1}{1+\rho}$$

在此情形中，佃农可以向其他贷款人借到钱。如果地主可以限制佃农这种行为，那么他就会尽力去限制佃农向别人借钱。如果地主没法限制佃农向别人借款的行为，那么他自己仍然会借钱给佃农。在这两种情形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现象。虽然在第一种情形中，相互关联的市场上并没有交易发生。

29　要分析佃农的效用函数不可分，所以 c_0 的变化会影响到劳动努力程度 e 这种情况，只需要对消费信贷模型做类似的修改就可以了。

30　在此模型中，我们假设贷款的产出弹性为单位弹性。更一般地讲，如果产出是劳动努力程度和另一种投入品 z 的函数，即产出为 $f(e,z)$，并且 z 是 B 的函数，即 $z(B)$，那么 $f(e,B)\equiv\tilde{f}(e,z(B))$。此时，方程式（34）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是对 f_B 的解释要略做修改。

$$Y = gf(e,B) \tag{33}$$

于是，（经过恰当修改后的）最优化问题式（30）的一阶条件就可以写成

$$\frac{EU_c}{EU_c\alpha gf_B} = \frac{(1-\alpha)f_e\partial e/\partial\hat{B}+1}{(1-\alpha)[f_e\partial e/\partial B+f_B]+(1+\rho)} \tag{34}$$

因此，地主就会考虑：（1）在增加佃农借款总额所产生的收益中，地主自己能分享的比例（$(1-\alpha)f_B$）；（2）借款总额增加后对佃农劳动努力程度的影响；（3）借款总额增加会使佃农的期望效用增加（并且因此就能让地主在满足佃农的参与性约束的前提下，改变其他合同条款，使其更有利于自己）。增加借款总额对佃农劳动努力程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31] 如果劳动努力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它与其他投入品是互补的（即 $f_{eB}>0$），那么增加佃农借款总额就能提高劳动的边际收益。但是，产出增加又会产生收入效应，而这种效用通常都会降低劳动努力程度。

当没有补贴时，佃农就会使得

$$EU_c(1+\rho) = EU_c\alpha gf_B \tag{35}$$

所以，地主究竟是补贴还是限制佃农的借款行为，取决于

$$f_e\partial e/\partial B+f_B \gtrless \frac{EU_c\alpha gf_B}{EU_c}\cdot f_e\frac{\partial e}{\partial\hat{B}} \tag{36}$$

显然，上述两个不等式都可能成立，这取决于互补性程度（f_{eB}）以及效用函数的特征。

8. 没有关联性时地主的行为对贷款人产生的外部性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强调了与贷款活动有关外部性对地主收入的影响。当违约的概率为正时，只要违约会影响贷款人的收益，那么同样也会出现反向的外部性（我们通常假定，违约会降低贷款人的期望收入，但是若有用劳动抵偿债务的条款，则它会提高贷款人的期望收入）。分析的思路与前面的讨论类似。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农场的平均产出，而是在地主分掉部分收益之后，佃农的收入不足以让其偿还借款的概率有多大。显然，这种概率会受到合同条款（比如分成比例、土地耕种面积、互补性投入品的供应量等）的影响，但是地主在确定最优合同时，并不会考虑合

31　（在保持 $\hat{B}$ 不变的前提下）将与劳动努力有关的一阶条件对 B 微分，就可以得到 $\frac{\partial e}{\partial B} = -\{\alpha f_{Be}EU_cg+\alpha^2f_Bf_e[E(U_{cc}g+U_{ec})g]\}\div\{\alpha f_{ee}EU_cg+\alpha f_eE[(U_{cc}\alpha f_e+U_{ce})g]+EU_{ee}\}$。

同条款对贷款人的影响。由于地主可以通过发放贷款给租种其土地的佃农来将这种外部性内部化，所以他将钱借给租种其土地的佃农得到的收益，会高于他将资金贷给其他人得到的收益。因此，这就是土地市场和信贷市场之所以会相互关联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9. 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

前面的分析表明，对于佃农任意一个固定不变的期望效用水平，地主都可以通过同时控制信贷市场和土地市场来提高其自身的期望收入。这实际上是说，土地市场和信贷市场相互关联的经济体中的效用可能性前沿，位于（因为法律限制等因素而使得）这两个市场相互分离的经济体中的效用可能性前沿之上；并且在竞争均衡中确实会存在这种不同市场相互关联的现象。然而，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地主是唯一的受益人；而且，这也不一定就表明，在一般均衡状态下，地主的福利状况肯定能得到改善。不同市场相互关联时新的均衡点（图 3 中的 *A* 点），可能（但并不是必然）会位于没有关联现象时的均衡点的东北边。此时，佃农和地主的福利状况都得到了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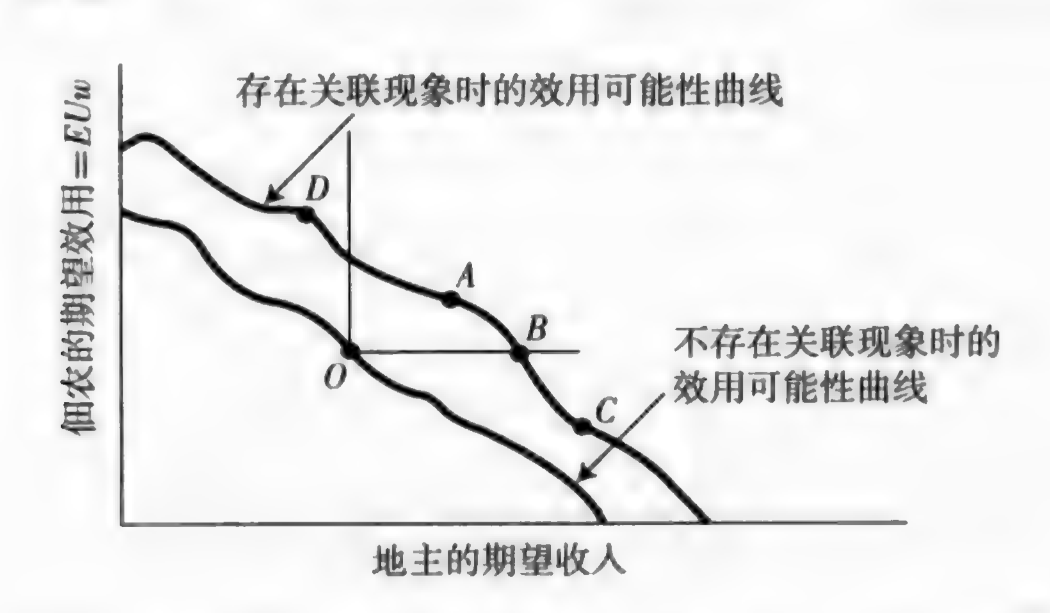


图 3 存在关联现象时的均衡与不存在关联现象时的均衡的福利比较

在图 3 中我们描绘了四种情形：在 *A* 点，地主和佃农的福利状况都得到了改善，他们共同分享了相互关联的市场带来的收益；在 *B* 点，佃农的效用水平没有变化，地主占有了相互关联的市场带来的全部收益；在 *C* 点，不同市场相互关联的结果，使佃农的福利状况恶化，关联市场的所有收益都由地主享用；在 *D* 点，不同市场相互关联的结果，使地主的福利状况恶化，关联市场的全部收益都归佃农所有。

在竞争性的经济环境中，我们可以肯定 *C* 点或 *D* 点表示的情形都会发生。在理论上讲，很容易确定市场相互关联的现象对佃农的福利的影响。我

们可以推导出对劳动力的拟需求曲线（a pseudo demand curve）。现在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劳动力价格（工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佃农的期望效用来概括合同的主要特征。当佃农的期望效用较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比较少，这可以在图4中画出来。需要注意的是，图4假设佃农的供给是完全没有弹性的。[32]竞争均衡就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即图4中的O点）。不同市场相互关联的现象，可能会使需求曲线向上移动，此时佃农的福利状况得以改进（图4中的D点）。如果关联现象使需求曲线向上移动的幅度足够大，那么地主就要为雇佣佃农展开激烈的竞争，以至于地主的福利状况会恶化。然而，需求曲线也可能会向下移动，此时佃农的福利状况就会恶化（图4中的C点）。如果在佃农的某个特定的期望效用水平上，最优的"关联"合同规定的每个佃农的耕种面积，小于（大于）非关联合同规定的耕种面积，那么就存在对佃农的过度供给（需求）；于是，在存在关联现象的均衡状态中，佃农的期望效用就会低于（高于）其在没有关联现象的均衡状态中的期望效用。计算最优耕种规模与关联性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复杂，所以我们把计算过程放在本文的附录之中。附录中的分析表明，在一些合理的前提条件下，（当佃农的期望效用水平给定时）不同市场相互关联的现象会使每个佃农的耕种面积增加，并导致佃农的福利状况恶化。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考虑一个生产函数为科布—道格拉斯函数的经济体。我们已经知道，在最优合同中，佃农的分成比例等于劳动收入占总产出的比重S_w（其中S_w为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劳动力的指数）（Stiglitz，1974）。不管借款数量是多少，此分成比例都是最优的比例。因此，贷款条件改变后，必须要通过改变耕种面积来抵消其影响。如果关联现象限制了借款行为（只要命题1和命题4中的条件成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佃农的福利水平就会下降；为了对他们进行补偿（使其期望效用水平等于没有关联时的效用水平），地主就要增加每个佃农的耕种面积；这样就会减少对佃农的需求，因此一般均衡效应就与局部均衡效应相当。

反之，如果关联现象鼓励了借款行为（见命题1和命题4），佃农的福

32　对于劳动力的供给具有弹性的情形，分析的思路类似。关键的区别是：如果佃农的供给曲线（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是向上倾斜的，并且在一个固定不变的佃农期望效用水平上，不同市场相互关联能使每个佃农的耕种面积增加，那么在均衡状态下，当土地面积固定不变时，每个佃农的耕种面积会增加。相应地，佃农的数量就会减少。相反，如果不同市场相互关联使得每个佃农的耕种面积减少，那么佃农的均衡数量就会增加。因此，可以根据关联现象对每个佃农的耕种面积的影响，来推断其福利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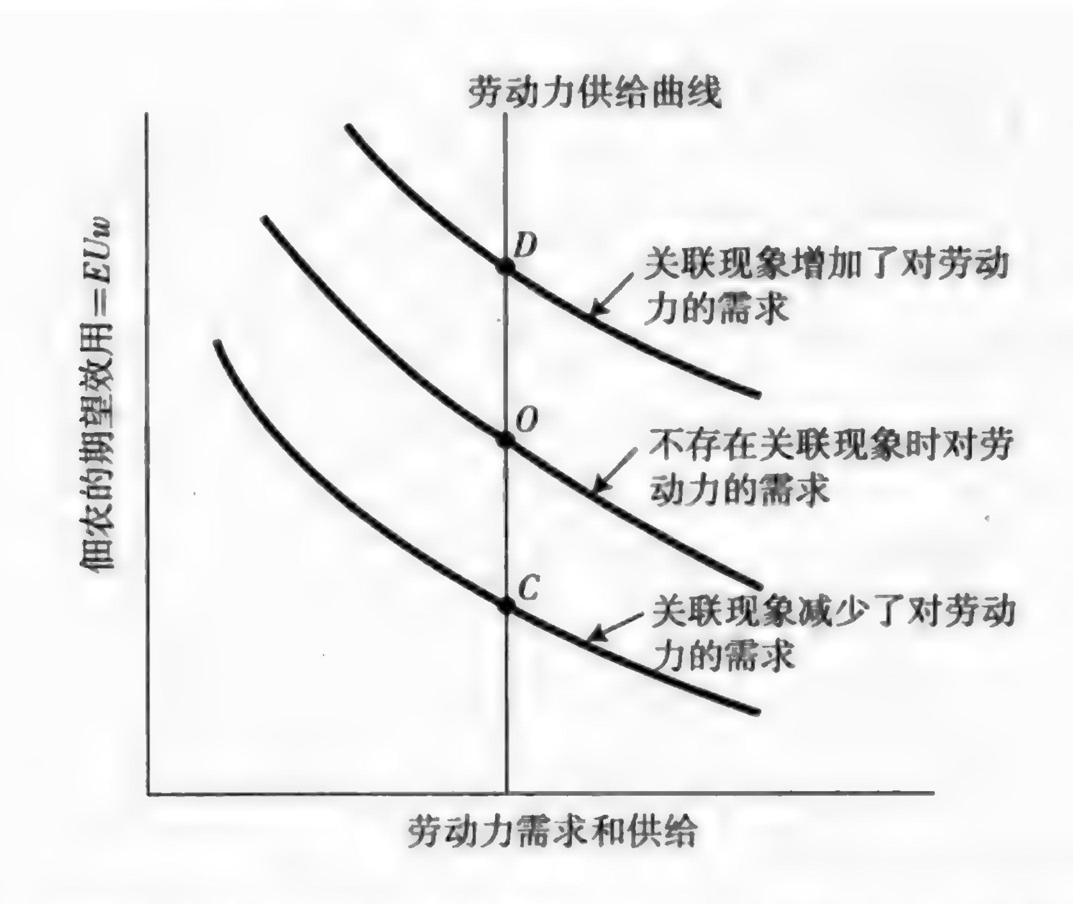


图4　土地租佃市场存在关联现象时和不存在关联现象时的竞争均衡

利状况就会因此而得到了改善；为了使佃农的期望效用水平保持不变，就要减少每个佃农的耕种面积；这样就会增加对佃农的需求，于是一般均衡效应再次与局部均衡效应相当。不过，在更一般化的情形中，一般均衡效应和局部均衡效应并不必然具有相同的性质。[33]

在第四部分，我们将分析非竞争性环境中不同市场相互关联的影响。

二、相互关联的产出品买卖合同和租佃合同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假设，对于地主和佃农而言，产出品及原材料价格都是外生给定的。所以，地主和佃农面临的各种价格是一样的。然而，实际上最常见的情况是，地主既会购进及销售佃农的产品，又会卖原材料给佃农。[34]对产出品买卖合同和租佃合同相互关联现象的分析，是否与前面对信贷合同和租佃合同相互关联现象的分析类似?[35]在本部分中，我们主要分析

33　在许多存在风险的情形中，都会出现这个一般性特征。参见 Newbery and Stiglitz（1982）的分析。

34　为简化起见，在本部分我们集中关注产出品买卖合同与租佃合同相互关联的现象。当然，对于地主销售原材料给佃农这种现象的分析与此类似。

35　另外还有几个原因使得地主可能会买卖佃农的产出品。如果地主要求佃农只能与他一个人买卖产出品，那么地主很容易就能监督产出，并保证他自己能获得合同规定的分成收益。另一个原因是，产品买卖活动本身就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因此由一个专业人士来买卖多种产出品更有效率。而地主就能提供这种专业化的产品买卖服务。

投入品买卖合同和租佃合同相互关联的现象。下一部分我们再考虑消费品买卖合同和租佃合同相互关联的现象。我们的分析表明：（1）如果只有一种投入品，并且在利用合同来规定成本分担和收益分成份额时不会受到任何限制，那么投入品买卖合同和租佃合同相互关联并不能带给地主任何额外收益；（2）如果在确定成本分担规则时受到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如果确定成本分担规则时需要考虑多种投入品），那么投入品买卖合同和租佃合同相互关联就能让地主获得额外的收益。

通常的说法是，通过买卖产出品，地主能够明显地（用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进佃农的产出品这种方法）攫取更多的剩余产品；或者是隐性地（用收取更高的销售价格这种方式）攫取更多的剩余。然而，在佃农的期望效用保持不变的均衡分析框架中，虽然地主拥有的足够多的控制措施，并且通过将佃农的效用水平降低到其保留效用水平而获利，但是地主无法再攫取更多剩余了。因此，我们自然就会问：在这样的环境中，控制产出品和原材料的价格，是否为地主提供了另一种激励佃农（并攫取更多剩余）的手段？

考虑没有不确定性时佃农的决策问题。假设地主和佃农都面临同样的原材料价格 P_x（比如，肥料是从村合作社购买的）。为了方便表达，我们将肥料的价格单位化，即令 $P_x=1$，然而，地主以价格 P_T 向佃农收购产出品，收购价 P_T 不同于地主销售产出品的市场价 P_L。所以，佃农的收入就是

$$Y_T = \alpha P_T f(e,x) - \beta x \tag{37}$$

其中 α 和 β 分别表示佃农的产出分成份额和成本分担份额。并且佃农的目标是使下式最大化

$$\max_{(e,x)} U(Y_T(e,x),e) \tag{38}$$

根据此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我们可以得到

$$f_x = \beta/\alpha P_T \tag{39}$$

$$f_e = -U_2(Y_T,e)/U_1(Y_T,e)\cdot \alpha P_T \tag{40}$$

因此，佃农的决策完全由控制变量 β 和 αP_T 确定。我们定义 $\hat{\alpha}\equiv\alpha P_T$，并将佃农的努力函数和投入品供给函数分别写成 $e=e(\hat{\alpha},\beta)$ 和 $x=x(\hat{\alpha},\beta)$。

现在我们转而分析地主的决策问题，并确定除了影响 $\hat{\alpha}$ 之外，P_T 是否还会产生其他影响。在产出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为 P_L，并且保证佃农的效用不变的前提下，地主使其自身收入最大化，即

$$\max_{\{\alpha,\beta,P_T\}} (1-\alpha)P_L f[e(\hat{\alpha},\beta),x(\hat{\alpha},\beta)]-(1-\beta)x(\hat{\alpha},\beta)$$

$$\text{经 } U[Y_T(\hat{\alpha},\beta,P_T),e(\hat{\alpha},\beta)]=\bar{V} \tag{41}$$

可以将方程式（41）改写为

$$\max_{\{\alpha,\beta,P_T\}} P_L f - x - Y_T \tag{42}$$

上式中的最后一项是佃农的收入。对式（41）中的约束条件进行变换，我们就可以得到

$$Y_T=\phi[\bar{V},e(\hat{\alpha},\beta)] \tag{43}$$

将式（43）代入式（42），就能得到

$$\max_{\{\hat{\alpha},\beta\}} P_L f(\hat{\alpha},\beta)-x(\hat{\alpha},\beta)-\phi(\bar{V},\hat{\alpha},\beta)=\Pi(\hat{\alpha},\beta) \tag{44}$$

根据上式，显然就可以发现，地主只关心$\hat{\alpha}$，而不会既关心α又关心P_T。因此，就能得到下列命题：

命题5：在必须保证佃农的效用不变，并且确定成本分担和收益分成份额时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地主可能会以市场价向佃农收购产出品，即$P_T=P_L$。然而，如果受社会规范或法律的约束，确定成本分担和收益分成比例时存在一定的限制，那么地主就能用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产出品这种方式（即$P_T<P_L$），从佃农手中攫取更多剩余，并且这样做也不会带来任何效率损失。

类似的分析表明，为什么将信贷活动与产品买卖活动关联起来，符合处于垄断地位的地主的利益。假如他在购买农民的产出品时只支付一个价格，那么他确定的这个价格会使得额外购买一单位产出品的边际成本等于销售这一单位产出品的边际收益。但是，由于地主确定的收购价通常都低于边际成本，所以（从地主的角度看）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就不够高。如果地主能诱使佃农在给定价格水平上生产出更多产品，那么地主的利润就会提高。因此，对贷款进行补贴就符合地主的利益。

还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即如果有多种投入品，地主把第i种投入品卖给佃农的价格为P_i（我们将地主购进所有投入品的价格都标准化为1），并且由佃农分担的第i种投入品成本的比例为β_i，那么佃农的行为就完全由控制变量$\{\beta_i P_i,\alpha P_T\}$决定。类似地，地主的利润也是这些控制变量的函数。因此，在任何均衡状态下，地主都能把每一种投入品的销售价定为$P_i=1$（即所有投入品的成本都由地主承担）。但是，再强调一遍，如果对

β_i 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如果有些成本分担规则必须要考虑所有投入品时），那么因为对每种投入品而言，$\{\beta_i P_i\}$ 的最优值都各不相同，所以每种投入品的最优价格也必定不一样。然而，要注意到只有通过改变各种投入品的相对价格，地主才能从投入品买卖合同和租佃合同相互关联之中获利。

三、相互关联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品市场

上一部分的分析结果表明，与地主只是简单地改变他强加给佃农的“合同”这种方式相比，即使地主能通过控制产品市场来剥削工人，他也无法攫取更多剩余。[36]对于地主能控制消费品市场这种情形，此结论就不成立了。我们假设典型的佃农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V = V(C, \underline{p})$ 。一般而言，V 和 e 对 C 和$\underline{p}$都是零次齐次的。换言之，只要处于垄断地位的地主不改变各种消费品的相对价格，那么地主拥有销售消费品给佃农的商店这个事实，并不会影响到他剥削佃农的能力。

然而，地主肯定想改变各种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以鼓励佃农消费那些与劳动努力互补的商品，并约束佃农消费哪些与闲暇互补的商品。[37]因此如果地主能控制消费品市场，那么他的收益就会增加。此外，这个分析结论同时合理地解释了，地主为佃农提供米饭及部分实物报酬，而不是完全支付货币工资的现象。[38]

四、卖方垄断、买方垄断、竞争及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均衡

在本文的绝大部分分析中，我们都没有区别处于垄断地位的地主和处于竞争性环境中的地主。对这两种地主而言，其目标都是设计合同使得佃

36 这就是 Newbery（1975）在批评 Bhaduri（1973）认为相互关联的信贷合同和租佃合同妨碍了技术创新这种论断时提出的观点。参见 Srinivasan（1979）以及 Braverman and Stiglitz（1981b）对此问题的分析。

37 我们省略了处于垄断地位的地主的最优定价策略的详细推导过程。它与最优商品税的标准分析完全相似。在分析最优商品税时，政府的决策问题是，在满足给定的预算约束条件下，使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在分析处于垄断地位的地主的最优定价策略时，我们要考虑一个对偶问题，即在必须要使佃农的效用维持在生存水平上这个约束条件下（此约束条件并不一定是紧的），使地主的收入最大化。

38 对于消费品市场和土地市场相互关联的现象，还有另外一种分析思路。这种分析以消费者对其与整个关联合同有关的“实际”收入的错误认识为基础。即他们更看重其当时得到的一些补贴（比如，贷款和食物），而轻视那些今后将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的合同条款。

农的参与性约束得到满足时，其自身的期望利润实现最大化。不同类型的地主所带来的唯一差异体现在佃农的效用水平上。在只有一个地主这种垄断情形中，佃农的效用仅能达到生存水平；在多个地主相互竞争的情形中，使得佃农的供给和需求相等的那个效用水平，就是佃农的实际效用水平。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在此分析框架中，即使是在均衡状态，仍然存在失业（剩余劳动力）。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所刻画的均衡的特征是，地主在满足佃农的参与性约束条件下，使其自身的期望利润最大化。在这里，满足佃农的参与性约束是指，地主向佃农提供一份合同，根据这份合同，佃农能达到的期望效用水平至少与他在其他地方所能达到的效用水平同样高。在许多情形中，这个约束条件都不是紧的。例如，在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1957）、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1976）以及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76）等人所分析的效率工资模型中，就存在能使每效率单位的劳动力成本最小化的工资。即使能以更低的工资雇佣到劳动力，地主也不会那么做。原因在于，那样会提高他的劳动力成本。当工资更低时，不但佃农的劳动效率会更低，而且因为劳动效率低下，此时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成本会大于其支付“效率工资”时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成本。类似地，尽管地主能降低佃农的收益分成比例或土地耕种面积，但是这么做也不能让地主获利。原因在于，他自己的期望利润会因此而下降。此时，即使是在竞争性市场的均衡状态下，仍然会出现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的现象，即存在非自愿失业（这种失业均衡出现的条件是，每公顷的产出随每个佃农的土地耕种面积的增加而上升。Braverman and Srinivasan（1981）的分析表明，在生产函数对土地和劳动力都是规模收益不变的函数时，这种情况不可能会出现）。

在这些情形中，不同市场相互关联的现象就有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含义。例如，如果地主能以优惠利率贷款给佃农这种方式诱使佃农更加努力地劳动，那么（不管是在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情形中）不同市场相互关联的现象就可以增加地主的期望利润。尽管在此情形中，不同市场相互关联对地主的福利影响是很清楚的，但是其对佃农的福利影响就无法确定：（1）受雇佣的佃农数量可能会增加，也可能会减少，这取决于不同市场相互关联对每个佃农的最优耕种面积的影响；（2）对于那些租到了土地的佃农而言，他们的福利状况既可能会得到改善，又可能会恶化。

考虑佃农的消费由酒（这会使其劳动努力程度下降）和食物（这会使

其劳动努力程度上升）两者组成的情形。假定地主通过改变酒对食物的相对价格，他可以诱使佃农显著地改变其花在这两种商品上的收入比重（假设此两种商品的替代弹性非常高）。于是，这不但会提高佃农的劳动努力程度，而且也可以使增加佃农的耕种面积或分成比例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上升。例如，假如像图5所描绘的那样，效率工资显著地上升，那么对那些租到了土地的佃农而言，他们的福利状况就得到了改善（显然，虽然劳动努力程度可能会提高，但是增加工资的边际收益也许会下降；因此处于垄断地位的地主可能会降低工资，并且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相互关联也会使得佃农的福利水平下降）。类似地，如果每个佃农的最优耕种面积增加，那么失业率就会上升；同样地，如果每个佃农的最优耕种面积减少，那么失业率就会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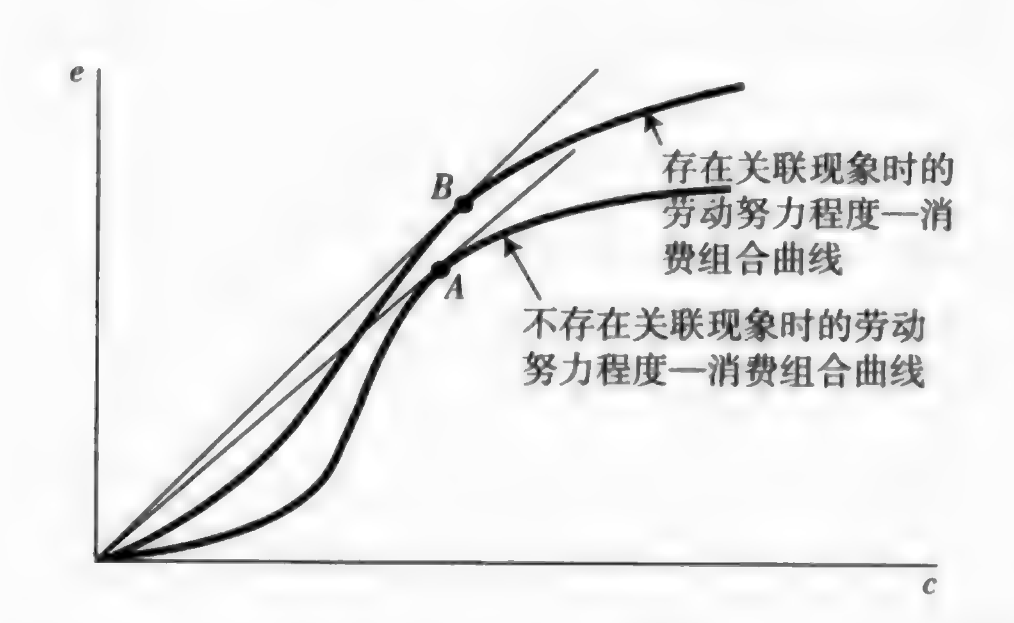


图5　商品市场与土地/劳动力市场相互关联导致佃农消费水平更高的例子

我们已经在本部分指出，对一个竞争性市场中的关联现象进行分析，与对只有一个地主的垄断市场中关联现象的分析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但是，在佃农的期望效用约束是紧的情形，与该约束不是紧的情形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然而，关键是要认识到，不管佃农的期望效用约束是否是紧的，它本身都会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换言之，佃农的期望效用约束会受到地主所掌握的剥削手段的影响。例如，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地主也许会采用非线性贷款的手段。此时，利率是借款数量的函数。然而，如果有二级贷款市场，那么佃农相互之间就可以进行借贷，这样地主不得不对所有贷款都收取同样的利率。因此，如果地主降低贷款利率以诱使佃农向他借更多钱，并且地主在减少佃农的收益分成比例和土地耕种面积时受到一定的限制，或者是地主发现这么做并不

符合自己的利益，那么佃农的期望效用水平就会超过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如果地主能对佃农征收总额税，那么他就会再次将佃农的期望效用水平压低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

五、结论

本文对道德风险问题非常严重的情形中各种合同相互关联的现象给出了经济解释。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租佃合同条款的最优决定上，不过在习俗或法律对某些合同协议做出了一定限制的情形中（比如，禁止或限制收取利率的高利贷法律）[39]，本文对各种合同相互关联的现象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更有说服力。

我们也注意到，本文并没有分析异质性地主和佃农对各种合同相互关联现象的影响。例如，信贷合同和租佃合同相互关联，也许就是地主识别能力更强的佃农的一种手段（参见 Franklin Allen（1980）以及 Braverman and Guasch（1981）的分析）。进一步地，我们的分析主要关注给定时点上各个市场相互关联的影响；类似的分析还可以拓展至不同时点上各市场相互关联的影响。这样就能得到佃农和地主会签订长期合同的结论。在此情形中，尽管可能会（在合同签订之前）存在事前的竞争，但是事后的竞争是非常有限的。[40]这种影响非常重要，不过我们无法在此展开详细的分析。

尽管我们已经指出，各种合同相互关联的现象，并不是表明欠发达国家的农业市场是非竞争性市场的证据，但是显然这些关联性既有分配效应，又有配置效应。通过限制地主的买卖活动或信贷活动来削减其“权力”的做法，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降低农业产出，并使佃农的福利状况恶化。在另外一些条件下，[41]这种做法既能增加农业总产出，又能改善佃农的福利状况，只有地主的利益受到损害。显然，还需要做深入的实证研究来确定，在任何特定情形中，到底哪一种可能性最大。然而，我们的一个研究结论是，在许多情形中，竞争性和非竞争性市场看起来十分相似（比如，就地主所采用的关联的类型而言就是如此）。因此，要

---

39 显然，在这些情形中，相互关联的合同能有效地回避这些限制。因此，即使在没有道德风险问题时，仍然可能会出现各种合同相互关联的现象，本文已经对此进行了重点分析（参见 Braverman and Srinivasan（1981）对此问题的分析）。

40 参见 Stiglitz and Weiss（1980）对信贷市场上事前的竞争和事后的竞争的分析。

41 这些条件是，只有一个地主，而且期望效用约束不是紧的。

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区分，就需要做更加详细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比此领域中通常所做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研究可能要细致得多。我们希望，本文的研究已经证明了，那些采用匿名市场、同质性商品和能对生产投入进行完美监督等假设的简单化的模型（不管它们是竞争性的，还是非竞争性的）很可能有极大的误导性。

附录：在佃农的期望效用保持不变的均衡中，成本分担和收益分享份额可变条件下的均衡耕种面积的决定

设$f(el)$为每公顷的产出，所以f/l就是每个佃农的产出。设a和l都是可变的。并且假设$Eg=1$。地主必须要选择$\{\alpha,l\}$去使得

$$EU\left(\frac{\alpha f(el)}{l}g-\hat{B},e\right)=\overline{U} \tag{A1}$$

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

$$d\alpha/dl|_{\overline{U}}=\alpha(f-f'el)/lf=\alpha(1-S_w)/l \tag{A2}$$

其中$1-S_w=(f-f'el)/f$为地主的收益占总产出的比重。此外，由于与劳动努力程度有关的一阶条件为

$$EU_c\alpha f'g+EU_e=0 \tag{A3}$$

所以，为简化分析假设效用函数是加性可分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等效用合同中有

$$\left.\frac{l}{e}\frac{de}{dl}\right|_{\overline{U}}=-\frac{\alpha f'[1-\gamma-S_w]EU_cg}{elEU_c\alpha f''(el)g+EU_{ee}e}=\frac{1-S_w-\gamma}{\gamma+v} \tag{A4}$$

其中$\gamma=-f''el/f'$并且劳动努力的供给弹性为$v=EU_{ee}e/EU_e$。

地主（每公顷）的期望利润为$(1-\alpha)f(el)$。因此，最优的合同就要能使下式成立

$$f\left[(1-\alpha)S_w\left(1+\left.\frac{d\ln e}{d\ln l}\right|_{\overline{U}}\right)-\alpha(1-S_w)\right]=0 \tag{A5}$$

即

$$\frac{\alpha}{1-\alpha}=\frac{S_w}{1-S_w}\left(1+\left.\frac{d\ln e}{d\ln l}\right|_{\overline{U}}\right) \tag{A6}$$

例如，如果$d\ln e/d\ln l|_{\overline{U}}=0,\alpha=S_w$，并且根据式（A4），生产函数为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即$\gamma=1-S_w$，那么就有$d\ln e/d\ln l|_{\overline{U}}=0$。于是，对于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而言，当我们改变$(1+r)B$时，最优的分成比例

会保持不变。所以，为了使期望效用水平保持不变，当我们在固定的借款水平上提高利率时，就要增加耕种面积。因此，不同合同相互关联的现象就减少了劳动力需求，并且导致佃农的福利状况恶化。

更一般地，我们发现替代弹性 $\sigma = (1 - S_w)/\gamma$。将其代入式（A4），我们就可以得到

$$\left.\frac{d\ln e}{d\ln l}\right|_U = \frac{(1 - S_w)(1 - 1/\sigma)}{(1 - S_w)/\sigma + v} = \frac{(1 - S_w)(\sigma - 1)}{(1 - S_w) + v\sigma} \gtrless 1 \quad \text{当} \quad \sigma \gtrless \frac{2(1 - S_w)}{1 - S_w - v} \tag{A7}$$

因此，就有

$$\alpha/(1 - \alpha) = S_w/(1 - S_w) + S_w(\sigma - 1)/(1 - S_w + v\sigma) \tag{A8}$$

虽然一般都是用式（A8）来刻画均衡的主要特征，但是关键是要注意到（除了一些特殊情形之外）γ，α，S_w，σ 和 v 都是内生变量。然而，我们可以利用式（A8）得出一些与各种合同相互关联的效应有关的结论。首先，我们假设 B 保持不变，但是利率上升（佃农借款是为了应对前一期发生的突发事件）。假设为了让 U 保持在同一水平上而使 l 不发生改变，于是 α 必须要提高。因此，e 就会增加。这是因为 α 和 $(1 + r)B$ 都增加了。如果替代弹性大于 1，e 增加就会使得 S_w 上升。于是，式（A8）中等号左边和右边的值都会增加。如果等号右边的值增加得更多，那么就意味着，在使佃农的期望效用保持不变，并且不改变佃农的耕种面积的合同中，α 的值太小了。于是，α 必须上升，每个佃农的耕种面积必须减少。因此，对佃农的需求就会增加，佃农的期望效用水平也会上升。在替代弹性非常大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替代弹性只是略大于 1，那么等号左边的值就会大于右边，于是 α 就要降低，（假如要保持每个佃农的期望效用水平不变）每个佃农的耕种面积就要相应地增加。这些变化会使劳动努力程度上升，但是上升的比例低于耕种面积增加的比例；于是，el 就会下降，这会使得式（A8）中等号右边的值减少；α 会不断下降，直到式（A8）中等号两边的值相等时为止。因此，在此情形中，各种合同相互关联的现象致使劳动力需求下降，并使得佃农的期望效用水平降低（对其他情形的分析留给读者作为练习）。

参考文献

Allen, Franklin, "Control of Capital, Sharecropping,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mimeo, Nuffield College, Oxford, 1980.

Arnott, Richard and Stiglitz, Joseph E., "Equilibrium in Competitive Insurance Markets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oral Hazard," paper presented to NSF-Bell Laboratorie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May 1980.

Bardhan, Pranab K., "Interlocking Factor Markets and Agrarian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Issue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March 1980, *32*, 82–98.

______ **and Rudra, A.,** "Interlinkage of Land, Labour and Credit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Village Survey Data in East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February 1978, *13*, 367–84.

______ **and Srinivasan, T. N.,** "Crop Sharing Tenancy in Agricultur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71, *61*, 48–64.

Bell, Clive and Zusman, Pinhas, "A Bargaining Theoretic Approach to Cropsharing Contra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76, *66*, 578–88.

______,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Credit and Tenancy Contracts,"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mimeo., March 1980.

Bhaduri, Amit, "Agricultural Backwardness Under Semi-Feudalism,"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73, *83*, 120–37.

______, "On the Formation of Usurious Interest Rates in Backward Agricultur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December 1977, *1*, 341–52.

Binswanger, Hans P. et al., "Common Features and Contrasts in Labor Relations in the Semi-Arid Tropics of India," in H. Binswanger and M. Rosenweig, eds., *Rural Labor Markets in Asia: Contractural Arrangements, Employment and Wag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Bliss, Christopher J. and Stern, Nickolas H., *Palanpur-Studies in the Economy of a North Indian Village*,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Braverman, Avishay and Guasch, Jose Luis,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Interlinked Credit and Tenancy Contracts," World Bank, Development Economics Department, Public Finance Division discussion paper, September 1981.

______ **and Srinivasan, T.N.,** "Credit and Sharecropping in Agrarian Societ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December 1981, *9*, 289–312.

______ **and Stiglitz, Joseph E.,** (1981a) "Moral Hazard, Incentive Flexibility and Risk: Cost Sharing Arrangements Under Sharecropping," World Bank, Development Economics Department, Public Finance Division discussion paper, 1981.

______ **and** ______, (1981b) "Landlords, Tenants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s," World Bank, Development Economics Department, Public Finance Division discussion paper, 1981.

Cheung, Steven N.,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Diamond, Peter and Stiglitz, Joseph E., "Increases in Risk and in Risk Aversion," *Journal of Economics Theory*, July 1974, *8*, 337–60.

Jaynes, Jerald, "Economic Theory and Land Tenure," in H. Binswanger and M. Rosenzweig, eds., *Rural Labor Markets in Asia: Contractural Arrangements, Employ-*

ment and Wag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Leibenstein, Harvey,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Wiley, 1957.

Marshall, Alfred,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20.

Mirrlees, James, "A Pure Theory of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 in L. Reynolds, ed., *Agriculture in Development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Mitra, Pradeep, "A Theory of Interlinked Rural Transac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2, forthcoming.

Newbery, David M. G., "Tenurial Obstacles to Innov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July 1975, *11*, 263–77.

______, "Risk Sharing, Sharecropping and Uncertain Labor Marke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October 1977, *44*, 585–94.

______ **and Stiglitz, Joseph E.,** "Sharecroping, Risk Shari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Imperfect Information," in J. A. Roumasset et al., eds., *Risk, Uncertaint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EARCA, A.D.C. Publication, 1979.

______ **and** ______, "Risk Aversion, Supply Response and the Optimality of Random Prices—A Diagrammatical Analysi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82, *97*, 1–26.

Reid, Joseph, "Sharecropping as an Understandable Market Response: The Post Bellum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March 1973, *33*, 106–30.

______, "Sharecropping and Agricultural Uncertai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April 1976, *24*, 549–76.

______, "Tenancy in American History," in J. A. Roumasset et al., eds., *Risk Uncertaint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EARCA, A.D.C. Publication, 1979.

Rothschild, Michael and Stiglitz, Joseph E., "Increasing Risk I: A Defin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September 1970, *2*, 225–43.

Srinivasan, T. N., "Agricultural Backwardness under Semi-Feudalism," *Economic Journal*, June 1979, *89*, 416–19.

Stiglitz, Joseph E., "Incentives and Risk Sharing in Sharecropp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April 1974, *61*, 219–56.

______, "The Efficiency Wage Hypothesis, Surplus Labo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LDC'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July 1976, *28*, 185–207.

______,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______ **and Weiss, Andrew,**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81, *71*, 393–410.

______ **and** ______,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Part II," unpublished mimeo., 1980.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21[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10[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